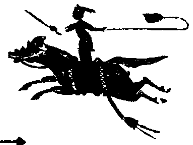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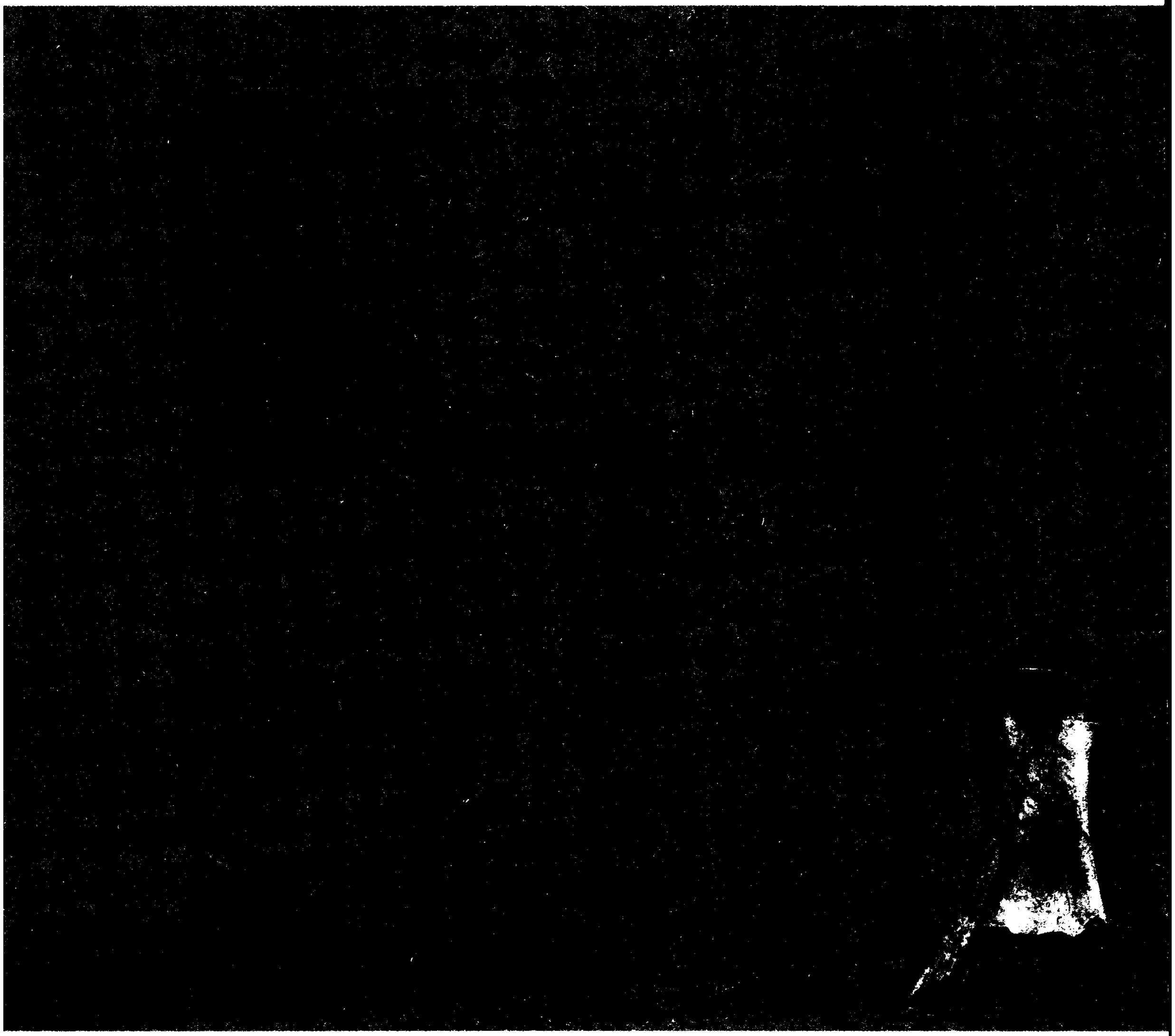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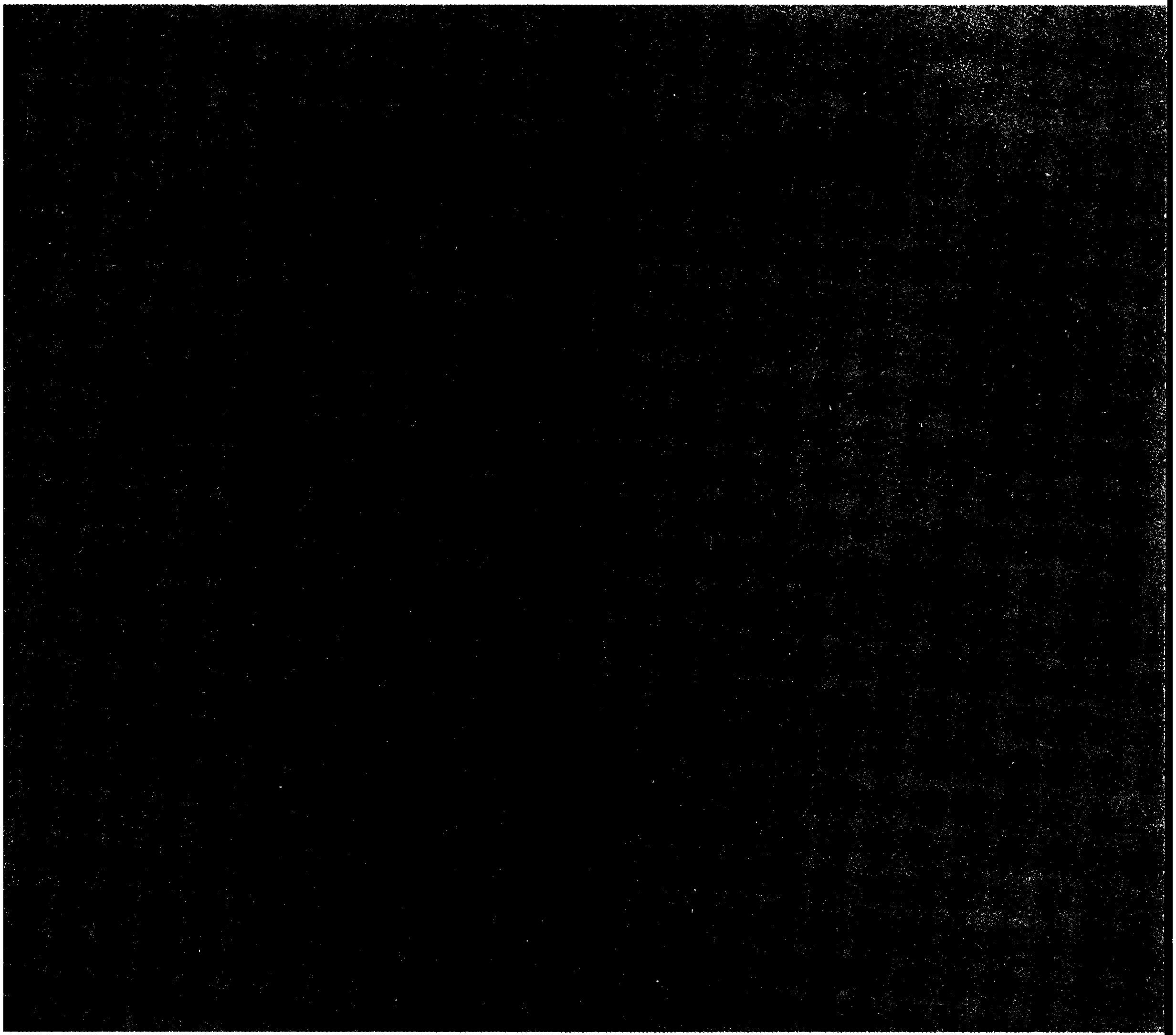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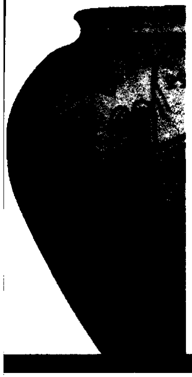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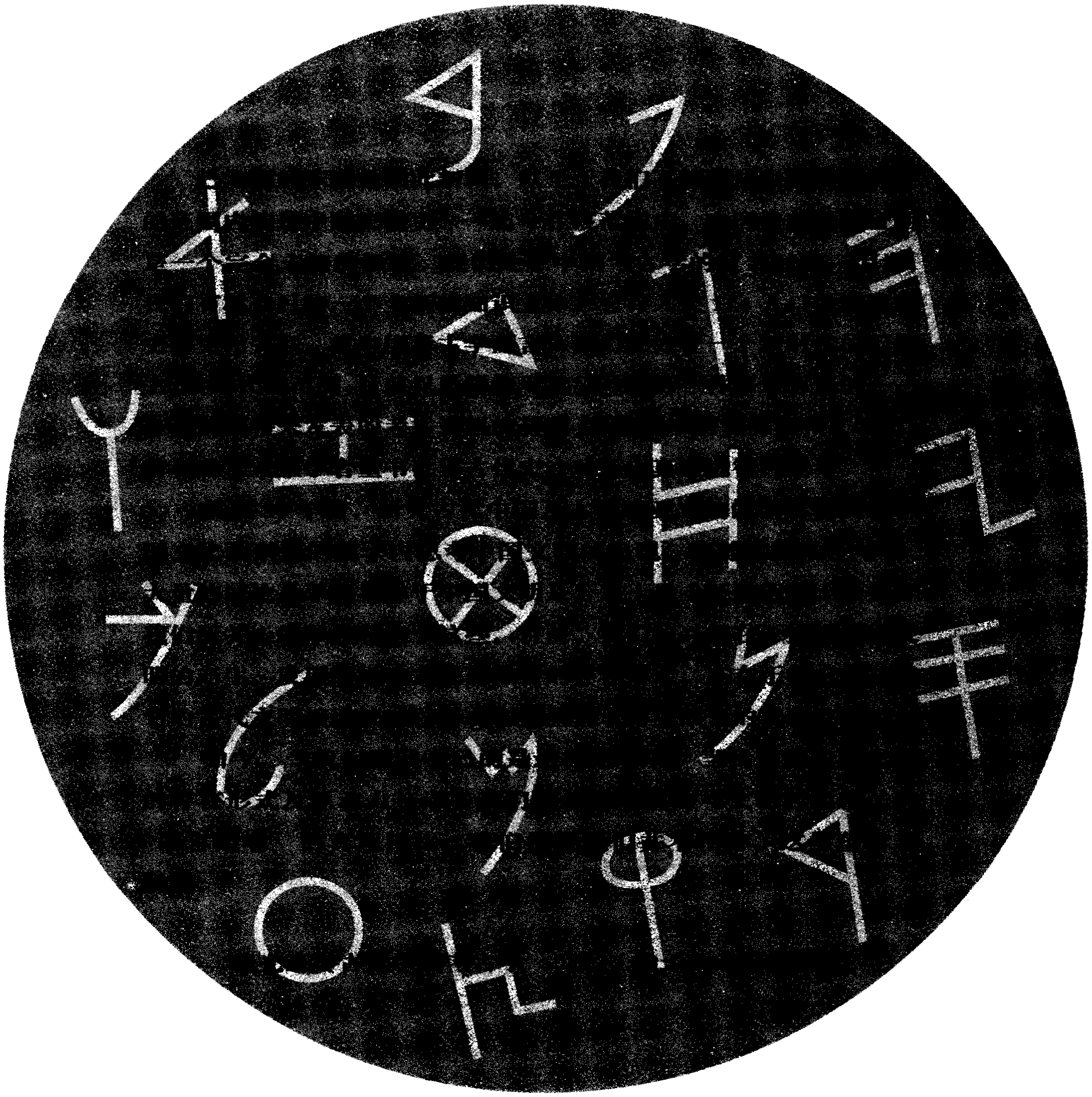
目录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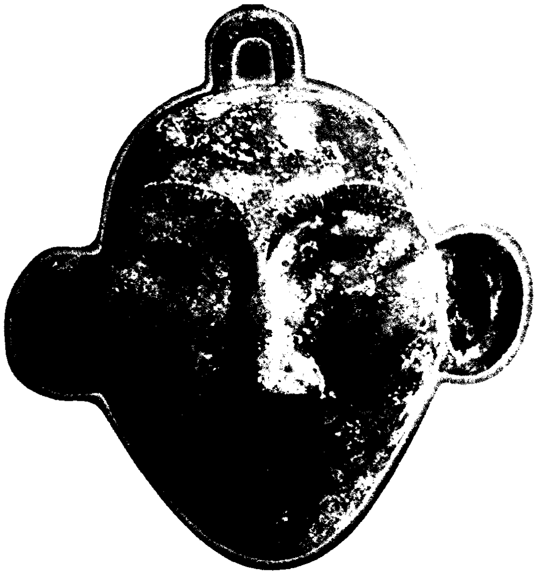


目录

目录

第一部分

汪洋中的古代中国



[illegible]

张光直在《商文明 · 后记》中说：“我们可以预料，将来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出现，我们的结论可能会变化。”考古学的“变”是正常的，并且也是常常出人意外的。比如三星堆与河姆渡的发掘都“突然”改变了黄河中心论。但有时并不是地下文物而是科研新发现新理论，也可以改变一些旧结论。

最近公布的DNA技术鉴定，证明中国人与中国本土的早期人类化石皆无关联。但中国古代确实又发现那么多化石，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学科的一个新发现可能解释了这个原因。

几年前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无意中发现，距今大约10万年到4万年之间，中国地区，尤其是北回归线以北地区，有一个明显的化石断层，这个时期内很少有人类化石发现。有人推测说这期间第四纪冰川的顶峰期使人类被压迫到赤道一线①。这个“断层”的发现与总结是个非常重要的科研成果，它暗示或提醒了人类学几方面的意义。

简单地说，基于这个发现，假如要探讨中国的文明史与人类起源史，放弃大约4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与中期的分析，直接从旧石器晚期开始就可以了。甩掉5万年之前的所有包袱会使我们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于那些我们应该关注的情况，问题一下子就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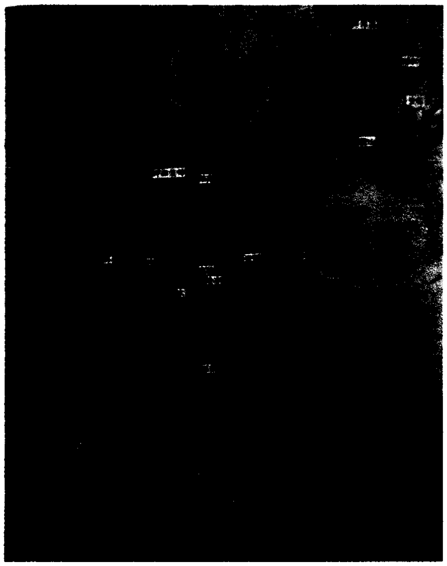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化了，同时也摆脱掉一些纷扰与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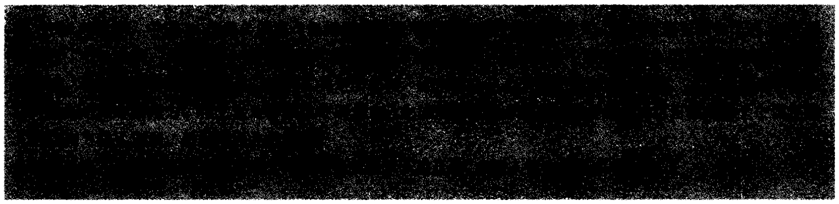
假如说中国人来自非洲是个宏观概括①，那么随着第四纪冰川在一万多年前的逐渐融化，人类重新向北方挺进的事实则把中国人起源的问题具体化了。全球范围都经历了与中国基本同样的过程，大约 5 万年内向赤道附近压缩以及冰川结束后再次向回归线扩散的伸缩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再分配”。东亚也不例外。

DNA 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出中国人史前整体由南到北推进的一个渐进。尽管在“历史时期”比如魏晋唐宋时期发生过许多次从北到南的移民，但史前时期却显示出从南到北的迁徙更有影响力②。

古人从哪几个主要渠道来到中国，这是个问题。假如你同意非洲起源说，那么你必须要承认，从非洲到中国的通道是一直存在的，而不是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也就是说东亚地区受到外部影响是个无须论证的事实，中国人起源要经过中东，中国早期的文明同样要得益于中东地区。假如你反对中国文明受到外部影响，是你必须拿出证据以说明这样的一条人类通道如何突然中断的，而不是我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通道的存在，因为我认同从非洲到中国的通道一直存在，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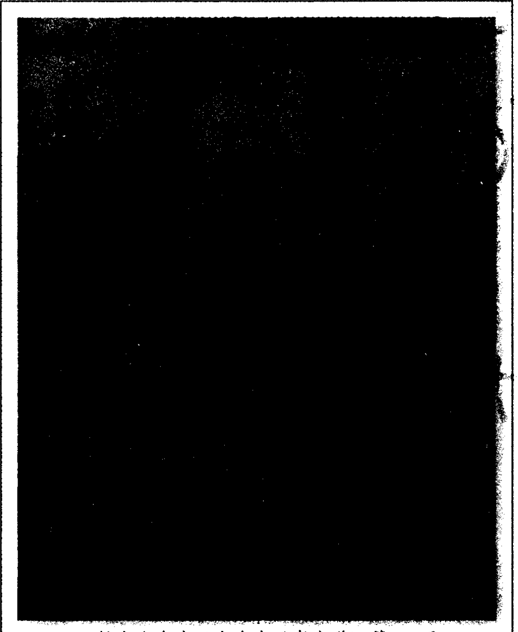
▲“中国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分布图”（摘自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34 页）。此图不仅显示了西南地区密集的人类居住区，而且长江、淮河流域的广大空白显示了当时该地区地势过低可能经常处于水下。地图上很明显的南北两个集中区域或许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读：早期从中东来到中国地区的人类主要为两条线路，一者从（西）北方来，一者从西南来。



且DNA已经潜在证明了这样的通道是存在的。我最初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尚不清楚这些DNA测试情况，可以说我的研究结果与DNA测试情况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不谋而合，这并非偶然。

假如说许多人曾经考虑过来到中国的人们经过中国西北，也就是通过中亚，那么这本书是在承认这条通道的情况下使人们开始考虑其他更多的途径，比如从中国西南方的东南亚，还有中国南方最接近赤道地区的群岛，甚至太平洋上的诸多岛屿，这些都可能是“再分配”时期加入中国文明序列的分支和源泉。我们可能涉及这样一个话题，“南岛文化[1]”之于中国古代文明远比我们曾经猜想的影响要深远。以前中国的南岛文化研究仅限于中国福建与台湾等东南沿海，现在我要说，或许我们应该继续扩展我们的眼界至更深入的中国南部与东部甚至北部所有今天的沿海地区以及昨天的沿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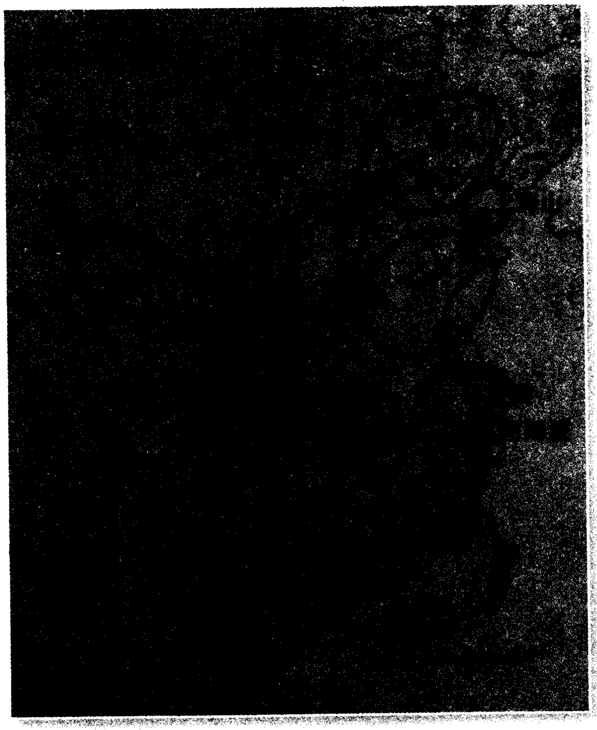
台湾学者凌纯声曾经提出过一个“亚洲地中海”概念，指的是印度洋北部到中国南海、再到东海、黄海、渤海所有涉及的沿海岛屿和大陆。我也对这一区域非常感兴趣，由于这是一条南北有很大差距的斜线分布，所以这一区域牵涉到我们上面讨论的由于冰期而引起的南北“伸缩”，同时这一区域的东西跨度，也牵涉到从西到东总的文明流向问题，它也恰好涵盖了部分东亚的“南岛”地区。这一区域是值得继续关注的热点，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区域。



▲摘自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6页

大约1.5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开始融化，导致了地球上的

地理巨变。积聚在北方的冰帽融化为海水，一些高山与陆地从冰雪中浮现出来，但海平面在上升。从那个时期到今天，海平面发生剧烈波动，其幅度大约在200~150米。所以，在新石器时期开始的年代（中国大约9000年前，中东为1万年前）与今天的地理环境有很大不同，某些差异可能大到难以置信。简单地说，今天中国的东部地区凡在地形图上表现为绿色的部分都曾经被浸泡在海湖沼泽里，陕西、河南、四川这一带的山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是中国的“沿海”，山东地区的泰山附近曾经是一片海岛。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那时中国西北地区以及山东地区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海拔一千多米的泰山也一样使人们非常之安全，他们不常受到海潮波动的威胁。


▲摘自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96页

这个事实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波动”可能曾经使这个世界面目全非。今天世界上一半的土地可能曾经是海，这个现实不仅改变了世界的交流方式朝向与水抗争的特点，而且改变了东西方交流的“道路”——某些文明交流道路缩短了，比如东亚与中东的交流很可能在某些时期（假如使用水上工具或对于那些沿海而行的人们）就缩短了一半的路程，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他们或许甚至可以驾船直接在印度“平原”上航行，然后到达两河流域南段，当然这个方向相反也成立。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并非所有的时期东亚都被泡在海里。新石器时期的人们比我们更幸运地观察到过“沧海桑田”

的景观！甚至诺亚的传说也可借助这个现象进行研究，到底那是一场突然而至的海啸，还是一次海平面快速上涨的过程——从诺亚一家仍然有时间打造船只的推论看，似乎海平面上涨更有可能。

保守的人们认为，航海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以为远航是2000年内的技术，美洲是欧洲人“发现”的。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人类由于在以往的年代里缺乏文字记录，所以对很多事情失忆，这歪曲了“史前史”的原貌。新石器时期太平洋上彼此隔绝的许多岛屿居住着人类，假如没有航海工具的存在他们怎么可能存在？另外，在大约5000年前中国大陆就与200公里之外的台湾海峡有广泛的联系，假如他们之间不是靠稳定成熟的航海工具，怎么可以达到频繁的交流？新石期时期的晚期分布有极大的改变，东部开始繁忙。而且北方强盛于南方则又说明了北方气候在当时更适宜人类居住生产。

闻名天下的北京猿人由于时间已经超出了第四纪冰川，所以不可能与中国人有关。DNA技术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但北京山顶洞人可能还有疑问，因为他们生活在距今1万至2万年前。

几十年前第一批到中国进行考古的德国专家魏敦瑞指出，在著名的7个人骨中较为完整的3个成年人，其中的男性为原始蒙古人种，另外两位女性一个属于美拉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东北一带），一位属于爱斯基摩人。不过后来也有中国人（吴新智）却认为他们一概都是蒙古人种①。

另外，1956年在广西来宾县麒麟山发现的智人颅骨，据说时间为距今5万年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南方亚热带，有零星人类存在也不奇怪，不过他被判定为不属于蒙古人种②。

假如魏敦瑞对山顶洞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从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远古时代人类曾经进行过多么自由的迁徙！现在这三个人种分散在万里之外。它同时暗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不仅人类的迁徙能力很强，而且他们并不畏惧航海，因为美拉尼西亚人无论从中国还是从非洲走到今天他们所在的地区都要跨越很多不同的水域。这一跨种族、跨地区的生活对于我们现代人在多方面形成了观念的挑战。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我们的某些知识体系是否发生了严重误解，或者说，这一事实对于我们的常识造成了一

① 资料引自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8～49页。
② 参考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72页。

种难以置信的冲击。

千百年来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普通中国人是根本不可能看到一个外国人的，在 1970 年代中国人在现实里看到一个西方人或非洲人会奇怪地犹如看到外星人一般——这在生活体验上让中国人认为全球“交流”是困难的，实际上这是个错觉。中国上个世纪与外部的隔绝是行政指令造成的，并非真正的自然地理上的困难所致。在一万多年前，一个中国老丈夫竟然可能娶了一个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与一个生活在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为妻①，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不过，假如我们依据这个人类学结论认为他们一家三口跋山涉水才走到一起也是荒诞的，很可能今天生活在美拉尼西亚地区的人们一直就分布在中国的东南，而今天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不过是一群一直追逐着冰川生活的人群，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恰好有部分人遗留在北京附近地区。从这个小家庭的神奇结合情况，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的变迁与不可思议。

▲大约 5500 年前埃及出土文物，以“有船只的陶罐”著称。

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学博士李辉在 2005 年初《北大中文论坛》发表言论说：“古人类学资料已经证明，在现今中国和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

---

① 厄尼斯特·A·霍顿在《从猿以来》一书中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illegible] 页）

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各族、南岛语系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ngoloid-Australoid hybrid forms）的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这样说来，似乎魏敦瑞的结论还是更为可信。

另外一位甘肃的考古工作者，综合一些新闻消息，2005年初在“苏三客厅”BBS提出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发文如下，某些吻合我的推测，某些我还有不同看法，放在这里以供参考：

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概念：藏彝走廊和藏缅通道，它们都位于横断山区。根据现在流行的人类非洲起源说，许多人认为曾有一批晚期智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通过藏缅通道和藏彝走廊进入中原，最后演化为华夏族。(1)

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陈竺院士公布：中国科学家首次采用能覆盖绝大多数基因染色体的微卫星标志，对遍布全中国的28个群体，作采样分析：初步证据提示：今天东亚人群源出非洲；中国南北两大支，可能是先到了南方，再移到北方，并可能是发生在3万～5万年前的事②。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金力、卢大儒等利用Y染色体上的SNP为遗传标记，为东亚人群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研究发现，北方人群的Y染色体比较单一，是南方群体的一个亚群，故东亚人群最早的迁移路线是从南到北。

通过对汉藏语系代表民族Y—SNP分析，发现该语系的各民族具有共同的起源，其祖先可能是3万年前由南方迁徙并定居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氐羌氏族。

约6000年前，氐羌氏族的一支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马拉雅地区，并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藏族而后同来自中亚的古老人群融合，形成在Y染色体包括东亚和中亚两个人群特点的多起源组合。

该位先生的私人看法为：

根据晚期智人的年代，我们可大约得知这些原始人的迁移路线：云南丽

根据晚期智人的年代，我们可大约得知这些原始人的迁移路线：云南丽江人

[redacted]

（距今约 5 万年）——广西柳江人（距今约 4 万多年）——四川资阳人（距今约 3.9 万年）——甘肃武山人（距今约 3.8 万年）——内蒙河套人（距今约 3.5 万年）——北京山顶洞人（距今约 2 万年），这与遗传学的结论类似。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距今 8000 年前，迁到我国各地的晚期智人开始了新石器时代革命，他们从洞穴里走出，开始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制造陶器，并产生了最初的艺术作品。

不过，考古学并不支持中华文化“西来说”。比如，在 8000 年前的几个文明源头中，最靠西的要数大地湾遗址了，但大地湾原始人从人种上来说是从我国南方迁来的，大地湾文化的演进也经历了从粗到精的过程，虽然其演进过程不能完全排除西方的影响，但其文化的本土性是可以肯定的。①

我认为这位先生所说的“考古学并不支持西来说”与大多数人犯了同样的一个逻辑错误，实际上他们只能证明中华地区确实有“从粗到细”的演进，但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西方的影响”这一点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不同的影响力量以及方式，这是需要仔细研究区别对待的，不能一概而论。即便证明了石器时代，但“三代”时期如何却是必须另外证明的一个阶段，目前得出考古学并不支持西来说的结论是草率的。

① 最后两段都比较明显地能够看出来该位先生倾向于中华文化本地起源，我认为他们“南方”理解狭隘化了，这个“南方”的背后假如指的是“非洲”根源，那么[illegible]的中术[illegible]“西方”。另外，[illegible]代的“从粗到精的过程”并不能替代后来“三代”前后的文明发展过程。[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的是，[illegible]从“西方”[illegible]。

海平面的波动

与今天衔接紧密的一万多年前，冰期结束。“当时的地形与今天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在以后的几千年间（实质上是整个史前史和中国农业的早期历史），尽管其间存在着波动，但气候总是更温暖而湿润。”

这个波动形成的地形与今天的差别非常之大，大到一般人无法想象。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是，今天 80% 的中国人可能居住在当时的大海与湖泊里，而华北地区的气候很可能接近于今天的南方或印度一带，因为那里大象频繁出没。一个学者经常使用的比喻是，那时的黄河流域气候相当于今天的长江流域。

“在温度最高的时期，华北东部平原高度突降的部分被水淹没，其他的部分则成沼泽；山东实质上成了孤岛，水和沼泽将其与华北西部高原隔开；黄河在如今的豫中地区流入东海；沿海平原和沼泽以及黄河中游流域被森林所覆盖；长江中游流域的湖泊比现在的大，沿长江口海岸被水淹没。”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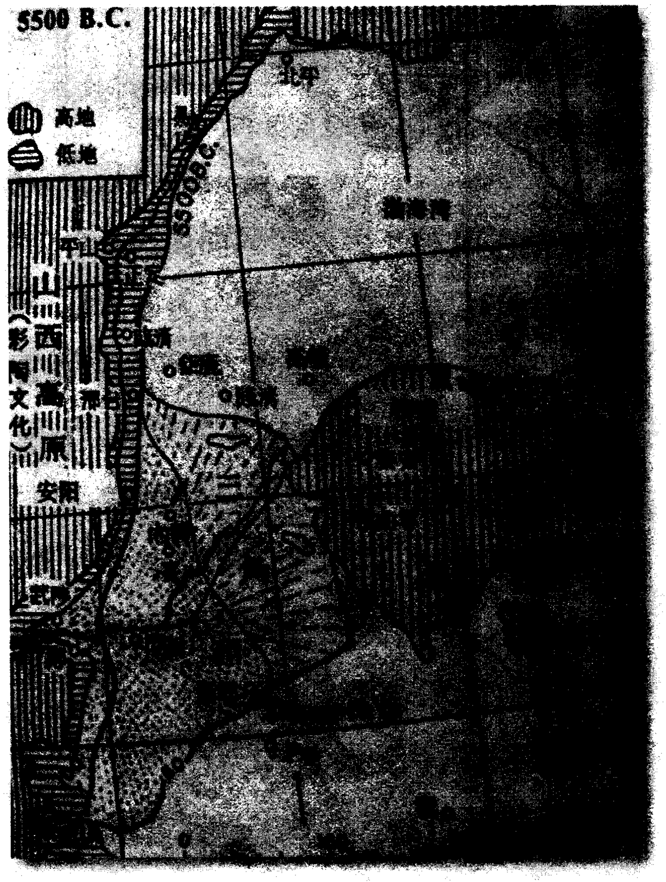
“对东海岸边大陆架和内地沿旧海岸线的古代海洋软体动物遗存所作做的研究已揭示出更新世后期海陆变迁的循环过程，据有人估计，在距今 4 万至 3 万年间（大理冰期时），海平面比现在低约 70 米 ~80 米，在距今 2.4 万 ~2.2 万年间，海平面上升了挺多，不过仍比现在低 30 米 ~40 米，但在距今 1.8 万 ~1.5 万年间的末叶，海平面又退至比现在低 110 米。随着全新世的开

---

①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57 ～ 58 页。

始，由于冰块和冰川的融化，海平面急剧上升，到距今 7000 年前接近于现在的高度。大概在距今 6000~5000 年年间，在更新世后海侵高峰时，海平面至少比现在还高 6 米 ~7 米。从那以后至少还有三次波动，波动高度在 4 米 ~5 米之间，直到最近 200 年，此时出现了海退的趋势。”

这一海平面上下来回波动的结果对于当时的人类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冰期后的海侵高峰期，华北平原很可能不存在。当时，华北一带人们居住的主要低地是位于西边高原东部的山丘以及山东高地附近的山丘。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当时人们居住的低地位于沿太行山的冀西部分，核心区在河南沿太行山和中条山一线，还包括沿泰山的山东地区及鲁东高地。”①



▶ 7500 年前的这张示意图，可以比较清晰看出，在新石器时期，沿太行山到郑州直到“大斜线”的西岸，实际上这里生活的人们并非生活于“内陆”，而是生活于海边！这个期间的中国文明实际上是海洋文明，尤其是泰山，更是海洋文明的典范。同时，这里可能揭示出为什么泰山是个圣山的道理。它是连接当时东亚“大陆”与广阔太平洋西岸的一个海上中转站。（摘自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9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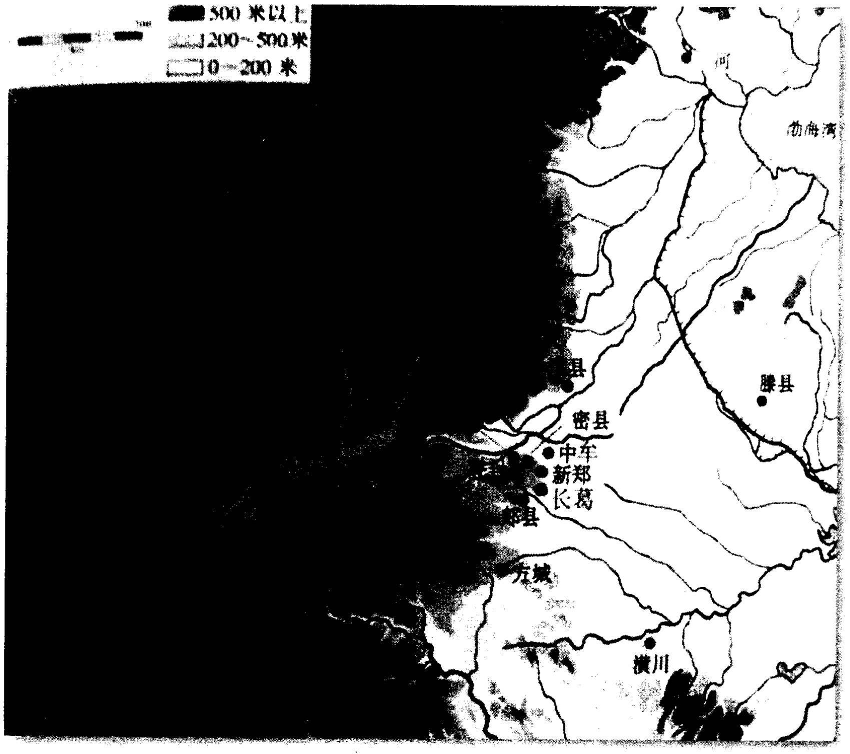
---

①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57～58 页。

进入到“文明时代”，陶器与农业出现，虽然它们两者并不一定是如影相随，但从大多数的情况看它们是相互伴随产生的；渔猎活动却是农业产生之前人们就一直在从事的活动。

新石器时期尽管有一些东部平原上的遗址，但是它们的突然消失也变得容易接受了，因为海平面在不断升降起伏。也许人们会评论说，既然那里不平稳怎么还会居住在那里？要知道这个情形跨越千年，所以一旦有几年看到可以居住的平地人们也会扩散而去，不用说相对的稳定经常是几十年几百年了。

基于以上的事实，这样一个史前遗址分布是必然的：多在西部高原山区，东部平原比较少见，尤其是在距离较远的时期。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分布体现了这个特点，基本上是沿山分布，体现了古人类既要依靠海洋生物过活，同时居住在高冈以避水灾。在今天人们喜欢的广阔的平原地区基本上看不到古人类活动的踪迹。或许我们也可以假设，那里曾经是有过人类活动的，只是后来被洪灾全部掩盖摧毁了。但是西部高原却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太多的水灾。



▲“大斜线”就是曾经的海岸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海平面波动期间，不仅中国东部的平原经常消失不见，东亚的文明人主要集中在中国“大斜线”的西北一侧，东南亚的许多岛屿不见了。假如行走海路，不用再穿行马六甲海峡，从泰国那里的某些低地或许就可以直接穿越过去。印度半岛经常泡在水里只露出几个小岛来，古人们用独木舟沿着喜马拉雅山南侧划行，这条海上通道可以走过两河流域、顺着伊朗高原的南麓一直到达土耳其！

假如从印度这里向南，某些时候阿拉伯半岛可能只露出今天也门一带的高山，对面的埃塞俄比亚也有比较安全突出水面的大片地带。从东亚启程的人们穿过红海，可以直接把独木舟划进地中海。红海与地中海在海平面比较高的时候是连通的，西奈半岛的一部分被淹在水里。欧洲曾经一片泽国，只有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高山作为岛屿凸出在海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这些地区才可以发现密集的古人类活动痕迹的原因所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也露在外面，所以有一部分人居留在那里并形成欧洲的爱斯基摩人——就是著名的拉普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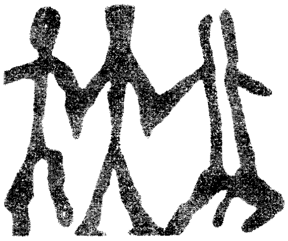
最后，不要忘记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就在今天的西伯利亚一带高原很可能生活着一批文明人，那里有广大而安全的土地，他们在新石器时期南下影响了东亚的北方地区；中国西北地区与俄罗斯临近的阿尔泰山在气候与地理认识中也应重新考虑在新石器时期的特殊地位，那里很可能曾经是个发达的文明地区。

我认为人类航海的事情是 1 万年之前就存在的事实，只是他们的船会很简单，但他们的勇敢弥补了技术的不足，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航海。

假如我们推断人类的语言能力从大约 3 万年前就开始出现了的话，那么思维随之出现，用石器就可以凿出独木舟来。不过人们最多提到的早期船类实际上更多是芦苇捆绑起来的小船，这不需要很先进的工具，只需要思维能力。但是很可惜，由于船类在水中易腐烂的这一特点以及木质或草类的特性，今天的考古很少发现。比较令人高兴的是，中国杭州湾附近的河姆渡已经发现了一些“大船”的痕迹。河姆渡的存在时间大约在 7000 多年前，但应该注意的是那里有一些高冈，当时周围应该多为沼泽或大海，我们应该把那时的人们想象为生活于一些孤岛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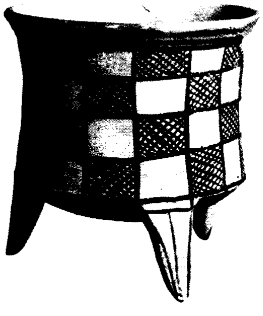
① [illegible]



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

在中国新石器早期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它大体开始于7000年前，而衰落于夏商之际。实际上我常常简单地把中国新石器时期分为仰韶文化和夏商周三代两个部分。

在仰韶文化之前，有比较大影响的遗址是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其中精美的椭圆形磨盘与磨棒引人注目。在其南面不远处还有一个舞阳贾湖文化，据称它与裴李岗有一定的联系。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贾湖已经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符号，有人认为那就已经是文字的雏形了。这些发现不同寻常，因为那几乎是中国最早的符号了。



▲伊朗西部与土耳其接壤处出土的3500年前的三脚陶器

贾湖在河南漯河，遗址时间为大约8500年前。这些符号与后来的仰韶符号以及甲骨文之间，我认为有一定继承关系①，最奇特的是这个关联一直延伸到中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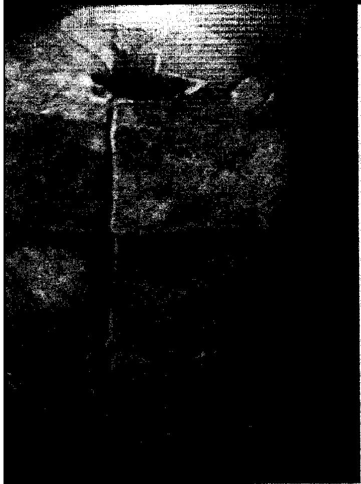
在著名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前也有类似的符号存在，并且，在埃及远古也出现了几乎与裴李岗、贾湖一模一样的磨盘。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播关系，现在还不好定论，我只能说早在9000年前到3000年前这段新石器时代，中国与中东之间一直发生着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神秘联系。既然中国人整体经历着从非洲方向而来的迁徙，那么这个联系就不是特别难以猜测。

一种比较有利于“西来说”的支持因素是，这个时间依然

---

① 具体文字请参见本书“第五部分：走马观花史前语言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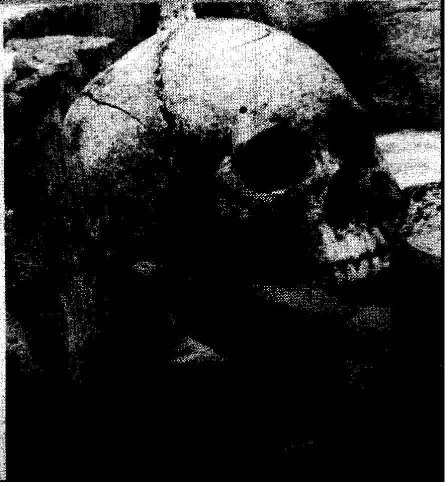
◀今日贾湖位于豫东地区，地势平坦，今日依旧有一些湖河贯穿。根据考古生物判断，贾湖文化时代的人们过着渔猎生活，证明这一带曾经类似沼泽地带。苏三 / 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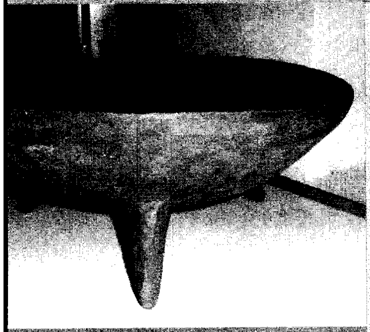


◀贾湖龟甲上刻着明显的眼睛符号

◀贾湖出土的象牙棒与石棒，做工极其精细。苏三 / 摄影

▼贾湖人头骨





◀贾湖仿制红陶，这个时期的支脚尽管是三脚的，但却很细小，与后期中国东部地区的三足鬲可能有传承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类似仅作支撑的三足在地中海东北地区、伊朗等地同期也有发现。苏三 / 拍摄

没有超出西方的新石器时期的开端。也就是说，即便有了裴李岗、贾湖等中国的新石器遗址，中国的新石器时期开端依然在西方新石器时期之后出现，就东西方新石器时期的开始标志方面，没有形成质的改变。

另外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当时的海岸线假如波动很厉害的话，那么裴李岗实际上是属于海洋文化，因为遗址所在地新郑就在秦岭东麓末端的“海边”。我们已经推论过由于海平面的波动使东亚与中东之间距离缩短的可能，而这几个文明在最初假如都属于海洋文明的话，那么这个统一性使它们关联起来的几率更大了一些。

与裴李岗基本同期的河北磁山出土的一些陶器纹饰能够看出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波纹”状与“V”形痕迹，这些不仅与西北的仰韶文化有联系，而且与中东地区也有联系。我倒不倾向于它们是后来仰韶文化的先驱，很可能它们之间的相似有其他的联系。同时，我也不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突然一鼓作气从中东直接跑到东亚来的。它们可以分批分期呈多米诺骨牌效应方式，从一个接近的文明地区来到中国的河南以及西北地区。这个根源完全可以在土耳其与伊朗高原甚至青藏高原附近。在华北平原根本不存在的时候，那些西方的人们甚至可以驾着小船一点一点沿海划到裴李岗这里，当然所用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百年或一千年。据说那个时期的人们喜欢沿海而居，这方便他们的渔猎生活，海洋生物的获得成为他们生存的一大支点。

那时候由于海平面很高，里海东岸实际上接近今天的新疆西部地区，甚至天山北部的准葛尔盆地通过伊犁草原而与欧洲汇为一片湖海沼泽。所以，假如是从北部进入中国，在大约一万年前后可以从西亚、欧洲分别进入天山或青藏高原一带，然后沿祁连山一直过渡到秦岭的“海边”——陕西、山西或河南附近——定居下来。假如你怀疑这条路线过于遥远而不可能如此，那么你怎么看2000年前匈奴人从中国北方长驱直入法国境内的历史事实？事实上这条路线上确实有欧洲人的踪迹。只是越到中国中原欧洲人的痕迹就越淡，因为南方而来的人类抑制了这个人群的扩展，中原黄河成为中国地区南北或东西方向人类源流碰撞交融的一大圣地。

在大约6000年前后从南边或东边来到中国的人们不仅部分北上与仰韶文化会师，另外一部分可能到汪洋一片的东部寻找适

合落脚的小岛，然后当海平面下落之后那里成为大陆的一部分，河姆渡等可能就属于这样的类型，接下来“东夷”的产生就有了根据，它们与仰韶文化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源流。

几千年里由于海平面的来回波动，不仅可能产生包括诺亚方舟那样的故事，同时会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山崇拜”的文化根源，因为在某些海平面快速上涨时期，看起来似乎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只有高山可以挽救这个世界。所以，新石器时期陶器上面最经常出现的“波纹”状条纹，一方面很可能是水，同时它们也可能就是连绵不断的救命之“山”。青蛙也在陶器产生初期就出现在人们面前，除了表示生殖之外①，很可能它们能够逃脱水患而两栖生存的能力让古人艳羡，从而开始崇拜它们。

与诺亚差不多同时代的是中国仰韶文化的兴盛时期。我曾经长久地为封闭的内陆大西北所表现出来的海洋特色迷惑不解，我想现在假如不能说我全部的疑问没有了，起码消减了许多：甘肃青海一带当时距离大海远比今天要近得多，或者说那里当初就曾经为沿海地区。

中国西南地区一直是个化石密集的地区，因为这里距离“西方”近，另外，这里有裸露在大海里的群山。尽管这里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为什么这里看起来没有发展出西北地区那么发达的文明？我的看法依然是与地理气候有关。农业只适合于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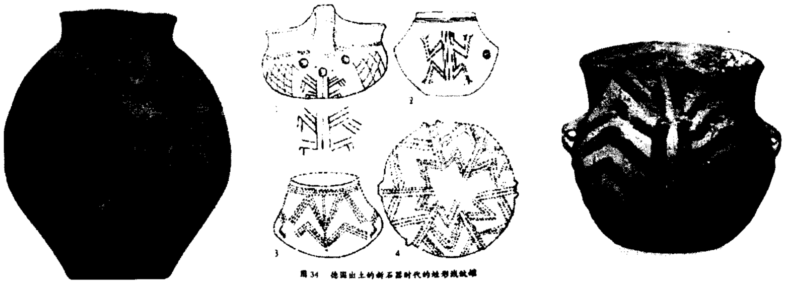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图 3

图 1 中国青海省新石器时期带有青蛙纹饰的白陶
图 2 欧洲德国新石器时期的青蛙纹
图 3 土耳其新石器时期陶器

---

① 青蛙产子能力很强是它们作为生殖崇拜的条件之一，但是后来很可能人们渐渐保留了对它们作为生殖的偶像，而忘记了原因，我在陕西生活的童年还依旧听到人们警告女孩不能喝河水，原因是假如喝进蝌蚪就可能会怀孕。

显季节变化的地区，而甘肃青海一带的高原当时肯定符合这样的条件，要考虑到那里比今天要温暖潮湿一些。但南方却由于过分湿热失去了农业文明的高度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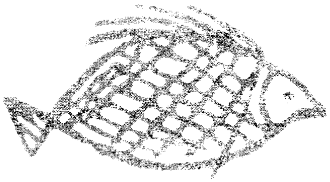
广西桂林的甑皮岩发现了陶器，据说那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陶器”，时间大约为9000年前。这同时，距离那里很近的西边泰国也同时发现了类似的洞穴遗址。看来假如论早，实际上最早还得是与非洲方向最近的西南。

以上提及的中国早期文明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中国本土化的最底层的资源。最基础的部分可能陆续从一万年前左右就部分从中东附近带过来，比如对于鸟的崇拜，对于鹰的敬拜，对于蛇的恐惧与崇敬，都是曾经有过的“水世界”的产物；人们渴望如鸟一样可以随时避开洪水的袭击，它们可以像鸟一样了无障碍地飞翔于蓝天，可以像鹰鹫一样强悍凶猛，但对于到处存在与他们为伴的蛇摆脱不了，只能求告于它们。

鸟与蛇崇拜是全球通行的图腾，不是中国独有的，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巧合，但最集中于这两种动物却不能说是一种巧合，应该怀疑各种文明是否同源。

▲河姆渡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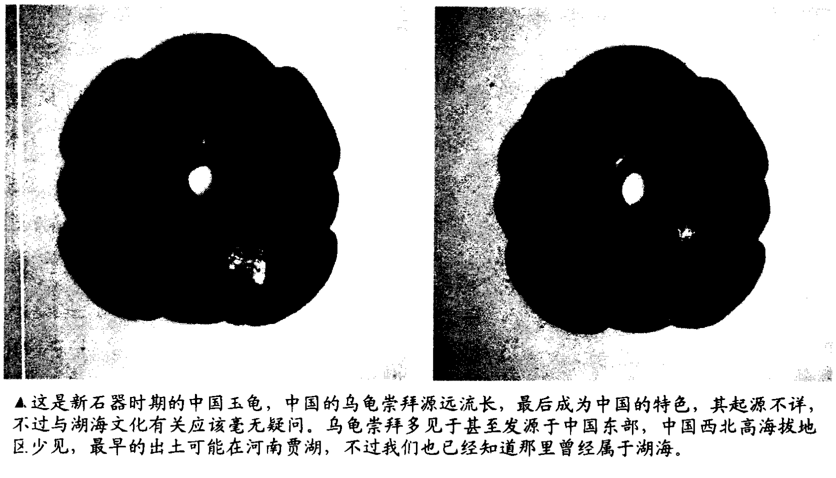
▲早期的埃及陶器由于烧制方面的原因总是会呈现出这样的颜色分布



人类起源于海洋假说

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一块中东泥板上记载着世界产生的过程："最初没有芦苇，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城市，到处都是海洋。"这说明，当人类有记忆的时候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海洋"。后来陆地才慢慢显示出来，给人们以存身之地。实际上这可能是文明开蒙之后人类具有语言之后的最早记忆，其主要特征是：到处都是汪洋海水。

我们发现，不仅人类喜欢沿河流而生存，而且考古显示最早的人类也非常喜欢沿海而居，甚至离开海就不行。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分布图就显示出人类在追着"海岸线"发展，只要有足够



▲这是新石器时期的中国玉龟，中国的乌龟崇拜源远流长，最后成为中国的特色，其起源不详，不过与湖海文化有关应该毫无疑问。乌龟崇拜多见于甚至发源于中国东部，中国西北高海拔地区少见，最早的出土可能在河南贾湖，不过我们也已经知道那里曾经属于湖海。

立脚的丘陵与岛屿，他们就会迅速移居过去。所以我们确实很容易猜想：古人类是不是属于海洋动物？我甚至想猜测他们是两栖动物，当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栖动物”，我的意思是，很可能在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水的亲近以及对水的把握能力远远在我们想象之外，反而是后来我们与水亲近的能力才退化了。起码从解剖学上看人类曾经与水亲近并不让人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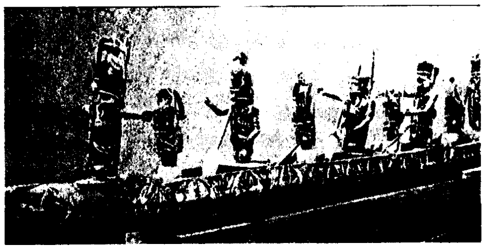
也有人把人类的起源解释为海上。20世纪中期英国人类学教授爱利斯特・哈代爵士认为：距今400万年至800万年前这一时期的人类祖先并不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海中，这里存在一个化石的空白期。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存在着几百万年的水生海猿阶段。大约在400万年至800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北部曾经有大片地区被海水淹没，海水分隔了生活在那儿的古猿群，迫使其中一部分下海生活，进化成为“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却，已经适应水中生活的海猿重返陆地，它们就是人类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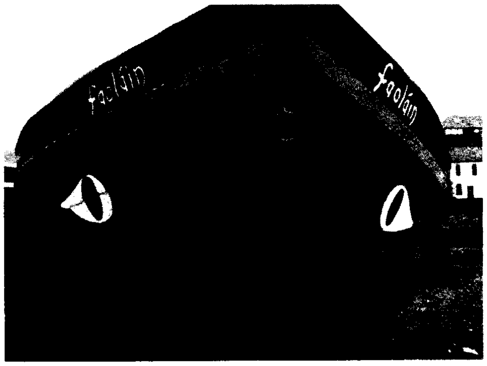
这个“海猿”假说同时也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最早学说。

“海猿说”也有丰富的论据：

第一，人的身体表面裸露无毛，却有皮下脂肪，这与灵长类动物大大不同，光洁无毛的身体与丰富的皮下脂肪更适宜在较冷的海水中生活并保持体温。

第二，人体无法调节对盐的需求，而且要靠“出汗”来调节体温，这是“浪费”盐分的，而灵长类动物却不需要靠出汗调节体温，反而具有对盐摄入量的控制与渴求的机制。这说明人类是从盐分丰富的海洋中来。


▲2200年前新几内亚的古舟造型，其中人物按照与真人等高比例。



▲这是一艘地中海的船，请注意船上的眼睛。

▲两河流域发现的史前石刻，有人认为中间那个是乌龟造型，也有人不同意，认为那是个孩子。

第三，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都不是游泳能手。

2002年一位叫米高尔·奥登的法国医学家提出了更加离奇的新观点：人类和海豚的亲缘关系超过猿猴，人类的祖先是海豚。其论据是：

第一，人类本性亲水、猿猴厌恶水，这是最明显的分水岭。人的婴儿一出生就有游泳的本能，而且人的脊柱可以弯曲，适宜水中运动，而猿猴的脊柱是不能后伸的。

第二，人的躯体和海洋哺乳动物一样光滑，头部却长满浓密的头发。

第四，人类能以含有盐分的泪液表达感情，有趣的是，海豚也会流泪。

第五，人类喜欢吃鱼、虾与海藻，猿猴却不喜欢。

假如说这些牵涉到人类起源的理论还比较空洞和难以把握的话，那么考古遗址的分布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远古人类并不像我们曾经推测的那样因为没有高科技大船的出现而畏难于海，相反，他们与海异乎寻常地亲近！这个道理可能就像远古并没有天文科学但是却人人了解星空一样①。很可能古人使用简单的航海工具做出了许多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航海事业。

---

① 清人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盐类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撇开人类起源问题，海边有什么吸引着人类？在文明初期的古代人们为什么会聚集在海边？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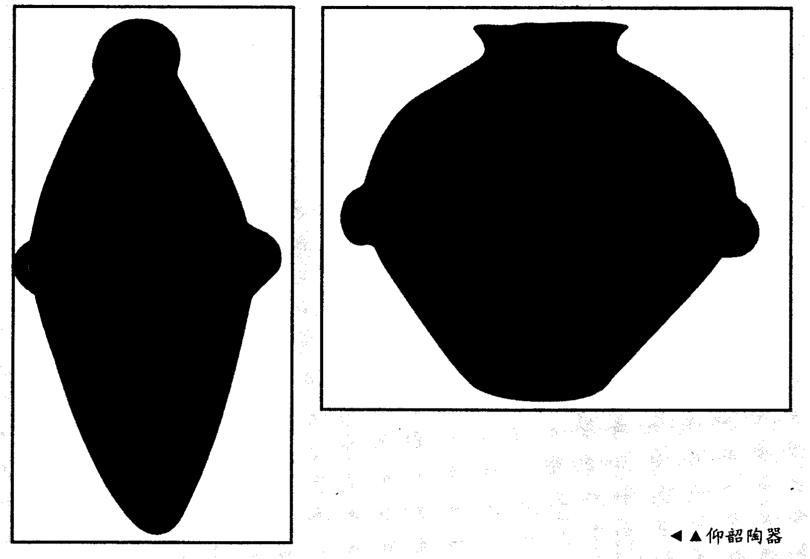
在没有生产盐类的蒙昧时期，很可能已经有某些群体认识到生活在海边感觉身体更舒服一些。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他们只能待在海边身体的不适症状才会减轻一些。甚至这个现象构成一些迷信，但事实上这与他们摄取海生物所带的盐分有一定关系。河流却是淡水，所以无法自然地补充盐分。另外，打鱼和以虾蚌类为生远比在陆地上狩猎简单而方便。最大的好处是，乘船比行走更便捷、迅速。当然所谓船并非今天的船，而是非常简陋的一些工具，甚至是如葫芦等一些原始条件的支持。

人类整体逐渐与海洋拉开一定距离应该是新石器中期的事情。从此时开始，盐类被得到正确的认识，河流开始被开发，水井使用成为可能，盛水的陶器开始出现，最重要的是农业出现了。

农业需要人类退到足够远的内陆去发展耕田。大约1万年到5000年前正是这一文明时期发生关键转换的时期。当他们全部转化到位，中国的“国家时期”开始了，“三代”在4000年前开始。

“三代”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农业已经成为人们的常业，他们开始稳定地生活于黄河中游一带。

仰韶文化被“三代”取代的过程，很可能伴随着东亚地理的巨大变动。比如说，原先生活在“海边”的仰韶距离大海越



◀▲仰韶陶器

来越远。或许对于盐类的提取时间与途径会对仰韶文化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研究人类认识盐与使用盐的过程很可能会揭开一部分人类文明之秘。在古代盐为“白色的金子”。相当长的时间内盐几乎是一种流通货币。盐类实际上也是仅次于空气的一种生命必需品，所以结合海洋在中国大陆上的伸缩研究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了解了这个秘密，早期人类为什么喜欢沿海生活就容易理解了。

传统学者认为商业的起源很晚，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商业的起源几乎随着文明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而盐类就是人类最初的商品之一。许多人会被迫主动去寻找盐这个必需品的交换，然后顺便他们后来也交换其他的东西，一些商业网络就会渐渐建立起来，当然最初他们只存在于一些家族之内，我相信某些家族可能会因此而渐渐成为职业商人，故而个别庞大的特殊商业家族会遍布全世界。商业交流促进文明交流，同时也发展了交通工具。

管仲的《管子》相当篇幅谈到经济。管仲多次谈到“利”，“盐利”即为其一。《管子·海王篇》多涉及盐策，这是我国最早的盐政理论。他的理论确立了“盐税是人头税”，并且提出了“盐专卖”政策。

盐类制约并引导着人们在盐源的周围生存，甚至为盐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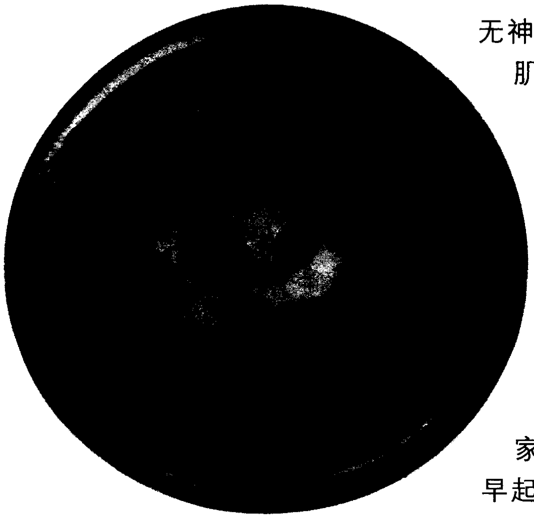
在美国内战期间，由于北方富盐，南方缺盐，整个美国都必须进口盐。战争后期盐这种特殊的紧缺物品甚至会作为结婚礼物相互赠送，盐成为宝石一般宝贵的物品，某些盐场甚至成为战争争夺的重要制高点。

在认识到盐类的重要作用之后，东亚的古人很可能也发生同样的类似战争，甚至盐成为某些群体的命脉。不过大约5000年前的古人是不怎么喜欢使用暴力的，假如真的有类似的争夺至多是把人撵走了事。

盐的原料来源可分为四类：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以海水为原料晒制而得的盐叫做“海盐”；开采现代盐湖矿加工制得的盐叫做“湖盐”；运用凿井法汲取地表浅部或地下天然卤水加工制得的盐叫做“井盐”；开采古代岩盐矿床加工制得的盐则称“矿盐”。由于岩盐矿床有时与天然卤水盐矿共存，加之开采岩盐矿床钻井水溶法的问世，故又有“井盐”和“矿盐”的合称——“井矿盐”，或泛称为“矿盐”。

食盐是维持人体生理正常发育不可缺少的物质，成人体内一般约含钠90 g、含氯85 g，大部分存于体液中。钠对肌肉的收缩、心脏的搏动、血液的流通、神经信息的传递、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体液的酸碱平衡等都有重要作用。氯既有维持人体内酸碱平衡和渗透压平衡的作用，又是胃液中电解质的主要阴离子，能促生盐酸，帮助消化。成人每天一般需要摄入5g ~ 8 g食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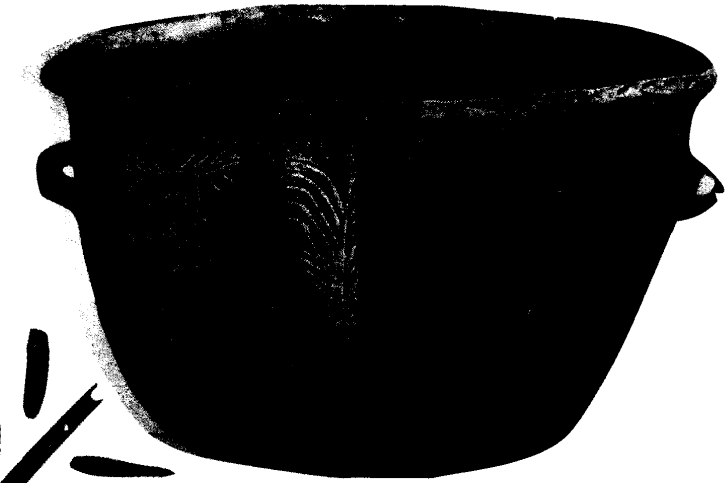
人体如果缺盐，轻则倦怠乏力，淡漠无神，起立时晕眩；重则恶心呕吐，痛性肌肉痉挛，水肿，血压下降；极重者木僵，恶心呕吐以至昏迷，血压进一步下降或不可测知。



▲仰韶陶器

食盐除做调味品外，尚有调理作用和药理功能：食盐水浴可治疗皮疹、风湿、慢性贫血；肺出血时可服数克盐水止血；在水银、溴、碘、铬等中毒时，服食盐水可解毒。

中国是世界产盐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地区煮海为盐据考证最早起源于山东半岛胶州湾一带，开始于炎帝时期。此法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逐渐过渡



▲河姆渡陶器

到用滩晒法制海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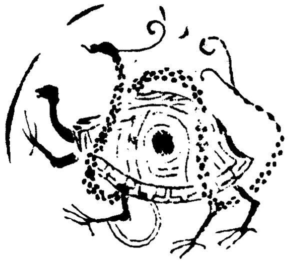
湖盐的生产至少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已开始，即用人工盐田晒制石盐的生产方法，春秋战国时代“肇始于山西解池”（即今运城盐湖）。

井盐的生产始于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公元前256～公元前251年李冰为蜀守时已采用钻井汲卤煎盐方法开采利用今四川省双流、成都一带的卤水矿。

中国矿盐（亦称岩盐）的生产历史只有数百年，先是从地面或地下直接采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云南省石羔井开始采用斜井开采，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川省自贡钻出第一口岩盐井，注水溶解后汲卤制盐，为钻井水溶开采法的雏形。另外，在西藏芒康县、盐井县一带广泛出露盐泉，利用盐泉“汲卤熬盐”已有数百年历史。

我国最大的盐矿省为青海省，保有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80%；此外四川、湖北、云南和江西等省盐矿资源亦极丰富。青海省的这一特性或许能够部分揭开为什么新石器时期早期最发达的地区就在青海附近一带。

我国盐矿资源基本分布状况是：东部海盐，西部湖盐，中部井矿盐。我国是世界上湖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西部仰韶文化兴衰

许多人探讨中国仰韶文化的兴盛与衰落之秘。我认为这个探讨必须在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之上进行才有可能获得进展。我的看法是，仰韶文明的兴衰与地球地理环境的改变，也就是与东亚的地理大改观可能有直接的联系。

仰韶文化位于今天中国最贫困的西北干旱高原山区，让许多人惊讶不已。为什么几千年前该文化曾经会繁荣于此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旦了解古往今来的沧海桑田，一切就会变得容易理解。

仰韶人曾经生活在距离海湖不远的地区，但在大约4000年前，地理环境与他们长久适应的环境发生了断裂。海岸从地理“大斜线”①东移，同时又没有及时得到来自中东的技术更新，在与具有海洋背景支持的东部文明碰撞中，仰韶文化终于消失于历史的舞台。

在中东地区也奇怪地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南移现象，从土耳其以及两河流域南推至稍微后期的埃及。这些都可能也与全球气候变冷有关。大象、鸵鸟等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从中国北方南撤，河南、河北现在都没有了大象，如今它们只生活于云南省一带。以往适合农业生产的北纬40度地区，后来在北纬30度也可以，所以埃及文明在中东开始大放异彩，在中国地区仰韶文明被南方的黄河文明取代。

① 参考苏三《历史也疯狂》第280页图。

仰韶文明的衰落与中东的变化有同步关系。从世界地图上看，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甘肃青海一带恰好与小亚细亚半岛和两河流域在接近的纬度，并且同期它们在东西方同时获得了文明稳定而长久的发展。大约从 4000 年开始，文明在中东和东亚同时南移。这根本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在早期渔猎和农业时代，气候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一切都要靠天吃饭。气候的变化会导致一些文明的兴衰。不仅远古如此，对于中国唐朝突然开始的“安史之乱”，有些研究者也认为与当时气温下降有关。它迫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南迁。“从 8 世纪中叶至 10 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前，春季时间则推迟，相应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最晚时间都有提早或推迟。通过河湖海冰冻现象研究，当时气候带要比现在南退一个纬度。这种相对寒冷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这个论点的持有者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他认为这是直接影响中唐时期北方变乱的主要原因。

仰韶文化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三代”把中国区域内的文明重心拉向中原和东部。尤其是商朝现在已经被认定为来自山东沿海一带。这一先一后，一西一东，已经给仰韶的兴衰指出了神秘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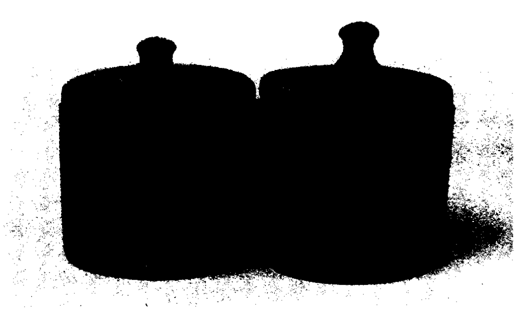
中国的文明起源确实可以简化为这两个大的文明板块，仰韶在西部代表了农业文明，“三代”很可能代表了“海洋文化”。尽管黑格尔说封建时期的中国人背离了海洋，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或许可以说，是“海洋文化”打败了“陆地文化”，东部打败了西部。“三代”的出现很可能可以归纳为“海洋文化”的胜利，或者“水利文化”的胜利。

在中国最早的文明遗址之间是否曾经有过交流，这是个问题。并且，怎么来定义这个“交流”就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个事实：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强烈特色；假如还不能说某些貌似交流的成分是同源，那么起码我们可以说这个交流是很薄弱的。

就仰韶文化与裴李岗之间而言，“无论是碳十四测定还是类型学研究，都尚未能将该类型与更早的文化（裴李岗文化）衔接上，为我们留下了一片有待于填充的空白。该缺环与渭水和汾河下游地区的早期阶段（半坡阶段）相对应”①。“在陶器风格方面，甘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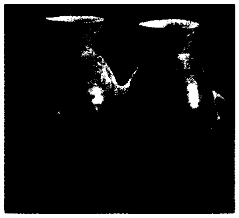
①《古代中国考古学》



▲古希腊双联杯　中国地区一直到历史时期都有大量双联杯出现，至今还在北方牧区盛行。双联杯或三联杯甚至四联杯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

青海地区诸类型与陕西、河南诸类型有着重大的差异：这无须争论，而是从其发现一开始就已被认识到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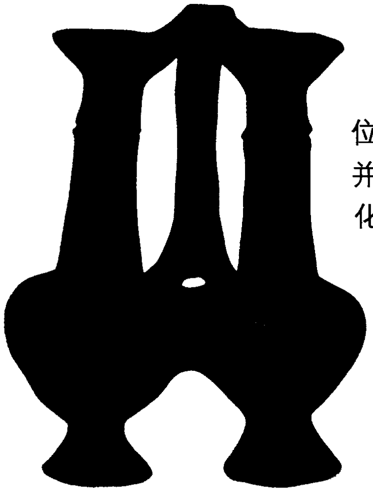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差异可以考虑为在中国之内的东西方差异，其根本的原因是，它们来自不同的根源，带有不同的语言与原始宗教习惯，这些沟通工具的差异阻碍了它们之间的有效交流。



▲河南郑州大河村双联杯，从大河村文化依然属于仰韶文化范畴而言，并且如今在中国北方保留这一传统，同时欧洲地中海北岸也有此传统，或许据此可以推测此传统为流行于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北方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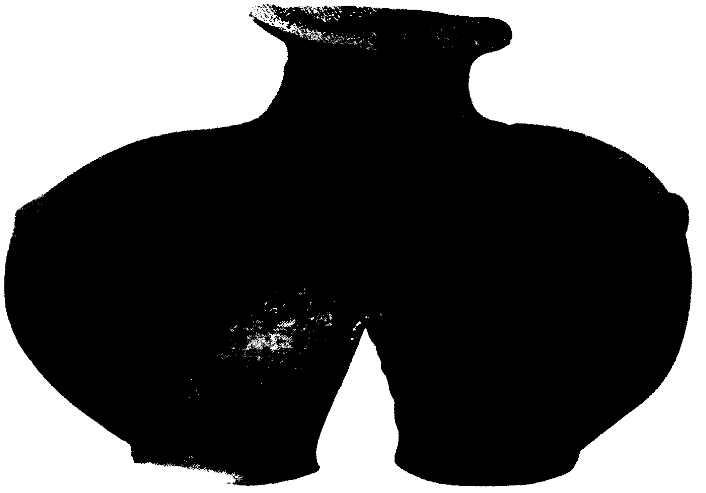
此时距离中国西域很近的印度河上的哈拉帕文明值得中国人关注。它几乎与仰韶文化的命运一样，在大约4000年前神秘地消失不见。或许在中东的某个地方与中国的仰韶之间存在着一种尚未被我们观察到的相互关联，而这个关联由于世界的巨大变化迅速地导致了一连串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多米诺骨牌倒塌现象。比如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兴衰就曾经导致过沿途几个国家的兴灭。不过哈拉帕文明也可能由于一些水位影响了地理变化。哈拉帕文明距离中国的昆仑山很近，并且与仰韶文化基本同期。可以将其定位为中国某些文化的“过渡驿站”进行考察。

从这个时期开始看，中国区域内可以有几种划分。一个是南北划分，一个是东西划分，还有一个是东西南北的划分。从目前来看，起码把出现于湖北的大溪文化作为楚文化最早的一个根据地，而把古代文化分为西北、东部与南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划分中把东北的红山文化与河姆渡、良渚等东部文化合二为一了。但不能把这个划分与后来的苗、夷、戎、狄



▲已有大约3500年历史的塞浦路斯双联杯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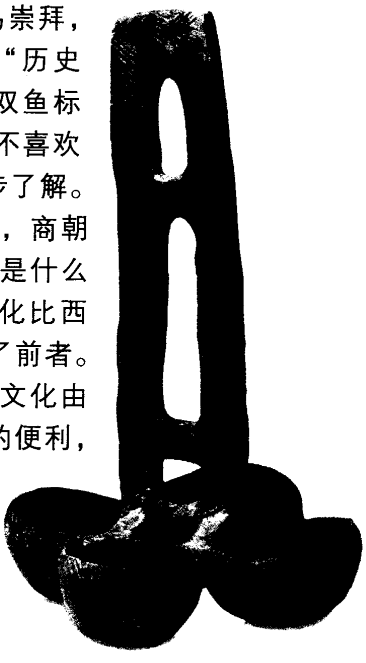


▲西北仰韶文化中的双联杯

对应起来，主要原因是由于时间上有差异。

从新石器时期最初就已经看出，西北的红陶①仰韶文化与东部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主要的差别表现在前者以红陶为主，后者明显以黑陶和白陶为特色，也有红陶出现。并且巨石文化、鼎文化、鬲文化、甲骨占卜、漆器、鸟崇拜，多来自东部文化，它们通过“三代”而延续至“历史时期”。除了红陶，西北的另外一个特点似乎是双鱼标志，后来成为羌人的一个特色——至今藏族同胞不喜欢吃鱼，或许远古他们有鱼崇拜有关，这需要进一步了解。

夏代是第一个有较多完整青铜器的一个团体，商朝更是进了一步。或许这可以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是什么真正驱逐了“红陶文化”，是科学技术。东部文化比西部整体上更早一步获得这个先手，所以它们战胜了前者。我猜想东部在夏时依然使用了海上通道，而仰韶文化由于海平面的逐渐回落彻底脱离海岸而失去了交通的便利，后来的“三代”对它们造成了海上来路的断绝，最终使仰韶随之气绝于深深内地。



▲已有大约4000年历史的塞浦路斯四联杯。

在中国境内泰山并不特别高大，海拔才一千多米，为什么它会是中国古代最神圣的具有人文价值的大山？从大汶口文化或许已经奠定其神圣地位。东部地区新石器时期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先后组成。

在山东西南与河南比较接近的地区发现了一个滕县遗址，“早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该类型与后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有相似之处”。这不奇怪，从地形图上看，那是两处最近的“岛屿”，它们之间应该曾经是一片“湖海”。我们或许需要猜测两地之间是通过舟船之类的工具达到交流才正确。

苏北淮安的青莲岗文化遗址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时间上早于龙山文化。

迄今为止已经发掘了100处大汶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尽管出现于鲁东、皖北甚至豫中等地，但其核心分布于山东、苏北，并且这些遗址多为墓地，而非居住地。①

我对于大汶口文化以及它前后和周围的东部文化的总结是：偏于海洋特色。并且之所以多发掘有墓地而不像仰韶那样有许多的居住地发掘，原因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船上，船就是他们的居住地。或者他们的房屋就建立在水上或水边，这一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居住地会在发现概率上少于仰韶文化，坟墓就不同了。

① 《古代中国考古学》第152页。

即便在上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渔民除了必要的采购以及埋葬亲人他们几乎是拒绝上岸的，与岸上的人们几乎成为两个不同的民族。远古时期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如此，或许没有道理，只是传统，也或许深有道理，比如躲避各种可以想象的危险。当然，不要误以为大汶口文化是纯粹的海洋文化，他们也发展农业，任何一个谋求发展的群体在当时肯定已经意识到农业的不可或缺，所以他们最有可能整体是“两栖”群体。

大汶口人到底来自哪里？这个问题重大而敏感，因为它意味着对东部文明根源的回答。

“严訚根据对大汶口和西夏侯遗址（山东曲阜）人口的一项研究而推断其居民为波利尼西亚人种，而与同时代的仰韶居民有着显著差异。”① 但也有中国学者不同意这个结论。

波利尼西亚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否则他们就不会居住在太平洋上的小岛之间。实际上我还认为这个民族与后来中东崛起的海上民族或者腓尼基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后话。再联系到北京山顶洞人中的拉美尼西亚女人，这个推断就显得更有道理，因为拉美尼西亚基本上就在波利尼西亚文化圈内②。也就是说，无论山东大汶口人还是北京山顶洞人看来有可能是同源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都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南岛文化”范畴内。也就是说，中国的南部与东部地区，在早期更多接触了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海洋背景的“南岛文化”。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又加入了其他多种文化色彩，最终稳定沉淀于“三代”。而“三代”的直接根源却在中东。

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我相信生活在海洋上的这些人们融合、分化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与文化，有些群体甚至消失不见完全被包容在另外的文化色彩之中。比如“三代”就是一个典型，这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结晶，我们最终只可以分析出其中的一两个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做全面的总结很困难。

在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一直比较接受人类起源“非洲单一说”，当然包括南岛人（含波利尼西亚人）也是从非洲出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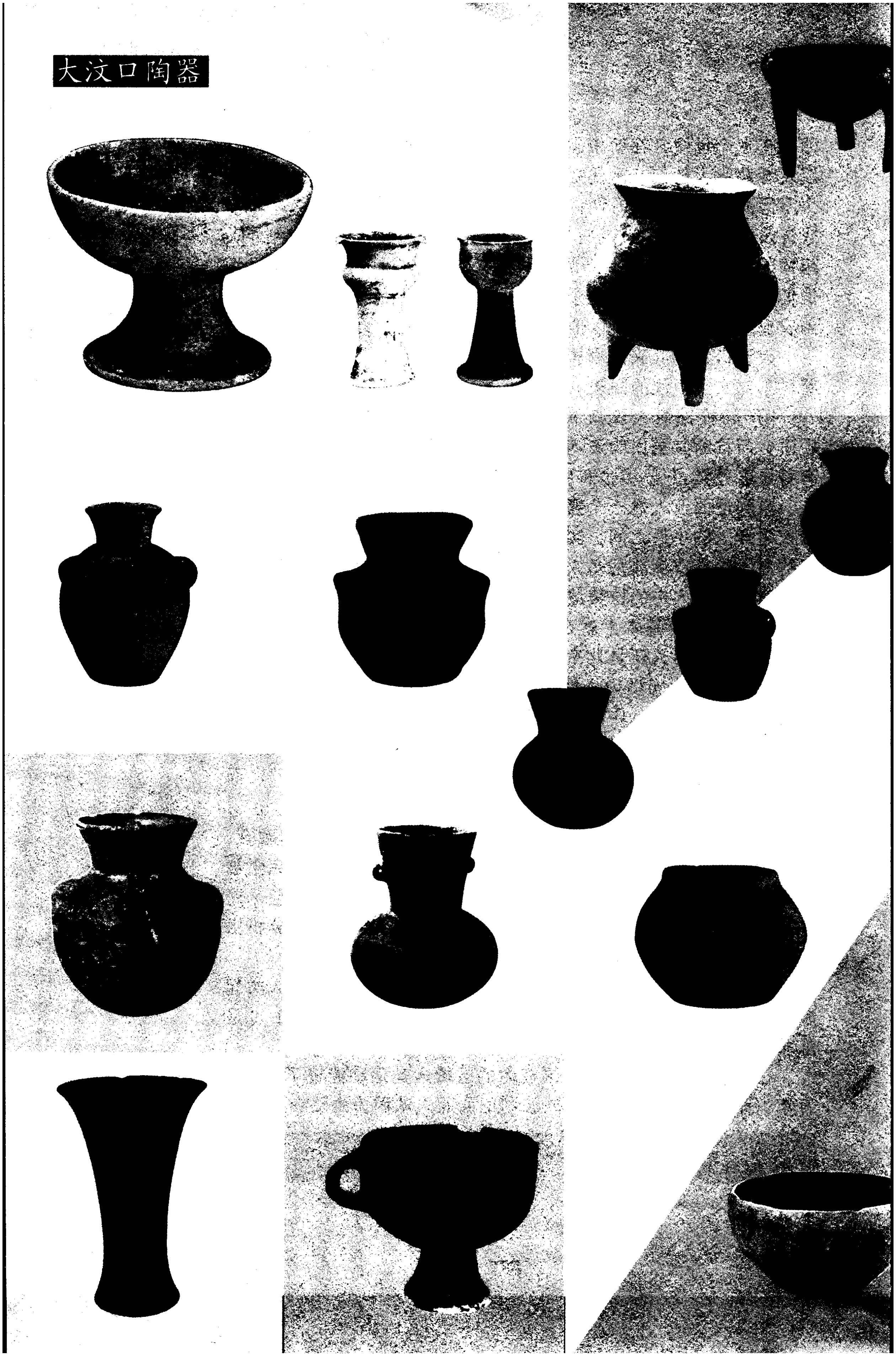
在第四纪冰川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人类活动绝迹了大约 4 万年，而这个时期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因为生活在赤道附

---

① [illegible]第 199 页。

② [illegible]

大汶口陶器



近一直生活得自由自在，他们以那些温暖的岛屿为根据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万多年前冰雪融化期间，他们可能花费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游弋到当时临海的北京山顶洞，其部分后代也分布于相距已经不远的山东泰山一带。台湾在这条交通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中转作用。有许多的研究者认为台湾是“南岛文化①”的发源地，可能就与这个重要作用有关。由于中国大陆文明交流与冲突大大高于台湾，所以最初的“南岛文化”作为最底层在大陆被彻底掩盖，我们容易看到的是后来人群带来的影响。台湾的“南岛文化”成分因为相对“纯净”而为大家所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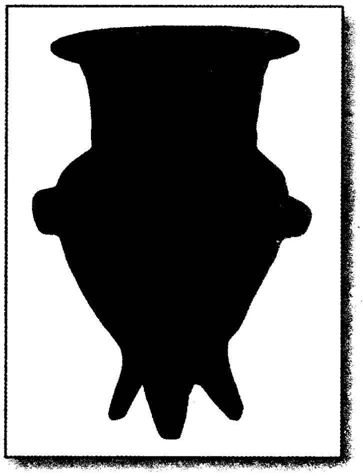
对于日后中国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大汶口文化有人给分为这样三期：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为第一期，公元前2900年之前为第二期，公元前2400年前为第三期。在最后这期中出现了西夏侯等遗址，黑陶开始出现，玉钺与石钺出现，并且一些大家熟知的斧头与太阳月亮的组合符号也同时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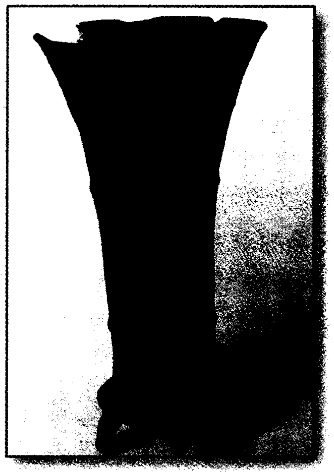
以赤峰为核心的北方红山文化与大汶口应该有接触，并且时间越近我认为红山与大汶口愈加靠近，它们相互有过更多的影响。我更偏向于把红山文化的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与仰韶有联系，后期与沿海的东部有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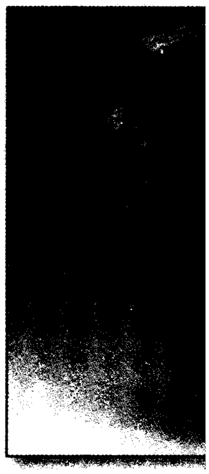
南部江苏吴县一带的崧泽、马家浜、杭州湾的河姆渡、良渚等也作类似考虑归纳，它们通过大汶口而与红山文化发生联系。形成东部沿海一条线。

以上东部地区很可能皆与“南岛文化”有牵连。所以在近1万年的时间内，到底是中国大陆发展了“南岛文化”，通过台湾回馈给太平洋中的南岛人，还是南岛人不断向东亚北方迁徙发展，这确实是个问题。但重点是要认识到，大约从龙山文化开始，东部文化就逐渐被新的文化层所覆盖，这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假如说红山文化中有鹰崇拜，那么南方河姆渡文化里则似乎出现了凤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龙凤文化从根源上似乎与西北仰韶文化鲜有关联。也就是说，在中国一直声名显赫的仰韶文化很可能由于被东部文化替代，尤其是被奠定了中国文明根源的“三代”覆盖，今天中国人所继承的很可能更多不是仰韶文化，而是东部海洋文化。当然，这个说法相当武断，但确实值得提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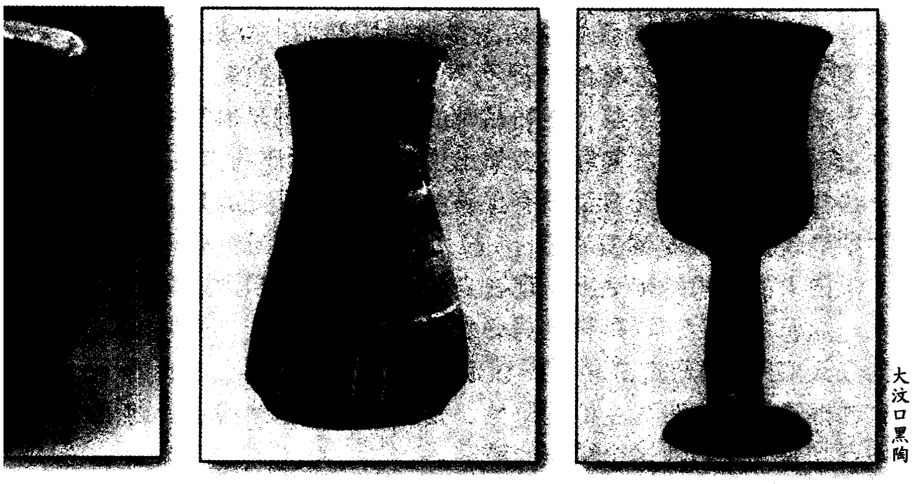
黑陶作为龙山文化的象征，似乎除了西北仰韶哪里都有出现过，包括南方的大溪以及后续的汉水屈家岭，河姆渡就更是“以黑陶为特色”（张光直语）。这都说明了中国东部南方与东方的某些统一性，以及它们与西北地区的分别。

张光直先生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河下游冲积扇已基本形成，随着其边缘地带地面豁缝逐渐缩小直至最后消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的陆路交往就必然便利了。”①“有确切无疑的迹象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无论南方和北方，这些有特色的文化都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该进程中，文化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其时间在北方为随后的1000年，而在南方则为随后的1500年至2000年。这些地域文化向外扩展，彼此间确确实实地进行接触，在文化上相互作用，并从实质上表现出相互作用日趋加剧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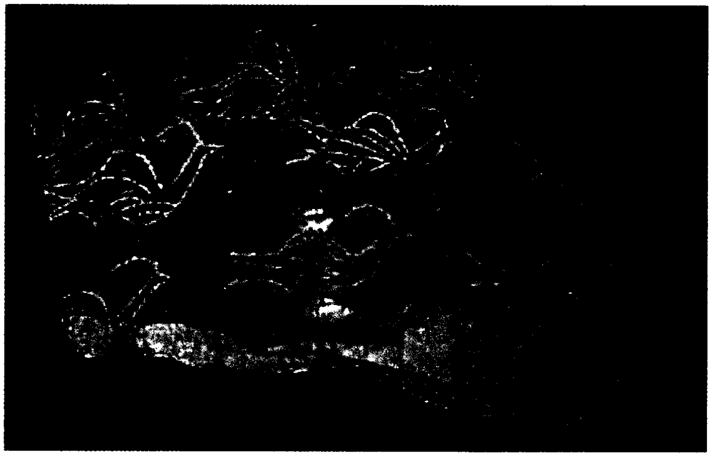
注意一下南北两地的不同时期或许是有意义的。它或许暗示了我们某些基本条件上的必然，比如交通工具在这个时间的改进甚至出现。为什么南方会晚一两千年，他们在等待什么？我认为可能是一种舟船大车。也可能是青铜器的出现有利于南方茂密森林的开垦。

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区域在“相互作用”之下成了“相互关联的文化”。对于这个相互作用

① 《古代中国考古学》第237页。



大汶口黑陶



▲假如这个陶片出现在中国，人们一定会对着那些鸟纹惊呼：凤文化的新证据。不过这却是地中海上马耳他岛屿上的陶片，距今已经 5600 年。中国龙凤文化到底起源何在，现在还是个谜。

的时空概念，张先生认为是“在公元前 4000 年开始形成，范围是北起辽河流域，南到珠江三角洲和台湾，东起东部沿海地区，西到甘肃、青海和四川……所有的地域文化在形成被秦汉王朝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作用”①。

张先生尽管是一位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的支持者，但是他是一位明显有着开放与发展眼光的人。他时时看到新材料的涌现对于史前老的假说的冲击。我不得不说，在这里张先生表达了中国

---

①《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2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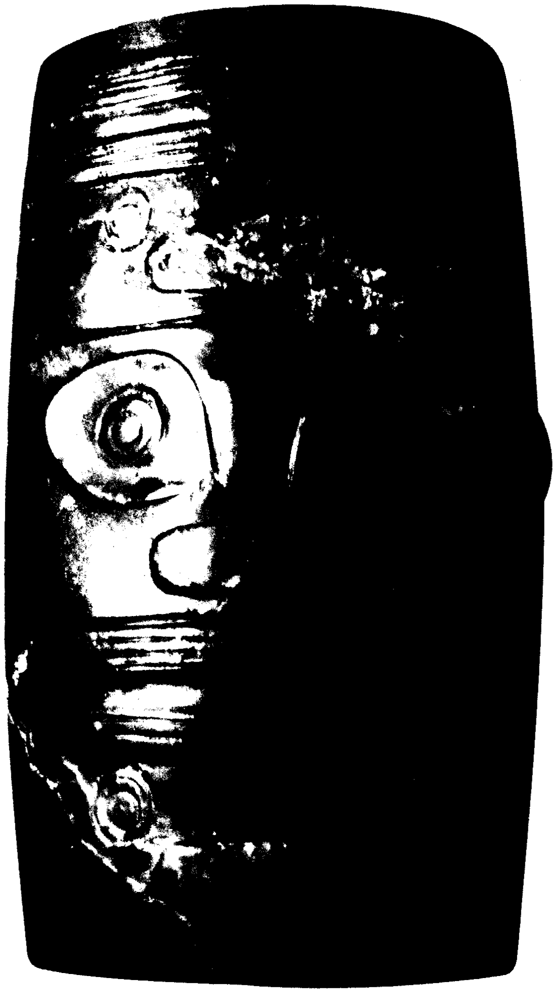
后来的文明就起源于以上提及的新石器时期文明的倾向，这个认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张先生如大多数中国文明独立说者一样，只看到了中国本土完整的“序列”，并陶醉于这些“序列”，但对于新内容的注意不够，比如马车的引进，青铜器冶炼技术的引进，瓷器（非陶器）在商朝的突然出现，文字在后商的突飞猛进，对于这些关键的文明元素都没有足够的重视。最重要的是，中国文明独立说的前提是建立在DNA技术应用之前中国也有猿人进化为中国人的幻想基础之上。现在当我们把人类的起源定位于非洲单一起源说之后，许多推论势必发生了动摇。但张先生并没有看到今天DNA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已经没有机会更改他的结论了，这很遗憾。但张先生的视野始终是开放的，我始终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受到他这个精神的鼓励。

在过去的上万年里，应该源源不断地有外部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国，定居下来，他们带来的文明与本土产生的文明一直在进行交流和本土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奠定了部分的中华文明，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带来新文明的“三代”还没有到来。

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无疑的，但是假如只看到这些本土化而看不到突然的文明几次大举进入中国境内也是不客观的，所以无论是强调“西来说”也好，强调本土起源也好，基本的事实还是应该分清楚的。假如没有这个前提的区分，可能永远只是在做无用功，因为从表面上看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实上是有些人没有分清本土化以及“突然外来文化”的区别。

大汶口之后的龙山文化开始了，同期比较著名的还有南方杭州湾附近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黑陶以及那些独特的带有大眼睛（或大耳朵）的玉石纹饰都说明了它与龙山文化或者商文化的直接关系。

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那些精良的玉器。东北的红山文化是另外一个以玉著名的区域。尽管从纹饰上还看不出来两者有什么关联，但是同样热衷并擅长玉石雕刻都让人猜想其间是否有着深层关联。由于红山文化在前，良渚稍后，再考虑到气候在那个时期发生了气温下降之后，这一猜想就更显得合理。当然，我不认



▲作者收藏的一块据说是良渚文化的玉石（高7.5cm），上面的纹饰是典型的良渚特色，眼睛得到了重点突出，并且同一块玉石上面分布了上下三双眼睛。

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迁徙，更大的可能是一种融入交流。

整体看下来，实际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都有十分明显的玉传统，而中国西北地区却似乎只盛行陶文化。这是中国新石器时期东西部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龙山文化挟裹着“三代”文明。

龙山时期一些遗址开始广泛出现于平原地带，说明大海消失了，沼泽也已经开始缩小，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中原。突然多出来的这些土地使整个东亚看起来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埃及与两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发达的王国，中东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不会不关注到东亚长出了一块巨大的肥肉。而更多的商人甚至商业大家族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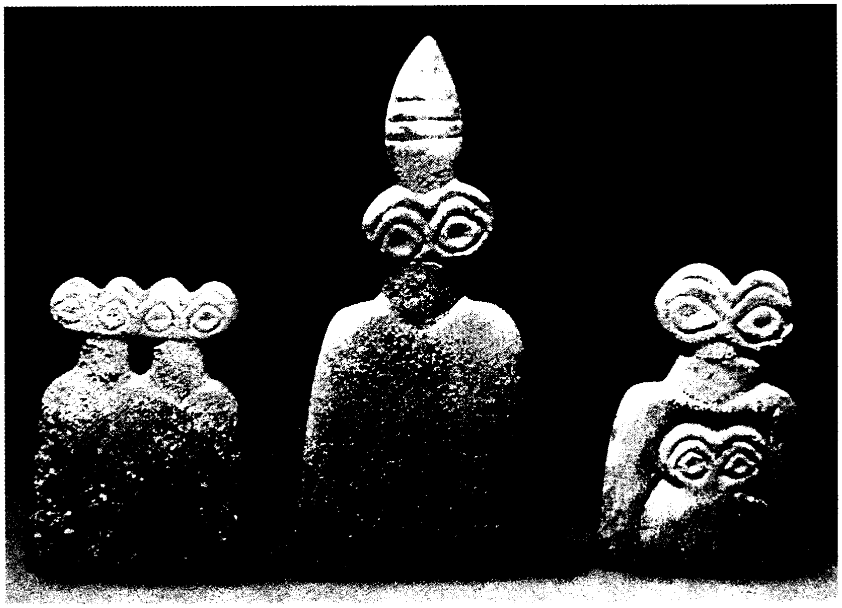
考古显示，在大约5000年前东亚开始文明加速，这里的社会生活即将发生一些质的改变，其中一个标志是“矛头和箭头的数量却异乎寻常地多”。暴力与战争开始正式登场。

这时期一些新的文明因素又在出现。比如良渚文化中著名的内圆外方的玉琮就没有人能找出起源，甚至至今没有人能讲出它

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那些奇特的面貌造型也是突然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是很成熟的模样，没有什么过渡。它们来自哪里，也没有人解释。但是这些遗址位于海岸边的事实还是给了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

黑陶文化的起源也是个问题。在中国的东部从南到北几乎都有黑陶，甚至台湾的凤鼻头文化也有黑陶。但是比较肯定的是，除了中国之外中东附近包括印度也有零星的黑陶发现。既然这些疑问都产生于中国的海边，我想还是应该把这些疑问交还给大海。

一位名叫“余以为”的网友在“苏三客厅”看到我以上的议论后发言：



▲这些苏美尔的眼饰最容易让人联想到良渚文化中的眼睛崇拜。

一、中国东部、南部、东南亚、印度南部，都是黑陶文化区，连成一大片。黑陶伴随着湿地农业，彩陶伴随着旱地农业，这两种文化在石器时代交流不多，井水不犯河水，黑彩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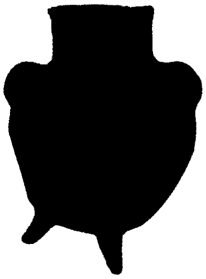
既然想讨论海洋文化，建议侧重讨论黑陶文化圈。

二、你说过“太平洋尼格罗人直到商朝晚期都出现于河南的平原上”，他们是比黄色人种更早抵达东亚的澳洲人种，他们相对现代后来的东亚人既不是外来的，也没有迁移走，而是被吞没了，在周边民族的基因里还有较多遗存，比如日本、通古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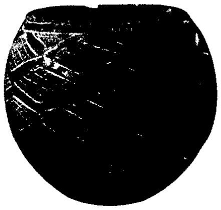
和藏族。

三、雅利安人东进的动力主要是，西欧还是大片原始森林。森林和沙漠一样不适合新石器农业，不可能大规模繁殖。西欧在铜器时代才逐渐发展，铁器时代才繁荣。新石器时代，人类对付森林，不是用石斧，而是用火。太潮湿的地方，森林是烧不起来的，所以西亚、北非、中亚、印度和中国北方这些现在看起来有点干旱的地方，反而是最适宜新石器农业（水稻除外），中亚也可以。公元前2000年，适逢气温下降，中亚农业衰败，西欧雅利安人改良了马，从定居畜牧改为游牧生活方式，既有迁徙速度，又有战斗力，又能适应较贫瘠的草原环境，所以在很短时间里就替代了早期已经衰落了的定居半畜牧半农业印欧人。所以青铜器早期，整个中亚遍布雅利安游牧人，直到东方的蒙古人种也学会了游牧方式，雅利安人又找到地理条件更优越的殖民地——伊朗、印度和欧洲，才半推半就地把中亚北部让给了突厥人。雅利安的东进和突厥人的西进，隔绝了中国和西欧的联系，所以我们才会对汉语和英语相似之多觉得不可思议。

探究以往的历史，并把我的结论写下来与大家分享，不是我在向读者说出一个不可置疑的真理，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不是出于谦虚，而是这个世界实在奇妙，在研究中发现其变幻多端的事实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被这些新挖掘到的事实以及我自己的逻辑推论所惊呆，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欧洲人的谚语：事实远比现象更大胆。



▲裴李岗文化红陶



▲非洲苏丹发现的大约3700年前的(C群文化)磨光几何纹饰黑陶

在总结过去的人类历史时，分出几个阶段才容易理解，过于笼统就会发生许多误解，所以让我们还是做个“精细”的分层。

从我的角度出发，我愿意把人类起源到“非洲单一说”的“夏娃说”归为一线。这条线大约在15万年之前。由于牵涉到过于庞大的资料收集，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阶段的想象，置于一片美丽的“混沌”。

接下来的阶段到10万年前为止，这期间从非洲走出的人类覆盖了亚非欧，包括中国大陆。

第四纪冰川顶峰期的到来使人类被压迫至赤道附近发展，中国大陆人类化石基本上呈空白状态。这时期大约为10万至4万年前。

然后的阶段是第四纪冰川顶峰期向融化期过渡，导致了大约4万年前到1.8万年前人类的逐渐回流，其出发地就不仅仅是非洲一地。与先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超出了非洲，散落在世界

各地的热带区域，不仅有非洲的赤道，还有太平洋小岛，以及美洲地区。这个时期的特别指出具有重大意义，它可能导致以下的一些情况凸现：由于回潮人口在赤道附近的突然积聚，使得交流加剧，在某些热带地区产生了相对发达的文明，在后来冰川融化期这些发达的文明又从这些地区传播到他们的北方去。

▲龙山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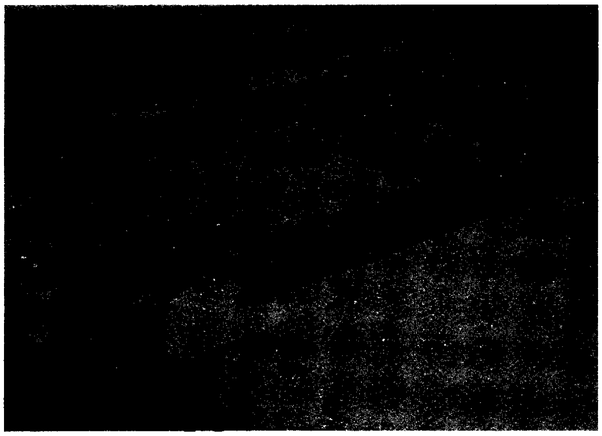
▲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出土的2000年前陶器

很可能这个冰川在地球上的来回伸缩带来的人群流动，无意中加速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从而使人类文明发生了质的转变，很快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但需要补充的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地理特点（如海平面频繁升降）以及人类善于和水周旋的缘故，这一时期达到过我们不能想象的文明融合，冰转化为水，水不再为害，水成为利。这也就是至今我们从考古发现的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人类就具有诸多相似特点的解释吗？否则，我们怎么解释人类在广大的地球上似乎突然之间不约而同地进入同一种状态，各个大的区域之间就新石器期间差别的时间只有千年。

从冰川融化顶峰期，一直到新石器时期，乃至“三代”之前，东亚一方面受到来自“西方”（中东与欧洲等地）的强大影响，构成了西北仰韶文化等底色；另一方面，东亚的沿海地区却受到来自南方的太平洋地区以及东南亚岛屿传来的文明强劲影响，可能发展形成了中国自渤海湾一直到山东半岛、杭州湾乃至台湾、琉球、南海的文明。同时，这个太平洋文化直接东去，横向进入美洲，所以，整个太平洋东岸与西岸的许多文化看起来有许多的相似成分。

北部白令海峡确实是一个文明通道，但远非唯一的亚洲与美洲通道。一般认为美洲人是大约3万年前迁徙到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支持条件。也就是说，在第四纪冰川顶峰期之后才是亚洲人迁徙过去的阶段，它衔接了4万年前的中国化石空白期。当人类从赤道回归北方的时候，他们不仅来到了中国北方，并且沿北部残余的冰原到达美洲。当然，这只是第一批，



▶意大利北方伊特鲁里亚文化中的宫殿，与中国“三代”宫殿有某些相似之处。参见《向东向东再向东》第158页中国二里头复原宫殿。还可以联系到中国南方客家人的土楼。

后面还有许多批人穿过海峡或大洋来到过这块远离文明核心的大陆。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忘记在中国与美洲之间存在着俄罗斯的广大土地，那里是一片极其神秘的土地，可能产生过一些文明团体，并且从考古上可以认为与仰韶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可能都有接触。

在考虑人类的文明交流与群体迁徙时，不能犯“单纯化”的毛病，一旦过于单纯地总结问题就会陷于各种误区。实际上许多文化区域是混合的，只是偏于哪里的问题，并且越是靠近我们的时代，交流与混合的幅度与深度就越大。始终不要忘记文明本土化以及自创也没有停止过，只说交流外来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或许西北、西南和东方这三个大的方面最终构成了中国相应三个分区，并最后“混成”为汉语的背景：来自西北方的阿尔泰语，来自西南的藏缅语，来自东部南方的南岛语。这个认识依然不能“单纯化”，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侧重。另外，假如我认为中东对于中国有着深重的影响，那么他们对于

中国的语言影响是什么呢？这使问题复杂起来。我的一个解释是，这是后期的问题，是“三代”时期的问题，时间比较靠后，而且假如“三代”主要是上层统治者为外来者的话，他们是否最终会广泛影响和改变民众的语言习惯，这也是个问题。

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文明加速发展，地理的优势导致人口在中东地区会聚，中东文明的强势从地图上显而易见。无论是人类起源于东非，还是最大的土地板块核心就在中东这亚非欧联系地带，太平洋热带地区即便有文明发展，长期下来必将不是中东的竞争对手，美洲那纤细的赤道带更不是文明发展的好选择。中东的幸运是地理决定的，它的文明排头兵地位是地理优势决定的。这个落差积累到一定的时期后，中东必然要向四周扩展，这个必然到来的扩张时期就是大约4000年前的青铜时代。而中国的“三代”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从青铜器时代开始文明发生了质的改变，青铜这个当时的高科技成为征服其他文化最有力的武器。“三代”携带着青铜来到中国并不令人意外。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居住在东亚的人们很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语言、不同审美偏好、不同的工艺，也有不同的人种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工具。

几个大致分期：

1. 人类起源到“夏娃”的15万年前
2. “夏娃”到10万年前非洲人扩散到东亚
3. 10万至4万年前的化石空白期，曾经居住在大陆的人被迫南迁
4. 4万至1.8万年前从赤道附近逐渐回潮北方
5. 约9000年前至4000年前以仰韶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期
6. 4000年前至3000年前“三代”核心时期
7. 秦汉之后封建国家兴起的封闭历史时期

▲具有3000年历史的小亚细亚军事防御工事，请对比中国长城。

夏商周“三代”文明

中国文明主体应该说是从“三代”开始的，并且这个文明以汉字为标志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探索中国文明实际上首先就是要清理“三代”的根源。

当我们在考察“三代”文明时，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在中国的部落成千上万，夏商周不过是其中较大的部落而已，它们或许还不能代替整个中国，但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来谈。

顾祖禹总结说：“传统的说法是当夏禹在途山召集各邦首领时，有万邦首领携玉和丝绸而至。至商汤受命于天来肩负重任时，尚有三千余国。到了周武王大会诸侯而检阅军队时，还有1800个诸侯。当周王朝开始将王都由镐京向东迁至洛阳时，还有1200个邦国。从迁都至春秋末期的242年间，诸侯们进一步卷入了相互兼并之战，在春秋经传中仅见到一百余国。其中在结盟和征战中记载清楚的是14个诸侯国：鲁、卫、齐、晋、宋、陈、郑、蔡、曹、许、秦、楚、吴、越。另外的113个诸侯国被大国们所征服，将其财产和武装交由大国们处置。”①

▲地中海北岸出土陶罐，类似这样红白相间涂彩的陶罐在中国四川羌族地带有出土，并且是那里的一个特色。红白涂彩标志着什么样的人文意义，是值得追问的。

因而张光直先生说：“尽管夏商周三代中有统治时间较长的时期，然而，“三代”可能至多是诸多国度中的某几个，在一段时间里取得了统治权而已。但是该三个政权在各自所进行的时期，其文明发展的水平可能高于所有别的国家。”②

① 转引自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23页。
② 参见《向东向东再向东》第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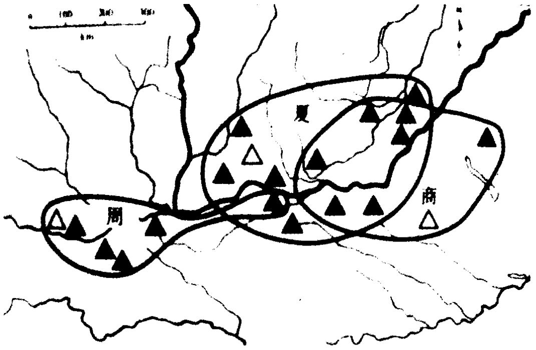
张先生还明确认为，夏商周的文化有统一性。我在《锁定红海》一书中甚至更进一步试图论证“三代”的同宗关系，比如对于“qi”这位祖先的探讨。

或许仅只是因为这个延续下来的家族特别注重“族谱”，所以我们只留意到同时期这仅有的“三代”，其他的全部被忽略了？比如三星堆文明在偶然发现之前我们就毫无留意，直到它们的青铜器竖立在我们眼前，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支文明队伍。修族谱的习惯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难道三星堆人仅仅是因为没有修族谱的习惯才被中国历史忘记了？

至今在中国境内哪个民族或群体依然具有这个顽强的修族谱的习惯，是仅仅“客家人”有此传统，还是其他的民族也有此传统？他们是相互学习的这个传统习惯还是自古就有呢？另外，在中东具有修族谱习惯的除了犹太人还有其他民族吗？这些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是被一个喜欢修族谱的家族给夸张填充了。

在《锁定红海》一书里我怀疑“夏甲”就是“客家”，至今客家人也有记录家谱的习惯，比如今天南方赣州的客家人竟然可以记录到从1700年前河南颍川南迁的详细事实。当然，中国几个圣家族的族谱就更清晰了，比如孔孟家族。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他的国家民族有此习好。犹太人的家谱能力倒是不用怀疑，中亚一些国家似乎也一样有类似传统。

由于缺乏文字，夏朝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来任何文献，所以有关夏朝可谈的很少，只有传说。而这些传说在中国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以区别于真实的历史，估计要很久之后我们才可能对夏说三道四。尽管中国人喜欢开口就说“夏商周”三代，但实际上西方人并不认同有“夏”这个朝代，他们遵从的是科学原则，我们中国人认同的是情感原则，甚至神话原则，或者干脆就因为夏商周是同宗的，自古就是连同一体的，所以言我中华必从夏始。当然，或许中国人这样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据说“华夏”就是从“夏”开始的。



▲张光直绘制的“三代”活动区域

有较多可谈的是商朝。

商朝公认的发源地是山东，时间上对应的则是大汶口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商文化或者说龙山文化逐渐向中原靠近，它们的都城一步步进入黄河中游。最终龙山文化与晚期的仰韶文化在中原河南融合。两种文化典型的混合承担者是夏朝。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或许它暗示了最初的某种联合，这甚至让我们无法判断夏的来路，在东西之间摇摆。

商更明显地指向了东方海上，然而近年来对于商墓中玉器来自西域的鉴定又一次使我们怀疑商其实也很可能采用两条不同的水陆道路，并且迂回了东西两条路线。

假如说周取代了商是由于宗教，那么我假设商取代了夏是因为一种职业性新势力：商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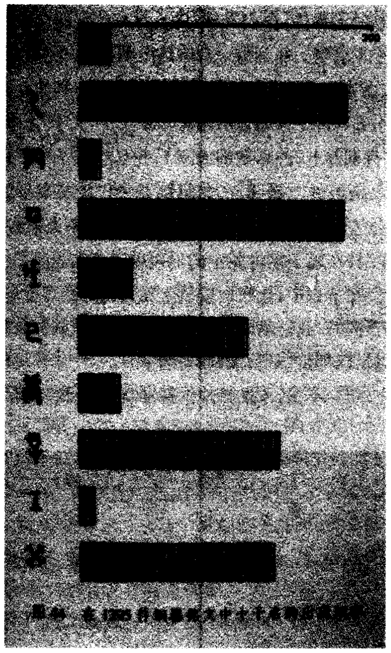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认为在大约3600年前海洋文明击败了夏所代表的内陆农业文明，而这个附带于海洋文化之中的是日渐发达的商业。

再继续进一步仔细分析，商朝内部也发生过大的变化。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商”与“后商”。这个变化之大甚至让许多人诧异地提出疑问：它们还是一个王朝吗？这个“结构”上的松散其实不由得让人想起张光直先生对于商王朝政治格局的解读：轮流坐庄制。

张先生认为，可能商王朝并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皇室家族统治，而是由几个大的家族轮流定期执政。这个说法我很欢迎，不仅给

后商的突然变化作出了合理解释，而且还为我后面一个更大的假设提供了方便的背景条件。只是有一点改动的是，我假设这几个轮流执政的家族都是富商巨贾，实际上类似的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确实出现过。

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商王的“轮流坐庄”假设是具有统治权的王族共有十个群体，按照干（支）体系分为十个，每个群体中的王就以他们的群族来命名这个王。如武丁来自“丁”群。这个假设很有创意，与清朝“八旗”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合乎逻辑，不过目前尚需要更多证据。



▲ 10个干支在1295件铭文中出现的频率（摘自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

似乎从后商（大约3300年前）开始，发生了某种革命，其标志是甲骨文突然出现，使用龟甲的占卜大规模出现，葬俗也出现了大幅度改革。这些都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的剧烈变动。我甚至认为后商与周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周人或许为了真正的另立江山才彻底推翻了商人。他们之间有联姻关系是肯定的，但之间的真正关系如何，起码不能以《封神演义》那样的文学作品来论证，因为就这部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学作品看，周朝与商朝水火不容，不可能是我假设的更为密切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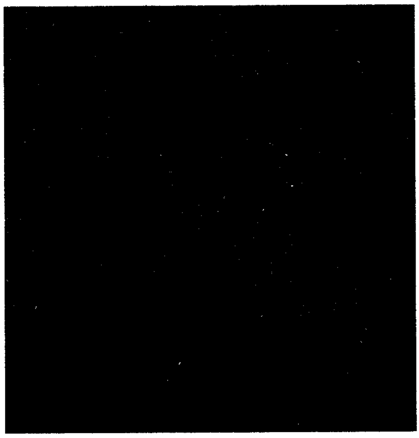
一种带隧道的王墓在后商开始出现，威望越高隧道越长，国王与亲王之间在隧道的数目上有明显区别。只有国王可以有四条隧道，王室成员根据等级不同隧道的数目也不相同，在后世人们称其为“隧礼”。这一情况在中国封闭的学术圈内以为是中国的独特礼制，实际上类似习俗西方早有。与此基本同期，欧洲远至爱尔兰，近至意大利、德国，尤其是古埃及只要刻意寻找都有类似发现，只是在细节上不尽相同。尤其是隧礼在埃及这里明确出现，并且，隧道越长威望越高，其集大成者在“国王谷”①，时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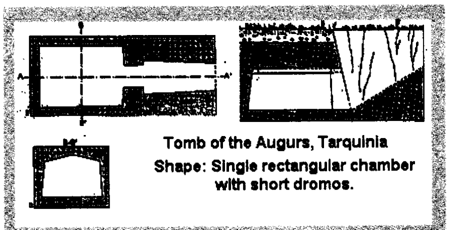
① 埃及情况见《锁定红海》一书插图。欧洲见《向东向东再向东》第191页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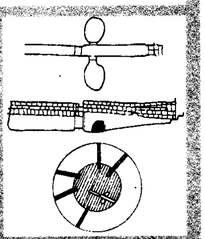
也与中国基本同期。

在国王谷出现之前，古埃及皇室使用金字塔，他们与中国商周几乎同时改换为有漫长隧道的墓室。中国想必一直同样模仿使用了金字塔，不过质材与大小差别很大而已，夏前诸多传说是“台”。后商开始，隧礼出现，埋在地下，地面上的金字塔形状实质上在中国也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据说到宋朝才改为圆形宝顶。中国从后商开始，可能结合了金字塔与隧礼，上有金字塔但却很小，下有隧礼但却短得可以考虑为下葬的通道。古埃及的隧道长度有时达上百米，中国皇室的一般则长十几米，偶尔我猜想这是不敢僭越的一种表示，所以后商人把长度加在侧面的几条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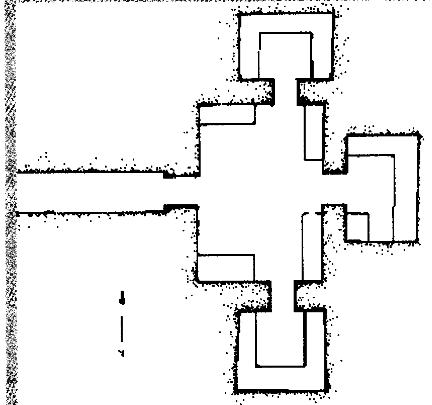


▲意大利伊特鲁里亚文化中的墓穴示意图。圆圈为其整体外观，是个引人注目的巨型大墓，但地下展现的是几个分别的墓穴。这些墓穴显示出某些“隧礼”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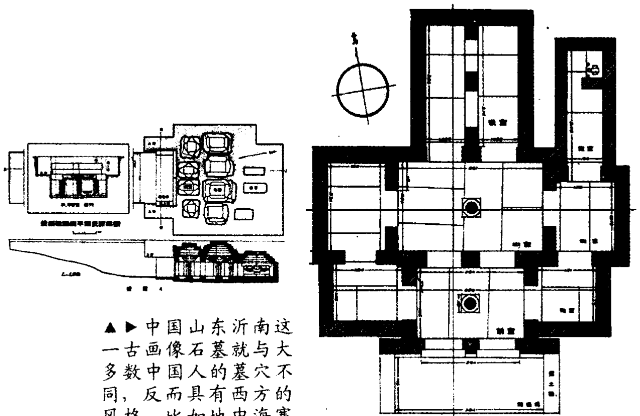

Tomb of the Augurs, Tarquinia
Shape: Single rectangular chamber with short dromos.



▲▶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文化中的墓穴平面



▲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文化中的墓穴平面。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墓穴格式统一，更多的是与中国不同的，正如中国地区也并非所有的墓穴为统一样式。



▲▶中国山东沂南这一古画像石墓就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墓穴不同，反而具有西方的风格，比如地中海塞浦路斯等。

▲殷商青铜人头像 现藏台湾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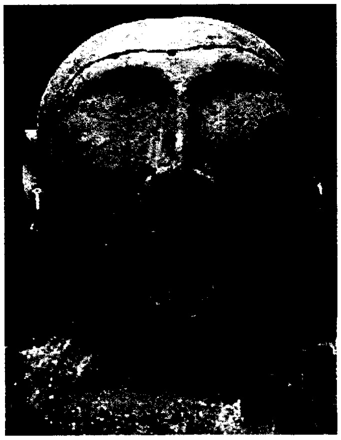
◀殷商人全身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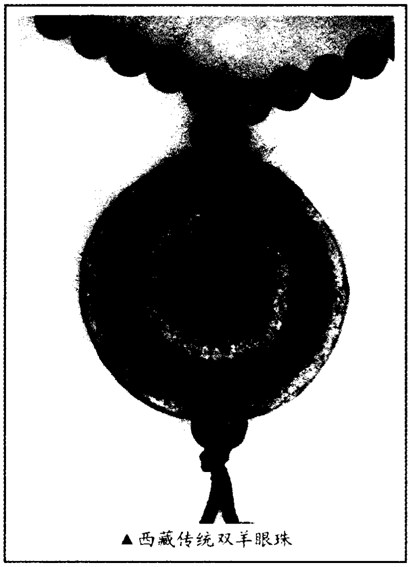
道上，成为一种古埃及人并不使用的“十”字墓地。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并非世界上所有的墓穴格式统一，更多的是与中国不同的。正如中国地区也并非所有的墓穴为统一格式。

后商的诸多变化让我怀疑，是商的统治集团被注入了新的成员才导致了突然的许多变化。我还是怀疑这个新成员或许与周有关。从文化传承上看，后商与周实在衔接太密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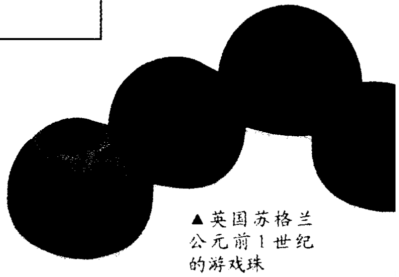
商朝各种各样的鸟造型很盛。据说，在中东一带鹰是女性的象征，尤其是女性权威的象征。同时鹰也是王权的象征。由于在奢华的妇好墓中发现了多种鹰造型，我坚持认为，假如妇好不是一位女王那么她肯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王权身份，她不是一位普通的王妃。假如以后的考古证明她是直接派到中国的某位西方皇家代表我也不会诧异。

有人认为商朝出现的饕餮纹与沿海比如良渚的器物之间有联系，最初我认为这太牵强附会，但后来经过研究后我认同了这个观点，并且我认为它们的相同点是“眼睛崇拜”。良渚玉器中常见的一种是眼睛状物品，饕餮的重要特征也是眼睛而不是其他五官。我希望再把这个“牵强附会”的源头拉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那里去，他们有“眼


▲公元前7世纪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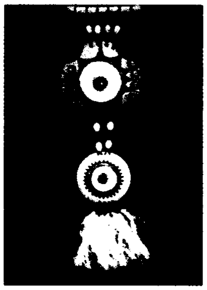

▲西藏传统双羊眼珠

睛崇拜”。当然，全球眼睛崇拜现象很普遍，只是那里更盛一些而已。比如埃及的“何露丝之眼”，中国夏朝与三星堆器物中出现的眼睛符号，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共同的眼睛崇拜。


▲英国苏格兰公元前1世纪的游戏珠

尽管商与沿海许多文化有牵连，并且它们之间的联系超过了与西北仰韶文化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夏商与沿海似乎还并不成为绝对的同一体。或许我们可以猜想它们是联合结盟了，比如，黑陶、鼎、鬲等属于旧的沿海文明，但外来的“商人”却可以以青铜技术获得与他们结盟的权利。我们不能看到某些文明痕迹在一起就认为它们一定是本来同源的，也可能是外来突然融入的。

▲西藏传统饰品“九眼天珠”


▲中国云南纳西族饰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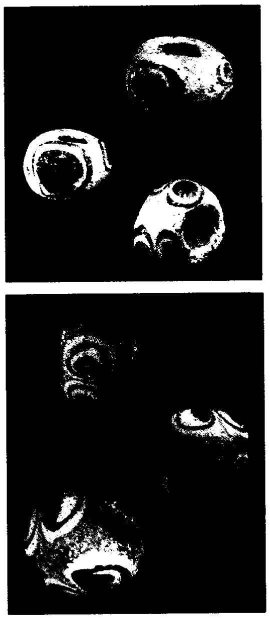
中国至今也没有发现青铜冶炼的探索期，应该是有人带它们进来，而进来的新人一定获得了利益，起码在黄河流域就是夏人和商人。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远远高出原来的早期土著它们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政治利益。

在长江流域另外有一群默默无闻的青铜携带者，他们或许也有修建家谱的习惯，但是由于南方从来并非帝王所在之地，丛林很快掩盖了他们的身影。北方却由于政治文化的发达，先帝王迹一再得到追寻而强化，所以只有夏商留在史册。

◀中国出土的名叫"蜻蜓眼"的先秦饰品。蜻蜓眼多出现于春秋时期，现在已经证明它们来自国外。

与青铜一样令人怀疑的高科技在中国突然出现的，还有马车。后商非常明确有马车出现，比如在殷墟已经有车马坑出现，有人怀疑夏朝可能也有马车，不过还不肯定。或许我们可以怀疑马车随着青铜器一起进入中国。既然进来一种，何不同时一起进来呢。但这确实还是个疑问。

作为商代考古专家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影响巨大，他在此书345~346页说："中国北部的文化发展序列现在已稳固地建立起来，这个很长的文化序列开始于新石器早期的转变，最终导致等级森严、阶级分化的社会和有文字文明能够产生。应当肯定，这个序列还存在缺环，我们期待着将来的考古资料使这个序列得到充实，但现有的资料足以使研究中国史前史、世界史、社会演变的大多数



▲地中海附近岛屿出土的名叫"腓尼基眼"的饰品。

学者相信中国是‘本地起源’这一基本共识。”

但我觉得这个“共识”来得太早了，正如张光直先生自己在“商与古代社会中的纯洁性”问题所提示的，这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文字的“缺环”就无法从本地内部予以圆满的解释，商文明何以存在于东南沿海也是个疑问，它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并未得到充分的比较与分析。张先生此书尽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但可惜写于近30年前的1978年，距今又有大量的文物与考证出现，许多概念得到根本改变或推翻。

张先生提到的“序列”也是许多本地起源说者所看重的，但是我认为这种序列像一条编织完美的麻绳，从外部看是“独立”的，并且是那样长，想多长就有多长。粗心的人找不到接口，但是懂得编织麻绳原理的人都应该明白，麻绳不是由外表看起来那样长的麻纤维编织起来的，它们是一点一点续接起来的。麻绳的长度与组成的麻纤维的长度无关。“本地起源说”者注重的是麻绳的外观，而“西来说”者却意在指出看似完整的麻绳其实是由一条条新的不断外来的短纤维编织起来的。它们就角度上来说有根本的区别。

我认为在DNA技术应用之后，许多旧观念被颠覆，这是发生在近几年的新鲜事。假如我们承认人类主流是从非洲出来的，那么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他们必须经由中东才能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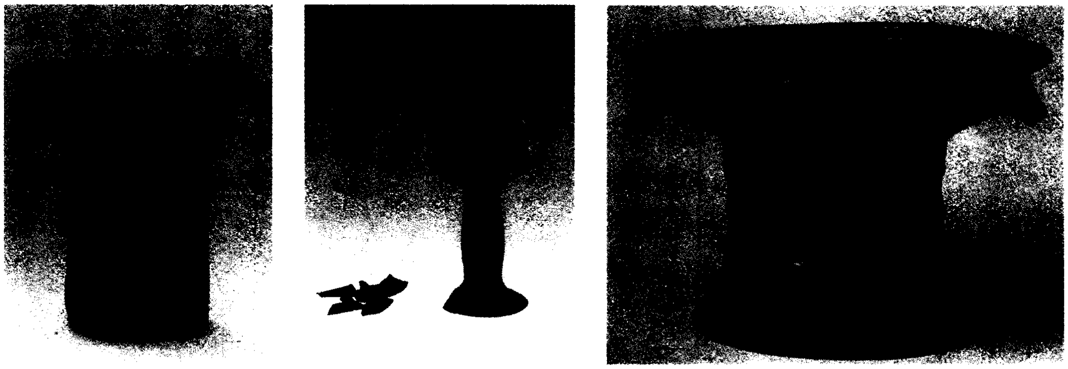
看来张先生并不排斥中国接受了一定的外来影响，只是他认为没有达到我认为的程度。他说：“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排斥传播说，否认它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不过传播是不能如此轻易地排斥在外的。”他在同一页还说：“众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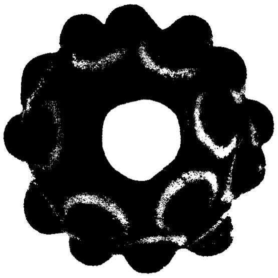
周知，中国文明的诞生年代要晚于世界其他各地的几个文明，中国文明的近祖完全有可能接受了这些文明的推动。之中接受的最好证明是，小麦作为粮食作物在商文明中的出现，因为有充分的资料说明小麦种植的发源地是中东。”

在谈到商朝的王系可能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时，实际上这个态度本身就说明张光直先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中国文明独立说”论者。他说①：“具有开阔视野的严肃的商史学家，如果存有客观的心理，并不认为商史、商制都已搞清楚，不必再行研究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那些民族学上描述轮流继承制度方面的资料，尤其是马来半岛（Malaya）、蔼理斯岛（Ellis②）的弗他弗尼（Futafuni）、尤宁群岛的法考福（Fakaofo③）、太平洋岛屿中的罗图马岛（Rotuma）等地区的有关资料，对商代制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同时还会发现这些王国与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还说不定可以搭上些亲戚关系，他们的王制，尤其值得注意。”

张光直有关商王多支王族轮流坐庄的说法恰合了我的设想，中国商朝并不是由单一势力组成，而是多民族多势力的集合。并且，他把中国东部文化的视野引向广阔的太平洋以及南岛文化区域，这是我极为赞赏的。由于他长期在台湾参加考古工作，这方面他是个权威。

[illegible]


◀龙山黑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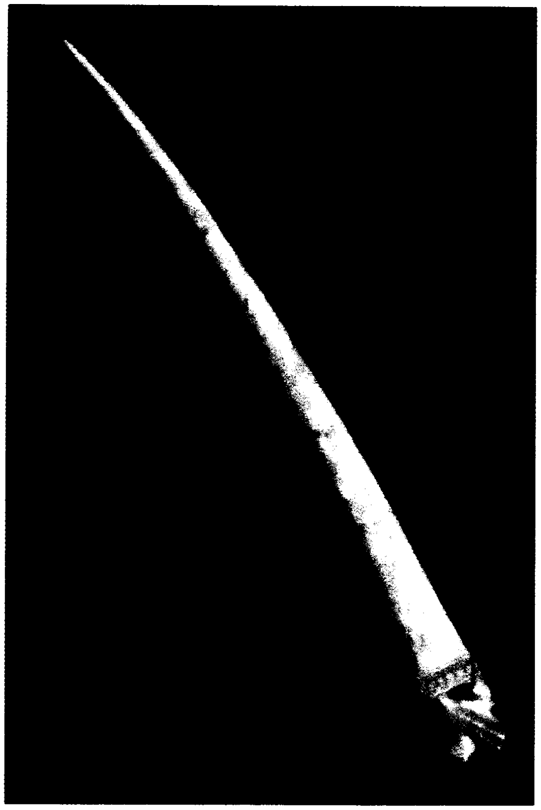
有关周朝

张光直先生或许更赞同周朝是中国文明的开始——西方人多持此论——“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的终结，是中华帝国及其 2000 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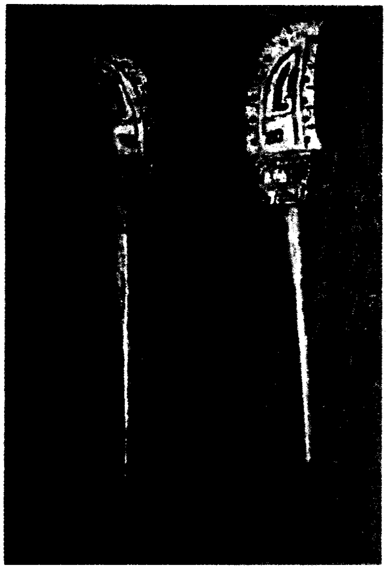
我更愿意把这个开端挪到后商。周继承了太多后商的文明，包括文字。

对于周的起源，张光直先生建议“从西安附近的丰镐地区开始回顾”，在汾河下游和渭水流域“这些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序列依次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文化”。我想说的是，这里与夏、商可能采取过近似的联姻或结盟手段。但我也注意到这个事实，它的“发源地”（实际上就是来到中国之后的定居地）比夏商更西，夏之初更多提及的是山西南部。有关这一点或许可以结合《锁定红海》中论及部分犹太人族群从西北进入中国陕西然后流落为部分藏缅人的事实，并且这条通道反向也成立，也就是说，从中东过来的某些群体可能从中国西南地区进入陕西。

说到周朝与商朝的之间过渡有许多话题都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但有一个却是始终没有提及的，那就是爵位制度。中国与西方共同拥有一个古老的贵族制度，它们同样为五个级别！可能



◀公元前7世纪意大利出土的象牙饰品，长19.6厘米，属于伊特鲁里亚文化，现藏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



▲安阳殷墟出土的象牙饰品，有人认为是头饰。

由于性质非常接近，也或许根本就是同源，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中西方贵族制度完全对应，这就是：公、侯、伯、子、男。这个制度中国有，欧洲也有。最初在两种语言文献中看到它们就让我惊讶不已。

据说中国的这个贵族序列从夏朝甚至先夏就有了，比较确切的商朝就有这个称呼，西周固定下来。《孟子·万章篇》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在英语中它们表现为：公（Duke）、侯

（Marquis）、伯（Earl 或 Count）、子（Viscount）、男（Baron 或 Lord）。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们之间还是有点差别，这就是“天子”在中国也占据了“一位”，并且最后的“子男同一位”，数量上竟然恰合一样五个。除这五个等级之外，中国与西方都还有另外的一些级别划分，但这五个爵位是单独比较常用的一个体系。它们是同源关系还是一个巧合?

欧洲的封建制度公认与周很接近，我认为可以深入考察一下再下结论，根源可以从地中海沿岸以及红海考察起，重点或许可以放在希腊与意大利半岛那里，甚至延伸到小亚细亚。

假如我们把中国的“王”作为一种总督类型，也就是“皇”之下的一个级别，实际上中国的“天子”有可能相当于西方的“Duke”。这样也就好解释为什么秦嬴才是“始皇”，之前中国的国家首领确实并非“皇”。在西方，皇帝之下的最高爵位确实就是“Duke”。那么实际上拿英语的爵位对照周朝的爵位可能就是：天子（Duke），公（Marquis），侯（Earl 或 Count），伯（Viscount），子男或许为两个爵位合并了，所以是 Baron 和 Lord。

在后世的许多作品里，由于夏商没有传下来多少文献，所以一切都由“周”这个会流利说话的族群说了算。因而有关周灭商的传说都是以德胜人，但实际上考古证明周人在生产力上也远远超过周围的文明：“张家坡出土的新材料足以证明，周在伐商之前，就已达到了比当地……的文化高得多的水平。”① 很值得追究周人的根源来自哪里，他们是凭空就发达了还是有通往文明核心的神秘通道? 商为什么没有抑制住他们? 或者我们更需要问：商为什么更落后了呢? 也许，这个问题依然要从交通工具上的革新发展来找答案，比如马匹的广泛使用是否对于这次改朝换代产生了作用，而其中的一个族群使用了它们，另外一个族群没有使用它们，就足以造成很大的差别。

周替代商是一个内陆战胜海洋文化的例证，考虑到周已经在陕西附近发展了很长时间，尽管商周之间存在密切的姻亲关系，但集团利益压倒了一切。周之取代商很可能还有其他我们没有观

① 《商文明》第371页。

察到的环境外因。

周人与商人文化上既统一又有区别的事例集中体现在卜辞方面。周人也占卜，并且记录于龟骨。张光直指出："但在几个方面，其与殷人卜辞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它们非常小：最大的字长8毫米，宽5毫米，不过最小的字仅长、宽各1毫米，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其次，卜辞中的月相词语，清楚地表明，被用于占卜的宗教历法是太阴历，这些月相词语颇有特点，殷人的甲骨文中没有这项词语。再次，卜辞的内容，是关于发生在周王朝朝廷中的事件及祭祀活动。最后，其甲骨整治和钻凿形制与殷人的大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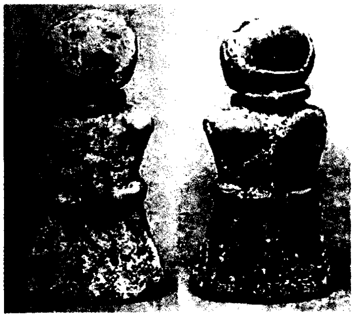
这些特点显示出，周与商之间不仅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而且各自大有戒心，比如字刻得那样小，恐怕就是不愿意让人轻易发现。我的一个直觉是，即便商周同宗，周朝统治者也发展了新成员，否则他们为什么连宗教历法都不同了呢?

天文历法引出的秘密

据说古代全球人都使用“太阴历”，周人就使用了“太阴历”。至今依然有几十个国家与地区使用“太阴历”，这就是伊斯兰教国家，或许我们该说阿拉伯半岛的人们对于“太阴历”更执著一些。“太阴历”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农业的方便，它来源于“朔望月”的周期。

“朔望月”是个重要的天文概念，意思是：月球轨道中月球与太阳或地球处于同一直线的两点之一。“朔”在天文上是指月亮黄经和太阳黄经相同的时刻，黄经差等于0度，这时在地球上完全看不到月亮；“望”时黄经差是180度，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

◀欧洲史前简约风格的雕像


▲中国般墟出土的简约风格的雕像 所有这些简约风格的统一之处在于脸被削刻为一块平板，这个手法很罕见，或许有一个统一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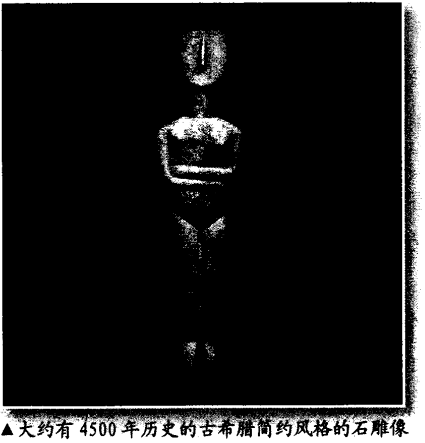
满月。连续两次“朔”或“望”之间的时间叫一个“朔望月”。“朔望月”的长度并不是固定的，有时是 29 天 19 小时多，有时仅为 29 天 6 小时多，平均长度为 29 天 12 小时 44 分 3 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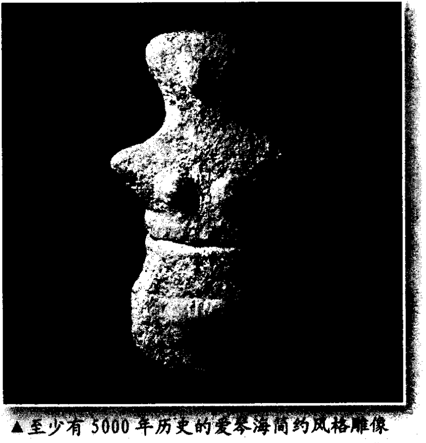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并非统一的“阴历”，只周朝使用了“阴历”。据说对于商朝的历法使用情况专家意见比较混乱，认为使用了阴阳历，但阴阳历中也包含了“朔望月”的太阴历。夏朝的历法还并不十分清晰。无论如何古人的历法一定与“月相”或“朔望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朔望月”本身可能有着恒久统一的政治意义。

在远古，一种新的历法改革或启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甚至某些民族会赋予历法以特殊有政治或历史意味的名称，比如伊斯兰国家使用的“太阴历”实际上就被称作“迁徙历”(所谓“希吉来”)，以纪念他们历史上的重要迁徙：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 622 年率穆斯林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

中国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历法改革的命名事件呢？非常碰巧的是，“夏商周”与“朔望月”之间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关联。

“朔望月”这个天文术语在英语里为“syzygy”，拉丁语为“szygia”，希腊语中为“suzugia”，几种外语之间变化很小，从读音与拼法上都能看出来十分古老。它们的音节如此明显，很有东亚的语言意味。很明显“朔望月”在汉语中是一种偏于意义的表达，假如说它来自一种外语，那么我们要说它是一个“意译”，而不是“音译”，这很明显。


▲大约有 4500 年历史的古希腊简约风格的石雕像


▲至少有 5000 年历史的爱琴海简约风格雕像

“syzygy”的另外一个词义是“联合”、“会合”。

要么是太巧合，要么就这么简单地找到了夏商周三代的姓氏来源，并且同时说明了他们的关系性质“联合”：

“Syzygy”三个音节的发音“sizidʒi ”恰合中国的夏姓“姒”（si）、商姓“子”（zi）以及周姓“姬”（ji）！

并且，其先后顺序竟然与夏、商、周的先后顺序完全一致！

是夏商周为同时存在的一个结盟联合体，还是他们以此庆祝从不同道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胜利“会合”呢？又或者是夏商周三代到达中国之后就签订了一个“轮流坐庄”协议，从而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各自400年吃果果了呢？

如此排序也可能是出于其他的考虑，比如由于第一个王朝用了“朔望月”之第一个字“si”，商为了表示自己是夏的合法后续就采取了“zi”，周同样考虑问题就使用了“ji”。

当然也可能从一开始他们三家本来就具有“姒”、“子”、“姬”的姓氏，由于他们三个的特殊“联合”行为，所以到后来“syzygy”就具有了“联合”的意义。后来中国的这个概念通过某些途径传播到了欧洲去，并且这个词汇代表了一种“三代”共同使用的历法的一部分——有人可能觉得这很困难，似乎中国与欧洲交流不太可能，但后面的一些证据会告诉你，唯有如此才更合理，事实本身远比我们想象更大胆。

在“三代”错落并存的推理框架下应该这样解释（参考《锁定红海》之“‘但’与‘周’的关系”），由于但人从中东出走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500年前，可以认为是他们来到中国才有了三姓的固定，而这个背景是三家可能制定了一个具有某种联盟意义的协议。当时为商人当政，夏人未散，按照先来后到就赐以新姓给三族。做这个推理主要是想较为具体地推测出“三代”命名的时间。

为什么夏的“姒”还有“妯娌”及女性意味？夏只是取了“sy”音，至于单个字的意义是后来根据夏朝实际上为一女性领袖而特别赋予字形和意义的。它们有联合在一起时的意义，也有分开来之后的单独衍生的新的含义。有关“子”后面还有更详细的单独解释，也是同样道理。

可能现在我们还无法圆满地解释“朔望月”（syzygy）与“夏商周”之间的神秘联系，但终有一天总会有人来彻底解开这一秘密。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看见了冰山一角，我这里的牵强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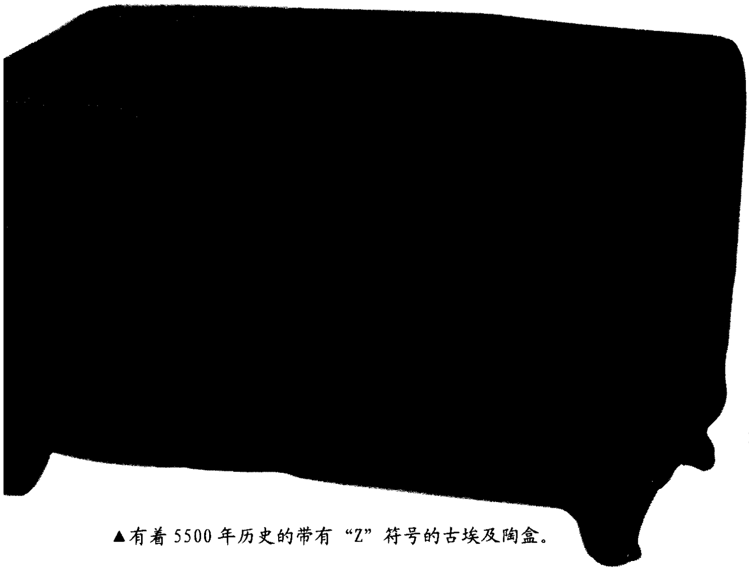
会只能算是一种抛砖引玉。

商朝是阴阳历合用。这个信息对我们后面的某些分析是有好处的：地中海东北地区的人们使用阴历，而埃及却是太阳历的制定者，很可能红海流域都使用太阳历。这个历法现象是不是把商朝的统治者指向一种文明混合呢？假如商朝曾经是“轮流坐庄制”，那么天文历法的混合使用也就合理了。

“朔望月”由于是以月亮为核心的一种历法，所以这个历法之下很可能隐含着一种宗教：崇拜月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当时人们唯一的崇拜，实际情况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长期崇尚万物有灵，所有的天体与动物，甚至看不见的物质，只要是人们可以想到的都被赋予神灵存在，只不过类似“月神”这样的会更重要而已。

月神在阿拉伯地区长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可能即与此有关，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伊斯兰教看作是这一古风的传承，大多数伊斯兰教的装饰物都有一弯月亮。而犹太教则是一种太阳崇拜，基督教也同样。

有人可能诧异为什么某些地方月神崇拜比太阳崇拜更有市场。这是因为在古代月亮更容易被作为历法象征存在，而太阳似乎最初时期并不如月亮那样能够规律性地呈现出“月”的含义。我想人类可能有“月”的概念早于“年”，并且最初人们不一定能够把太阳与“年”的观念统一起来，还认识不到太阳的重要。在今天科学的天文知识之下我们才知道原来月亮不过是一颗地球的卫星，而地球也得围着太阳转。但是在蒙昧远古时代，日月或许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分别。



▲有着5500年历史的带有“Z”符号的古埃及陶盒。

占卜方式

占卜是“三代”时期一个特殊的现象，并且这个龟甲现象往往被夸张到“中国独有”而成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另外一个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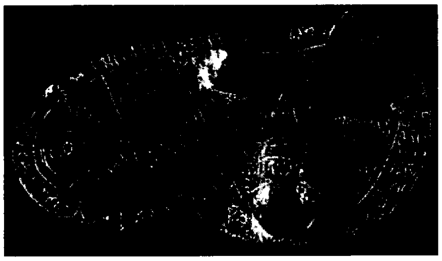
中国商周龟甲卜辞确实是比较独特的，但是商朝其他的占卜记录或方法却并不特殊。以肩胛骨占卜为例，至今也出现于欧洲许多地方，从与中国相连的俄罗斯到法国，甚至是英国的苏格兰高地，都有利用绵羊肩胛骨（spealbone）占卜的习俗。张光直先生也说：“烧灼动物肩胛骨占卜的习俗，（商朝）不久以前还在北半球新、旧大陆的广大地区流行过①。”说明这个占卜习惯是全球性的，并且非常古老。

商朝还有其他类别占卜。张光直先生说：“古代中国占卜有多种，藤野岩友列举了粟卜、蠡卜、鸡卜、虎卜、樗蒲卜、十二棋卜、竹卜、牛骨卜、灼骨卜、羊胛卜、镜卜、响卜等，而以龟甲及易卜为要。殷代占卜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龟卜和牛骨卜。陈梦家所说的，……以血（尤其是犬、豕、羊等家畜的血）为最具有巫术能力。巫术之祭的用牲重其血。”这些占卜方式多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东的重叠。

注意一下中国占卜的发展，作为“三代”之首的夏目前考古看也只有肩胛骨占卜，并无龟甲占卜；是商突然启用了龟

---

① 见《青铜挥麈》第281页。



▲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化中的肝脏占卜样板，青铜器制品。伊特鲁里亚肝上面有个16分区。经过许多年的研究，有人认为那是天空分区。假如那是时区就有意思了，因为中国汉代之前使用的就是16时区，中国是在西汉时改为12时区的。中国16时区为夜半（0时），鸡鸣，晨时，平旦，日出，蚤时，食时，东中，日中，日西，餔时，下餔，日入，黄昏，夜食，人定。

甲占卜，他们还与羊甚至牛肩胛骨同时使用。今天看来如此重要的一种方式或许是一种很偶然的产生，比如某位商王的丈母娘使用了两次，而它们特别灵验，然后龟甲就流行开来。或许是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加入了商朝统治阶层。

龟甲占卜有比较明显的海洋特色。中国最早出现有龟甲的遗址怀疑是在新石器初期的河南贾湖，龟甲中间有一定数目的石子，有人怀疑为占卜行为，但未确定。当时这些遗址就地理而言可能处于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上。后来从渤海湾到东部都有龟甲的发现，但无卜辞，都说明龟甲与沿海文化之间的关系。商所倡导的精神领域的主导方式不可能不影响到周人，因而最后周也继承了龟甲占卜的习惯。

▶巴比伦使用动物肝脏占卜，这是一块泥质羊肝样板。

我们可以认为，龟甲占卜属于中国的东部文明，与西部文明无关。这是东方的特殊。西方也有其特殊，中国本土暂时并无发现有继承，比如两河流域以及意大利北部出现的对于动物肝脏的占卜使用。

航海与外面的世界

新石器时代，“从东北到华北的交通，可能更多地通过海岸的路线；在龙山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其相互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航海船只来进行。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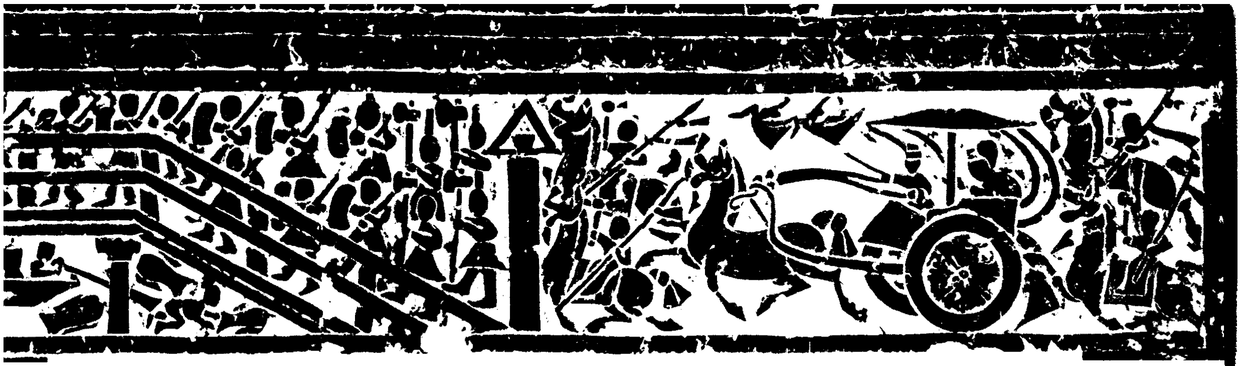
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属铜石并用期，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一般认为商文明直接来自龙山文化，其前为大汶口文化。

语言学家李葆嘉在《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中国语》一文中说：“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中南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凌纯声根据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来源于洞庭、鄱阳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②的祖先。美国人类学家杨江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他们向南穿越印度尼西亚，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绝大多数迁往南洋的夷越，至今还保持着与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

---

① 《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40页。

② 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皆为太平洋东部群岛区域。前者分布在赤道之北，接近亚洲；后者多在赤道以南，接近澳大利亚。



▲山东汉墓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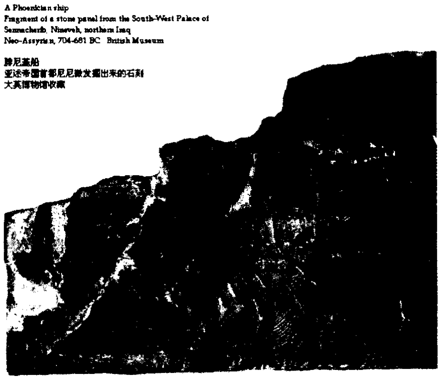
这些语言学结论是否完全正确还难以论证，起码“无风不起浪”。中国大陆与南岛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只是把起源方向调整一下可能就正确了。比如，实际上中国东部出现的部分人群是一万多年前第四纪冰川融化时从赤道回潮到中国大陆去的。当然也有可能这些地区是互相交流的。比如在冰帽扩大期，中国大陆的人类被赶到回归线之内的赤道附近，然后在融化期他们又回到北方，发展之后部分人又扩展到赤道附近，这是有可能的。在证据稀少的情况下认定有文化联系就可以了，不要过早下结论谁是谁的祖先。

撇开来去先后的争论，对于联系性的存在大家是没有异议的。

这里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没有航海能力，无论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还是中国大陆向太平洋群岛进发（或者反向）都无法进行，所以，即便我们暂时没有发现考古方面的证据，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古代很久以前人类就具有超乎我们想象的航海经验与能力。否则以上这些语言学上的结论就不存在。当然，我们或许对此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所有这些目前看起来隔绝的地方由于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全部陆地相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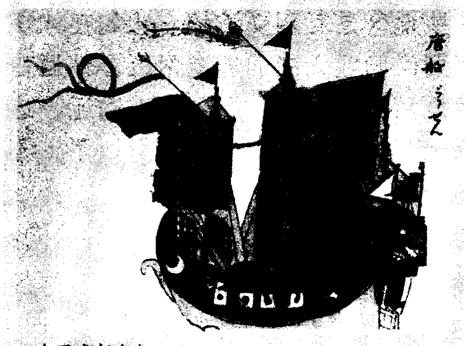
西方学者蒲立本 (E.G.Pulleyblank) 所著《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也说：“台湾北部大岔坑的绳纹陶文化，依碳 14 测定，年代是公元前 3500 年左右。这种文化与大陆福建和江西的新石器文化有关，这两地的文化目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7000 年。台湾西南部的凤鼻头文化，年代在公元前 1000 年至 2000 年之间，张光直 (1977:169) 将其归类为龙山型，与大陆沿海文化关系甚近。”

如此多的考古证明了不同地区的文化联系，比


A Phoenician ship
Fragment of a stone panel from the South-West Palace of Sennacherib, Nineveh, northern Iraq
Neo-Assyrian, 704-681 BC British Museum
腓尼基船
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发掘出来的石刻
大英博物馆收藏

◀亚述帝国时期的腓尼基大船浮雕 时间约有 2700 年，现藏英国。

▲泰国古船



▲中国唐朝古船

如核心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就很让人意外和警觉。在新石器时代有如此广泛联系，我们不能认为他们都是在河边洗手不小心掉进海里的鲁滨逊，必须承认古代人早就有主动航海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航行得很远。假如这个联系在6000年前，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陆地相接，假如在其后的时段则应该考虑一些航海工具的发展。

假如到杭州湾的河姆渡考古遗址就会看到一把距今7000年～6500年、残长62cm、柄宽3.5cm、桨叶长27.8cm、厚2cm的木桨。有桨一定有船！

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肯定有独木舟存在。专家估计，独木舟在中国的出现应该是10000年~8000年前。

商朝的海洋特色非常鲜明，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并且就人种方面许多人提到他们与太平洋人群的联系。但是按传统在描绘“三代”图景时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点，我倒不觉得这是某些学者的故意，但事实是，这个欠缺直接导致了一个疑问的提出。商人发源于海边（山东），假如在海边沿岸找不到文明的根源，例如龙山文化的光亮黑陶以及青铜器的冶炼起源等在那里找不到，那么势必要继续向海外寻找。但由于商的海洋特性被掩盖了，所以它的海洋根源也被掩盖了。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商人的海洋性给提出来，并且适当解释他们的起源与外部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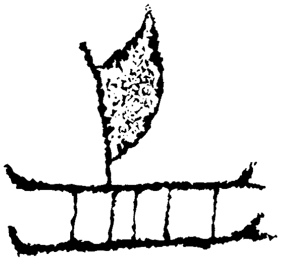
这样一个观点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山东曾经出土有大量的欧罗巴人种化石，并且这一地区的欧罗巴人种现象直到公元5世纪还很明显，唐以后才趋向蒙古人种。在这一地区的汉墓画像中很清晰地看到，2000年前一群骑马的大鼻子人种奋力抵抗着蒙

古人种。奇怪的是那些蒙古人种却划着船！假如不是我亲自看到这些画面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假如不是事先知道这是汉墓作品我可能会认为这是近几百年内欧洲人的侵入。看来在我们失去记忆的远古，确实有大批欧罗巴人来到过山东。从画面上还不好判断两个不同的人种谁是原本的居民谁是入侵者，不过乘船人为渔民这一事实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这个问题只有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鉴别了，不能简单地认为欧罗巴为原住民，蒙古人种的渔民就是后来者（见第70页图）。

中国沿海从南到北在新石器早期就有人居住，而且有独具特色的依然不知道根源的一些文明，但他们首先皆总体属于海洋文明。到商朝这个海洋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并且几乎可以说此时是中国曾经有过的最为开放的时期，因为航海技术的积累到此时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的东周使这个开放的大好局面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质朴的原始时代结束了，甚至连过去那种足以维持中西方交流的政治秩序也破灭了，春秋战国来临了。

我认为西方与东亚之间最频繁有效的交流实际上集中在后商与西周时代大约500年内。这个时期长期沟通两地的人们我猜想是一个声名远扬的海上民族以及一个商业民族。而在这同期，中东也出现了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海上民族，他们屡屡在埃及和地中海东岸出击，对一些强国造成了极大的打击，甚至拖垮了埃及帝国。至今这个海上民族还没有被具体化，没有人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只知道他们善水而勇猛。这批人会不会与亚洲有关，他们之中是否混有太平洋东部以及东南亚的海上民族呢？他们是否加入自山东起源的商朝统治集团了呢？他们是不是闻名天下的腓尼基人？

▲有大约3000年历史的中国新疆小河墓地雕像



海洋与船舶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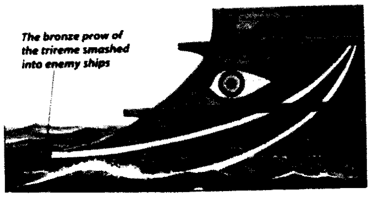
一般传统认为，“从罗马文明开始，商人们就通过熟知的水路运送货物，从一地到另一地，把货物运到市场。①”确实地中海的意大利半岛居民是最富于航海的，但时间恐怕远远早于老生常谈的罗马时代。“对于一个国家的商船而言，航运就是他们的谋生之道。对于一些商人而言，这也是积累财富的资源。野心勃勃的商人总渴望能发现运输货物的新航线，正是源于这种渴望才有了航海探险，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但是最初，海洋勘探也有一些宗教原因。”

下面这个因素也是我想说的：“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寻新大陆，想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大侠走在旁门左道上，探索新的世界与新的道路。不安分是一种自古至今最值得赞扬的品行，我猜想正是一直有大量不安分的英雄觉得在俗常生活中实在无趣才想出了种种办法探险。今天也一样，比如激流冲浪，比如极地探险，实在闷得要死你就去北京王府井街头交120块钱来个蹦极跳。王朔说：“活的就是心跳。”是的，许多人生来就是为“心跳”而存在的，你不能阻挡他们探索新世界的愿望，我们也不能想象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英雄会满足于闹市街头的“蹦极跳”，在那个原始浪漫时代他们肯定更乐于聚合一帮志同道合的勇敢者去世界各地攫取“金羊毛”。当然，中国一旦有了儒教影响，似乎一切就被凝固了起来，

---

① 摘自（美国）马斯·斯瓦尼／帕缇斯·巴尼斯合著的《海洋世界》。本节引文皆来自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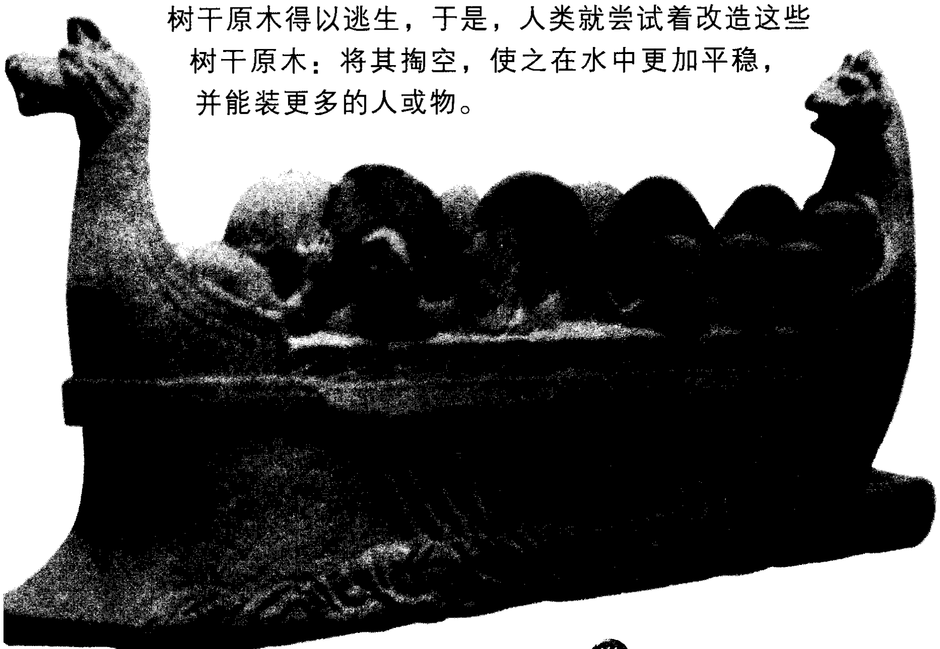
中国没有探险的英雄。但在史前阶段，我认为中国人很可能是与其他地方一样生龙活虎的人。


The bronze prow of the trireme smashed into enemy ships
◀这条地中海古船明显是条战船，其尖头上包装了青铜，为的是靠近敌船时可以刺穿对方，而船上的眼睛是为了震慑敌人。

“在飞机问世之前，当两地被水域分隔而又无法架桥时，航海就是唯一的交通方式了。就算有了飞机以后，多年来船只也仍然是海上运输的主要方式。1881年到1920年间，保守的估计大约有几千万移民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到北美开拓新天地并在那里定居……在早期，大多数人使用木头和芦苇制成的竹筏，或使用特殊木材、树皮、动物皮制成的独木舟做航海工具。航海中，最高级的船只不过是有木桁的木质结构，木桁上覆有一层薄木板……虽然许多早期的单甲板平底船只有一个方形的樯桅，但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帆船就成为一种赖以使用的交通工具了。公元前100年中国人就发展了船舵，但直到公元1200年舵才风行起来。航海过程中，用舵可以驾船在海上航行。”

看来中国人在航海领域并不落后，这个历史基础让人怀疑中国东部人群是否来自一个海上民族。

古人有关船舶起源的这两个猜测都是可以考虑的：“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刘向《世本》）；“古人见窾〔kuǎn款，中空之意〕木浮而知为舟”（刘安《淮南子·说山训》）。也有人猜测，独木舟很可能起源于山洪暴发时，不会游泳的人们抱着树干原木得以逃生，于是，人类就尝试着改造这些树干原木：将其掏空，使之在水中更加平稳，并能装更多的人或物。


◀古罗马大船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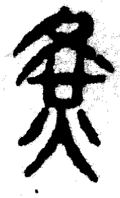
▲希腊阿加门农金面具

早期制作舟船的方法一般推断是使用火烧与石器砍削相结合，还有捆扎芦苇而成船，这个方法古埃及比较常见，而且有大量的壁画为证。葫芦渡海可能比舟的使用更早一些。

航海技术到底成熟于何时，古人的航海能力到底如何，实际上我们并不能严格推定。我认为人类有了语言能力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船舶与航海技术的探索，而不仅仅出现于新石器时代。

中国和地中海国家是古代战船的发源地。公元前 16 世纪～公元前 11 世纪，据说商代就已开始使用舟船为军队运载工具。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率兵伐纣，参战部队中就有 47 艘大船，他们在孟津渡河直捣商朝都城朝歌，灭了商朝。

最早的桨帆战船为单层桨，公元前 1200 多年出现于埃及、腓尼基和希腊人中间。公元前 800 年，单层桨战船开始装上青铜铸造的船艏冲角，用来进行海上战船间的撞击战。公元前 700 年，在腓尼基和希腊等国造出了两层桨战船。公元前 550 年，希腊最先造出三层桨战船。此后，三层桨战船成为地中海沿岸各国海军舰队的主力。



中国战国时期就比较确切地有了“帆船”。但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商朝时期就有帆船，甲骨文的“凡”字就是“帆”。英语里除了“sail”之外“velamen”也有“帆”的意思，其拉丁语源为“velare”，另外英语的“帆船”为“sailing vessel”。或许我们可以把“帆”（fan）与“vel”进行比较，发现这两个读音接近，要知道在中国话里经常“v”“f”不分。

《海洋世界》一书总结说：“用于海洋的航船类型有以下几种：1. 阿拉伯独桅帆船，可以抵御任何强风。2. 中国帆船，东亚东南亚使用。3. 欧洲帆船。4. 混合帆船。”看来中国在其中占有一个很突出的地位，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海洋气息很浓。并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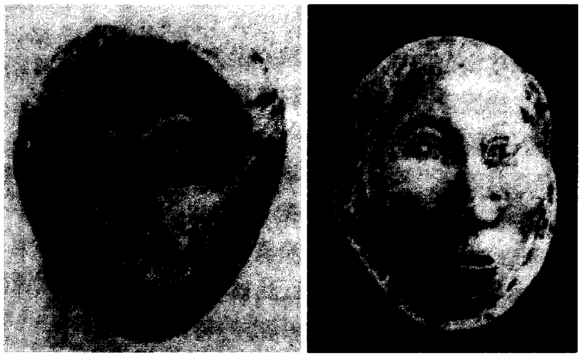
从另外一方面看，让我们抽取出来这几个地域：阿拉伯、中国、东南亚、欧洲，其实这几个地点正是古代一个著名海上民族腓尼基人行走的路线，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凸显了古代海洋民族所经历的场所。并且，在今天已经消失的腓尼基人与阿拉伯人的联系也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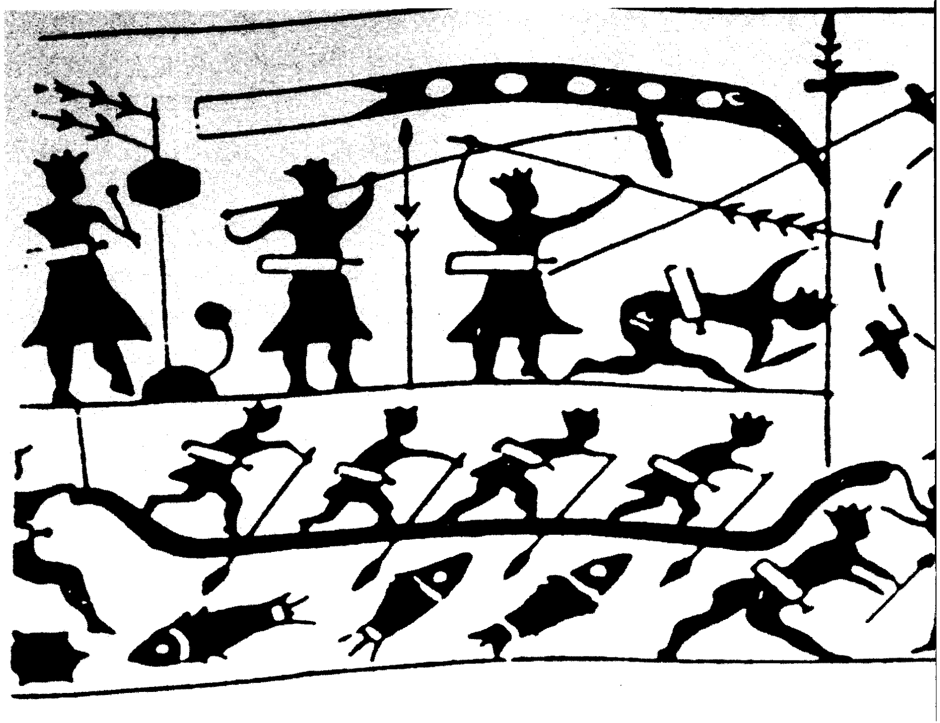
“第一艘有重大意义的船只是由腓尼基人建造的大帆船，它是航行于地中海的标准船只。从公元前3000年到18世纪，人们一直在建造此种大帆船。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希腊人驾驶的船，它长约40米、宽约6米。尽管经常有一个方形的独桅，但桨仍是推动力的主要方式……最早的船是在古埃及建造的，也可能是在地中海的其他地方。这种船是由一捆捆尖头的纸草秆捆绑在一起造成的，长约11米。”

腓尼基人在世界海洋文化中渐渐浮出海面。但腓尼基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海洋世界》使用传统的语言告诉我们：“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城邦国家。大约公元前1200年他们已经成为古时有影响力的头号商人。大约公元前800年，这个海洋民族建立了迦太基（新城的意思），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公元前1200年前后正处于中国后商，腓尼基文化在地中海突然兴盛起来。在中国具有海洋背景的“商人”与腓尼基人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还是继续先把船的发展史讲完。

“幸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船，为公元前26世纪统治埃及的法老胡夫所拥有。这艘4600年前的古船被分为若干部分，埋在基沙的胡夫金字塔附近……现在这艘船陈列在埃及的一所博物馆里。”实际上幸存下来的船很少，因为木头容易腐烂，但是通过许多材料人们推断：“公元前3000年：土著人乘着海上小船到达了澳大利亚。公元前1500年：波利尼西亚人开始勘探太平洋，并在此建立殖民地。”


▲中国殷墟出土的人面陶范以及反出的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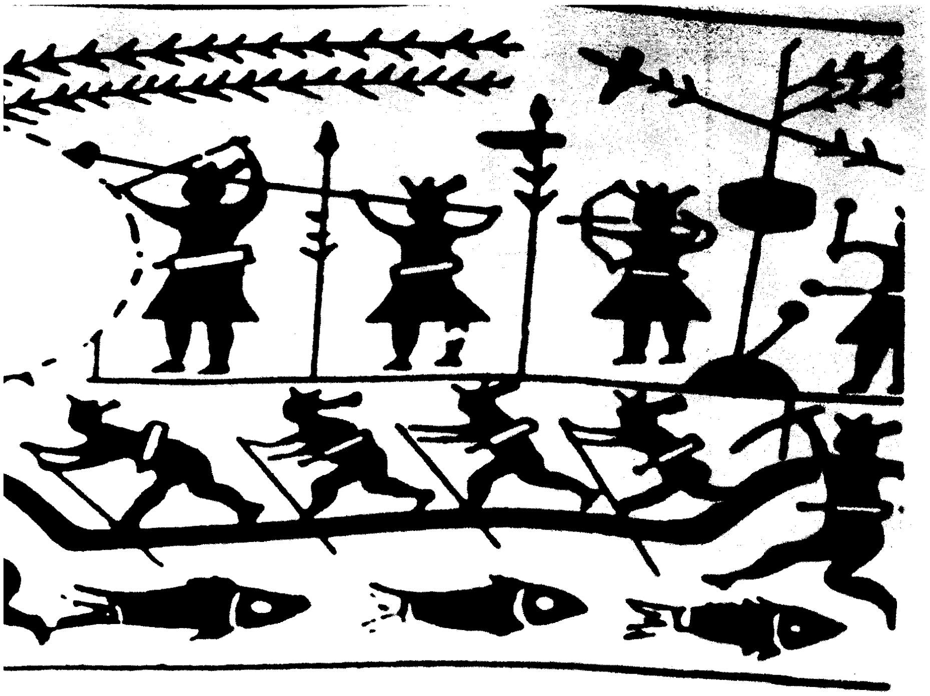


▲河南出土的战国时期船图

“一艘被认为是腓尼基人的古老船只最近在地中海距水面近一千米的海底被发现。这艘沉船被人们称作‘迈尔卡斯’，它是根据腓尼基水手神的名字命名的……1954 年在地中海发现了最古老的沉船之一，它是公元前 12 世纪沉没的。人们从这个小商船上打捞出许多铜块、石制天平以及加工制品。”另外一个被认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沉船，是 1982 年被一个潜水员发现的。该船是在地中海距海面 4 米 3~52 米处被发现的，此处位于土耳其南部乌卢布朗地区附近。

《希腊神话》中的最大船只配备 50 支桨，这就是伊阿宋去取“金羊毛”的大船，当然《希腊神话》里也不缺乏帆船类型。顺便解释一下，有人认为夺取“金羊毛”活动可能就是中亚流行的骑马叼羊比赛，而当地由于盛产黄金，并且他们有一种淘金方式是用带毛的羊皮放在水里沉淀黄金，故而有远征夺取“金羊毛”的原形。

进入近代，蒸汽机在 18 世纪末问世，19 世纪开始用于商业航运。之后航船使用的动力依次为：蒸汽机、气轮机、内燃机、核动力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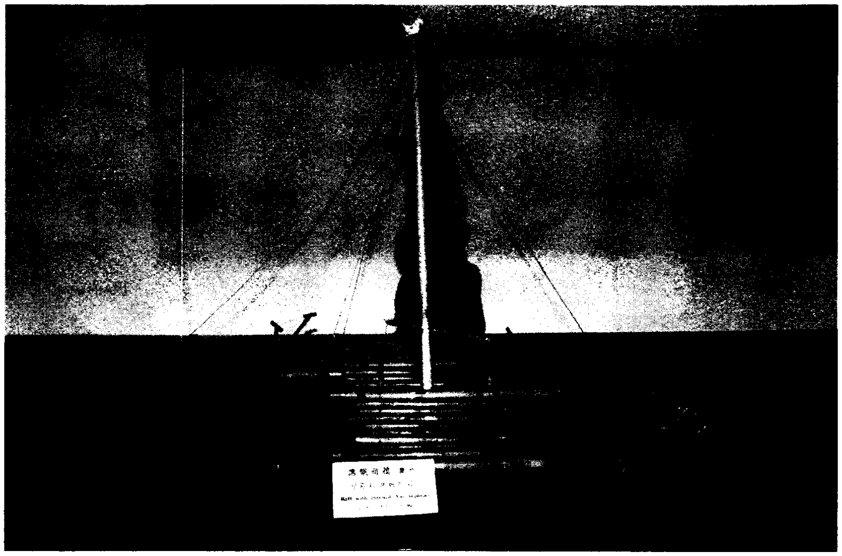


航海并非只需要勇气。“航海需要具备观察能力、科学知识、技术要求，甚至艺术细胞……与现代海员相比，早期海员的航海是很困难的。他们的航海只是从海岸的一点到另一点的简单移动，当时的技术也仅限于依靠风力这种自然‘仪器’来导航。后来海员们尝试在公海航行。”

在辽阔的公海航行中有一些对于我们旱鸭子来说很新奇的文化。例如，波利尼西亚人早期在太平洋航海中会利用这样一些线索判断陆地：鸟儿的出现、云彩的形状、大海的颜色，甚至气味等。

在航海仪器方面，“早期的海员利用天体导航在公海航行。他们把天空想象为环绕地球旋转的中空球体，根据这个球体天空上的太阳、月亮、行星、恒星来确定船的方位。而且在这个球体天空上还有一个类似于地球经度（时间角度）和纬度（磁偏角）的重要系统……许多有伟大航海文化的民族，诸如腓尼基人、诺斯曼人、波利尼西亚①人，都懂得利用天体航海……但这种方法也有缺陷，即要求可视性强。如果天体被云雾遮盖，这种体系对

① 腓尼基人、诺斯曼人、波利尼西亚人[illegible]的海洋民族，所以一旦提到中国的海洋文化就一[illegible]这三个民族之外，[illegible]会与[illegible]的关系。



▲泉州海洋交通博物馆展品，推测中的夏朝席帆舟筏。叶扬 / 摄影

于海员在白天航海就不起作用了……古希腊人发明的星盘是最早用于航海的仪器之一，它一直用到了大约 18 世纪。星盘是一个金属圆盘，用铜制成，上面有一个小环起悬挂作用。圆盘上安一活动指针，称作照准规。轴心在圆盘中央，能够绕圆盘旋转。圆周刻有刻度。观测时，照准规在圆盘上所指的角度也就是星体（或太阳）的角度。12 世纪欧洲发明的指南针可以为海员提供确切的方位信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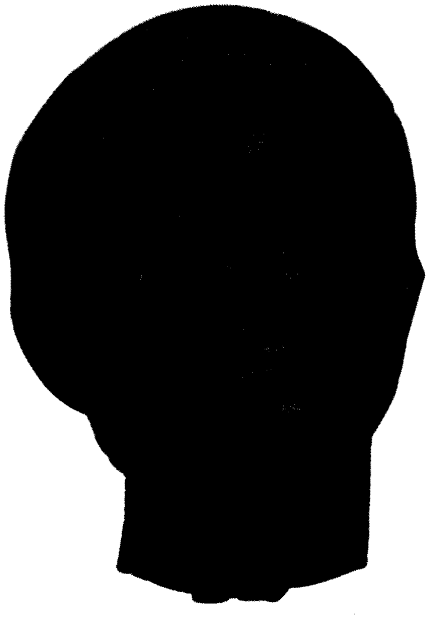
“大多数精密仪器都是在 7 到 15 世纪被发明出来的，如四分仪、八分仪等。”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人确实在航海方面加速发展了，很快他们以航海征服了全世界。从宏观的角度看很有趣。似乎在新石器晚期，农业文明逐渐击败了海洋文明；但是到了一千多年前，海洋文明在一个更高的文明平台上重新攻占了全世界。100 年前，万里之外的欧洲战船带来与中国总人口不成比率之少的一些海军，竟然把大清朝的皇帝赶得鸡飞狗跳，使他们逃到了 3000 年前周人所在地陕西。这个历史事实提醒我们，只要有发达的文明做后盾，完全可以做到以少胜多。所以，有人反对“三代”外来文明有关人数上的担心是不必要的，文明程度是最关键的。

① 托马斯·斯瓦尼 / 帕里斯·巴尼斯著《海洋世界》第 289～292 页。

第二部分

寻找腓尼基人的足迹



腓尼基与商人

我认为商业活动是新石器时期文明传播交流的主要动力。换句话说，那些带动各地文明交流的人群应该是商人，中国“三代”的建立者也可能是西来的商人。

已故台湾女作家苏雪林女士也是“西来说”的支持者和研究者，她主要研究“昆仑”现象与“屈赋”。她在《屈赋研究》一文之第七节《我国古代人民通商沟通文化之伟绩》说：

> 远在洪荒时代，亚洲的黄种人便曾举行大规模的移民，向蛮荒僻远之地，寻求新世界，建设他们的新家园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曾发现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陶器的形式花纹，与意大利西西里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亚、波兰的格雷西亚、俄国西南几富城附近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等地所发现极为类似，断定同出一源。又我国河北北边石像与里海西岸旱地所掘出者亦同一风格，这均在新石器末期。可见极早的时代，我国与欧洲西亚均有交通。立国西域的大夏，据已故历史家吴其昌氏考证说便是我国历史上的夏朝，商民族崛兴，夏战败，只有率族西迁，另建王国。盖《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均言“天子闻大夏、大宛、安息之属，土著颇与中国同俗”。……故吴先生谓大夏之先当是中国人。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自称“般人”。今日人种学者谓其人面貌与中国酷肖，有许多言语与中国同源，疑是一部分殷商民族于白令海峡尚未断时迁徙而往的。不过这一部分商民族或

系文化本低的边疆人，到了美洲极北又因天候过于酷烈，原来带去的那点文化，亦渐灭无余，变成完全的野蛮人了。一般人均认哥伦布为发现美洲第一人。但今日竟发现哥氏之前中国人到达美洲的痕迹。近亦有人在美洲掘出地下木质神像有类我国南极寿星，计其年代是在千数百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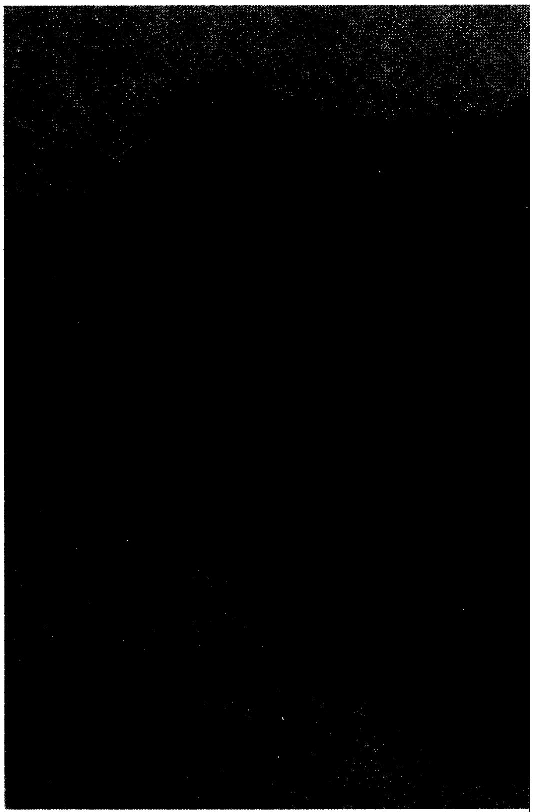
说到商业活动的作用，苏雪林说：

这（商业）无非出于民间私人的行动，规模既小，经历时间也甚绵长，但以沟通中外文化的效果而论，反比政治力量为巨伟。因为移民仅能将我们文化带往别处，而通商则能将别处的带回本国。我们都知道商人贩贱卖贵，追求赢利，万水千山，无远不届;走私的时候，漏税偷关，又是无孔不钻，他们的足迹绝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阻止得住的。他们是货物的贩运者，同时也就成了文化的交互运输者，好像蜜蜂采取花中甜汁作为自己食粮，足上所沾花粉，传播于别的花上，却于无意之间替植物尽了雌雄花蕊交配的义务。古代立国地中海边的腓基尼民族专以航海经商为事，商船往来各国，成为古代民族相互间的介绍人。他自己虽未曾创造何等文化，然能取此族文化传之他族，成为文化的媒介者，地中海一带国家文明进步，实受腓人之惠；即欧洲古代蛮族之开化，腓人亦与有功。至其采取埃及象形与草书文字创造字母，一变为希腊文，再变为罗马拉丁文，成为今日秦西文字之祖，对文化贡献尤大。

我国商人所造成最大的功绩则为贩运蚕丝。丝为我国特产，极早时代便知育蚕抽丝，作为衣服，并且输出外国，今日欧洲考古学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贝尔格曼、科兹洛夫在克里米半岛的古希腊殖民地遗迹中及楼兰、波斯、北蒙古、额济纳河等地均发现丝的残迹，断定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国之缯或已越帕尔米高原而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大王东征以后，又经叙利亚人手输入欧洲、罗马人秉性浮华，尤爱中国之丝。中国之丝遂亦源源运往，大量倾销，其后竟引起罗马之通货膨胀，酿成大乱。西洋史家谓此赫赫有名一代大帝国之覆亡，由中国丝所引起之经济破产，实为其原因之一（皆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以商业而灭亡西方一大帝国，我国商人所造成的不但是伟绩，而且是奇迹了！

我国与西亚距离如此辽远，而文化上竟能如此相通。想必都由于移民及商业上往来之力，否则这个哑谜怎样解释呢？”

看来苏雪林女士已经意识到商业的巨大作用，并且注意到腓尼基人传播文化的作用。但我的看法可能要更进一步，我认为腓尼基人直接参与了商朝的建设。苏女士认为中国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我不同意这个意见，或者说，我认为中国文明不仅仅来自两河流域。至于人种，她由于生活在生物学尚未发达之前，所以她认同中国人类独立起源，以为中国人只是接受了西方的文明，而无人种上的关系。现在借助于生物科学，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个陈旧的看法。尽管我与苏雪林女士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无论她的研究还是她的精神都鼓励了我继续她的未竟事业。



▲中国江苏常州出土的西周时期的殷红色的丝绸，常州在长江

我认为腓尼基商人参与了中国商周的政治文明建设，是这批人在船舶发展到可以直接远航时期加入到中东与东亚之间的交流大军中去，而且这一时期在陆路保持的同时海上道路明显得到加强，最终从山东沿海催生了中国的一个王朝：商朝，并且他们的一个分支与后来的周人也保持着神秘的联系，或者也加入到周朝的建设。

对这一推理的支持条件有许多，已知的一条就是，中国的甲骨文突然在3300年前出现，而且这个文字与红海出海口的南部阿拉伯文字最接近。不仅“南阿”文字是腓尼基文字的一支，而且，阿拉伯海附近的亚丁湾就是腓尼基人频繁活动的场所，甚至今天许多索马里人就自称是古代腓尼基人的后裔！基因方面的研究又证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人与腓尼基人曾经占领过的地中海上三岛（科西嘉、马耳他和撒丁岛）有联系。一条神秘的连线由腓尼基人牵出水面，这条线从中国山东沿海通过红海（以及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这是一条古老的水路。

世界上声称腓尼基人后裔的有许多地区许多国家的人，以地中海沿岸最为集中。那么，东亚沿海国家的人们是否也与腓尼基人有关呢？尤其是，腓尼基人是否参与了商朝的建立呢？这确实是一个大胆新奇的猜想，到底是不是无稽之谈，让我们一起寻找腓尼基人的足迹。

腓尼基人在以往是仅在中东或欧洲历史中提及的一种文化现象，严格讲腓尼基人并非为一个民族。在我的体系里腓尼基人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成为这本书的主角。在封闭的传统体系里撇除腓尼基人在中国的影响是可以的，一旦承认“西来说”，一旦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于“三代”的影响，忽略活跃在全世界的腓尼基人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这个海上民族在古代几乎遍访非洲、中东以及欧洲，他们有什么理由偏偏忽略了东亚呢？这没有道理！难道东亚的资源不够丰富难以吸引这群三千多年前的著名商人？尤其是中国这里已经“先进”得让中国的学者宣称“文明独立起源”了，所以中国应该有足够的消费群体以及资源吸引来这个特殊的商业团体：腓尼基人！

中国的学生经常有一个错觉，中国人已经文明地穿金戴银之时西方人包括英国人依然在树上还没进化完。实际情况是，起码在“三代”前期，东亚未必比不列颠岛屿上的人们先进多少，遗憾的是不列颠群岛确实没有足够的地理纵深作为后援，所以这个孤岛上的人们安静地龟缩在西方一域；到蒸汽机发明之后，动力船只扩大了他们的有效控制范围，他们很快就建构了一个“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历史就航海向我们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只要有一流的航海技术，只要你的文明足够先进，抓住机会，一个小国一个小群体照样可以控制全世界。

在三千多年前，抓住这个机会的不是别人，是腓尼基人，他

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他们在全球建立了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这个民族并不重视国家建设，他们是纯粹的商人，他们的大本营黎巴嫩是个小地方，不过那里富裕的程度据说“街上堆银如土，堆金如沙”。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关于腓尼基人的一切尚在研究之中。但有些方面是很肯定的：这是一个以航海为主业的民族，他们航海的目的仅只是为了商业贸易。中国“坐贾行商”的成语说明了“商”的流动性。中国的“商朝”或许并没有其他更深奥的道理，就是“行商”的意思！他们的“行”多半就是“航海”，这些商人远航于各个不同的大陆与国家之间，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甚至更远①。

我推断腓尼基人最擅长的海路很可能有这些：从中国经东南亚到印度洋，再经红海，在埃及的底比斯一带短暂上岸，然后进入地中海地区；回归黎巴嫩大本营休整，向西他们在地中海的北岸与南岸地区建立殖民地（比如迦太基就是典型的腓尼基殖民地），他们甚至穿过西班牙南面的海峡进入大西洋，转而向北进入今天的西欧与北欧，大不列颠群岛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腓尼基人在北欧的足迹已经不是猜想，已经被考古部分证实。

以上是腓尼基人的主线路，当然他们也有其他的路线，他们也经常到波斯湾去，这业已是定论。甚至有人认为腓尼基人的发源地就在波斯湾，从后面的某些历史考证看倒也不无道理。以波斯湾为核心，可以经两河流域到叙利亚，陆路即可回到黎巴嫩。

在欧洲人到达美洲新大陆之前，与腓尼基人有关的人群可能一直是美洲得以与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团体。那些奔波于秘鲁与太平洋岛屿之间的人们或许正是他们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善水。

腓尼基人部分应该是白人，当然也有其他的人种，腓尼基人不是一个民族，它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善于航海的商业混合体。所以探讨其发源地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引起人注意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现象，从他们的活动范围如此分散来判断，他们的人种应该很复杂，不是单一的。

一般我们在教科书中或许会得到这样的描述：生活在巴勒斯

---

① [illegible]多年研究后认为，[illegible]这一结论不仅扩展了中国[illegible]之间的联系，[illegible]了山东半岛与[illegible]之间的联系[illegible]

▲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加缪。假如加缪从小生活在中国根本没有人会注意他是外来民族，他的长相与东方人很接近，他与中国人不同的不是五官，而是西方人的文化气质。加缪的家乡在法属阿尔及利亚，而那里在3000年前正是腓尼基人的天下，所以加缪本人就有可能是个具有腓尼基人血统的法国人。

坦、叙利亚、黎巴嫩沿海地区的最早部族，在公元前2000年前被统称为迦南人。至公元前1200年后，因希腊人常与他们通商，又称他们为腓尼基人。腓尼基人不仅善于经商，还会多种手艺。他们的特点是向埃及与苏美尔学习优秀文化，通过经商与他们发生广泛的交往。腓尼基人的航海业成熟得很早。埃及人把腓尼基人看成是一种聪明的象征，正如中国人所称“无商不奸”，腓尼基人由于善于经商而被当作“狡猾的人”看待。

腓尼基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城邦制国家。他们有史可考的殖民地远达西班牙。无论他们拥有多少的殖民地，他们实际上依然还是商人本性，并无大国政治谋略，据说他们中间很少有军阀统治者出现。

腓尼基每个城市本来都有一个国王统治，他负责与几个强大的商户家族协调谈判国家大事。后来，这些商人势力增大之后，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些团体。在公元前第一千纪里，商人团体推翻了国王，他们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宗教与贵族政治体系。这个描述让人不禁想起中国的夏商周，尤其是夏商之变、“轮流坐庄”。

在富有的大商人统治的腓尼基城邦里，贵族有超越法律的权利。在他们之下生活的是：小生意人、手工艺者、经纪人、店铺老板以及生产商，再下层就是普通的工人，最下层是奴隶。

有记载的腓尼基人殖民地分布于下列国家和城市：

叙利亚 : Arados
塞浦路斯 : Kition
利比亚 : Leptis, Oia, Sabrata
突尼斯 : Carthage, Utica, Hippo Diarrhytos, Neapolis, Hadrumetum, Thapsos, Acholla
意大利 : Solus, Panormus, Motye (Sicily), Nora, Karalis, Sulci, Tharros (Sardegna), Kossyra (Pantelleria)
马耳他 : Melita, Gaulos
阿尔及利亚 : Hippo, Icosium
摩洛哥 : Tingis, Zili, Lixos
西班牙 : Ebusos (Ibiza), Abdera, Sexi, Malaka, Karteia, Gadeira and Tartessos

我们可以相信，腓尼基人在全球成立了类似跨国集团的巨型商业团体。通过考古人们得知，通常他们从西班牙购进白银，从大西洋的不列颠岛购来锡，从非洲收购象牙，从塞浦路斯收购黄铜，从叙利亚收购铁，从地中海收购纺织品，在埃及与亚述帝国之间进行交易获得巨额暴利。东方被遗漏了，这没有道理。

在以上这张商业网络里缺少了一样宝贵的物品：丝绸。既然他们可以远达不列颠岛与非洲，腓尼基人没有理由不来东亚贩卖丝绸。甚至我想推测，恰好是丝绸这一特殊商品引来了大批商人，引来了中国的“三代”。

▲今日黎巴嫩美女

迦南与中国

有人认为腓尼基人属于闪米特人。严格些说，腓尼基人中大部分是闪米特人，同时也有其他民族。闪米特人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从沙漠地区迁到叙利亚地区。这个部族中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腓尼基人等。闪米特人是一个泛称，很明显他们应该带有两河流域的文明特征。

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沿地中海东岸建立起若干奴隶制城邦，集中在这些地区的民族被统称为迦南人，具体地点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沿海地区，实际上他们深入到红海以及阿拉伯半岛。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常来地中海东岸经商，他们见到迦南人时习惯称他们为“腓尼基人”，原因是他们这里出产一种从贝壳提取的紫红色染料，“腓尼基”就是“紫红色”的意思。

有个事实需要注意，假如说早期的“闪米特人”还包含了“希伯来人”的话，那么在后来分离出来的“迦南人”就把“希伯来人”给剥离出去了。也就是说，“迦南人”是“腓尼基人”，后来“腓尼基人”与同期的“以色列人”已经分离开来。

在中国，尽管大家能够看到“三代”之间的许多共同性，但是也看到了三代之间的差别。比如商朝人自称为“商”，而周人却喜欢称呼他们为“殷人”。这就表示，起码周人不认为自己属于“殷人”团体。假如“周人”是犹太人的话，他们

对于“殷人”的距离感符合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相互关系。结合中国古文中“衣”就是“殷（深红）”，这是不是提示我们“紫色”颜料与用来做衣服的丝绸的典故，“衣”、“殷”通假，否则“衣”为什么一定要是“殷（深红）”呢?

中国是生产丝绸的国家，而当时生产名贵紫色染料的是腓尼基人。他们之间的联系顺理成章。腓尼基人又是世界著名的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排除腓尼基人与中国商人的联系！深红为紫。“衣”、“殷（深红）”同义，这向我们暴露了腓尼基人与中国商人的同源秘密！

腓尼基人曾经占领过地中海东岸这些城市：Simyra、Zarephath、Jubeil、Arwad、Byblos、Acco、Sidon、Tripolis、Tyre以及Berytus。Tyre（推罗）和Sidon（西顿）是其中最强大而具有统治权的城市。这些城市并非属于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城邦联合体。中国同时的夏商周或许部分借鉴了同样的格局。

以上的资料其实有矛盾含混的地方。首先腓尼基人多被看成是“闪族人”，闪族人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但《圣经》告诉我们“迦南人”应该是“含族人”，是一种深肤色人种。当腓尼基人又被看作是“迦南人”时，我们确实很难说清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种，或许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混合才是他们的特色。

或许我们可以试着解释这些矛盾。比如，在最初的早期他们是从两河来到地中海东岸的，甚至我们可以再夸张一些认为他们有可能是从伊朗，甚至中国西北地区越过大河而来，经过千年发展，最终与靠近非洲的含族混合就产生了“迦南人”。

假如按照严谨的治学态度最好的办法或许是把这些矛盾的资料给删除掉，但我认为回避这些矛盾是不正确的。通过这些矛盾的资料更全面地展示给读者一些有关概念才最好，或许以后某些读者自己会去继续分析与搜集资料找到确切的腓尼基人的发展轨迹。让我们以开放的眼光与开放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在确实不能给出确切答案的时候就保留那些矛盾的说法是最可取的。对史前资料收集不能采取过分苛刻的态度。

沿着以上的矛盾资料，我还有了一个新设想：腓尼基文化复合体很可能在亚洲呈含族人特色，而在地中海（尤其是北岸）他们却多呈现闪族人特点，所以才有了以上的矛盾传说。这一点非

▲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陶器

常有可能。

无论外人怎么称呼，腓尼基人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呢？据说他们称呼自己为“迦南人”。而“迦南人”的意思就是“商人”，这符合中国商朝人自称“商人”的习惯。

就地理上看，腓尼基人生活在联系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的中间地带，承担的恰好是运转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传送带。他们很可能在当地最先充当近距离的商人，后来因为尝到甜头开始进行远途贸易。他们就这样逐渐扩大脚程，最终成为职业商人，整个民族和团体全部成为商人，随后构织了一张全球商业大网。

我一直观察到这个事实，中国甲骨文产生之前的类文字符号与地中海东部一带的所有古老文字都很接近，迦南文、腓尼基文，甚至乌加利文。现在看来它们接近才是正确而符合逻辑的，而最接近的就是腓尼基文字。

考古得出的结论告诉我们，文字的起源是由于商业的出现，商人需要记录数目与合同。一些文字符号在中国的出现其实可以说就是商业的痕迹，而且恰好是与地中海东岸这批职业商人交易的痕迹！

在船舶尚不发达时期，他们更多通过陆路到达中国的西北。在半坡遗址出现过零星的符号，在二里头夏文化也出现了明显为同类型的符号。这些都说明了远古中国与地中海东岸的联系。但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并不多见于仰韶文化最典型的甘肃、青海，而是出现于陕西，然后是河南二里头。除了海路的可能外，很可能有人从印度、缅甸、云南、四川而进入陕西。也说明，这个时期海路还不够发达，因为从海上而来的商人还没有从山东深入内陆。甲骨文的出现是海路完全成熟的一个标志，它给我们指出了大约的时间。而大汶口文化发现的符号显示了埃及人曾经试图在海上登陆的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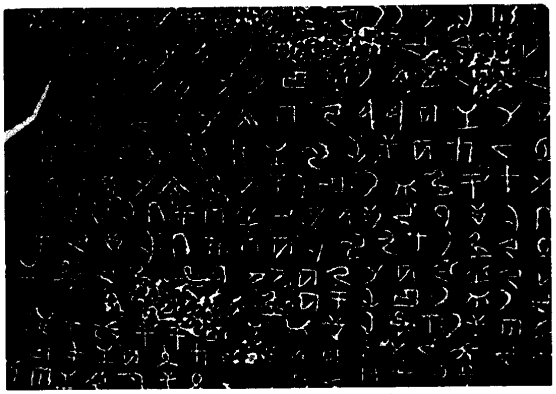
“中国”的英文名字叫“China”，有人说这来自陶器，利玛窦神父认为China是葡萄牙商人在16世纪对中国人的称呼。

然而我相信它另有更古的来源。当时东亚地区可能有许多名称搅缠在一起，但是哪个势力在后世强大，他们的称呼就会被保留下来，很明显后来占据优势的是称呼“China”的这个群体。后来的“秦”（Qin），甚至“sina”，意大利语为Cina，我认为都与“China”是同一个概念，他们的起源不是别的，而是“迦南人”（Canaan或Cana，希伯来语为kena’ani，阿卡德语作Kinahna）。假如你懂发音，一下就明白了，“China”其实就是“迦南”，他们的差别很小，考虑到几千年并且是在远距离的流变，这个推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迦南人有自称“迦南人”的习惯，假如有许多迦南人定居于中国经商，东亚这里确实是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迦南”的。

Sinai（西奈）由于是迦南人的居住地，所以Sinai也成为迦南的代称。“原始迦南文”的表述是“Proto-Sinaitic”又作“Proto-Cnaanite”，所以不难看出中国之“Sina”与“迦南”的双层对应联系。

大约四五千前越来越多的迦南商人到中国来，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在这里，并且想家的人把中国命名为他们的故土“迦南”。这是另外一个可能。很可能在这个时期有两个地方都叫

▲历史上基督教传入中国线路图，可以参考为古代商路之一。请特别注意这条道路不仅经过黎巴嫩附近，而且终点在意大利北部。



▲黎巴嫩古代的 Byblos 文字

“迦南”，这就是地中海东岸与东亚各有一个。这个称呼一直使用到今天，只是中国人并没有留意到 China 正是 Cana 或 Sina。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正是腓尼基符号比较集中的陕西，也就是说，正是后来迦南商人比较集中的陕西被称呼为“Qin”，后来整个中国也被简称为“Qin”，“Qin”就是“Sina”，学英语的人会知道许多人有一些“不良”的发音习惯，会在最后收尾的“n”后面加一个元音“e”，我大学时的一个老师因为这个习惯过分明显甚至被同学们命名了一个绰号就叫“ne”。所以，在古代“Qin”很可能与“Sina”分别不大。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腓尼基”也自称“迦南人”，但是 4000 年前腓尼基人的概念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不能说有类似迦南文字出现的地区或时代就有了腓尼基人。但是，从这条线索我们完全可以说，晚期仰韶文化与夏文化里很可能都有迦南文化的痕迹，他们与创造出甲骨文的商朝有文化联系是合乎逻辑的——假如腓尼基人确实参与了商朝建设的话。

“迦南”是音译，意译有几个意思，其中之一是“商人”。中国恰好就有一个朝代被命名为“商朝”。并且商朝人自称为“商人”。这符合他们在中东的习惯，腓尼基人自称“迦南人”，也是“商人”。但他们又被外人称呼为“紫人”，他们在中国也被外人称呼为“殷人”，“紫色”其实就是“殷”。加上“China”发音接近“Cana”，“Sinai”接近“Sina”。中国在大约 4000 年前出现许多类似腓尼基字母的文字符号，“后商”期间中国的甲骨文接近于一种红海文字——也是腓尼基文字的一个很近分支。假如我说这么多现象都只是巧合，那将是一个罪过。

“Canaan”还有一个响亮而神秘的意思，经常用来比作“乐土”、“天堂”以及“让人向往的地方”。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是中国古人对于故土“迦南”的呼唤？还是对也门附近“萨巴”的呼唤？或许两个地方都是“乐土”，因而印证了他们的某种文化同源关系。由于腓尼基商人从地中海到红海的穿梭，他们在世界上可能繁殖了不止一个“乐土”，甚至中国不也叫“迦南”（China）了吗？但是相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部分人可能还是知道在遥远的西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神圣的“乐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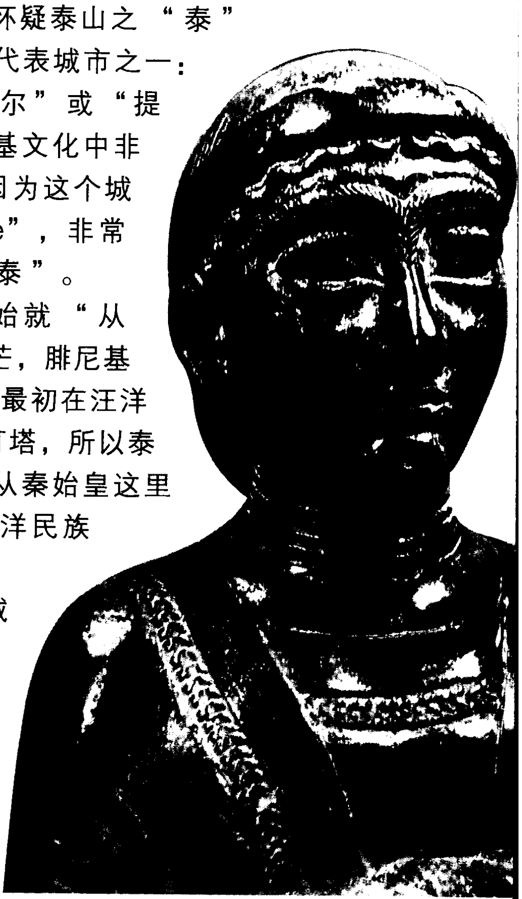
假如秦朝是商朝的继承者，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的问题就又一次浮出水面，周人与他们不同族。

秦始皇开创了到“泰山”封禅的风气。在我看来，“泰山”就是商文化的经典之经典。我怀疑泰山之“泰”实际上就来自于腓尼基的两大代表城市之一：“Tyre”（译为“推罗”、“苏尔”或“提尔”）。Tyre 这个城市在腓尼基文化中非常重要，“腓尼基紫”曾经因为这个城市而被命名为“Tyrian Purple”，非常明显的是，tyre 可以翻译为“泰”。

“泰”从甲骨文造字开始就“从水”，也给这个解释以一线光芒，腓尼基人就是“水上民族”。泰山是最初在汪洋大海中航海到中国北方的一个灯塔，所以泰山曾经具有的神圣意义并不是从秦始皇这里奠定的，而是从远古的某个海洋民族奠定的。

腓尼基人还有把自己的城市建立在悬崖峭壁的习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后来的中国人有崇拜山的习惯，并且有把庙宇建立在峭壁的习惯，是不是也是这方面的继承呢？

地理上的迦南核心在今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

天的巴勒斯坦，其边界其实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今天人们说到“迦南”通常可以指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叙利亚，但偶尔也会单指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区。

有一种观点认为，迦南人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当地人与外来移民，当地人叫外来人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今天的“中东人”实际上就是以迦南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族群。一般情况下迦南人指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他们之前被称呼为 Amorite 人，有人说他们从东北方而来 。在大约3000年前左右，迦南人与腓尼基人是一回事，并且这一时期犹太人占据了整个迦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腓尼基人最早生活在萨巴王国，就在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红海。在一些古书里称腓尼基人来自“厄立特里亚海”，这是“红海”的古名，不过也有人认为“厄立特里亚海”在古代泛指红海、印度洋与波斯湾。今日“厄立特里亚”是一个小国家，在1993年才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它直接面对红海，与今天的也门相对，曾经是萨巴王国的一部分。

▲巴力神（Baal）是雷神，大约公元前1400年前后Baal取代了El神。我认为这个Baal实际上就是中国“暴”（bao）的来源，从意义和发音上看都符合，“雷暴”的合用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腓尼基人崇拜巴力神，比如汉尼拔（Hannibal）的名字中“Hanni-bal”的后缀就是巴力神（Baal）。雷神在中国传统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赌咒发誓常说“天打五雷轰”就是把雷神放在无上的裁判地位的证据。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腓尼基人是不能从迦南人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就是从沿海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群具有超强航海能力的族群。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坚定地认为，腓尼基人的形成一定与一些外部因素有关，尤其与以色列人有关，核心与但人有关，并且牵涉到生活在“朋特国”（索马里）的但人部落。他认为腓尼基人的老窝就在朋特国。也难怪今天的索马里人会认为他们才是腓尼基人的后裔了。这个观点恰好与我有关萨巴帝国的推论能够联系上。

无论怎么说，无风不起浪，本着严谨的态度，对类似的线索

宁信其有，不能信其无。但中国人却相反，把一切可疑的全部丢弃，这使得中国的学术远离了生机勃勃。许多中国人继承了这种保守拘谨的思想，极大伤害了中国的科学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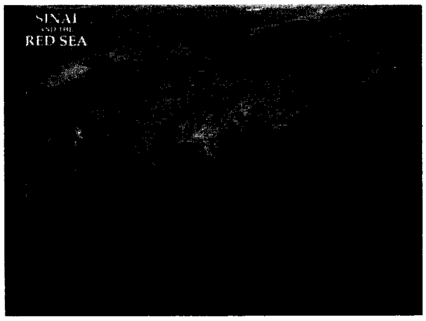
有关这个线索，一个有趣的词汇链接可以参考：Land of Punt,Puntite,Punt,Pont,Phunt,Poenit,Po。

许多人也认为腓尼基人发展的顶峰是公元前 1200 年 ~ 公元前 800 年，具体原因不清楚。但这段时间却是中国西周的历史。我在《锁定红海》中认为中国的西周与亚丁湾这里的萨巴王国有关、与但人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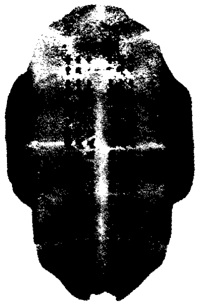
有人会问我，一会儿你认为商朝与腓尼基人有关，又过一会你认为他们与西周有关，并且西周可是推翻了商朝的啊，怎么解释?

这个疑问很好，我们是否可以如此设想：在地中海沿岸发展时期的腓尼基人是早期，其代表文字为腓尼基字母，时间从大约 3800 年前开始；在红海时期发展的是晚期腓尼基人，他们从大约 3300 年前开始，其代表文字为“原始阿拉伯文字”和“南阿”。这两个群体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前者更多倾向于商朝，后者更多倾向于周朝——更细的划分是从后商开始，并且很可能在萨巴王国这里腓尼基人与但人结合。

腓尼基人的权力结构建立在这三个基础之上：国王、寺庙神职人员、元老会。以 Byblos 为核心腓尼基人开辟了地中海与红海的海上道路。Byblos 受到连续不断的攻击，在大约公元前 1000 年 Tyre 和 Sidon 建立。从此腓尼基人开始以城邦制王国而闻名，同时他们常常被称呼为 Sidonia 或 Tyria，后来腓尼基人在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战果后，与迦南人一样被称为 Zidonians 或 Tyrians。我怀疑这两个城市建立的时间要提前一些才能符合这种的推测。



◀ 西奈连接着地中海与红海。很可能在大约 4400 年前那里还留有水上通道，它促使了红海两岸的文明发展，同时影响了中国的夏商。



腓尼基字母与天干地支

语言文字的产生是由于商业的需要，这个结论最容易从两河流域得出。那里考古发掘出的具有5000年左右历史的最早的人类文字几乎全与商业有关。

全世界各地在更早的时候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符号，但严格来说我们一般不把它们当作“文字”看待，但可以当作文字的雏形来研究其起源。具有连续的完整意义的文字最早还是出现在两河流域。

中国在贾湖遗址就有许多符号出现，但相对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朝，并且是后商。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文字专家们认为甲骨文很明显是新造的文字，处在一个开创的初期。这些文字的产生与商人内部的变革有关。由于“商人”最常使用文字，所以他们不仅创造了中国的甲骨文，很可能同时创造了商朝。但是甲骨文中的商业信息却不多，这是个事实。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明发展不是一种中东那样的“自然”模式，中国最早用文字来标示商务的时代是在前商甚至夏朝或先夏，到后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所以记录的多是宗教、政治、生产活动，因为发现的甲骨文实际上是王室的“文件”，当然内容是王室的活动。

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中（第280页）曾经简要论述过中国文字与红海两岸的文字关系，从古埃及文字，到原始迦南体系、腓尼基文字、南阿，结论是中国文字距离也门附近使用的“南

▲大约公元前6世纪的腓尼基人雕像

阿”最近。甲骨文既受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影响，也受到了从迦南文字到“南阿”这条发展线的影响，结合本书前半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该推论的合理性，并且其中穿针引线的传播者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个群体：迦南人，或称腓尼基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同一个群体。

从迦南到腓尼基，再从腓尼基到“南阿”，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发展线①：有一批迦南人从地中海东岸沿红海向亚丁湾和印度洋北部游移。他们受到埃及文明的影响是当然的，他们从阿拉伯海进入中国也是合乎逻辑的。并且进入中国的渠道并不一定是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海路，而且可以是经过中南半岛，也可以从印度河北上顺昆仑山脉进入中原——妇好墓中的昆仑玉已经可以证实这条道路的基本存在，当然还有一条海路一直进发到中国的黄海再进入大陆。

① 参考《历史在震颤》第288页“文字发展树”。

许多古老的文字随着历史的风云都消亡了，只有迦南的一支腓尼基文字留存下来，它几乎成为现今所有文字之父。人们公认它发展出了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今天西方人使用的所有语言都是它的后代。腓尼基文字很可能还是中国文字之父，当然，之间通过了“南阿”文字过渡。之所以有这个令人惊异的结局都与这个特殊的水上民族的“商业”性质分不开，因为这促使他们到处游走传播文明。

大约3800年~3500年前腓尼基人从迦南文字发展出一个以22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这是最普通的说法。这个字母表是所有西方字母的基础。罗马和希腊字母都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腓尼基文字的书写方式与希伯来文一样从右到左，腓尼基文字的发音与希伯来语和摩押语①接近。

腓尼基语是一种北闪族语言。腓尼基字母像希伯来字母和阿拉伯字母一样，都是辅音字母 (abjad)，没有代表元音的字母或符号。它们的读音要从字面中推断。从这些特点进一步暗示了腓尼基人的可能族源。

有人说，因为腓尼基人无处不在的经商与远航，腓尼基语几乎成为一种古代的世界外交语言。这话可以得到充分验证。在埃及、赫梯、巴比伦以及希腊都能见到双语的铭文，除了那些当地的语言，就是腓尼基语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看中国地区的腓尼基文字我们就不再觉得那么难以置信了。

是腓尼基人发明了线形字母，正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古希腊人创造了希腊字母，然后才有了罗马字母以及拉丁字母，直到今天的欧洲诸多文字，包括英语。说到底我认为英语与中国文字通过腓尼基文字具有了同源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直接因陋就简地使用英语的合理性。

腓尼基人的文字是如此发达，很可能恰是这个智慧的民族在中国商朝的出现促进或直接参与了甲骨文的发展。但为什么中国的文字与西方的文字不同？因为中国本土已经在后商之前偶然地发展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一套语言体系，所以它们不必一致，也不可能一致。另外，中东南方文明——埃及文明——在“三代”后期影响巨大也可能是象形文字的甲骨文得以发明的原因之一。

说到腓尼基文字的22个字母，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信息不

---

① Moabite，也译为莫阿布，位于古代死海东部。

可不提。西方汉学家蒲立本 (E.G.Pulleyblank) 有这样一段话：

> 与近东和印度相比较，中国的文字是较为晚出的，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忽视由某种外来刺激促成汉字产生的可能性。当然，就我们目前所知，很难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刺激……在 1978 年的伯克莱会议上，我仍然坚持一个观点，即认为二十二个干支的名称是语音符号，代表原始汉语的辅音，它们与早期闪美特语字母表中的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我曾进一步指出，可能两者都是从某种未知的印欧语的文字系统分化而来的，这种文字随着印欧人在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的扩张，向东方和西方传播……最相像的几个符号，是与晚闪美特字母比较所得的结果。

这段话可能并非完全正确，但在今天这个背景下确实值得再次关注其中的合理成分。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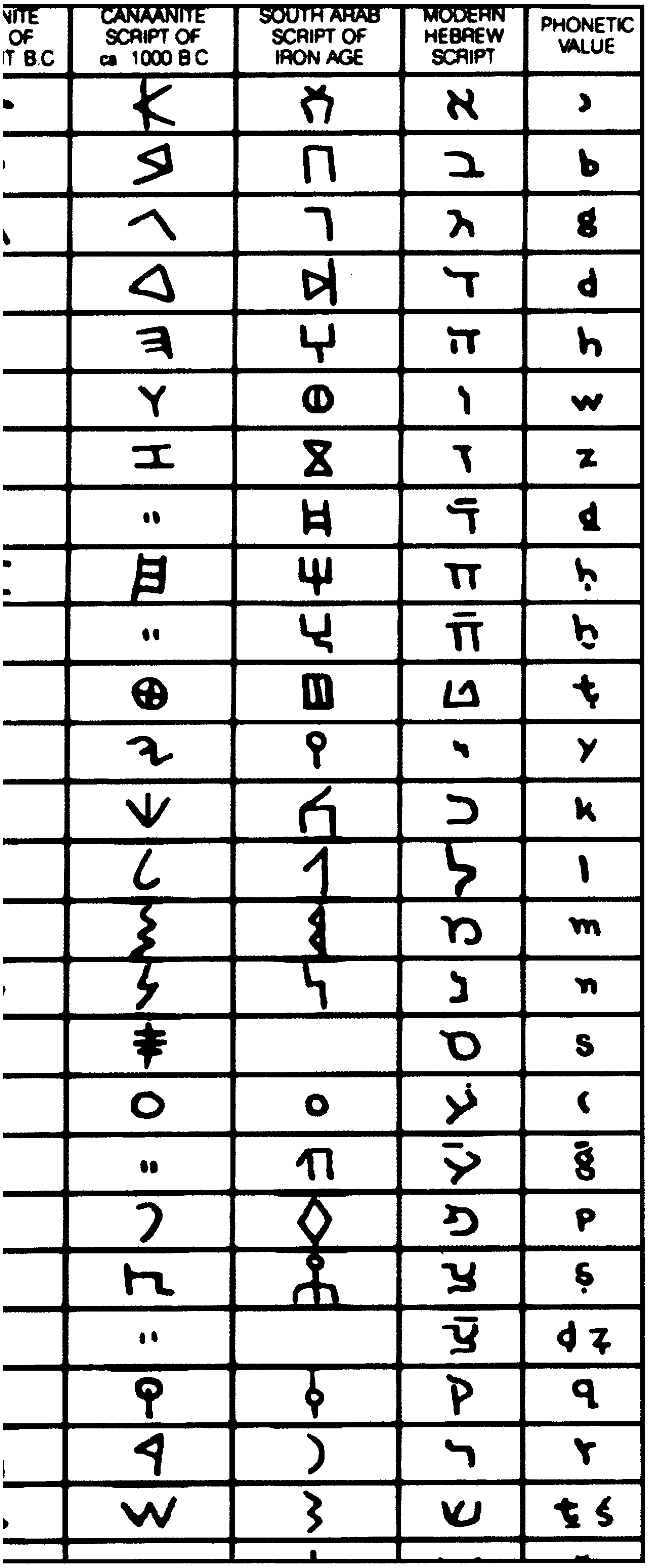
我认为我们应该试错性研究“天干地支”与腓尼基 22 个字母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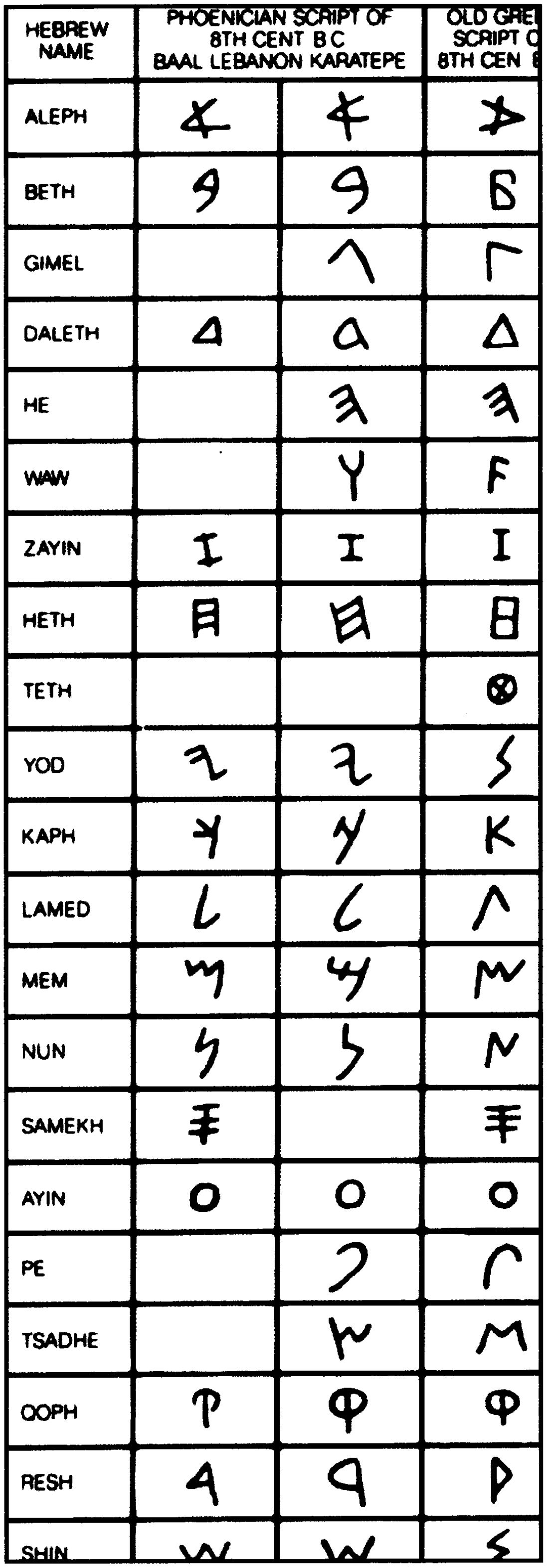
“天干地支”无论在商文化中还是在文字本身中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比如从商王这里才开始大规模使用“天干地支”作为商王庙号，比如“武丁”、“沃甲”、“小辛”等。

在今天被认定的商人后裔水族人所使用的古老“水书”，实际上就是甲骨文的一支，其中的“天干地支”也是水书里受到特别重视的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文字，它们是占卜最常用的文字符号。

“天干地支”一般人认为是商朝出现的，也比较符合这个特点，实际上夏末出现天干地支会更合乎实际情况，因为夏桀就叫“履癸”，我们不能排除这里的“癸”就是“天干”。

比较巧合的是，夏桀生活于 3600 年前，一般认为腓尼基的 22 个字母恰恰就是稍早于此产生的。


NITE OF T B.C
CANAANITE SCRIPT OF ca 1000 B C
SOUTH ARAB SCRIPT OF IRON AGE
MODERN HEBREW SCRIPT
PHONETIC VALUE
א ב ג ד ה ו ז ח ח ט י כ ל מ נ ס ע ע פ צ צ ק ר ש
ʾ b g d h w z ḏ ḥ ḫ ṭ y k l m n s ʿ ġ p ṣ ḍ ẓ q r ṯ š


HEBREW NAME
PHOENICIAN SCRIPT OF 8TH CENT B C BAAL LEBANON KARATEPE
OLD GRE SCRIPT O 8TH CEN
ALEPH
BETH
GIMEL
DALETH
HE
WAW
ZAYIN
HETH
TETH
YOD
KAPH
LAMED
MEM
NUN
SAMEKH
AYIN
PE
TSADHE
QOPH
RESH
SHIN

▲几种古老的文字，其中有迦南文字、腓尼基文字、南阿文字等。

腓尼基、黎巴嫩、埃及

黎巴嫩与巴勒斯坦比邻，自然也与以色列是紧邻，每次我们在世界新闻中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时都伴随着炮火隆隆，那里是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交汇地带。在历史上也一直如此，那里是个冲突不断的过渡战场，南方埃及与北方赫梯两大帝国都对这里虎视眈眈。从某个角度看，今天距离上古并不遥远，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依然生存在一个国家与民族概念不断得到强化的时代。大概这一切的改变只能有赖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真正体会与享受兄弟姐妹般的融洽与温暖。

2004年12月《北京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因破解腓尼基人之谜 可能是今天黎巴嫩人》的报道：

> 2004年10月，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牛津大学人类基因专家斯宾塞·威尔斯和黎巴嫩人类基因专家皮埃尔·札卢亚用基因法寻找腓尼基人的项目经过两年的研究终于有了结果。
>
> 威尔斯和札卢亚沿着地中海岸收集人类血样，他们总共收集了2000份血样。他们要通过基因分析的方法，帮助考古学家找出公元前3000年前就活跃于地中海的腓尼基人今天的下落。
>
> 腓尼基人的原始基因参照来自黎巴嫩拉斯基法(Raskifa)的一个山洞，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具四千多年前的腓尼基人遗骸。他们将会在古老牙齿与采集到的现代血液中寻找Y染色体上的相同基因类型。

> 在2000个血样中，172个有马其顿血统、98个有摩洛哥血统……黎巴嫩人与伊比利亚人（即西班牙人），包括巴斯克人、北非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等等具有相同的基因标志。他们的结论是，古代的腓尼基人与今天的黎巴嫩人遗传特征最接近，也就是说，腓尼基人很可能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人。

以上的报道，与其说是确定腓尼基人不如说是确定古代的黎巴嫩人与哪里的人有关联，因为他们的基因参照就来自黎巴嫩。也就是说，基础就是认定黎巴嫩是腓尼基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黎巴嫩就是腓尼基人的一个大本营。其他所采集的样本来源是通常人们怀疑与腓尼基有关的地区与民族。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分子遗传学专家Peter Underhill，利用分子技术推定地中海中接近法国南部与意大利西部和南部的三个岛屿（科西嘉、马耳他和撒丁岛）的Y染色体是埃塞俄比亚型的居多①。这表明在一个未知的年代，两地之间的人们曾经密切交流。换句话说，红海与地中海曾经存在着密切交流。

为什么是这两个地方？是谁在进行交流？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大海，所以应该是一个海上民族在穿梭交流。

我在《锁定红海》中多次强调，“萨巴”是腓尼基时代突然因商业而兴起的一个王国，本身它就是个具有一定腓尼基色彩的国度（假如还不能将“萨巴”看作腓尼基殖民地的话），为什么这个根据地建立在“萨巴”这个地方就耐人寻味，因为那里可以扼两大海之要。谁占领了亚丁湾实际上就拥有了沟通红海与地中海通往亚洲的海上通行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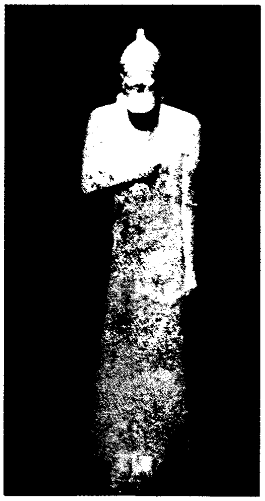
目前公认的事实是，地中海除了希腊等少部分地区几乎全是腓尼基的殖民地或文化影响区域，科西嘉、马耳他和撒丁岛是典型的腓尼基文化区域，还包括距离黎巴嫩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塞浦路斯小岛。

我们注意到，除了占有黎巴嫩之外，实际上腓尼基人所占领

---

① [illegible]在发表这篇论文的同时，刊登了[illegible]……他的工作证实了，人类[illegible]

▲大约2500年前的塞浦路斯人



▲大约2600年前的塞浦路斯人

▲大约2600年前的塞浦路斯人

的广大区域都是三千多年前欠发达地区，也就是大国不愿意垂顾的地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临海，比如地中海西部、红海南端，甚至东亚。这再一次让我们想到中国商人的发源地：山东半岛。

腓尼基人是一个专门发展海上商业的群体，在航海方面他们确实有过人之处，连一些大国也要借助于他们的这一特色来实现其经济或军事目的，偶尔也要对他们另眼相看。他们的这一特点让人怀疑，中国“三代”的统一性会不会来自于贯穿于“三代”的一个黏合剂：一个善于开拓游走的民族。或许他们在其中的某一代（比如商）具有压倒性的政治优势，但在其他两朝中同样有他们不可替代的身影。

据说，两千六百多年前埃及法老尼科想刁难一下以勇敢探险著称的腓尼基人，同时也想开辟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航线。他把几位腓尼基最优秀的航海家召集到王宫来，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腓尼基人那么善于航海，我让你们从埃及出发，永不回头，而且始终贴着右边的海岸航行，最后回到埃及。如果你们做不到，以后就不要再吹牛了。如果你们能够做到，我一定重赏你们！”出发点是地中海。

当时人们认为大西洋就是世界的尽头，腓尼基航海家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法老的挑战，据说他们驾驶的是三艘双层划桨船。

三年过去了，人们逐渐地把这件事情淡忘掉了。尼科法老看到他们再次出现在他面前还以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再次出现是欺骗他。腓尼基人将这三年的航海经历详细说了一遍，然后向法

老献上了他们沿途搜集到的奇珍异宝。尼科法老终于相信了他们。他们给法老讲述的故事与荷马史诗相比应该也不逊色。

传说中的四千年前人类环非航行，就是腓尼基人的杰作。

黎巴嫩与古埃及的关系应该得到特别的注意。在相当于中国夏朝这个时期，腓尼基人（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迦南人）应该是古埃及王国的固定商业伙伴，其实我更愿意把迦南人看作埃及人的另外一半。在大约公元前1600年，正是中国商朝推翻夏朝的同时，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相当于今天以色列地区的喜克索斯游牧人攻克埃及①，他们对埃及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结束。埃及并没有马上复元，再度兴盛是在拉美西斯时期，并且是从公元前1320年开始，黎巴嫩这时成为埃及帝国版图的一部分，而此时中国的后商恰好开始，甲骨文在中国出现。

▲大约2700年前的塞浦路斯陶器

▲大约4200年前的塞浦路斯陶器

埃及、喜克索斯人以及黎巴嫩的进退似乎都与中国的“三代”有着明显的关联。它们之间，以及喜克索斯人与“萨巴王国”之间是什么关系，都至关重要，只有扫清这些障碍，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复杂对应才能精确浮出水面。

随着公元前14世纪埃及势力的减弱，黎巴嫩人逐步驱逐埃及人，到公元前12世纪初黎巴嫩已经基本独立。

黎巴嫩北方的赫梯帝国的强弱一直都与上面的几国以及中国有着密切关联。按照我的推测中国的商朝之母简狄就是联姻而来的赫梯人，有关章节请参见《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这些近东与中东微妙的变化都会引起远东的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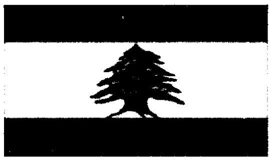
有关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资料本身就混乱不堪，多在探索研究之中。比如《塔纳克》(Tanach)就把喜克

① 这一事件对应中国的深层解释是，夏朝是埃及出身的夏甲建立的，埃及的覆灭就是夏朝后台的倒台，中国商朝的建立是埃及的一个对应，取代埃及原本统治地位的是来自迦南地区的一支族群，在中国地区取代埃及背景的夏朝人同样是迦南人——腓尼基人——商人——殷人。

索斯人直接等同为迦南人或腓尼基人，但是我们却也可以推测他们或许是希伯来人。在喜克索斯统治埃及期间，他们把首都从孟菲斯迁移到腓尼基人聚集的底比斯或许并非没有意义。

埃及与中国的联动时间表：	
古埃及	中国（大约同期）
公元前 2040 年 中王国开始	夏朝开始
公元前 1567 年 新王国开始①	商朝开始
公元前 1320 年 拉美西斯家族上台②	后商开始
公元前 1085 年 后王朝开始	周朝开始
公元前 716 年 黑人王朝	东周（出现较多黑人雕像）

附：黎巴嫩概况


▲黎巴嫩国旗

国名：黎巴嫩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Lebanon）

国旗：呈长方形，中间为白色长方形，上下为两个红色长方形③。旗地中间是一棵绿色黎巴嫩雪松，它在《圣经》上被称为“植物之王”。雪松被誉为黎巴嫩的国树，代表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人民的力量，还象征纯洁和永生。

自然地理：面积10452平方公里。位于西亚南部地中海东岸。东部和北部与叙利亚交界，南部与巴勒斯坦为邻，西濒地中海。海岸线长 22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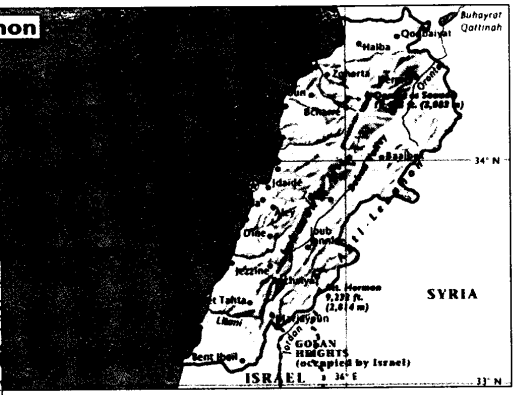
全境按地形可分为沿海平原、沿海平原东侧的黎巴嫩山地、黎巴嫩山东侧的贝卡谷地和东部的安提黎巴嫩山。黎巴嫩山纵贯全境，库尔内特—萨乌达山海拔 3083 米，为黎最高峰。河流众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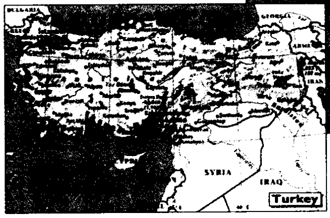
① 有人认为喜克索斯人攻克埃及是在公元前 1600 年，所以上面说的“商朝开始”更符合这个时间。

② 拉美西斯家族的上台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是埃及历史上最后一个辉煌时期。而恰好就在这前后，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开始，甲骨文出现，后商开始，并且由于埃及疆土的扩展，腓尼基人的大本营黎巴嫩此时属于埃及。所以，假如商朝是强大埃及支持的腓尼基人结合土著而开创的王朝就不奇怪了。当然，他们要从地中海来到东亚必须得到红海沿岸“萨巴王国”的支持，很可能他们几方达成了统一才实现了推翻夏朝的目标。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妇好墓中有五个石人雕像的由来，有地中海的、阿拉伯半岛的、非洲的、本地的土著等。

③ 中国商朝尽管称呼为“殷”，但实际上他们更崇尚“白”。古籍中显示，夏尚黑，商崇白，周人喜欢红色。


Lebanon
Buhayrat Qattinah
Halba
34° N
SYRIA
Mt. Hermon
9,232 ft.
(2,814 m)
GOLAN
HEIGHTS
(occupied by Israel)
ISRAEL
33° N

▲黎巴嫩地图


SYRIA
IRAQ
Turkey

▲土耳其、黎巴嫩以及叙利亚地图

向西注入地中海。利塔尼河为全国最长河流。黎巴嫩属热带地中海型气候。

人口①：400 万（2000 年）。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还有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等。阿拉伯语为国语，通用法语和英语。居民约 54％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46％信奉基督教，主要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等。

首都：贝鲁特（Beirut），人口约 150 万（2000 年），7 月平均最高气温 32℃，1 月平均最低气温 11℃。

简史：公元前 3000 年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迦南人最早在该地区定居。公元前 2000 年黎巴嫩为腓尼基的一部分，以后相继受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等统治。16 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侵入黎巴嫩，1920 年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1941 年 11 月 26 日法国宣布结束对黎的委任统治，1943 年 11 月 22 日获得独立，成立黎巴嫩共和国，1946 年 12 月，法军全部撤离后，黎巴嫩获得全部自主权。

政治：黎宪法规定立法权属议会、执行权属总统。

外交：黎奉行中立、不结盟和开放政策，与美、法等西方国家关系良好，是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议会联盟成员国。1971 年 11 月 9 日，黎巴嫩与中国建交。

① [illegible]今天的黎巴嫩人口组成也可以分析古代[illegible]
[illegible]人口[illegible]，但不[illegible]人与阿拉伯人的[illegible]

▲约旦出土的青铜时代物品

黎、夷、米、殷、[illegible]、羊

黎巴嫩曾经是腓尼基人的家园。在古代的称呼与今天并无大的区别。黎巴嫩与南面的以色列紧邻，地理上更具体的迦南就在西奈半岛的北面，某些时期西奈被迦南人占据。西奈半岛是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一个巨大的喉结。某些时候地中海与红海相通这一状况是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平面在新石期时期曾经有过剧烈的波动。

在如此复杂的地理与种族之中，我们应该指明这样一个可能：某些迦南人就是腓尼基人，某些以色列人也是腓尼基人，某些阿拉伯人更是腓尼基人。所有临近海边的欧洲与亚洲以及非洲地区都被撒播下了腓尼基人的生命与文明的种子，他们在3000年前的广袤地球上几乎无所不在，只要那里有海。

中国东部沿海生活着一个人群，“夷”。我有一个假设，“夷”可能是古代黎巴嫩的“黎”。一些中国语言学家认为，古代“夷”和“黎”发同一个音，甚至就是一个字，所以中国南方的“黎民”也是“夷民”。

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的“黎民”就是来自“黎巴嫩”的“腓尼基人”？我在《锁定红海》这本书中说，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回民”，这里把这个问题再次深入具体到与阿拉伯人有关的民族：腓尼基人。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如此，广大的地中海区域，尤其是北非与西班牙等地也都与中国情况接近。我曾经惊讶西班牙这个地方为什么一直被阿拉伯人占领，

现在终于明白一切皆有更深的历史渊源，腓尼基人在大约4000年前就已经是那里的主人。而腓尼基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在我看来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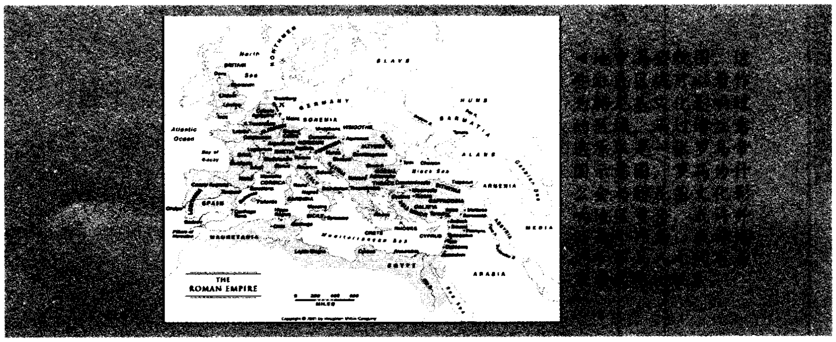
古代黎巴嫩这个地区的名字多以它的首府称呼为“Byblos”。“黎巴嫩”（Lebanon）这个国家的名字起码应该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也非常古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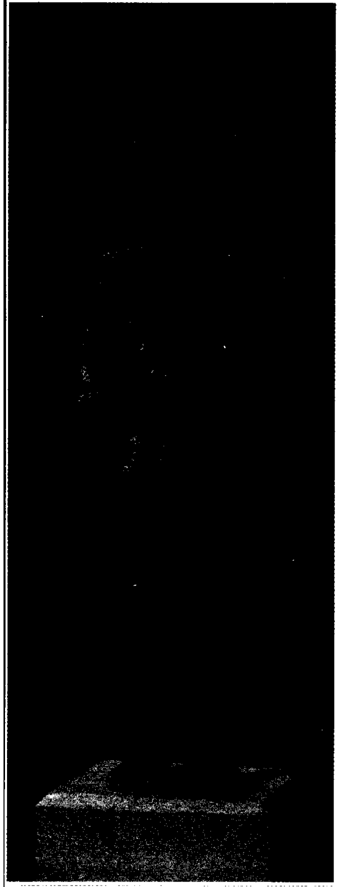
但有人在理解上可能有障碍，商朝人叫“商人”和“殷人”就够了，还叫“黎人”、“夷人”？其实这不奇怪。想想我们今天怎么来称呼主体“中国人”就可以理解。当我出现于外国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表述可以是“中国人”，“东亚人”，“蒙古人种”，“河南人”，“中原人”，“华裔”，“汉人”，“炎黄子孙”，这要看哪个场合哪个时代侧重什么而定，许多情况下它们之间可以置换，所以“商人”和“殷人”同时又成为“黎人”或“夷人”并不奇怪。

在中国“夷”一直代表东方，传统中属于“蓝色”，是海洋的色彩，这很合乎逻辑；后来实际上他们又移居南方，因为周人占领了中原后，驱赶了他们。这里还可以将其与南方“越人”结合起来研究，可能也会有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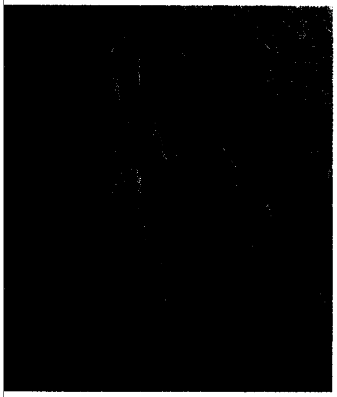
神话历史传说里曾经发生过一次“蚩尤”与“炎黄”的大战，蚩尤战败南下，我很想把蚩尤与商朝对应起来，同时把蚩尤与“夷”对应起来进行试错研究。当然“炎黄”可以对应具有犹太人色彩的周人。

假如我们大致以东经110度为界，我们可以说中国东部多为“夷人”和“越人”影响范围，而西部却是氐羌人势力范围，就是夏人或先夏的影响范围。这个区域划分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文明扩展的规律是：西早东晚。配合地势的西高东低，西陆东海，“夷”人的特色及其形成更容易得到表现。


North Sea
BRITAIN
SLAVS
HUNS
Atlantic Ocean
ALANS
Black Sea
ARMENIA
SPAIN
MAURETANIA
Mediterranean Sea
CRETE
MEDIA
EGYPT
ARABIA
THE ROMAN EMPIRE



▲古代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人造型



▲亚述的萨尔贡头上也长角

“商人”除了以上的可疑名称，应该说还有一个名称没有提及，这就是他们的姓氏：“子”。我想称呼他们为“子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子”依然可以追究到“黎巴嫩”去。

越来越多的证据在积累汇集，我仿佛看到一个叫“商”的庞然大物已经被“腓尼基”纠缠得不能动弹，“商”可能真的被我们捕获了。

古代“子”通“紫”，也就是说“商人”其实姓“紫”。“紫”恰好是古代黎巴嫩的一个特产，并且是古代黎巴嫩的一个支柱产业，虽然这个染料数度使黎巴嫩暴富，但也因福得祸屡被吞并，都与“紫”有关。腓尼基人就有一个称呼“紫人”。它提示了商人就是腓尼基人。

“紫”在分类并不详细的古代曾经与“红”被看作同一种或接近的颜色，“红得发紫”这一中国人的谚语就说明了这样的思维逻辑：红深而紫。生活在黎巴嫩的古代腓尼基人既然被称呼为“紫人”（Purple People），所以他们也可以是“红人”。中国人整体都崇拜红色，如今口语里常形容人“红得发紫”以及“大红人”或许就是商、周遗留下来的文化，意谓哪些人是“Purple People”就是炙手可热的贵族，或者干脆就是皇族的简称。而“红得发紫”更揭示了“紫色”就是“深红”。

商人的国姓“子”与“紫”在历史上有过重合的时期。它们不仅在今天音同为“zi”，而且在这几个方面意义相同：1. 皇家意味；2. 表示颜色；3. 夜半。

《辞源》与《辞海》中“子”通“紫”的例证：

1.“子绀钱”就是“紫绀钱”①。

2. 子薑的解释是“因芽尖微紫，名紫薑，又叫子薑。

3.“子姑”又名“紫姑”，也就是“厕神”。

4.“子衣”，婴儿胎胞，也叫“紫合车”。

5.“紫鱼(Pristipomoides typus)”又名“子鱼”②。

6. 一种顶尖级石榴“子牙乌”又名“紫牙乌”③。

---

① 修订本《辞源》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本第 777 页

② 缩印本《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15 页

③ 缩印本《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1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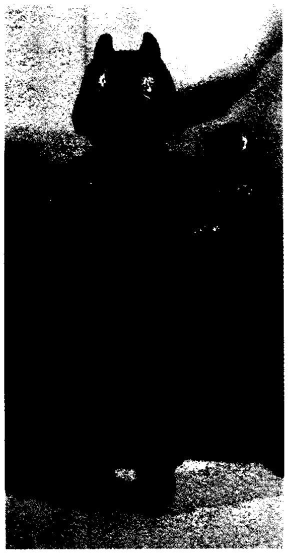
7. 表示“夜半”的意思，如“子夜”①，同样“紫茉莉”因为开花在晚上又名“夜晚花”，还有更多例证，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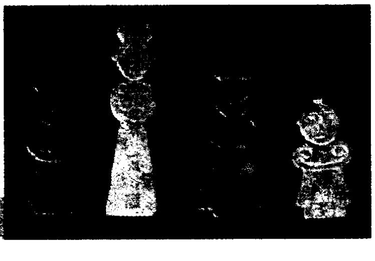
“紫”（子）会不会因为是皇姓的缘故所以就尊贵起来，并且自“商”因与皇族有关就以“紫”命名？这方面例证有：天文上的“紫薇宫”，实际上为天上的“皇宫”；现实里“紫宫”实际为皇帝居住的“紫禁城”；“紫书”实际为皇帝书写的“诏书”，还有直接表达为“紫诏”的。然后有“紫衣”，皇帝所赐僧衣也，又为“紫袈裟”；“紫陌”特指皇帝居住的京城郊区的道路。

很可能商朝与地中海一样以“紫”为贵，后来中国依然保留了这个传统。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传统，“紫色”特指贵族色彩。也许这与腓尼基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有关。古代珍贵的紫色染料只有黎巴嫩这一个地方出产，而且非常稀少，只有皇室与大贵族使用，久而久之全球以“紫”为贵。

中国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改尊黄色，尤其是明黄色为皇家色彩，我怀疑这是周朝才开始的，直接受埃及文化的影响，古埃及在这前后有以明黄为皇家色彩的习惯，因此同时还很崇尚金子，实际上某些地域很可能直接把金黄色的黄金列为皇家专用，不允许民间私藏滥用。

▲古代地中海沿岸头上饰两角者比比皆是，并且多为英雄。此青铜雕像为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


▲大约1000年前的中国东北地区辽人造型。


◀2300年前神秘的中国中山国人如蚩尤一样头上有两角。蚩尤的典型造型就是牛头。

---

① [illegible]《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82 页

▲ 2000年前的古罗马人

地中海里的几个腓尼基人根据地

地中海上有无数的岛屿，但比较显眼的岛屿首先是几个半岛：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人居住的亚平宁半岛，希腊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还有一个是地中海南岸的突尼斯，还有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最后一个是地中海最西边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人居住的伊比利亚半岛。

作为地中海里面完整的岛屿，我们最常提到的相对比较大而著名的岛屿，从东到西有：距离黎巴嫩一百多公里的塞浦路斯（它的意思是“铜”），克里特岛，紧贴雅典的伯罗奔尼撒实际上是个与巴尔干有一线牵连的半岛而不是完全脱离大陆的独立岛屿，然后是西西里岛以及群岛，在西西里群岛的南端是个很小但又非常著名的小岛马耳他，穿过突尼斯海峡就是意大利的撒丁岛，与之比邻的科西嘉①曾经产生过小个子伟人拿破仑，再往西有一个巴里阿里群岛属于西班牙，再往西就是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

所谓的“西撒哈拉”就在摩洛哥南方，这里临海，面对大西洋。有人说那里上古时期与中国有同样的物产，有人说“苏三再有想象力也不能把这两地联系到一起”，我即将做到这一点，通过迦南（腓尼基）人。

以上所有区域实际上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追踪腓尼基人通过

① 科西嘉与迦太基同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在中国翻译里看它们的名称似乎没什么关联，但是看它们的字母组成就完全不同了：Corsica （Kursika), Carthage。

航海与中国“三代”发生文明交流的可疑地区。初步检查的结果是，我深有所获，超出了我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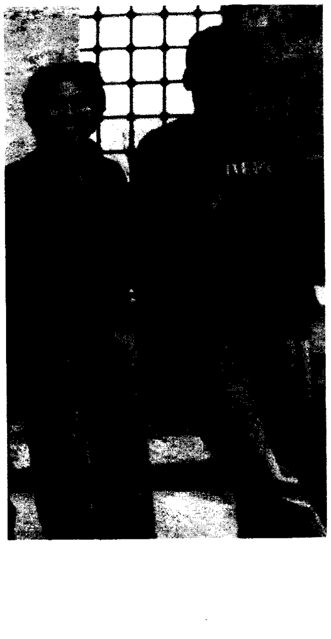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由于地中海东部地区面对那么多强大国家，中东是大国激烈争夺的资源。善于航海经商的腓尼基人除了黎巴嫩大本营之外仅仅占领了最近的塞浦路斯，腓尼基人抢占的地区多是偏远沿海。这也符合他们来到东亚建国的逻辑。

今天塞浦路斯人口明确划分为两大部分：希腊人与土耳其人。这个现象很形象地说明了希腊人与土耳其人之间就存在着腓尼基人，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彻底融合了。今天腓尼基人不见了，但是他们的文化却留在当地以希腊、土耳其人为主的民族中间被消化吸收了。

土耳其半岛以及希腊都具有各自的文明特色，并且希腊半岛很明确受古埃及的文明影响，这是个公认的事实，但是希腊文化中也可以见到腓尼基文化痕迹，这也是历史事实。由于土耳其的文明历史非常悠久，所以不可混淆认识以为土耳其文化就是腓尼基文化，当然希腊文化也与腓尼基文化有着明确的界限。这几个文明之间常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

尽管在地中海东半部没有获得太多的利益，腓尼基人却仰仗他们长期练就的水上本领几乎独占了地中海西部以及西部以外的大西洋里的沿海岸地区。突尼斯被公认为腓尼基人所建，正式建城的时间大约在2800年前。而西西里岛与马耳他岛都曾经属于腓尼基人的天下。占据了以上两个扼要，等于腓尼基人扼住了整个通往西部地中海的喉咙，所以向西的所有地区基本上现在都可以确认在那个时期或属于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或与腓尼基人曾经联盟，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和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人居住的亚平宁半岛的某些地区尤其具有特殊的腓尼基人特色。

可以说，今天的意大利人、突尼斯人、西班牙人以及法国南方人，都应该有腓尼基人的后裔。



◀作者与中国维族导游在土耳其合影。当我知道这位导游是新疆维族后很吃惊，其实他更像汉族人。但是看到古罗马人雕像后我认为他们或许更为相像。

西西里岛与商朝之“子”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面积为25700平方公里，其首府为Palermo，目前人口为五百多万。无论从东西走向还是南北走向看，它都是地中海最为核心的一个岛屿，而且是扼守西部地中海的咽喉，紧贴亚平宁半岛，它显得格外重要。如今两岛之间有铁路相连。

根据希腊人后来记载所说，岛上最初的土著是这三个部落：Elymi、Sicani以及Siceli，后二者估计是殖民者，因为他们据说又与大不列颠群岛以及法国西班牙等地的一些凯尔特人（Celts）有关。我们也可以怀疑后两者与腓尼基人有关，也就是怀疑欧洲的凯尔特人与腓尼基有关，后面有专文讲到凯尔特人。欧洲的许多民族其实与中国的许多古老民族一样，迷雾重重，起源与分化一时无解，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我们以往的许多历史知识是错误的，需要重新解构与重建的不仅仅是中国史前史，也包括中东史前史与欧洲史前史。

传统认为该岛最初的殖民者是腓尼基人从对岸的非洲突尼斯首府迦太基迁徙过去的居民，后来被希腊人占领，这个核心时间一般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但到底最初的时间有多长很难说，因为没有准确的文献可以援引，都是传说与推测。

从人种和政治联系上要想绝对分清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是非常困难的。在当时希腊人与腓尼基人有基本一致的信仰，尽管希腊人在哲学与政府组织方面更优越一些，实际上两者的社会整体还

是非常接近的。

如今腓尼基文化似乎消失或者被人们遗忘了，实际上总体被希伯来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阿拉伯人吸收融合了。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想探究腓尼基人的传统与习俗，有时到这些继承他们文化的群体里去寻找是最方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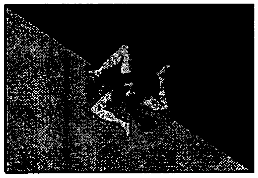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力量萎缩之后迦太基依然是腓尼基人的一个城市，并且得到长久的发展，今天的突尼斯依旧保留了浓厚的腓尼基文化特色。现代迦太基语（Punic,the Carthaginian language）就是晚期腓尼基语受到非洲语言影响后的一个残留。或许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研究红海两岸的“萨巴文字”之余也可以到这个地区与商朝的甲骨文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对比。

了解西西里岛的历史要从迦太基说起。尽管后期的西西里岛似乎距离史前太远，但是通过西西里岛在历史时期的争夺战，可以看到争夺它的是什么人，以及这个岛屿对于地中海沿岸的意义，我们从而可以方便地推演史前该岛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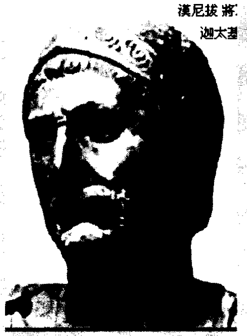
迦太基（Carthage）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布匿”（Punic），它的拉丁语是“Poenicus”（晚期为Punicus），希腊语为“Phoinikes”，不难看出“布匿”与“腓尼基”（英语为Phoenicia）的词根同出一源，称呼“布匿”还是“腓尼基”只是罗马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布匿”可以看作为“腓尼基”的另外一个别称。

为争夺西西里岛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战役，分别被称呼为“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及“第二次布匿战争”，皆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西西里岛从此彻底移手于从意大利半岛而起的“罗马帝国”，之前希腊人也在小岛上建立过小片的殖民地。其后的6个世纪里西西里岛一直属于罗马人。

西西里伟大的居民阿基米德（Archimedes）丧生于第二次迦太基战役，当然汉尼拔将军也是这次战役中著名的人物，他作为迦太基将军自然是个腓尼基人。西西里小岛上可谓人才辈出，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产生，最著名的一位应该是1934年获得诺贝尔



▲西西里群岛是意大利的一个自治区，有自己的区旗。由于西西里岛是个三角形，所以旗子中间是一个三腿怪。这个旗帜的颜色红与黄让中国人感觉很亲切，因为中国的国旗也是由这两种颜色组成。



▲汉尼拔图像迦太基将领哈米尔卡·巴卡之子。第一次布匿战争后汉尼拔随父去西班牙，受到良好教育和军事训练。公元前221年任西班牙地区迦太基军队统帅。前219年率军攻占罗马在西班牙的同盟城市萨贡托。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率步骑兵约6万人，从新迦太基城出发，穿过高卢南部地区，翻越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山南高卢。随后粉碎罗马人阻击，绕过敌重兵设防的阵地向罗马挺进。前217年6月在特拉西梅诺湖之战中几乎全歼罗马追兵。罗马军采取迁延战术，消耗迦太基军实力，而迦太基贵族因疑惧汉尼拔权重而不予必要的援助。前209年，汉尼拔的后方基地新迦太基城陷落。前207年，汉尼拔孤军无援，被迫退守意大利南部。前202年迦太基被迫求和。前196年任迦太基最高行政长官，实行改革，遭到贵族派反对和政敌诬陷。翌年流亡叙利亚。前189年罗马占领叙利亚，汉尼拔辗转逃到小亚细亚。公元前183年汉尼拔在罗马人的追捕下服毒自杀。假如我们描绘一张汉尼拔所经历过的地图，我们会惊讶于2000年前一个腓尼基人惊人的国际路线！而这个腓尼基人所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恰好是远古腓尼基文化所主要涉及的国家与地区。这些地方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叙利亚、北非。别忘记，这才只是地中海里的腓尼基人活动天地，还没有谈及红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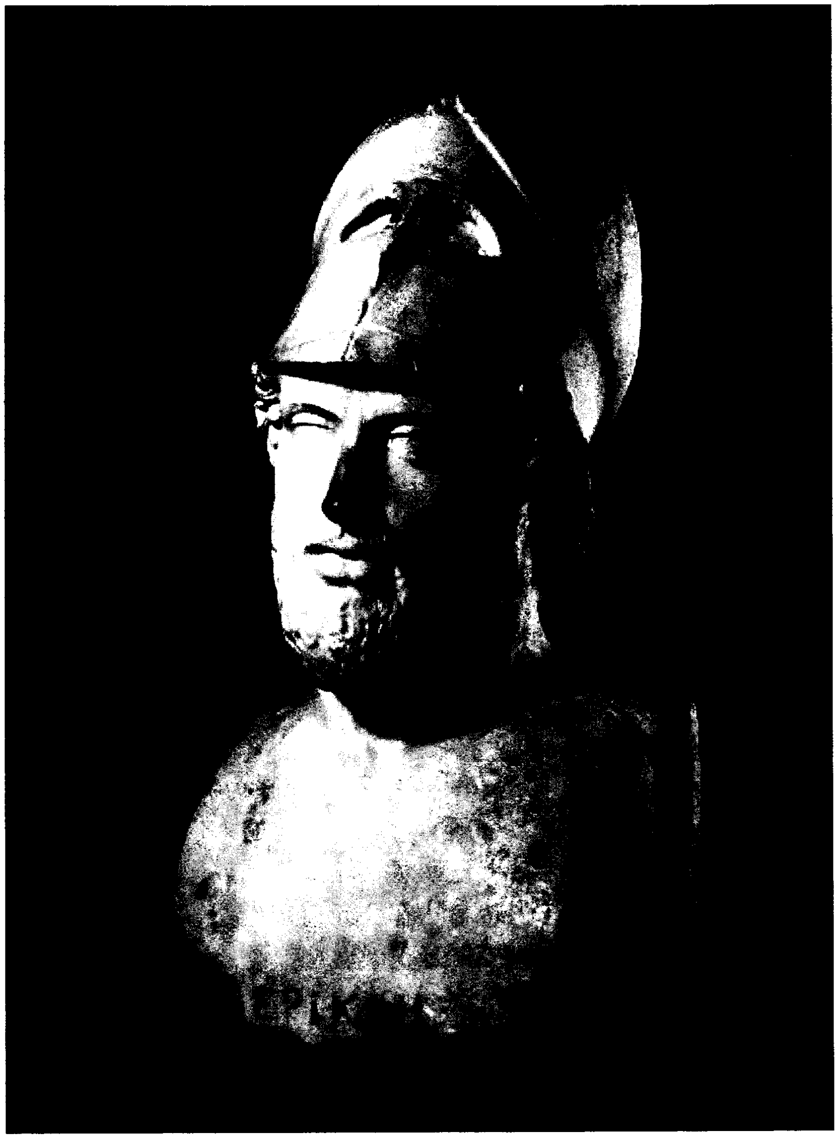
文学奖的小说家与荒诞剧作家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

哥特人（Goths）于公元493年攻占西西里，公元535年西西里又归于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人（the Byzantines），9世纪经过两百年的袭扰阿拉伯人终于成为该岛的主人。在其后的时间里几乎大半个的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教皇都参与了这个小岛的命运抉择，如今历史风云散尽，小岛回归意大利。

从这个小岛的一批又一批主人来看，这个小岛曾经属于谁我们都不意外，包括在近3000年前属于一个叫“子”（也就是“紫”）的民族。

在以上所有提及的国家或民族里面，可以肯定都是当年与腓尼基进行过广泛交流的人群。我尤其想提醒的是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的出现。阿拉伯人在中国称为“回民”，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回民”是中国第三大少数民族——这个现象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腓尼基人在古代来到中国发展的可能性有多大。汉族并非一个真正的民族概念，而更多是一种文化概念，所以要看今天中国人的民族组成，看少数民族大概是最合理的。我当然不同意说中国人全部是阿拉伯人，因为我这本书其实只是在寻找古代众多朝代中的一个商朝的起源，很可能商朝是由两个以上的民族构成的，而腓尼基人只是他们中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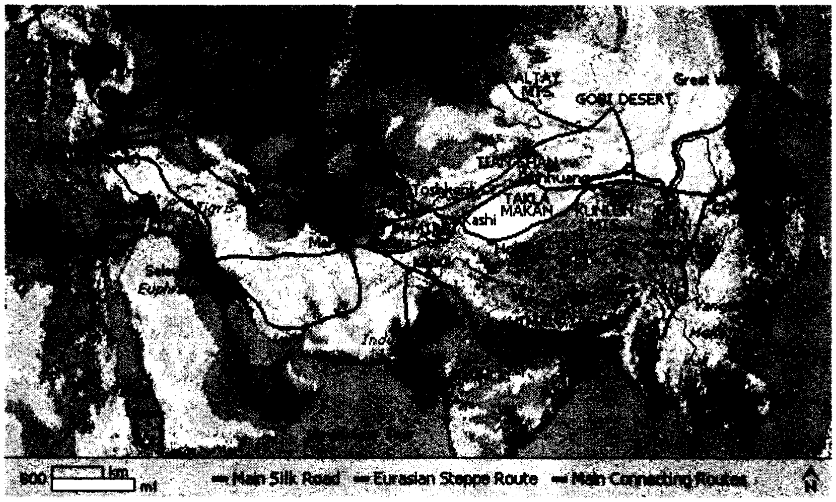
从西西里这个与腓尼基人深有联系的小岛历史也可以推测出其他接近3000年前一些远离世界中心的地区的



▲古罗马将领

国家与土地概念，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然原始状态。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这个小岛尽管主要为腓尼基人所占，但其他势力也都在上面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是大小的差别。当我把这个形势放在东亚的时候我觉得许多的历史得以合理地比照：中国大陆上小方国成千上万。另外，西西里的历史基本上是从2800年前开始的，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恰好也是基本同期，中国第一个得到清晰记录的年代是公元前841年。这


ALTAY MTS
GOBI DESERT
Great W
TIEN SHAN
Tashkent
TAKLA MAKAN
Kashi
KUNLUN
Tigris
Euphrates
Indus
800 km mi
Main Silk Road
Eurasian Steppe Route
Main Connecting Routes
N

▲对于某些一直经商的民族从中国的中原到地中海终点迦太基或西西里，这根本就是一条驾轻就熟的老路，沿途还有许多的故旧熟人。商朝的“子”（zi）来自于“Zidonians”（西顿人）。因为“子”指商朝的腓尼基人（紫人），所以“子”也就被赋予了“紫”颜色的含义，从而商朝又成为“深红”之“殷”。换句话说，“子”为音译，“紫”为意译，最后它们在汉语里合二为一了。商朝人发源地山东如今没有“子”文化却有明显的“泰”文化痕迹，如中国第一皇家圣山“泰山”就在那里，可以看作是腓尼基另外一个城市“Tyre”在山东的发展。而“子”族就是“西顿”文化。

一点也可以提示我们，中国与西西里附近的文明进程可能是同期的。

西西里岛首府是 Palermo（希腊人称呼为 Panormos），尽管目前岛上杂居着来自各个不同地域与文化的人们，但 Palermo 这里却非常明确地从考古上证明了该城最初就属于腓尼基人。一个比较怪异的事情是，Palermo 在公元前 8 世纪，也就是中国周朝时期，它的名字竟然叫 Zis 或 Sis。或者说，腓尼基人称呼他们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的这个最大的城市为 Zis 或 Sis，后来在公元前 5 世纪希腊占领后才将其改为如今的名字“Panormos”。

目前古老的“Zis”城仍保留有一段城墙，并且那里还发掘出大量当时腓尼基人的墓地，这些都是可以继续探讨的物质存在。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中国自汉朝开凿的“丝绸之路”最西边的顶头不是别处，恰好是“迦太基”这个腓尼基人的城市。这里浮现出一个秘密，所谓汉朝开通的“丝绸之路”实际上之前的几千年里可能一直存在，而线路的两端都是“自己人”：紫（子）人，都是同宗的“商人”、腓尼基人！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实际上很可能最初是由“商（紫）人”开辟发展的，但是到了汉朝由于战乱的中断人们失忆了。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经营这个跨国公司的商人

不是别人，就是神奇的腓尼基商人，只有他们在远古有这个登峰造极的商业组织能力。现在的“丝绸之路”的研究多处于对道路的清理确认，但是我认为更为神奇的是远古时代经营这条路线的理念与组织架构，要知道他们经营的货物重要到影响有关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安全保证、信誉问题、运输手段、政治斡旋能力，都不是小商人可以操控的。这是由很大的一个或多个群体在背后支撑的一个体系。面对这幅地图，请注意最主要的那条深红线路，一端在陕西长安——较早集中出现腓尼基字母的地方，另外一端就是腓尼基人的家园黎巴嫩。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老路，它不是从汉朝开辟，而是从迦南人，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其中的蓝色线路更是指向了我们关心的海上通道。

西西里岛由于在古代称呼为“Zis”或“Sis”，今天的名字“Sicilia”（英语为Sicily）或许就是来自它们。但是它们为什么被称呼为“Zis”或“Sis”呢?

腓尼基人与迦南人连续在许多地方获得一个接一个的征服胜利之后，他们被称呼为“Zidonians”或“Tyrians”，“Zi”很可能成为一个对他们的简称。《圣经》里也曾经出现过这个称呼：（bbe）On the south: all the land of the Canaanites, and Mearah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the Zidonians, to Aphek, as far as the limit of the Amorites①。很明显这里的“Zidonians”来自“Sidonians”，即“西顿人”。“西顿”为黎巴嫩古代两大城市之一。从这里我们看出，“zi”等于“si”，并且它们在汉语中又很容易地转为汉语拼音中的“xi”（西），因为我们翻译之为“西顿”。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的殖民地曾经名为“Zis”或“Sis”可能就起因于此。

---

① Bible: Joshua 13: 4. 翻译：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

其他几个地中海岛屿

▲腓尼基人陶罐

西西里是地中海上的第一大岛，撒丁岛排位第二，塞浦路斯第三，科西嘉第四。

假如说西西里岛由腓尼基人和其他民族诸如希腊人等轮流在那里掌控，那么旁边的另外一个几乎同样大的意大利半岛西侧的撒丁岛则一直就比较稳定地被腓尼基人占领，所以到这个地区寻找腓尼基文化是比较放心的。

2000年新华社罗马10月20日电 记者刘儒庭报道：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考古队在撒丁岛的诺拉市发现了公元前7世纪的腓尼基村落遗迹。考古队负责人雅科波·波内托20日在帕多瓦介绍说，考古队在诺拉市神庙附近仅挖了半米深即发现一些墙基，向深处挖掘后发现大量商店和民房遗迹。这些建筑用卵石、黏土、未经烧制的砖等建成，房间内的地面为夯实的黏土。考古队在这些建筑物内发现了大量伊特拉斯坎、希腊、腓尼基式陶罐等容器以及一百五十多具大理石石棺。据初步考证，这一村落大约建于公元前7世纪，村落规模很大，居民在1500人左右。

记者同时还介绍说：“腓尼基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前20世纪就建立了奴隶制城邦。公元前10世纪前后，这个民族的活动范围已达到了今天的塞浦路斯、撒丁岛、法国、

▲ 2300 年前的塞浦路斯人

西班牙和北部非洲等地。”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国，位于土耳其以南。至少在公元前 800 年腓尼基人就在此定居，后来相继被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埃及人、罗马人占领。拜占庭从 公元 395 年到 1191 年统治该地，并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被英格兰理查德一世占领。1489 年被威尼斯兼并。1571 年被土耳其征服。1914 年大不列颠宣布拥有其统治权。1960 年塞浦路斯独立。尼科西亚是其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人口为 642731 人。

现在塞浦路斯的居民主要分为两大人群：土耳其人与希腊人。

马耳他也是个不能忽视的小岛。它由两个小岛组成，是个只有 316 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但是这里从古到今都是风云之地，因为它处在地中海东西方的交界处。

从历史上看，这个地方具有浓厚的腓尼基人文化色彩，看看今天它的居民成分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从此可以了解昨天

腓尼基人由哪些人组成。

该岛人口主要组成为阿拉伯人、西西里人、(法国)诺曼底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英国人。当地人说英语和一种带有闪族特点的马耳他语,也有很多人说意大利语。所有人信仰罗马天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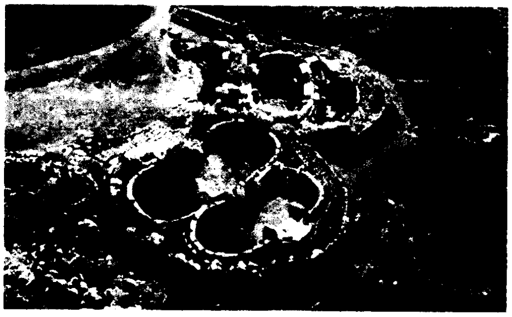
历史上马耳他曾经最先被腓尼基人占领,后来是希腊人,再后来是迦太基人,最后是罗马人。后来阿拉伯人、诺曼底人、土耳其人,最后是拿破仑,在该岛上他们各领风骚。19世纪初期英国人驱逐了法国人使这里成为英国殖民地,其实反过来说当初这里的居民在英国开辟殖民地也是合乎逻辑的,它们之间的通道是独特的大海。从历史上看,越是海洋民族足迹越远,无论是腓尼基人还是英国人都印证了这一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提升了马岛的战略地位,这里成为蒸汽船到印度与东亚的装煤加运站。我们是否也应该相信,在西奈半岛被泡在水里的新石器时代这里曾经成为那个时代繁忙的“加运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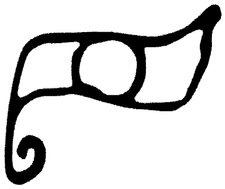
二战中间,这里是德国与意大利轰炸最为彻底的一个区域。

上个世纪该岛获得独立,成为一个宪政国家。

科西嘉岛距离海岸193公里,在法国东南,岛面积为8480平方公里,是地中海群岛中第四大岛,居民约55万人。在葱翠高山和湛蓝大海之间科西嘉岛为一绝佳度假胜地。科西嘉岛与其他几个岛屿一样充满了动荡,这里最先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曾经被罗马人占据,然后又被比萨与热那亚共和国占领,1769年又成为法国领土,这一状态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个岛屿不仅产生了著名的政治人物拿破仑,而且产生了许多航海家与地图制作者,其中不乏阿拉伯人。



▲具有5000年历史的巨石神庙耸立在马耳他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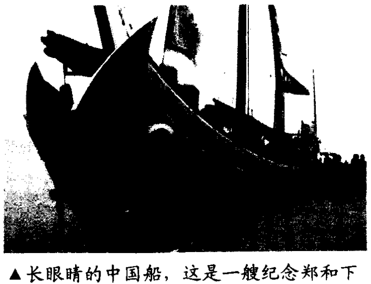
腓尼基眼与龙目

在 2004 年的电视节目中我看到一个奇特的场面，在一个隆重的纪念古代航海事业的下船仪式上，那艘明显是新建的木船在船头上描绘着一只大大的眼睛，并且是类似人的眼睛。这马上引起了我的警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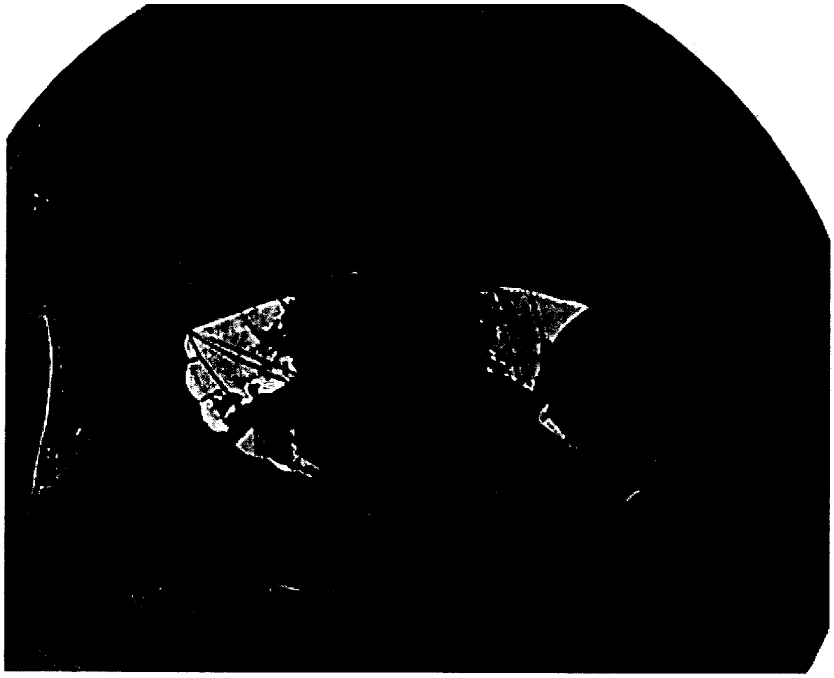
船怎么会长眼？凡是民间奇特之事必有古怪起源。

我印象中曾经看到过古罗马的船上也有眼睛，假如遥远两地有同样不同寻常的风俗就意味着某些同源可能。当然孤证不能成立，但是我相信到今天我给出的远远不是“孤证”，剩余的只是对一个人想象力和开放度的挑战。

由于在《锁定红海》中我已经留意到中国文化与地中海可能具有的神秘联系，所以我特别期盼在地中海找到类似眼睛长在船上的古迹，而不仅仅是个“印象”。其实，这本书就是因为这神奇的“大眼睛”引我到地中海去的，正是这“大眼睛”引导我把目光从中国转向了海上民族腓尼基人。我最后真的找到了古罗马浅浮雕，那些战船上果然长着一样的“大眼睛”，我回头再来找中国船舶的“眼睛”资料已比比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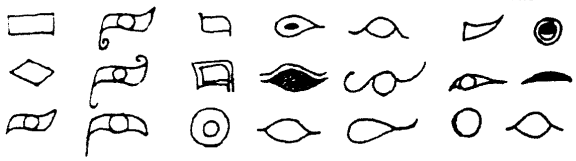
▲长眼睛的中国船，这是一艘纪念郑和下西洋的船只。请注意本书中所有挑选的船只几乎都带有“眼睛”，而它们所分布的地区与时间却是上至古罗马时期晚到今天的中国。



▲地中海北岸陶片里的帆船，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船只上的眼睛叫“腓尼基之眼”，只要是腓尼基人长期居住过的地方都可以找到类似船只，尤其是意大利与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附近。这种眼睛也叫“恶眼”(evil eye)，曾经装在战船上用来吓唬敌人，给敌人造成心理上的恐惧，意谓被“恶眼”看见就有不幸降临。

我查到，中国传统渔船上的大眼睛实际上叫“龙眼”。而西方长“眼睛”的船远远不是古罗马人才有，所有腓尼基人的古船上都会装饰这样一只眼，所以至今这样的“船眼”就被称呼为“腓尼基眼”。而且这个“腓尼基眼”还不仅仅出现在船上，它到处都有，今天许多首饰上都有这个痕迹。这个风俗或许可以延推到古埃及的“何露丝之眼”，当然两河流域也早有眼睛崇拜，中国三星堆也有眼睛崇拜。但是更具体地在相同物品相同部位描绘同样的饰物，这个“巧合”目前只在地中海与中国东海、黄海传统中多见。我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断然开始大举搜索腓尼基人的资料，其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温州日报》刊登了一篇记者邱国鹰的文章《黑白分明的渔船眼睛》，下面为节选部分：



▲中国历代龙眼（引自冯乃恩著《古玉鉴藏》）

人有眼睛，动物有眼睛，木质船也有“眼睛”。如今到洞头渔港，还可看到一些木质渔船的船头两侧，安有一对黑白分明的船眼睛。渔民把船眼睛叫做“龙目”。渔民尊“龙”为神灵，把自己的渔船也看作是一条木龙。既然是龙，自然要有眼睛，才能观渔路，绕暗礁，识方向，所以便有了“龙目”。关于“龙目”的由来，有好几种说法，在百岛洞头流传的，主要有两种。

一是鲁班造船斗鲨鱼留下的。传说第一条木船是鲁班师傅制造的。海龙王怕船造成后危及百鱼生命，便派出凶悍的鲨鱼大将军前去阻挠。鲨鱼提出要与鲁班斗法比本领，鲁班答应了。他飞快地削出一对扁圆形木块，涂上墨斗的黑墨水，说：“那就比谁的眼睛厉害吧！我的眼睛，每一只都能钉上三枚大铁钉。”他把这对木眼睛钉在船首两旁，每一只都钉上三枚七寸长的大铁钉。鲨鱼吓坏了，急忙逃回大海。从此所有的木船便都安上了眼睛①。

二是渔夫救神鱼得灵眼演变过来的。传说渔夫无意中救了神鱼，神鱼用自己的泪水给他擦眼，他竟然能看到海内的鱼虾，十分灵验。渔夫靠了这双灵眼，每一次都满载而归。狠心的渔财主几次收买渔夫都碰了壁，派人在月黑夜把他杀害了。打鱼伙伴们垒石为他筑坟建祠，并依照他的梦示，用木块仿照他眼睛模样安在渔船两边，竟也有同样的奇效，因而一直沿袭下来。

▲这是一艘欧洲船，有人认为欧洲国家，尤其是在大多数的天主教国家里，大多数的船只上画的眼睛是古埃及的“何露丝之眼”。据说这个传统可以保佑船只在航海中的安全。或许腓尼基之眼正是从“何露丝之眼”而来。

渔船有了眼睛，就能辨识方向追捕鱼群，确保生产平安。

船眼睛的制作很有讲究。首先，要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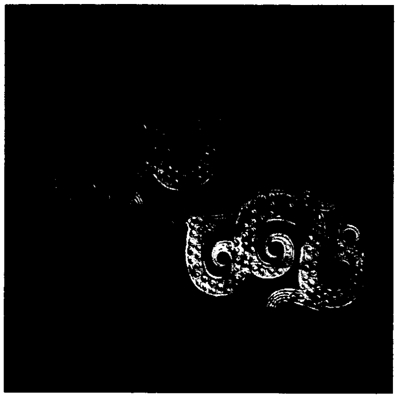
① [illegible]（Lebanon）[illegible]一直很发达。

用上好的木料，大多为樟木；其次是比例严格，船眼睛的大小即直径与船体“龙骨”的长度成特定比例，而船眼睛的眼珠与眼白又有适当的比例，后者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再次是眼珠和眼白的位置。不同的船也有区别。打鱼的渔船，鱼眼睛的眼白在上，眼珠朝下，这样便能直视海底，观察到鱼虾行踪；运货、收购鱼虾的船，船眼睛的眼珠朝前，眼白在后，便于船只盯准进港目标，不致迷失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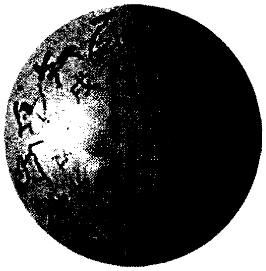
钉船眼睛要举行仪式。钉船眼睛的钉子数量，一般为三枚。后来船造得大了，大船的眼睛也有钉五枚钉子的。但不论是三枚还是五枚，其中有一枚叫“圣钉”，是关键性的一枚。圣，在闽南语里是灵验、有求必应的意思，这枚“圣钉”，寄托着渔民出海保平安夺丰产的心愿。它安钉的位置也很特殊：渔船钉在船眼睛靠下近海的部位，其他的船钉在船眼睛靠前方的位置。安钉时，一定要选吉日良辰，在潮水上涨时进行。到时船主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造船师傅安上圣钉，再用红布把船眼睛蒙住，待到新船下水时再开启。

当今的渔船大多为大马力钢质渔轮，渔轮的船首，刷印的是鲜明的船号。至于船眼睛这一习俗，只在小型的木质渔船上保存着。

以上的新闻报道里处处透露出远古的信息。由于渔民把木船当作“木龙”，实际上当我们中国人说“龙的传人”时，暗示出了中国人曾经的海上民族的身份。我的意思是，所谓“龙的传人”这一称呼很可能与“三代”时期有关，至少在商晚期龙的符号或图形已经大量出现于各种器皿上，比如司母戊大鼎上的动物实际上就是“龙”。


▲东周玉龙

▲大约六、七千年前伊拉克北部有蛇的陶片



中国船上的十二生肖

有关中国的船文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需要讨论。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中国22个“天干地支”与腓尼基的22个字母以及与商人甲骨文之间可能有联系，在腓尼基人最擅长的生产生活工具船舶之上我们再次与它们迎面相遇。天干有10，地支12，合而为22。12地支有没有可能与12生肖有关?

邱国鹰在2004年12月4日《温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船上的“动物世界”》，节选如下：

到洞头县①的渔村岙口走走，会听到一句顺口溜：“奇巧真奇巧，木船用火烤，划舟靠双脚，动物满船跑。”

在海滩，常看到渔民把木质渔船斜倾，然后在船底燃起熊熊大火。这时你大可不必呼喊“救火”，这是在为渔船“美容”呢！渔船在海上行驶时间长了，船底部会附生牡蛎等贝类，不仅影响航速，还会损毁船体，所以用火烧。

至于说到“动物满船跑”，那就得费一番口舌了。海是“龙”的世界，“龙王”统辖虾兵蟹将，是以海为生的渔民们心中的神灵。渔民把渔船幻化成一条木龙，船上不少部位以龙命名。渔船底脊最粗长的木料叫“龙骨”，这是全船关键处，犹如人的脊梁骨。龙骨接近船首处使之上翘的连接部位叫“龙

① 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为[illegible]之上[illegible]

根”，又因其位处船头，也有叫“头龙根”的。船头两根直竖的木条叫“龙须”，船板贴封其上，船首便更加硬挺坚固。船头两侧还钉有一双黑白分明的船眼睛，俗称“龙目”，以利眼观八方。作为民族图腾的龙，在渔民心中既是神圣的，又是具体的。

除了龙，渔船上的渔具还有不少以十二生肖命名。“鼠桥”：用以稳固船桅的楔木，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牛”：船桅系风向标的绳索；“虎尾”：船尾部与龙骨的交接部；“蛇索”：网具底部在涂泥上拖的粗绳，形如蟒蛇，闽南语又俗称“路蛇”；“车马”：收放船锚的转盘。闽南语锚的读音为“碇”①，渔谚有“船无碇，人无命”一说。木质渔船放碇收碇靠人力，推着转盘似马、牛推磨，故有此名，也有的地方称其为“拖牛车”的；“羊头”：打鱼绳的用具；“猴头”：升降篷帆用的滑轮，喻其作用如灵巧的猴子；“狗腿”：为强化船体的硬度和拉力，在渔船后部加上的一根长木料，使船体后部呈上翘的形状；“鸡旗”：船桅的风向标用木料雕成公鸡模样，三角形的风向旗挂在鸡尾，所以俗称鸡旗。有些船的风向标雕的是龙头或乌鸦，就叫做龙头旗或乌鸦旗了。

船上的部位以动物命名但不属于十二生肖的有：船老大掌舵处的舵面叫“龟壳”，有坚固耐用的寓意；船前头直竖的几根木桩，用以置放船锚的俗称“鹿角”。另外，不同船型对渔具的叫法也略有差异，如从事钓鱼的船只，把放绲绳时掌握长度的绳索叫“鼠尾”；木帆船上也有把船首为加强船的拉力使之微翘的用材叫做“牛腿”的。而在舟山等渔区，虽然对渔具也以十二生肖命名，却因习俗和语音的不同而大不一样。他们把固定桅杆的插销叫“老鼠尾巴”，老大掌舵的舱叫“猴（后）八尺”，升降篷帆的滑轮叫“钩（狗）螺”，船舵露出水面的部分叫“雄鸡头”等。

上面谈到的这些名称一般用于木质渔船，如今许多渔民已改用铁质渔轮，除了少数渔具的俗名还保留之外，其余大多不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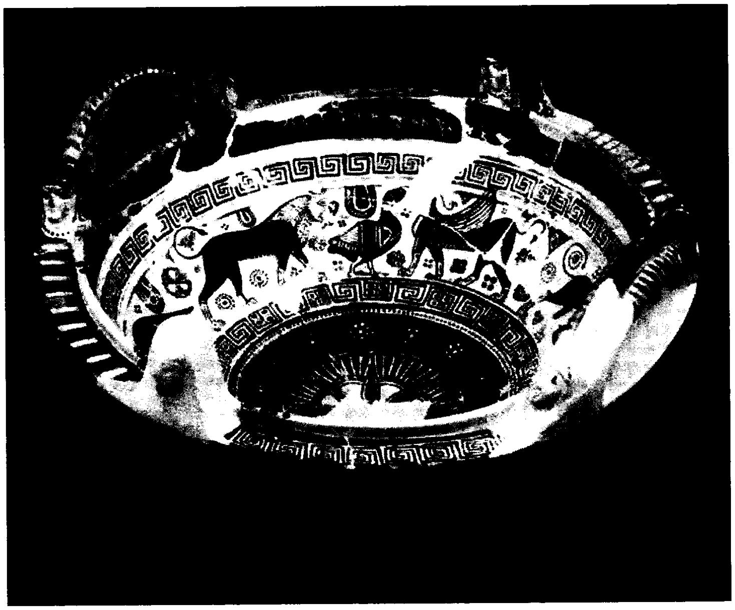
十二生肖与天干的对应如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西方十二星座：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

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

十二生肖与十二天干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它们与西方的十二星座之间是否有继承关系？这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很愿意推测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生肖排序是腓尼基人在中国参与商朝建设时的产物，推理证据是这个序列以“子”为始。假如按照后来中国人的概念应该从“龙”始，然后是“小龙”之“蛇”，接下去是贵族才能使用的“马”，以及神圣的“羊”，因为后来中国人以“龙”为皇室象征。但在目前遗留下来的序列中商朝的“子”姓却为首，而中国又没有以“鼠”为荣的习惯，除了“鼠”随“子”贵一时还想不出来什么别的原由。另外，我考虑这是否是两种外语的一种双语对应，比如，“鼠”在另外一个体系中读“子”，“牛”在另外一个语系中读“丑”，“寅”就是“老虎”等以此类推，试错于一些古老语种或许有出路，当然首先是排查腓尼基以及腓尼基衍生出来的近亲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南阿语等。



▲ 2800 年前的希腊陶盆，上面的“回”形装饰纹也是中国传统中经常使用的。

《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人

《希腊神话》与《圣经》一样，都不是历史书籍，但它们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既然我们对于史前史没有其他的文献可以借鉴，那么参考这些文献就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希腊神话》确实并非仅仅是虚构。比如德国谢尔曼就以《希腊神话》为根据在考古发掘中证明了特洛伊大战并非空穴来风。

特洛伊城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这个古城在大约3000年前被希腊人因为夺妻之恨而毁灭，“木马计”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情节。黎巴嫩这个腓尼基人的大本营距离土耳其不远，部分腓尼基人因是特洛伊人而参加了这场大战。目前无法判断整个特洛伊人是何民族，但有人认为特洛伊人就是腓尼基人①。

《希腊神话》中存在着大量的腓尼基人，他们生活在爱琴海两岸，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在希腊本土获得发展。正是他们把文字带进希腊，大家公认希腊字母从腓尼基文字演化而来。文字是腓尼基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大文明贡献——此时再一次想起中国甲骨文的突然出现，以及甲骨文与腓尼基文字的一支“南阿”的接近，我们或许不仅要说腓尼基文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要说腓尼基人是具有语言文字天赋的一群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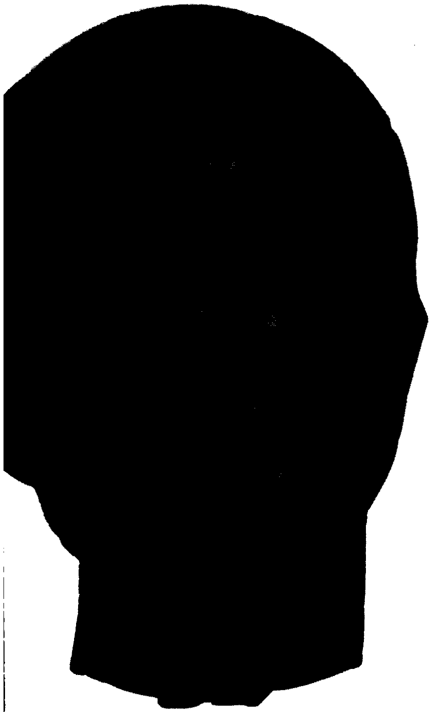
① 详见后文《巨人，泰坦巨人和腓尼基人》。

提及《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人起源，首先从其中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①说起。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大家早已熟知，但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全新的陌生角度去寻找新的发现：

卡德摩斯（Cadmus，也有翻译为“卡达玛斯”）是腓尼基国王阿革诺耳的儿子，欧罗巴的哥哥。宙斯带走欧罗巴后，国王阿革诺耳痛苦万分，他派卡德摩斯和其他三个儿子外出寻找，并告诉他们，找不到妹妹不准回来。

卡德摩斯出门以后东寻西找，始终打听不到妹妹欧罗巴的消息。无可奈何，他不敢回归故乡，因此请求太阳神福玻斯·阿波罗赐给神谕，告诉该在何处安身。

阿波罗迅即回答说：“你将在一块孤寂的牧场上遇到一头牛，这头牛还没有套上轭具，它会带着你一直往前。当它躺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造一座城市，把它命名为底比斯。”



▲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青年青铜头像

卡德摩斯刚要离开阿波罗赐给他神谕的卡斯泰利阿圣泉，突然，他看到前面绿色的草地上有一头母牛在啃草。他朝着太阳神阿波罗祈祷，表示感谢，随后跟着母牛走去。

母牛领着他蹚过了凯菲索斯浅流，站在岸边不走了。母牛抬起头大声叫着。它又回过头来，看着跟在后面的卡德摩斯和他的随从，然后满意地躺在绿草深软的草地里。卡德摩斯怀着感激之情跪在地上，亲吻着这块陌生的土地。

后来，卡德摩斯想给宙斯呈献一份祭品，于是派出仆人，命他们到活水水源处取水，以供神品饮。

附近有一片古老的森林，林

---

① 参考《希腊神话故事》第27页，第七章“卡德摩斯”。

中石间涌出一股清泉，蜿蜒流转，穿过了层层灌木。泉水晶莹、甜蜜。

在这片森林里隐藏着一条毒龙，紫红的龙冠闪闪发光，眼睛赤红，好像喷射着熊熊的火焰，它身体庞大，口中伸出三条芯子，犹如三叉戟，口中排着三层利齿。

腓尼基的仆人们走进山林，正要把水罐沉入水中打水，蓝色的巨龙突然从洞中伸出脑袋，口中发出一阵可怕的响声。仆人们吓得连水罐都从手中滑落了，浑身的血液像是凝固了一般。毒龙把它多鳞的身体盘成一团，然后蜷曲着身子往前耸动，高昂着头，凶狠地俯视着树林。最后，它终于朝腓尼基人冲了过来，把他们冲得七零八落，有的被咬死，有的被它缠住勒死，有的被它喷出的臭气窒息而死，剩下的人也被毒涎毒死。

卡德摩斯想不出为什么他的仆人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最后，他决定亲自去寻找他们。

卡德摩斯进入树林时看见一大堆尸体，全是他的仆人。他也看到恶龙得胜似的吐出血红的芯子，舔着遍地的尸体。“可怜的朋友们啊！”卡德摩斯痛苦万分地叫了起来，“我要为你们复仇，否则就跟你们死在一起！”说着，他抓起一块大石头朝着巨龙投去。这样大的石头，连城墙和塔楼都能打穿砸塌，可是毒龙竟无动于衷，它坚硬的厚皮和鳞壳保护着它，如同铁甲。卡德摩斯又狠狠地扔去一杆标枪，枪尖深深地刺入恶龙的内脏。巨龙狂暴地转过头来咬下背上的标枪，又用身体将它压碎。卡德摩斯无畏的行动激怒了恶龙，它的咽喉迅速地膨胀开来，喷吐着剧毒的白沫，它像箭似的冲来，卡德摩斯连忙后退了一步，用狮皮裹住身体，用长矛刺进龙口，恶龙的牙齿纷纷掉落。终于恶龙的脖子里流出了血水。卡德摩斯越斗越勇。最后，他提着宝剑，看准机会，一剑朝恶龙的脖颈刺去，把恶龙紧紧钉在树身上，恶龙被制服了。

卡德摩斯久久地凝视着被刺死的恶龙，当他离开时，只见帕拉斯·雅典娜站在他的身旁，命令他把龙的牙齿播种在松软的泥土里，说这是未来种族的种子。卡德摩斯听从女神的话，他在地上凿开了一条宽阔的沟，然后把龙的牙齿慢慢地撒入土内。突然，泥土下面开始活动起来，卡德摩斯首先看到一杆长矛的枪尖露了出来，然后又看到土里冒出了一顶武士头盔。整片树林在晃动。不久，泥土下面又露出了肩膀、胸脯和四肢，

最后一个全副武装的武士从土里站起来。不一会，地下长出了一整队武士。

卡德摩斯吃了一惊，他准备投入新的战斗。可是泥土中生出的一个武士对他喊道：“别拿武器反对我们，千万别参加我们兄弟之间的战争！”他一边说，一边抽出剑对准刚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一位兄弟狠狠地挥去，而他自己又被别人用标枪刺倒在地。一时间，他们厮杀起来，杀得难解难分。大地母亲吞饮着她所生的第一批儿子的鲜血。最后只剩下五个人，其中一人，后来取名为厄喀翁，他首先响应雅典娜的建议，放下武器，愿意和解，其他的人也同意了①。

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在五位士兵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座新城市。根据太阳神的旨意，卡德摩斯把这座城市叫做底比斯②。诸神为嘉奖卡德摩斯，便把美丽的姑娘哈墨尼亚嫁给他为妻，并参加了婚礼，还送了不少礼物。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即哈墨尼亚的母亲，送了一根贵重的项链和一条做工精致的丝面纱。

卡德摩斯和哈墨尼亚生了女儿塞墨勒。宙斯对塞墨勒十分爱慕，就诱惑了这个腓尼基姑娘。由于受到赫拉的迷惑，塞墨勒要求宙斯显露一下神的威仪。宙斯答应满足姑娘的要求，便驾着雷电，走近姑娘。塞墨勒忍受不住雷电，临死前给宙斯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狄俄尼索斯，又叫巴克科斯，他就是酒神。据说酒神在印度长大，在《锁定红海》中我推测过“酒神”可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山鬼”，宙斯很可能是中国的玉皇大帝。宙斯与塞墨勒这个片段很可能也是中国大禹与涂山氏的故事变种，所以“玉皇”很可能也是“禹皇”。如此看来，“山鬼”与“禹”之后代都是有腓尼基人血统的。

宙斯把狄俄尼索斯交给塞墨勒的妹妹伊诺抚养。后来，伊诺带着另一个儿子墨里凯耳特斯为躲避丈夫阿塔玛斯的追杀，不幸失足落海。母子两人被波塞冬救起，他们就当了救助落难人的海神。从此以后，伊诺称作洛宇科忒阿，她的儿子称作帕勒蒙。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信息是，母子俩海神是腓尼基人后代，因为他们是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的根脉。

后来，卡德摩斯和哈墨尼亚年事已高，为子女们的不幸感

---

① 难道这是中国“五帝”传说的另外一个起源?

② 这个底比斯在希腊，不是古埃及的都城。

到哀伤，于是双双前往伊里利亚。最后变作两条大蛇（也就是中国的龙），死后进了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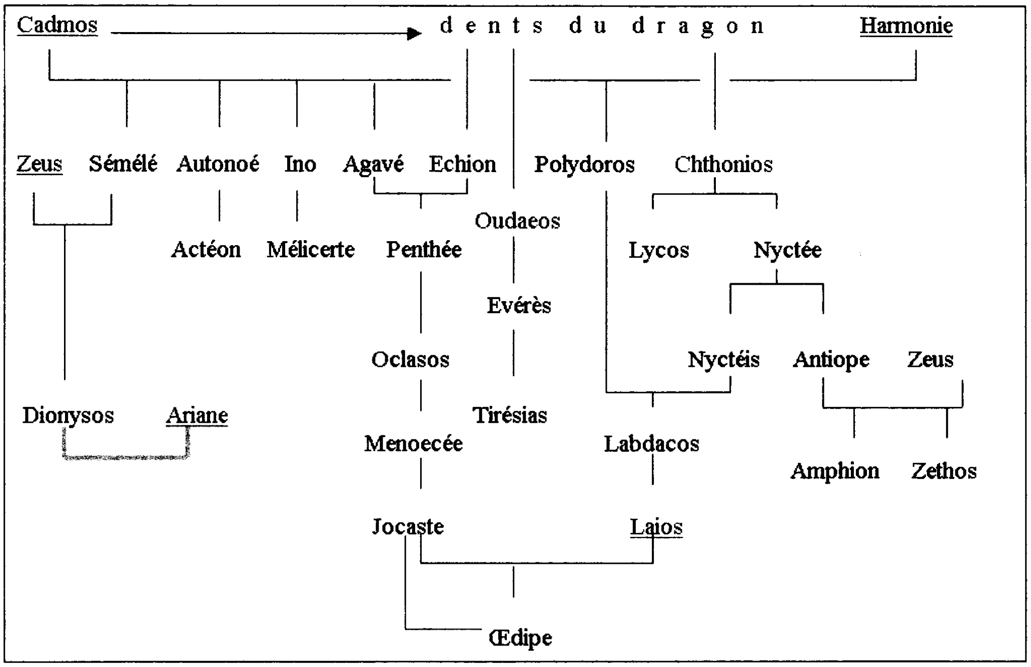
腓尼基人的祖先变为“大蛇”符合中国人对于祖先和帝王的传统意象。腓尼基人在古代自称为“龙的传人”，很可能就与以上的“龙种”故事有关。中国人以为只有自己才是“龙的传人”，这是眼界封闭的表现。同时以上这个故事也符合中国人的一个思维：龙、蛇同源。卡德摩斯是腓尼基人，他死后变为蛇，跟随卡德摩斯建设底比斯的五位腓尼基人祖先从龙种而来。

几乎世界上是每个地方都有“龙”的传说，《圣经》以及《希腊神话》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闭目塞听的一些中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龙的真正“主人”。也可以说，中国史前史的谬误多半就是因为眼光狭小所致。

从全世界看，龙这种怪物在造型上演化为东西方两种，西方造型多似《圣经》与《希腊神话》中的龙，它们短粗而暴躁凶狠，一般身上带翼，可飞，多居住在山洞；东方的龙经常是善兽，长而有鳞，无翼，与蛇同类，甚至龙与蛇经常就是一回事，经常有皇帝自称为“龙”。西方的龙更像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

种植龙牙而产生一个种族的故事衍生出腓尼基人是“龙的传人”这个线索之外，“龙牙”作为文明的象征文字或字母，这一点已经有人在研究讨论它的根源。不过中国方面却没有相应的“龙牙”与“文字”之间的象征痕迹。或许观察一些恐龙的牙齿数目，多在20颗左右，这是不是牙齿对应字母的一个象征？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古代传说中的龙其原形是不是恐龙（假如参考当然也是恐龙的化石了）。或许3000年前真有一些类似以上描述的“龙”存在，或许只是参考了巨蜥类动物而已。

这则短短的神话片段中包含了丰富的暗喻。腓尼基王子所建立的城市在希腊，但是他却把自己的城市叫“底比斯”，底比斯却是个著名的古埃及首都，它恰是腓尼基文化在埃及最集中体现的一个地方。从红海到地中海的中转站就设立在埃及的底比斯。作为一个腓尼基人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城市如此命名，显然是对于故土的一种纪念。腓尼基人四海为家，除了黎巴嫩地区，古埃及恐怕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第二故乡，现在又加上了


Cadmos
dents du dragon
Harmonie
Zeus
Sémélé
Autonoé
Ino
Agavé
Echion
Polydoros
Chthonios
Oudaeos
Actéon
Mélicerte
Penthée
Lycos
Nyctée
Evérès
Oclasos
Nyctéis
Antiope
Zeus
Dionysos
Ariane
Tirésias
Menoecée
Labdacos
Amphion
Zethos
Jocaste
Laios
Œdipe

▲卡德摩斯及龙牙后代族谱图

爱琴海两岸，否则《希腊神话》中腓尼基人就不会占那么大的比重了。

从《希腊神话》追寻卡德摩斯的家族根源，其父名为阿革诺耳。其祖父是特洛伊战争中著名的元老安忒诺尔，他以理性、明智而著称，是地位很高的元老——他有权召开元老会，曾经主张把海伦归还希腊人，但特洛伊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位老人不仅在战斗中失去了几个儿子，而且在特洛伊被毁时遭到杀害。安忒诺尔看来不止一位妻子，其中一个是雅典娜在特洛伊的女祭司特阿诺，另外一位是上面这个根系的母亲：伊庇玛达斯。

安忒诺尔的儿子伊斐达玛斯被阿伽门农杀死。我们还从神话中得知，安忒诺尔的大儿子叫科翁，他在为弟弟报仇时同样被阿伽门农杀死。看来安忒诺尔有许多儿子。

希腊神话中有关腓尼基人的故事很多，比如著名的忒修斯王子也是腓尼基人的后代。

希罗多德笔下的腓尼基人

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有一位司马迁式的人物，他就是希罗多德（Herodotus，大约公元前485年~公元前425年）。

在谈到希腊文字的产生时希罗多德提到一个生活在雅典的外国部落，希腊文字是从他们那里发展出来的。这个部落信仰一些奇怪的神灵，部落名字是Gephyraean。这些人自称来自一个叫Eretria的地方，但希罗多德认为他们来自一个叫做Boeotia①的腓尼基人群体，他推测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底比斯人，即卡德摩斯的后人（Cadmean）；他们后来被一个希腊部落（Argives）驱逐，聚集在Tanagra的郊外，那是分配给他们可以居留的地方。最后他们又辗转来到雅典，尽管有些雅典人的仪式不允许他们参加，但最后还是允许这群人作为雅典市民存在。

目前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Eretria实际上有可能就是我们熟知的“厄立特里亚”，属于古代“萨巴王国”，而且，古代红海的名字也叫“Eretria”。现在遗传分子学已经证明红海这一带的人与地中海撒丁岛、西西里岛等人群有关，尽管他们面貌上并不接近。我想他们当年依据的方便条件就是大海，只要是有海的地方他们就可以生存。

大概由于希腊神话的影响，“卡德摩斯”已经被作为一支腓尼基人的代名词。

① 有译“皮奥夏”、“比奥夏”或“维奥蒂亚”，在希腊中东部。

希罗多德继续说：这些从亚洲而来的卡德摩斯人带来了许多当时希腊人还不知晓的技艺与文明，包括腓尼基字母。但这些文字无论声音还是字形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最先与这些腓尼基人生活在一起的是爱奥尼亚人（Ionians），即便他们把字母改进了许多，但一直还是把这些字母称作"Phoenician"（腓尼基文字），同时他们也把这些字叫做"皮子"（skin），因为人们喜欢把字写在羊皮上。

他说：我看到过卡德摩斯人写在底比斯太阳神庙上的文字，他们刻在一些三脚架（tripod）上。他们的文字大多数与爱奥尼亚人的字母都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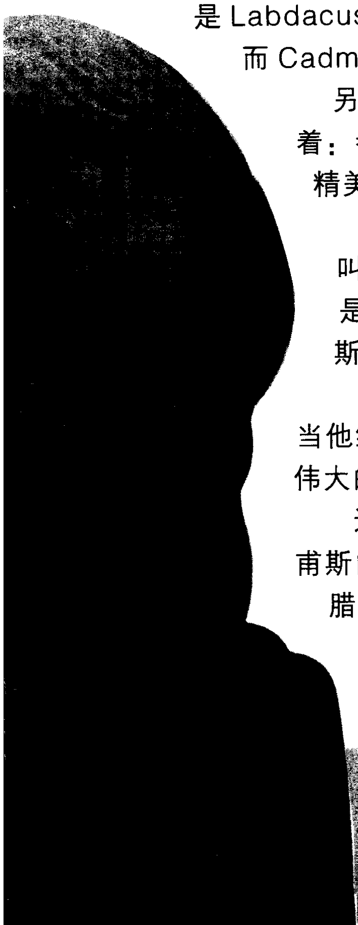
在其中一个三脚架上写着"底比斯王 Amphitryon 把他自己奉献给我"。这些文字应该是拉伊俄斯（Laius①）时代传下来的。著名的俄狄甫斯（Oedipus）是 Laius 的儿子，Laius 是 Labdacus 的儿子，Labdacus 是 Polydorus 的孙子，而 Cadmus（卡德摩斯）就是 Polydorus 之父。

另外一只三脚桌上以六步格②的诗歌形式写着：拳师 Scaeus 在竞赛中获得胜利，特敬献此精美之物给神。

希罗多德考证后认为，Scaeus 是一位名叫"Hippocoon"的男人的儿子，假如他真是这件物品的捐献者那么他就应该是俄狄甫斯时代的人。

第三个三脚桌上依然以六步格形式写着：当他统治之时，Laodamas 把这精美之物贡献给伟大的太阳神阿波罗。

这个 Laodamus 是 Eteocles③的儿子，俄狄甫斯的孙子。在他统治之时，卡德摩斯人受到希腊人的驱逐，他们来到一个名叫"Encheleis"的地方。Gephyraeans 部落就是他们剩下的那些人，最后又流落到雅典，就如上



▲希罗多德实际上是小亚细亚半岛人

① 俄狄甫斯（Oedipus）之父，后被儿子所杀。

② Hexameter，六步格，每个"步格"有三个音节，[illegible]

③ 在《[illegible]》中[illegible]

面所说的那样。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崇拜，雅典人从来都不参与，比如神秘的农业与生殖崇拜的 Achaean Demeter 神①。

谁是卡德摩斯？Cadmus 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 “ 从东方来的人 ” ，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根源在希腊以东的地方，或许是中东，或许应该是亚洲人。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腓尼基语，而腓尼基(Phoenicia)的意思在希腊语中也可以是 “ 凤凰(Phoenix)之地 ” ， “ 太阳升起的地方 ” 。尽管我们不能说腓尼基人来自中国，但中国正在 “ 东方 ” ， “ 太阳升起的地方 ” ，并且，中国自古就是 “ 凤凰 ” 的崇拜之地。龙、凤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图腾，可以说中国是龙凤的故乡。尤其就这两个方面而言，中国人与腓尼基人高度一致：龙的传人，凤凰的崇拜者。我当然不会认为中国就是腓尼基的发源地，但我并不想绝对排除这个可能，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三千多年前的腓尼基文化肯定对中国有过影响。至于在迦南人形成之前中国人与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没有充分的资料去谈。也就是说，大约 5000 年前迦南人与中国是什么关系我完全还没有涉及。

一般认为希罗多德说的 Gephyraeans 部落来自今天的叙利亚。不过这个情况也暗示我们，这些人与东亚的联系通道可能并不止于海上，他们可以经由陆地进入到中国。中国西北地区一直是欧罗巴人活动的区域，这一地区一直到 2000 年前都有白人存在，并且对于接近甘肃与新疆接壤处的楼兰地区的基因测试表明，其中部分居民的确来自地中海。叙利亚与中国西域的交流就更是方便，比如景教就是从叙利亚传入中国的。腓尼基人既然能向西远行，就一定也有向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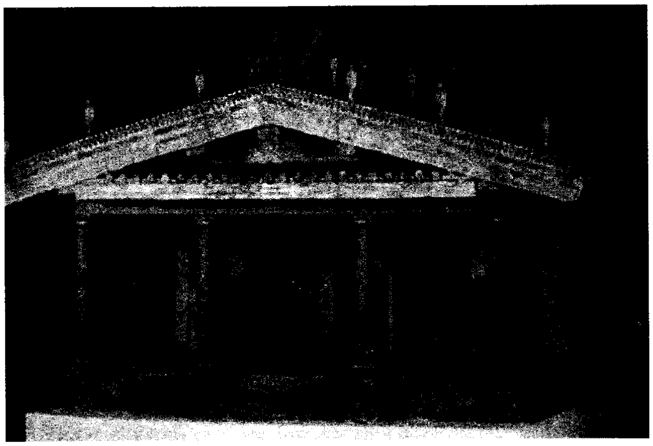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自从 4800 年前，腓尼基人的祖先就居住在耶路撒冷、乌尔城、以色列北部的米吉多 (Megiddo) 以及其他近东的一些城市中。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受到埃及的高度影响，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青铜器时代结束的公元前 12 世纪，也就在大约此时特洛伊战争 (the Trojan War) 爆发。这个发展脉络非常符合中国区域内的文化现象，越到 “ 三代 ” 晚期中国内地混合的埃及文明色彩越明显，包括甲骨文的特征，更是如此。

当希腊人称呼这批人为 “Phoenician” 的时候，希伯来人则更多称呼他们为 “Canaanite” 。我的一个猜想是，这批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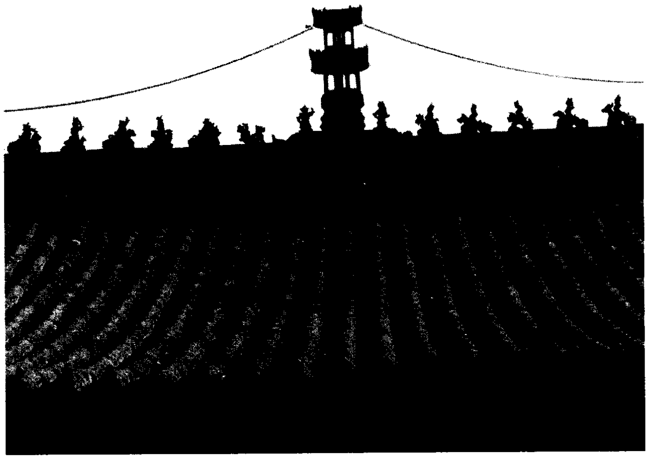
① 有人怀疑这个神实际上就是埃及的 Isis 神。

大约四千多年前，混合了大量的东方人，善水的东亚人。他们以商贸的游走惯性把文字传播到了全世界。尽管从甲骨文到原始迦南文字看，似乎是中国甲骨文继承了迦南文字（中间经过了腓尼基文字与“南阿”文字的过渡），但实际上，假如我们可以证实这批人确实存在于东亚和中东之间，那么我们同样不能拒绝这样一个推论：迦南文字的上线，甚至古埃及象形文字，也应该受到过东亚的影响。因为目前所看到的文字符号系统，处于中国河南省贾湖的文字符号与迦南文字是有关联的。而贾湖文化从目前看早于迦南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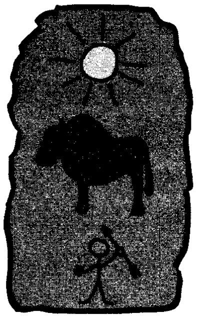
有篇文字说：腓尼基人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海上民族，并且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们在地中海上疯狂扩展殖民地。在殖民过程中，无论是贸易还是海盗活动中他们最大的劲敌都是希腊人，后来是罗马人。这个对峙持续了大约1000年。假如我们把公元前1500年视为腓尼基文明的顶峰时期，那么再来考虑此时他们对于中国商朝的影响就有了根据。这里提到的鼎盛时期恰好覆盖了中国的后商一直到战国时期。



▲地中海东北地区的神庙上经常放置神像，此庙在土耳其。



▲中国河南淮阳太昊陵里的庙宇上站着28个星宿神仙　苏三／拍摄



一位神学家笔下的腓尼基人

大约2000年前有一位神学家Apollodorus，他生活在地中海北岸，据说他是位罗马人。他在一本名为《藏书室》(THE LIBRARY)的书中说到腓尼基人的祖先与起源,某些部分与《希腊神话》重合。这些重合自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影响，但很可能表示了一段真实历史的不同演绎。

[2.1.4] 埃及法老厄帕福斯(Epaphus)与尼罗河的女儿孟菲斯(Memphis)结婚。法老以妻子的名字建立了城市孟菲斯。他们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利比亚”(Libya)，这就是地名“利比亚”的由来。利比亚与海神波塞东结合生下了一对双生子:阿革诺尔(Agenor)和柏拉斯(Belus)。阿革诺尔去到腓尼基并且做了那里的国王，他就是腓尼基人的祖先。

从以上可以看出，腓尼基人的根源在古埃及，或许我们应该说在临近迦南的西奈半岛附近以及红海沿岸才更合适。古埃及恰好跨在红海与地中海之间，这里的文明辐射到欧亚非三地，而传播埃及文明的最得力人选就是早期的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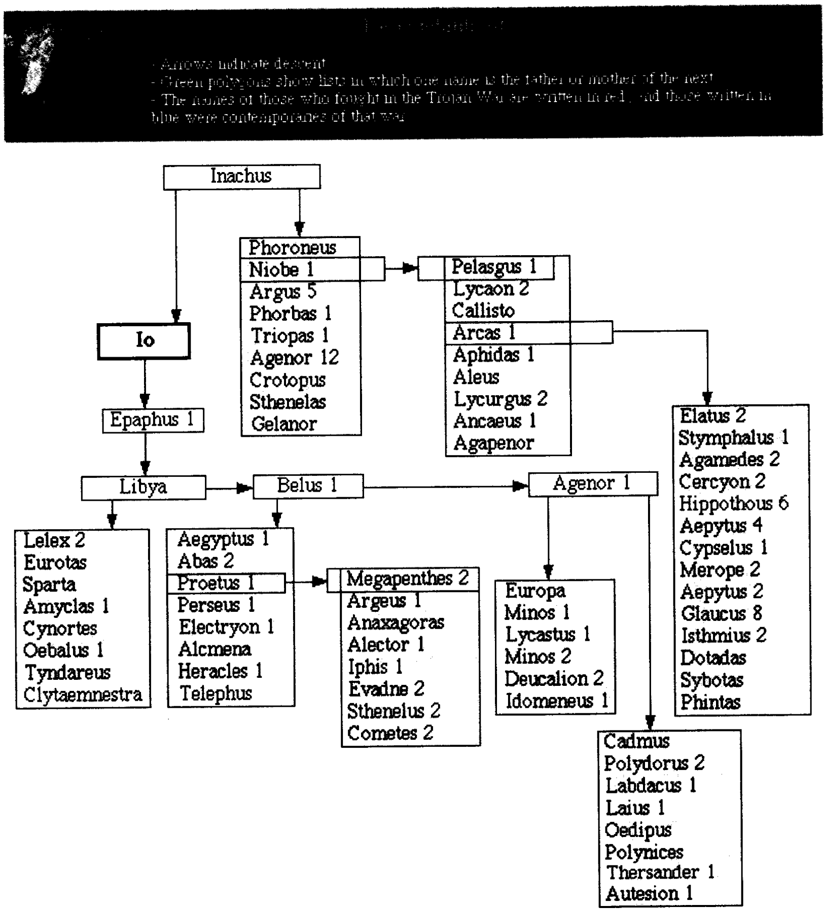
按照古埃及的编年史，在王朝期间第一个以“孟菲斯”为都的是“古王国”，时间为公元前2686年。这个时间比较符合有关迦南人起源的时间。

法老厄帕福斯实际上是个神话人物，他是宙斯与伊娥(Io)的儿子，他曾经一度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曾经又是“萨巴帝国”的一部分。

以上诸多有关腓尼基人的情节，暗示了腓尼基人也是宙斯的后代，或许这合乎我们推测的“宙斯”是中国“玉皇大帝”甚至就是“禹”的逻辑。不过伊娥在希腊神话里是希腊人。她变为母牛后在地上画出一行字，国王父亲认出了她。这说明她的部族是善于文字的。有人说伊娥实际上就是埃及的伊西斯(Isis)，而厄帕福斯就是阿庇斯神。

从《希腊神话》推测，她是后来这三大部族的祖先：普拉比德斯人 (Pelopides，他们后来创造了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特洛伊人、底比斯人。克里特岛与迈锡尼文明都与腓尼基人有些关系。

[3.1.1] 利比亚两个儿子中的柏拉斯统治了整个埃及。阿


- Arrows indicate descent
- Green polygons show lists in which one name is the father or mother of the next
- The names of those who fought in the Trojan War are written in red, and those written in blue were contemporaries of that war
Inachus
Phoroneus
Niobe 1
Argus 5
Phorbas 1
Triopas 1
Agenor 12
Crotopus
Sthenelas
Gelanor
Pelasgus 1
Lycaon 2
Callisto
Arcas 1
Aphidas 1
Aleus
Lycurgus 2
Ancaeus 1
Agapenor
Io
Epaphus 1
Libya
Belus 1
Agenor 1
Elatus 2
Stymphalus 1
Agamedes 2
Cercyon 2
Hippothous 6
Aepytus 4
Cypselus 1
Merope 2
Aepytus 2
Glaucus 8
Isthmius 2
Dotadas
Sybotas
Phintas
Lelex 2
Eurotas
Sparta
Amyclas 1
Cynortes
Oebalus 1
Tyndareus
Clytaemnestra
Aegyptus 1
Abas 2
Proetus 1
Perseus 1
Electryon 1
Alcmena
Heracles 1
Telephus
Megapenthes 2
Argeus 1
Anaxagoras
Alector 1
Iphis 1
Evadne 2
Sthenelus 2
Cometes 2
Europa
Minos 1
Lycastus 1
Minos 2
Deucalion 2
Idomeneus 1
Cadmus
Polydorus 2
Labdacus 1
Laius 1
Oedipus
Polynices
Thersander 1
Autesion 1

▲腓尼基人家族树

革诺尔做了腓尼基人的国王并与特拉帕萨（Telepassa）结合，他们生下女儿欧罗巴（Europa），这就是“欧洲”的由来；他们还有另外三个儿子 Cadmus（卡德摩斯），凤凰（Phoenix）以及西里克斯（Cilix）。也有的说欧罗巴是凤凰的女儿。

从以上的土地分配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占领了最优良的土地。但是其他土地却让腓尼基人去开拓。这无论是一个捕风捉影的演绎，还是一个对腓尼基人的归纳，都说明了腓尼基人必须到处漂泊的宿命。

后来宙斯诱惑了腓尼基人欧罗巴，把她驮到希腊附近的克里特岛，在那里生下三个儿子：米诺斯（Minos），萨耳波东（Sarpedon）和拉德曼提斯（Rhadamanthys）。荷马认为萨耳波东是宙斯与 Laodamia 生下的孩子。

假如还不能说这就是准确的历史，起码我们可以说米诺斯与拉德曼提斯所处的小亚细亚半岛都具有腓尼基文化色彩，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一位腓尼基公主。

无论是伊娥还是欧罗巴都不仅与宙斯结合，而她们俩都曾经化为牛，宙斯自己也曾经转化为小牛。这些都为腓尼基人祖先的“牛”图腾打下了基础。意大利半岛的人们长期有头上长角的英雄形象。中国在神话传说中也有一个著名的以牛为首的民族以及民族英雄，这就是“蚩尤”，假如我们是在“破案”，没有理由不把“蚩尤”当作一个腓尼基人组合的商朝人物来试错。这个人物多被认为生活在接近山东的中国东北附近出没，后来向南败退，与南越杂居在中国南部地区。

阿革诺尔派遣他的儿子出去寻找欧罗巴，让他们找不着就别回家。母亲特拉帕萨也与他们一起出发了。波塞东的另外一个儿子塞色斯（Thasus）也去了。因为始终没有找到欧罗巴，所以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家而是在世界各地安家。凤凰就落脚在地中海东岸腓尼基（Phoenicia，估计指黎巴嫩附近）。西里克斯统治了一个离那里不远的地方，在 Pyramus 河边，他称呼这地方为 Cilicia①。卡德摩斯与母亲居住在色雷斯（Thrace②）。而塞色斯则在色雷斯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城市塞色斯。

这可能是一个由历史转化为神话传说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它的一些线索符合考古与历史。迦南人在这个神话里从埃及出发，事实上有可能是西奈半岛附近。他们经过地中海东岸落脚于西亚、中亚和东欧。这支文明队伍没有就此停下他们的脚步，他们中的

▲河南传统房顶上的龙

一部分人可能开始了商业贸易活动，东亚市场展示在他们面前。这个时间大约是4000年前到3000年前。

[3.4.1] 母亲死后，卡德摩斯埋葬了她，然后带领他的人民到希腊古都特尔斐（Delphi），那里后来以太阳崇拜而著称。他想就欧罗巴的事情去请教神谕。神告诉他说，别管欧罗巴了，跟随一个母牛到它躺下来休息的地方建立一个城市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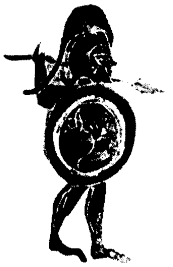
其后神学家所叙述的故事与希腊神话一致，讲述了卡德摩斯与龙搏斗的过程等。

[3.4.2] 因为打死了龙，为了抚慰龙的主人战神阿瑞斯，卡德摩斯不得不敬奉战神整整一年。那时一年等于现在的八年。然后他从雅典娜手中获得了统治权，宙斯则把哈墨尼亚送他为妻，她是爱与美神阿佛罗狄特与战神阿瑞斯的女儿。众神都来祝贺，他们生育了许多孩子。

---

① 西里西亚，在小亚细亚东南部。

② 爱琴海与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



特洛伊等战争中的腓尼基人

以上故事情节中卡德摩斯供奉战神八年后获得统治权，或许象征着经过了八年战争才获得了和平与土地。然后婚礼上的莺歌燕舞则说明了一个短暂的盛世来临。

底比斯是个不幸的城市，在《希腊神话》里我们读到无数的死亡与悲剧都与这个城市相连。

卡德摩斯有腓尼基与埃及的双重文化背景。当他在希腊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底比斯时，就具有了第三重背景：荷林文化——希腊的另外一个称呼。

卡德摩斯出现在欧洲之后，一个比较久远的影响从他这里开创，那就是酒神文化。狄俄尼索斯（Dionysus）产生。这个人物具有印度与埃及背景，实际上就应该清楚，这个时期的腓尼基文化已经开始了海上探险，否则他们与亚洲不能有如此深入的联系。

狄俄尼索斯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既不是单纯的希腊神也不是单纯的埃及人，更不是腓尼基神，而是一个在底比斯新产生的混合物。伴随着这个酒神崇拜历史上还发生了许多血腥迫害。此时我所想到的是中国商纣结束前期的许多残暴，实际上有可能是一种被曲解夸张了的类似酒神崇拜的宗教行为，但从周人的宗教视角来看那便是异端罪恶了。

从希腊神话谱系里我们知道酒神具有腓尼基血统，他是卡德摩斯的外孙。假如中国商朝与腓尼基人有关，我们不能相信中国

商朝会没有酒神崇拜。“酒池肉林”是描述商朝灭亡前夕荒淫生活的一个场景，该场景应该与酒神崇拜有关。中国“山鬼”就是“酒神”。中国人之所以把酒神命名为“山鬼”与一段酒神和一位国王在山林里的残酷斗法可能有关，最后酒神获胜。

腓尼基人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这一个情节，使他们中的一员与赫梯人联姻的可能性增大。在《圣经》中以扫与赫梯女人（推测为中国商人的祖先）简狄（Judie）结合，我推断商朝从他们俩而来。此时恰是在3800年前左右。“以扫”的意思可以是“殷红”。以扫由于受到同胞兄弟雅各（即“以色列”）的驱逐流落到东方，以扫这个希伯来人从逻辑上也属于迦南人和腓尼基人。

特洛伊人战争发生在3200年前左右，持续整整十年时间，很可能影响到世界范围，全球在这个时间发生了许多相关的变化。腓尼基人所在一方在战争中失利，中国在其后大约100年改朝换代成为周人的天下，被怀疑有腓尼基人根源的商朝灭亡。一个猜想是，红海南端的腓尼基人脱离了地中海岸边的腓尼基人，而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新王朝，当然还有其他部族成分的加入。或者我们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一支以色列人来到中国驱逐了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使用的瓶子

从《希腊神话》的十年征战中我们得知当时已经大规模使用战船。最初希腊人到特洛伊去发出警告时说，他们将会聚集1000艘战舰与特洛伊作战。矛、盾这些武器的使用已经非常熟练，并且参战双方都已广泛使用战车。实际上从希腊神话里反映出的文明程度，基本上也就是当时中东核心区域的腓尼基人的文明水平。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希腊人已经有了珍贵的丝绸，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希腊神话》告诉我们这些

美丽的丝绸来自西顿①——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黎巴嫩腓尼基人城市，这里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这是个细小而重要的情节。在三千多年前腓尼基人已经有了丝绸，假如那不是他们生产而是中国人生产的物品的话，更说明了腓尼基人与东亚的联系根本不是从张骞这里开始的，而且一直与中国通商的很可能就是腓尼基人，他们通商的主要目的就是贩卖丝绸。从而腓尼基商人在中国建立商业点最后扩展为一个王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特洛伊十年征战中，众神分为两派支持不同的阵营。这可能反映了希腊人与特洛伊人所代表的亚洲人或腓尼基人当时的不同信仰。站在特洛伊一边的众神除了阿佛洛狄忒以外，还有战神阿瑞斯、太阳神阿波罗和万神之父宙斯。从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这几位神都是腓尼基人祖先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站在特洛伊这边才合乎逻辑。

我相信中国古代一直有一种祭祀仪式叫“浇奠”，即把一些祭品的汤汁浇灌在地下以告慰埋在地下的祖先或神灵，以表示分享。这方面不仅可以从许多中国少数民族的喝酒习惯中得到验证，他们常常将一部分酒洒向天地，而且在家乡我也亲历过类似的习惯。比如每次有好吃的，或是一些传统节日里，我们都必须先给过世的祖先敬献一碗，等他们“享用”完了，我们才可以吃。一旦是带汤汁的食品就必须要把汤汁倒一部分在地上，我父亲说这叫“浇奠”。假如谁偶尔忘记“浇奠”恰好又生病或发生了灾祸，我们还会找出根源说，大概是遗忘“浇奠”得罪神灵了。

在《希腊神话》里应该有同样的习惯。赫克托耳回答他母亲说：“亲爱的母亲，我不要酒，免得我四肢无力。我也不想用一双不洁的手给万神之父举行灌礼。”

这里的“灌礼”实际上就应该是一种“浇奠”。

按照历史学家整理的家谱看，底比斯王朝在被希腊人推翻之前只有七代君王，他们是 Cadmus（卡德摩斯），Polydorus, Labdacus, Laius, Oedipus（俄狄浦斯），Eteocles 以及 Laodamus。实际上在第六朝希腊人就开始与腓尼基人对抗，战争持续了 10 年。

---

①《希腊神话》片段：“……（赫克托耳的）母亲[illegible]儿子[illegible]。[illegible]，是帕里斯[illegible]回来时从西顿带来的。她[illegible]一件[illegible]。[illegible]安忒诺尔的妻子，[illegible]打开[illegible]的门。[illegible]神像，[illegible]双手[illegible]，[illegible]从王后手里接过[illegible]，放在[illegible]的膝上……”

俄狄浦斯的另外一个儿子和哥哥一同与希腊人作战，一并战死。希腊人毁灭了整个城市，腓尼基人的后代 Laodamus 带领其余的人逃亡了。他们逃向哪里没有交代，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而就在这个时期前后欧洲开始出现了一些找不到根源的突然出现的民族，似乎还没有人把他们与腓尼基人联系起来。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描写看作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之战。与历史学家们的文字相比，《希腊神话》确实稍有差异。假如做一对比，我们发现卡德摩斯在特洛伊之战中是一位元老安忒诺尔的儿子，他的几位兄弟接连战死，而在这些似乎更接近历史传说中的底比斯保卫战，他的后代在其中接连战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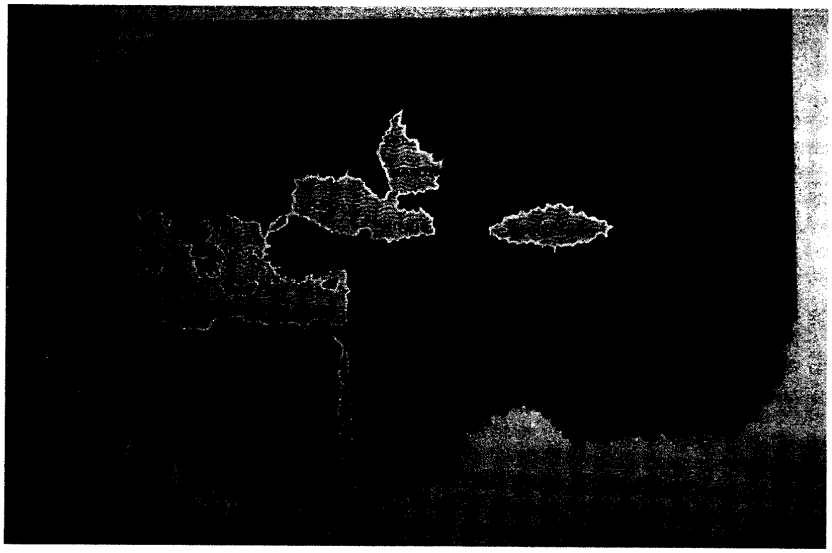
荷马史诗一般认为出现在公元前 8 世纪，卡德摩斯的事件应该出现在 3200 年前。对抗的双方是希腊人与部分特洛伊人，历史要么是“惊人地相似”了一回，要么是部分借鉴了真实发生的历史。甚至发起攻击的希腊人都是同一个叫“Argives”的部族。还没有人认为这两次战争是同一件事，但已经有许多人在争论到底两次战争发生的次序谁先谁后。有人说它们假如真是两次不同的战争，应该相隔不远，也就是说，都在 3200 年前左右。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似乎是先有底比斯之战后有特洛伊之战。结局都是腓尼基人战败。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大约 3200 年前有一股力量或新产生的条件遏制了腓尼基人，他们的厄运从此开始。

希腊历史学家 Thucydides 反对先有底比斯之战、后有特洛伊之战的观点，他认为次序应该相反，并且之间相隔大约 60 年。也就是说这次战争发生在俄狄浦斯当政或是其父拉伊俄斯当政期间。考古证实两个城市确实在大约 3200 年前发生过大规模的灾难。

更具体的争论从古到今提供了这几个特洛伊被毁的时间：公元前 1184 年、公元前 1209/1208 年、公元前 1250 年（希罗多德观点），以及公元前 1334/1333 年（Douris 观点）。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将来确定这个时间后，考虑一下这件事与中国商周替换所可能产生的关联。当然这个关联不是简单的腓尼基人跑到东亚，而是考究这件事情背后欧亚之间的大环境变革所指出的一个必然，这个根源才会更加可能影响到东亚去。

假如卡德摩斯把腓尼基文字带进希腊半岛的故事是真实的，



▲古代人描绘的地图，很明显核心在中东和近东，东亚看来是个遥远得几乎看不见的偏远地方。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青铜时代结束前的 100 年，也就是底比斯与特洛伊消亡 100 年前的事情。很可能最初第一个版本的特洛伊故事曾经被希腊语或底比斯语写下来过，而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希腊神话就来自那些版本。不过今天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文本，如今发现的最早希腊字母也是公元前 775 年的，并且他们出现于陶器上，也可能“皮子”上的文字都已腐烂了。不过从荷马史诗中看他知道写字的“皮子”。由于缺乏实物证据关于特洛伊时代是否只有口语也受到广泛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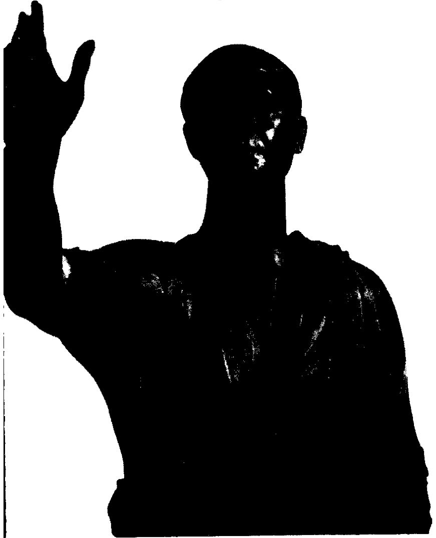
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就在腓尼基人把文字带进希腊并改革产生了希腊文字的同时，东亚出现了甲骨文！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的关联是很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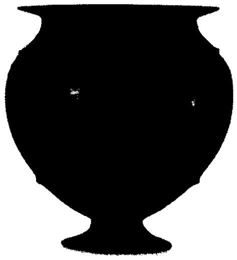
以上两场发生在爱琴海周边的战役，各自持续了 10 年，并且结果皆为腓尼基人一方战败。这一情况会造成一些相关地区的波动或文明的传播。战争使文明得到更快的传播是个规律。此时埃及一方也并不太平。这时期的腓尼基人或许更愿意选择远离“战场”的决定，相对荒蛮的远东与地中海西部成为他们的首选。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将受到我们的关注。这个民族的起源一直是个谜，但大致出现的时间在 3000 年到 2800 年之间。那里没有系统的文字出现，但有零星的字母符号。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最先注意到这个特殊的民族并非因为腓尼基人，而是直接因为商朝人，因为龙山文化下的山东人。

第三部分

伊特鲁里亚人





有关黑陶文化

中国在铜石并用期间，有一个著名的“黑陶文化”，其主要代表地区分布在中国东部的临海省份山东，更具体为泰山附近的章丘，后来山东日照地区也有黑陶发现。与以上不远处的另外一个临海省份在同期也有一个著名的古代遗迹：良渚文化，这里也发现有黑陶。

在稍晚一些时间里，河南、山西、甘肃、南方长江流域都有黑陶的零星发现，但总体还是山东的黑陶最多最发达。

黑陶文化是一个谜。不仅它起源哪里不清楚，而且它后来还失传了。

黑陶的特点是轮制的出现之后快轮的使用，它标志着一种新技术的应用。黑陶的主要品质特点是黑、光、亮、薄。最薄的可达到0.3毫米，这在几千年前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技艺。同时，黑陶的烧制工艺也很特殊，不是自然烧制就可以达到黑的效果，而是在一定的高温之下利用渗炭工艺才可以形成“黑陶”的独特效果，选料与火候都极其讲究，光亮则是打磨的效果。后来这个工艺失传，今天一些专业人员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又研究出来现代的黑陶工艺。

所以，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个黑陶工艺外面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它与红陶不同，不是自然而得。中国人又一次认为黑陶是中国独有，并且经常看到有人据此得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仓促谬论。假如我们在中国之外的古代地区发现了同样的黑陶

那将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很明显：不仅破除了这个基础之上的“独立说”，而且提出了“同源”的嫌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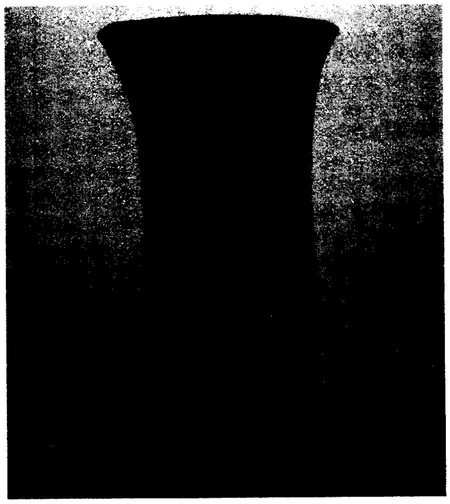
比中国早或者同期的黑陶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有，比如印度等地，但最出名的一个史前黑陶文化却在地中海上。

与中国人认为黑陶是中国龙山文化的代表一样，地中海地区以黑陶为文化代表的地区就是曾经占据了大半个意大利并长期盘踞在意大利半岛西部和北部的一个古国：伊特鲁里亚（Etruria）。意大利的古代历史一般从伊特鲁里亚的历史开始讲起，之前意大利再无“历史”可言，之后则是众所周知的古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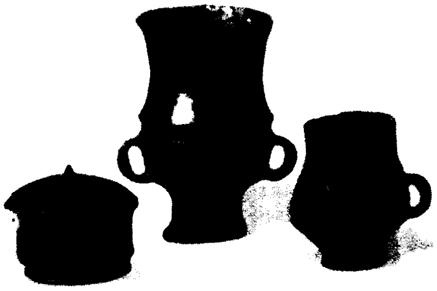
结合腓尼基人在神话与历史中逐渐向北方以及欧洲移动的轨迹，我认为探索一下伊特鲁西亚通过腓尼基人可能与山东之间产生的关系是非常及时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既然黎巴嫩的西顿在三千多年前就拥有了从中国而去的丝绸，那么一些黑陶工匠在两地之间交流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既然我

▲距今 7000 ~ 6500 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夹炭黑陶釜

▲距今 7000 ~ 6500 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夹炭黑陶



▲河南出土的龙山黑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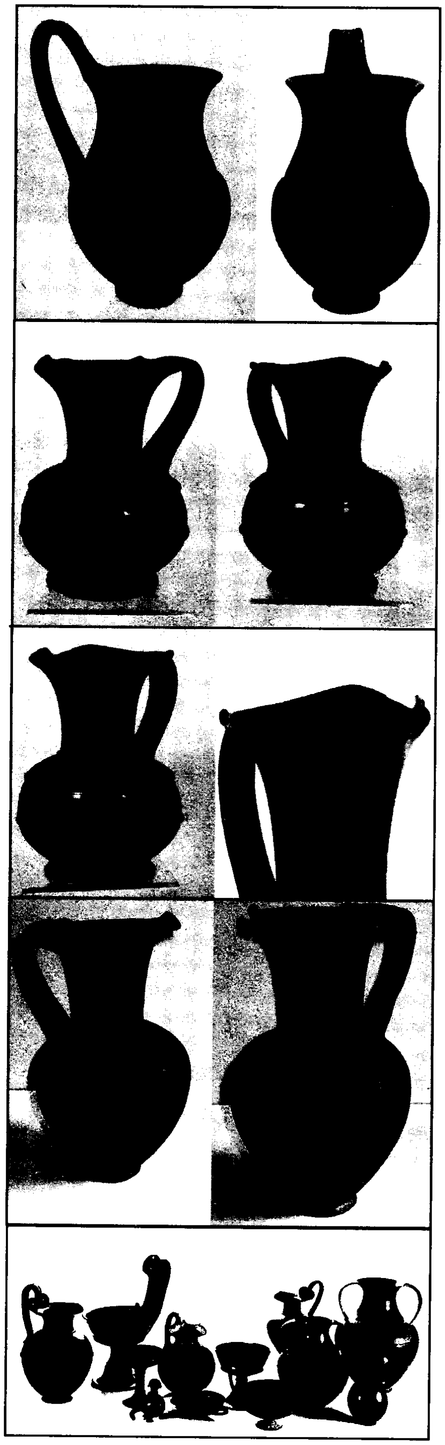
▲龙山文化中的黑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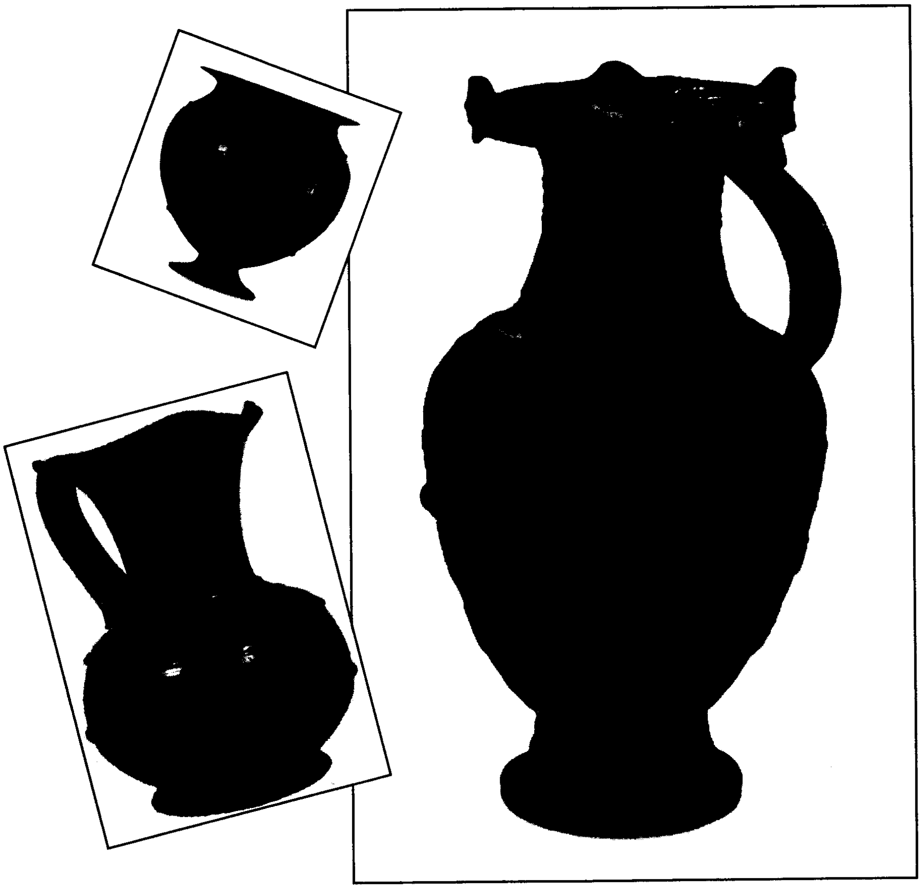
们知道腓尼基人曾经迁徙至地中海北岸地区，那么某些黑陶工人跟随过去也就不是什么意外。在这里我无意求证先后问题，我的目的在于说明伊特鲁里亚人与中国古代鲁人之间的关联。

伊特鲁里亚的黑陶不特与中国山东的黑陶一样属于黑陶，不仅技术一样，而且美学追求也很相似，其品质特点同样为黑、光、亮、薄，他们的装饰基本一样：要么完全素面，要么只有简单的划条，要么饰以环形凸条。两地的黑陶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两个徒弟。他们的主要差异在于把柄上的不同，并且，龙山文化的兴盛期在大约四千多年前，伊特鲁里亚的兴盛期在2700年前。

我现在还想起来意大利北部山区的建筑以前就曾经因为与中国羌族文化的接近而引起过我的注意。而这一次则是因为两地的黑陶。到底两地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有关伊特鲁里亚的起源目前有几种不太统一的意见，还在探索之中：一种意见认为伊特鲁里亚是


▲伊特鲁里亚黑陶，其鼎盛期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



▲伊特鲁里亚黑陶，其鼎盛期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

从铜石并用时期一直发展到人们常说的伊特鲁里亚历史的，也就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当地起源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其鼎盛时期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黑陶是鼎盛时期的主要文明标志。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是著名的希腊皮发斯基族人（Pelasgians）或者“海上民族利姆诺斯人”（Sea Peoples of Lemnos，在希腊一个小岛）的后裔。皮发斯基文明是一种综合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带有明显的（犹太）圣经文化背景，后来他们成为腓尼基人的一部分。“Pelasgians”与“Tyrrhenian”这两个词汇实际上可以置换使用，而Tyrrhenian又可以与Etruria置换。

Tyrrhenian牵连出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来自希腊或者小亚细亚的一个故事：传说在希腊或者小亚细亚有一个古老的王国Lidia，那里曾经发生过连续18年的饥馑，在亡国的边缘国王把国家的人口分为两半，让王子带领一半的人民外出寻求生存的机会，而他自己则留在原地。王子用船把他的人民与财产带到了意大利半岛的北部发展为一个新王国，Tyrrhenian就从这个王子的名字而来。这个说法来自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的著述，许多人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Tyrrhenian这个词汇让我想到从“推罗”这个城市导出的腓尼基人的另外一个名字“Tyrian”，两者非常接近。

还有一个说法是，伊特鲁里亚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汉志”（Aljazira al Arabia），那里是红海东岸、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山区，与迦南地区接近。我当然喜欢看到有人作出这个推测。实际上这意味着：伊特鲁里亚人就是红海居民，并且可能是迦南人，这加深了属于腓尼基文化的嫌疑。无论这个说法是否正确，都可能意味着伊特鲁里亚这个海上民族与红海人的某种联系。

公元前968年是更加具体的伊特鲁里亚国的可能起源时间。

伊特鲁里亚没有系统的文字出现，但有文字。它们似乎并不属于印欧语系，而被判定为印欧语言出现之前的一种古老语言。与伊特鲁里亚文化接近的附近区域有腓尼基文字的痕迹。

今天有关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多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在希腊与罗马攻占这里之后，大约与秦始皇同期前后这里也经历了一场“焚书”运动，不过焚书的人不是他们自己的统治者，而是外来侵略者。

据说这里的人极其“迷信”，他们被希腊和罗马人看作异教徒和野蛮人、海盗。伊特鲁里亚人在王国衰落时期被敌人大批杀戮，几十万人被消灭，最终他们只剩下五万多人。

在长期的征战中，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人始终是他们的坚定盟友。从小个子的拿破仑身上或许我们还能看到几许野猛古风。拿破仑身高只有1.63米，这在高个林立的欧洲确实是个异数。实际上，无论是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还是临近的意大利北部甚至法国南部，矮人的比例远远超过北欧。这到底是气候的影响还是古代善于游走航行的民族从亚洲带去了一些低矮的东亚甚至马来人种的后果呢？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在1.73米左右。

比较有趣的是，中国山东这里尽管90%以上都是汉人，但他们的身高却与其他地区的汉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山东人的主要生理特征是：身高肤白。这一特征由于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山东人的大规模“闯关东”而延伸到今天的东北地区，实际上我怀疑东北人本身就很高大。假如我们把山东是商朝的发源地并且具有明显海洋文明这一特点结合起来就明白为什么如此了。腓尼基人很可能给地中海北岸带去了矮个基因，而给中国的山东带来了一些高个肤白的基因，这是文明交流过程中两地必然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平均比欧洲人矮，所以山东人的身高一下就凸显出来。“山东大汉”是个常用语，就是指山东男人普遍较高这一现象的。

黑陶文化远不止中国的山东与意大利半岛。地中海其他岛屿以及源头在7000年以上突然于4000年前消失的印度哈拉巴文明都有黑陶的痕迹。

中国古代的文明不是单一的一个源头，它的构成极其复杂多样，一言以蔽之的行为是不可能解释清楚中国文明形成的，我们只能找到其主要的一些支派（比如黑陶）；更多的细流同样贡献了它们的光辉，但同样极大扰乱了我们的视线。甚至“三代”时期的每一个朝代的构成都是非常复杂而不是单一的民族和势力。

我越来越觉得假如我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假如我注重“没有肯定的证据就不讲话”的原则，我将永远处于失语。现在我已经意识到中国文明形成的复杂程度已经到了一说就错的地步。

陶器引出的疑问

就陶器方面，在谈到商文化时张光直说①：“李济把安阳出土的陶瓷器分为以下五个主要品类：白陶、黑陶、灰陶、硬陶或釉陶、彩陶……但是通过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的化学成分进行比较分析之后，李济又提出，彩陶可能是选用安阳当地的陶土并在当地制作而成的，而黑陶在陶土的选择上则有很大的区别。”“安阳出土的釉陶值得进一步思考。相似的器物在郑州和张家坡都出土过，被认为是从中国南部，具体地说，可能是从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传入的。”这一论断似乎为商文化的东南指出了一个可能，甚至是重要的标示，那就是来自海上。

早期伊特鲁里亚人盛行的是一种与中国山东接近的薄黑亮的比较单纯的黑陶，后期在公元前6世纪黑陶变厚，而且外部刻画更加花哨，开始出现浮雕，200年后这个厚黑陶也被其他的取代。这个快速变化的陶器链条里，最早的时期实际上就是指接近3000年前时期。

地中海北岸地区的陶器，尤其是黑陶，它们的把手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高出陶体口沿的浪漫，据说这叫做“酒神”把手。尽管中国的西部（指仰韶文化）和东部都曾经呈现出海洋气息，但却都止于大方与开放的气质，从来没有达到过地中海区域的“浪漫”。相比之下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整体的稳重得体，欧洲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自由奔放的特色。我一直试图在中国寻找这种浪

---

①《商文明》第4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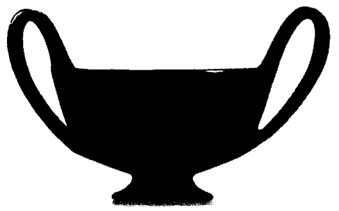
漫色彩，但一直很失望，最终在西北青海的卡约类型这里似乎得到了一点暗示：“卡约类型的陶器有大环耳，其中一些比口沿还高”①！我找到一些张先生书中提供的图片，但它们不属于卡约类型，它们尽管有比口沿还高的现象，但比地中海北岸的类型还是更质朴憨厚了许多。

链接“卡约类型”：“安特生曾将它归入寺洼文化，但其他许多田野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而我的看法与这两种观点都不同，我认为它应是一个与辛店文化陶器相关的文化类型，我们可称之为卡约类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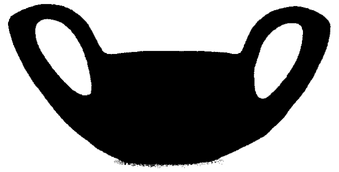
卡约类型发现于青海的西宁县，与西周基本同期，葬俗中有撒红赭石粉的习惯，人们仰身直肢葬，“大多头向西”。对于他们的人种没有看到分析。不过根据西宁所处青海东北角的位置看，在河西走廊旁边，距离武威只有一百多公里远的南边，时间又在大约3000年前，假如这个群体本身不是欧罗巴人种，那么肯定也受到欧罗巴人的很大影响，这是无疑的。河西走廊西头两千多年前的楼兰人还在讲印欧语的土火罗语。并且，与之有些相像的寺洼文化，有人认为其陶器特征显示“并非中华文化”，夏鼐就曾经断定：“寺洼人不属于中国汉族人。”③

这些与中国内地不同的稍显妖娆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陶器假如证实为外来则暗示了一个让文化学者感兴趣的地缘话题：中国这片土地似乎总是内敛而压抑的，而欧洲却是片浪漫开放的家园，从古至今没有改变。假如这是个地理环境导致的宿命，那么中国人应该怎样对抗这份封闭或压抑？这才是研究远古历史的现实意义。

一般认为伊特鲁里亚文化起源于公元前968年，中国商朝结束于公元前1045年，中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地中海上的伊特鲁里亚人会不会是商人文明的流散和融入？当然我不是指全部的伊特鲁里亚人都来自中国商朝，也不是全部的商朝人来到了伊特鲁里亚，而是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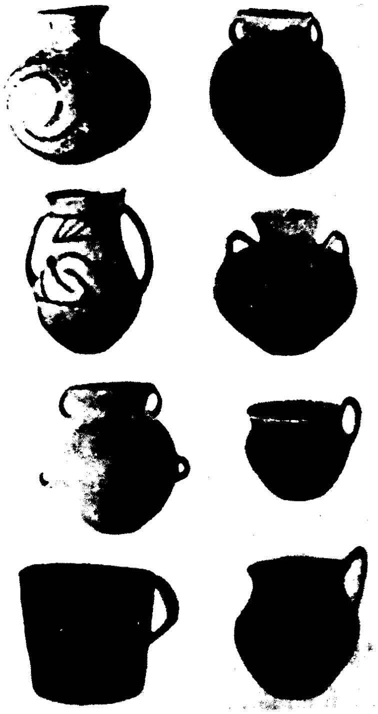
▲伊特鲁里亚黑陶酒杯（在今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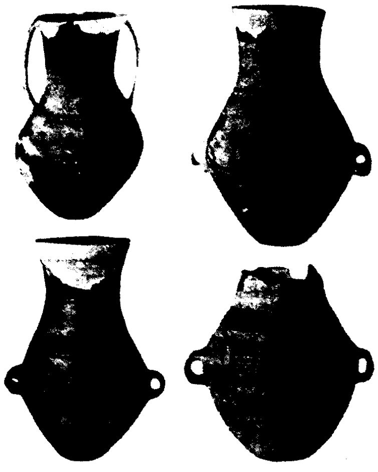


▲特洛伊黑陶酒杯（在今土耳其）

[illegible]

相互之间发生了某些联动效应。考古发现就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北部这一地区的村落突然增加，文明特征突然改变，土葬代替了之前的火葬，他们与希腊人的商业随之兴起，农业文明开始稳定发展，金属制造业得到明显提高，扩疆完成之后一个国家就形成了。显然这一地区突然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中国甘肃唐汪类型陶器


▲甘肃辛店文化B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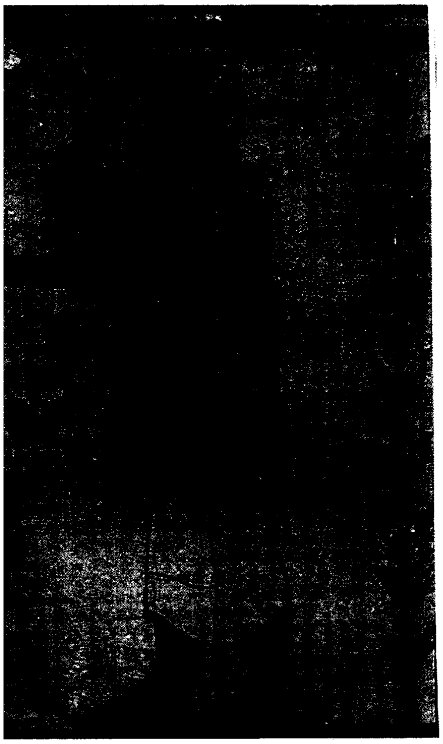
我认为某种远距离的文明交融通过一个商业群体的传送得到了充分的交流。通过海洋还是陆地那不是问题，只要他们熟悉那条商道，来去就都不成问题。假如有人考察这条进攻或撤退的路线，我提议依据“丝绸之路”——它古老得有了人类文明就已经存在。

假如一部分商朝遗民能够远迁美洲——这似乎已经渐被考古部分证实，他们为什么不能远行欧洲呢？还有，假如我们相信大约4000年前的雅利安人可以从欧洲远征到亚洲的印度半岛，部分商朝遗民为什么就不能远行意大利呢？它们的距离是基本上相等的。这里需要提醒的一个思维障碍是，古代地广人稀、没有海关，族群的集体迁徙有相对的自由和方便。

假如中国人认为确实有可能中国商朝向意大利北部转移了商文明，那么实际上也要准备好承认同样的事实：中国的文明有可能是从同样的远距离交流而来。有可能在上古时期全球因为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导致了无数的大规模广泛文化交流。

迦南人或腓尼基人的研究是这个联系的一个关键点，他们在东西方来回穿针引线。而伊特鲁里亚人已经有人论证他们属于腓尼基文化的一支。假如中国商朝确实有腓尼基人的加入，那么伊特鲁里亚与中国黑陶之间的关系可谓迎刃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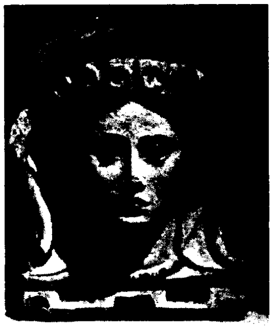
但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距离中国



▲墓室壁画中的伊特鲁里亚人，从众多壁画中看男性皮肤为黄色，而且身体短粗、健康。他们中的女性却多为白人，这一特点非常明显。总体看，当时那里人种很混乱，有白人也有黄种人，但无黑人。

相对较近的希腊文明始终没有在中国明确出现。不应忽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腓尼基人与希腊的敌对关系。假如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商人是腓尼基人，而希腊却是腓尼基的敌人。我数次面对中国上古时期带有明显海洋气息的文物但最终都否定了它们与希腊文明的联系，但今天看来，否定了中国上古时期与希腊的直接联系，并不能否定中国与地中海文明的联系。

腓尼基人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一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这方面夏前后时期的腓尼基文字在中国的大量发现就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3300年前商武丁时期中国突然由腓尼基文字转为“南部阿拉伯”文字或甲骨文，说明在后商期间“南部阿拉伯人”（可能是一支新的腓尼基势力）驱逐了以往的腓尼基人势力，这批人与周人有更加密切的联系，但他们最终还是被周人彻底驱逐了。



▲墓室壁画中的伊特鲁里亚人

两个地理环境以及“波”现象

中国黑陶文化比较集中的时间，约略在 4500 年前 ~3500 年前，是中国夏、商产生的前后时期，可以认定黑陶与商人发源地山东这个临海地区有直接关系，与夏似乎没有直接关系。黑陶在中国消失的时间发生在商朝中期，与甲骨文的兴起(3300 年前)放在一起研究会有重大的意义。在武丁前后，一定发生了重要的政变，否则不会发生这样的一明一灭：黑陶式微了，甲骨文兴起了。这两项都是当时的重要文明标志。很可能一种文明势力代替了另外一种文明。假如商朝实行的是“轮流坐庄”制，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其中的一个家族代表黑陶势力，而他们在后期被文字势力所驱逐了。但我们也要承认，这两股势力其实可能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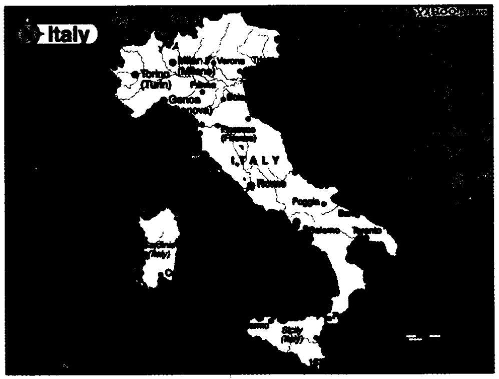
不特在商朝时期中国文明发生了剧烈的变异或断裂，实际上在“三代”之后也可能发生了断裂。明人顾炎武曾经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器乐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者矣。”假如“三代”以上中国的天文如此发达，而“后世茫然”，我们可以总结早期中国确实经历过一个与外界自由并充分交流的时期，但这个美妙的自由世界却于“后世”停止了。这印证了越是古前人类越有密切的全球文化联系，“后世”却因为宗教与国家的出现而全球总体停顿了自由迁徙。到今天尽管交通工具进步了，但是到

任何地方去却更困难了，因为你需要无数多的申请手续，甚至你的申请存在被拒的几率。

伊特鲁里亚古国不仅因为有黑陶而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且这个古国的特殊地理环境是特别让人惊讶的：那里的地理环境几乎是另外一个山东半岛。这是一个很好的暗示，说明有一群人大概一直喜欢在大致相同纬度、相同环境下生活，他们同样喜欢大海，他们同样习惯于半岛，他们应该具有同样的生活与劳动习惯。有人主动选择了伊特鲁里亚这里作为山东的替身。

山东鲁地与伊特鲁里亚古国惊人一致：都在临海的半岛，皆在北纬 40 度附近（前后不超过 5 度）。这里可以半农半渔猎。山东的日照（北纬 35.5 度）是个港口城市，直接面对大海，章丘市的龙山镇（北纬 36 度）距离海边大约 150 公里，这两地都是黑陶的主要发现地。

意大利北部与山东不仅气候相近，地理条件除了临海还同样为丘陵平原兼具，甚至它们同样为多泉地区。世界上再没有如此接近的两个地区了。



▲意大利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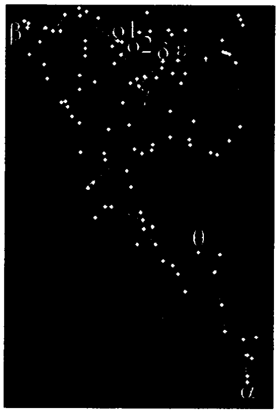
假如再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两地就更加接近：“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气候较今天更为温暖湿润”，那么想必早先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与后来的伊特鲁里亚地区的气候就基本一致了，因为在这个时段里气候在下降而纬度也（从山东到意大利半岛）“下降”了（下降 2 度 ~4 度）①。

最奇特的是两个文化区域的北部同样都有一条大河，在中国

是“黄河”，在意大利是“波河”（Po）。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意大利黑陶文明北部的大河叫“波”（bo）河，而山东半岛黑陶文明北部的这条大河流入的海叫“渤”（bo）海。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许久以前中国的“黄河”曾经叫“波河”致使其注入的海也被命名为“渤”（bo）海了呢？“黄河”想必并非自古就叫“黄河”，它在3500年前最初叫什么名字是个有趣的问题。

继续探察天上的一个星座使我们更有信心认为，古代“黄河”或许真的曾经被人们命名为“波河”。不过要解释清楚其中的故事却要颇费周折。

天文上有一个星座叫“波河座”（Eridanus the River 或 Eri）。一般的解释说，这个“波河”就是指伊特鲁里亚古国北部的波河①：传说Eridanus这条河流就是法俄同（Phaethon）淹死的波河。法俄同是太阳神的儿子，他企求父亲让他代为驾驶太阳车。宙斯看到天上的太阳车行驶不正常，认出驾车人不是太阳神就用雷电劈死了法俄同，把他打进波河（Po，在《希腊神话》里中国人一般将其翻译为“波江”）。他淹死后仙女们把他埋在波江旁边，他的姐姐们在那里不停地为他哭泣。宙斯为他的姐姐们感到难过就把她们变为杨树放在波江边永远守候弟弟的亡灵。



▲星河中的波河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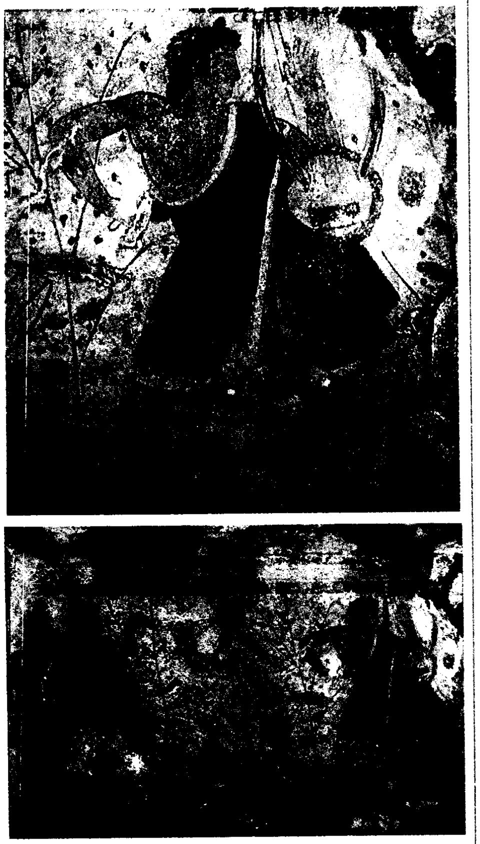
当我拿到这个“波江星座”的图片时，我发现这个“波江”从形状上看并不像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反而它更像是对注入渤海的黄河的直接描摹——黄河中部的大拐弯（俗称“河套”）是黄河独有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在“波江座”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假如我的猜测是事实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命名这个星座的地中海人是很熟悉中国的黄河的，并且中国的黄河在远古时期很可能就叫“波”河，否则“渤海”为什么叫“bo”呢？我的推测是，在三千多年前有人了解黄河的存在，他们由于熟悉中国的山东而把这个命名也带到了伊特鲁里亚。编织星座故

---

① http://starryskies.com/The_sky/constellations/eridanus.html

事的也是同一批人，这些人还带去了黑陶文化。这个故事确实很离奇，很牵强附会，但是想想希腊神话中已经在腓尼基人中间出现过中国的丝绸，所以我的故事并非没有可能。

中东还有一条“波拉河”，这就是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它最终注入一个海湾叫“波斯湾”（汉语拼音 Bosi，英语 Persion）。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三地的地理以及它们的命名显示了某种文化联系？其主要地理特征围绕一个“波”字命名，只要是与水有关，既是“波”河又是“波”湾。假如让我排序，我会认为它们的最初发源地是“两河流域”——那里本来就是迦南人的老家——穿越时空他们来到了一个当时人烟罕至的东方，意大利半岛成为其最后的落脚地。海上商业民族腓尼基使这一切联系成为可能。



▲伊特鲁里亚人的服装据说与希腊人一样，他们穿着长袍，在前面打一个结。后来，这种穿着方式被另一种服饰所代替，同时搭配一件鲜艳的披肩。这种披肩宽大且有厚厚的镶边。这种伊特鲁里亚的民族服装成了后来罗马人外袍的样式。

中国古代还真的有叫“波”河的，准确地说在古代它叫“波水”，“水”就是“河”的意思，并且它在一个叫“鲁山”今天中原河南的一个地方。《周礼》与《禹贡》皆有记述。“山东”又简称“鲁”，这之间是否会有些联系呢，比如“鲁山”为“鲁人”集中的地方而被命名？别忘记“伊特鲁里亚”之中也有一个“鲁”字。这个联系当然很牵强，但也不能肯定它们真的没有联系，因为“伊特鲁里亚”的重音恰好在“鲁”上，所以一旦如中国人那样简化为一个字称呼时确实按照一般规律是选取

“鲁”。河南地区的“鲁”为什么又与“波”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值得警惕？这条河南的“波”河注入淮河流域的沙河最终进入大海。淮河流域的江苏也临海，那里也有黑陶文化。

就在张光直先生的著作《美术、神话、祭祀》的“三代”活动区域图中，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一个叫做“Po”的都城（见《历史也疯狂》第27页），它在黄河与淮河之间，这就是商朝首都：亳（汉语拼音bo）！这让我想起来外文与中国的爆破音b、p是可以转换的，更说明了中国的“渤海”与“波水”，实际上都可以是“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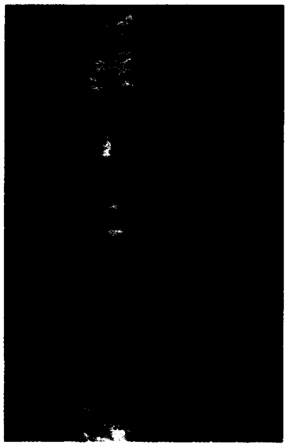
中国商朝甚至连都城都叫“Po”，或许他们真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商朝有一种我们尚未明了的“Po”文化，同时它还传播到了商朝的另外一个对应文化区伊特鲁里亚，致使那里也有了一条“Po”河——伊特鲁里亚的母亲河、命脉河。

波塞东（Poseidon）是《希腊神话》里与宙斯同时掌管世界的海神，也有一些民族尊认他为人类始祖。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而命名“波斯湾”、“渤海”以及“波河”呢？

中国的海神在传统画里与希腊海神同样是一个手执三叉戟的男人，我不认为他们是巧合。而且，在中国古汉语里，“波”很可能通“海”或“水”，最初人们因为“波塞东”而将一些水域或河流称呼为“波”，久而久之那便成了它们的名字，比如“渤海”——实际上来自“波”海，河南古代的“波水”同样来自这个起源。也就是说，至少在商代中国人可能就有海神崇拜，很可能正是从商朝开始中国才有了海神崇拜，而当时的商人称呼海神与海很可能一样：波塞东（Poseidon）。

▲请注意伊特鲁里亚人的鞋子，这种带尖的鞋子几乎全球流行，从埃及到中国新疆地区，再到中国南方楚地，甚至三星堆的人物图像里也有类似图画，非常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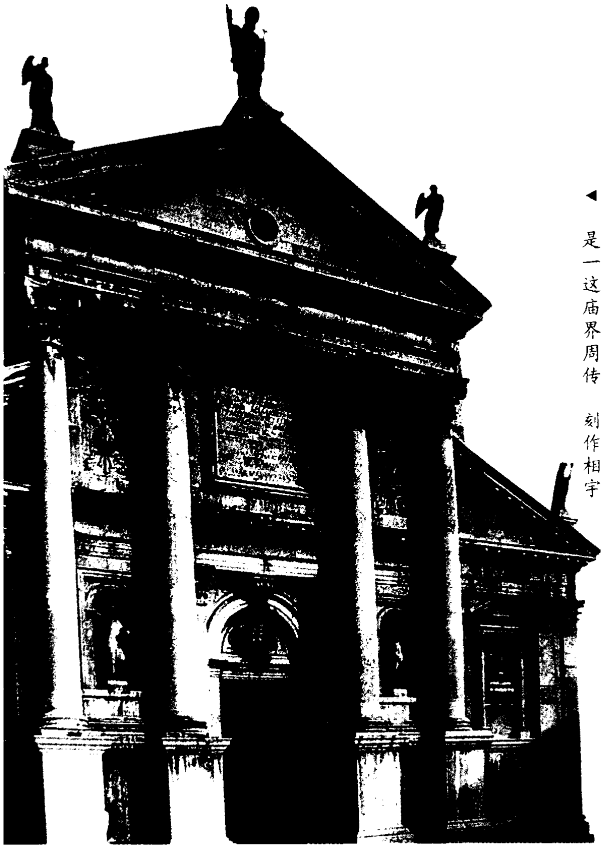
我现在买书很不划算。由于我关注的时期是“史前”，而一般介绍某一民族或国家的著作都从“历史时期”开始说起，所以我可以借鉴的部分就在书的开头薄薄的几页。《古罗马　英雄时代的神与人》这本书也不例外。罗马之前的意大利史前史主要就是伊特鲁里亚历史，涉及伊特鲁里亚的部分只有一点点。好在伊特鲁里亚的阴影很长，深深地插入罗马的核心，所以只要细心在罗马时期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伊特鲁里亚传统的延伸。



▲伊特鲁里亚人青铜像

这本书提供了几个令人兴奋的信息，但最大的一条莫过于“萨宾”人的存在。“萨宾”人属于伊特鲁里亚人的一支。我很警觉地将这个族群与中国联系广泛的“萨保”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因为这个民族的特点也是商业与航海。中国的“萨保”同样擅长商业与航海，而且主要涉及阿拉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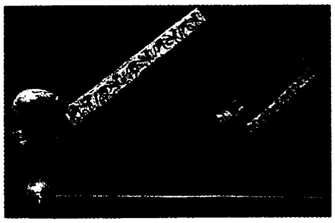
有关“萨巴”或“萨保”、“萨宾”的宗教与文化需要有人去系统地清理，目前我们发现全球许多地方与这个文化现象有牵连，从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到巴勒斯坦，从红海到印度洋，再到中国西部地区，围绕着这一现象可谓疑云重重。



◀伊特鲁里亚人的神庙遍布在地中海一带。

伊特鲁里亚人不会随意选定一个地方建立这些神庙，也绝不是为了让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实际功用，因为它们不靠近任何一个城市，而且交通不便。相反，它们普遍散布在不易到达的山区。这些神庙在许多岁月当中维持着崇高的声誉。一般来说，这些神庙都拥有一块石头标志，希腊人称之为“omphalos”，意即“世界中心”。这个行为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的由来，据说是周武王选定了一个神圣的地方后宣布“中国”的，是不是以讹传讹了？也许当初武王只不过是宣布了一个“omphalos”。

我是不是又在牵强附会了呢？这样的“中心石”顶端一般都刻有两只鸟，两只相对的鸽子。在我老家嵩县传统房顶上起辟邪作用的除了常见的“龙”之外，最常见的就是鸽子，并且恰好是相对而立。还有一种是鱼，甚至有狮子和人（神仙）。据说古代庙宇里的神职人员之所以有“预知”能力，就与鸽子的养殖分不开。



▲中国内地考古里很少发现有金属别针，但在伊特鲁里亚却是个常见的装饰品。不过中国新疆小河墓地也有别针的发现。

在黎巴嫩与小亚细亚之间有一个地区叫乌加利（Ugarit），那里时常听到两个神的存在：萨巴神（Shabar）和萨林（Shalim）。萨巴神代表黎明，在《旧约》中曾经提到过萨巴神，有时候他的名字被直接称呼为“辰”（morning）。萨林则相反，被命名为“黄昏之神”。据说耶路撒冷（Jerusalem）便是从“萨林”得名的，意思是“黄昏中的要塞”（fortress of Shalim）。这个现象可能还牵涉到一些天文上的现象。金星在古代被中国称呼为黎明星与黄昏星。所以这个崇拜或许有一种金星崇拜的根源。

金星在中国古代叫“启明星”、“长庚星”、“太白星”或“明星”等，是九大行星之一。在希腊她叫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在意大利她叫维纳斯。在前面腓尼基人的历史中看，她女儿嫁给了腓尼基人，在特洛伊之战中她是腓尼基人一方的保护神。我的意思是，无论在意大利那里还是在中国商人那里，假如人们崇拜“维纳斯”或者共同崇拜金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

尽管宙斯把她许配给丑陋又瘸腿的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但阿佛洛狄忒却爱上了战神阿瑞斯(Ares)，并和阿瑞斯结合生下几个儿女，其中包括爱神。战神阿瑞斯(Ares)罗马名字马尔斯(Mars)，这也是九大行星中的星的名字。事实上，古罗马人非常崇拜火星。中国商人实际上也有火星崇拜，但是却一直没被发现，有关这个话题请参见后面“罗马与中国的风俗

和神明”一节。

中国商朝人一般称呼自己为“商”，而周朝人却称呼他们为“殷”。前面曾经说过“迦南人”的意思就是“商人”，我推测“商朝”很可能是“商人”对自己职业和民族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自己祖先的一种纪念。但这个推理是否靠得住？腓尼基人在其他地方有这样的行为吗？非常幸运我在伊特鲁里亚人这里找到了同样的例证，并且正是这个例证让我把伊特鲁里亚、腓尼基、中国殷商联系在一起。话题还要从罗马的“萨宾”人谈起。

在伊特鲁里亚与古罗马之间起衔接作用的时代是以“狼之子”罗慕罗斯为首的“王政时期”，“罗马”就是以罗慕罗斯的名字建立的。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罗马初期的图腾可能为“狼”，这毫无疑问。无独有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也有以狼为图腾的历史，比如蒙古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不是在北半球40纬度附近欧洲到亚洲的横线穿梭结局呢？有两点可以支持这种设想虽然还未必说明他们之间也有同源关系，首先蒙古人中包含了渤海湾附近的部分中国东北人；另外，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直到几百年前还有许多金发碧眼之人。与其说我使用这么薄弱的证据想证明两地之间有关联，还不如说我在告诉人们：沧海桑田，我们今天所知道昨天的事情非常有限，所以对于史前不要抱任何成见，要给合乎逻辑的想象力以一切支持。

▲中国河南嵩县房顶的鸽子装饰　张毅可 / 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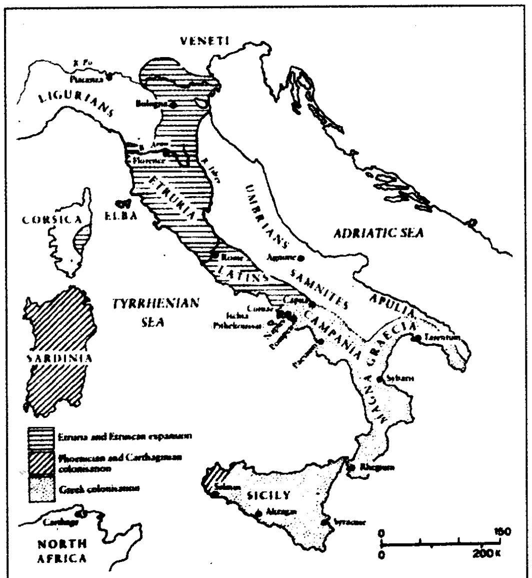
▲中国河南嵩县房顶的鱼装饰　张毅可 / 拍摄

罗马最初开始的是

一个“七王时期”。第一王是罗慕罗斯，其中的第四王“马尔修”是个“萨宾”出身的“农民王”。

这一时期“王”参与普通生产，并且多由推举产生，显示出原始风格的民主特点，没有明显的世袭。“王”的作用只发挥于战争和祭祀之中，其他场合他们是普通人。这点很像中国的商王。在商朝时期，“国家大事，惟祀与戎”，或许指的正是：只有在这两件事情上“王”才发挥作用，在其他事情上王不得进行干预。不过现在通常人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国家大事最重要的莫过于战争和祭祀。其中还是有些差别的。中国商王在甲骨文里有记录参与生产劳动，有人说那只不过是些王室娱乐活动，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当时的许多活动很可能类似于意大利的“七王时期”，我认为商王很可能也参加一些普通劳动。转换一下脑筋，在那个时代，民情淳朴，除了战争与祭祀活动并无其他复杂的社会管理活动，所以他们平时假如不参加劳动还能做什么呢?

开放是古罗马主要的政治特点，不论种族身份，都可以成为“王”，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对国家事务起决定性影响。这点我也认为中国商朝研究可以借鉴。假如确实是商业团体或商业家族在当时的中国称王很可能也经历了“不论种族身份都可以成为王”的时期。张光直先生认为的商朝“轮流坐庄”本身就是对固定的王室世袭的一种明确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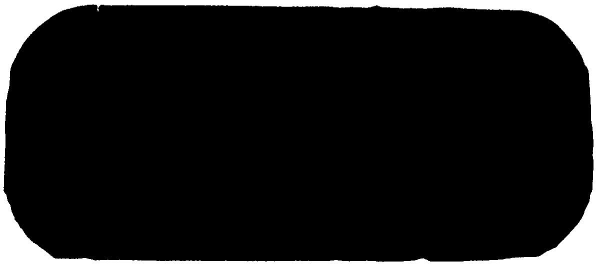

VENETI
LIGURIANS
Bologna
Florence
ETRURIA
UMBRIANS
ADRIATIC SEA
CORSICA
ELBA
Rome
LATINS
SAMNITES
APULIA
TYRRHENIAN SEA
CAMPANIA
MAGNA GRAECIA
Tarentum
Sybaris
SARDINIA
Rhegium
SICILY
Syracuse
Carthage
NORTH AFRICA
Etruria and Etruscan expansion
Phoenician and Carthaginian colonisation
Greek colonisation
0
100
200

▲伊特鲁里亚地图

此时意大利的宗教也十分活跃，各种流派一起在罗马狂欢。宗教为一种人与神的“契约”关系，人们相信只要你信仰就会出现“神威”。这个信仰使神灵多到不可胜数，这恐怕也符合中国商朝的情形。

第四王“马尔修”执政期间，罗马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

▲意大利古代的箅子



▲中国传统篦子。我少年时期经常使用这样的箅子。它不是梳子，多是专门用来清理头发中的虱子。传统中国人似乎没有洗头的习惯，我小时候见过许多老年妇女终生没有洗过头，她们用这样的箅子来清理头皮、虱子以及头发中的其他杂质。张毅可 / 拍摄

平民。这时期贵族作为一个对立阶层也开始出现，他们是“萨宾人”、拉丁人以及有关的伊特鲁里亚人，平民则为移民或者被保护人、俘虏等。

第五任王名叫“塔克文”。他出身于伊特鲁里亚贵族身份，但他同时有希腊血统，因而受到了同胞贵族的排斥，所以他离开伊特鲁里亚从北方来到中部罗马发展。他以博学多才很快赢得了罗马平民的支持。

在罗马城中的伊特鲁里亚商人当然也更愿意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团体的统治者，所以塔克文在漂亮的竞选演说之后就获得了王位。他之后的两任国王也都是来自伊特鲁里亚。因为伊特鲁里亚是个主要经商的民族，所以古罗马“七王”之中的后三王在历史上被统称为“商王”①!

严格地说，伊特鲁里亚人与罗马人还不是同一个群体，由于

[redacted]

地理上的南北格局他们两者相当于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区别，他们之间既有融合也各有特点，甚至还会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但总体看，他们又是混合为一体的。但比较奇怪的是，居于北方的伊特鲁里亚人更善于海上生活，而生活在两面环海的罗马人却更多显示出农业特点，以至于在著名的“布匿战争”中罗马人最初连连战败的原因竟然是“不善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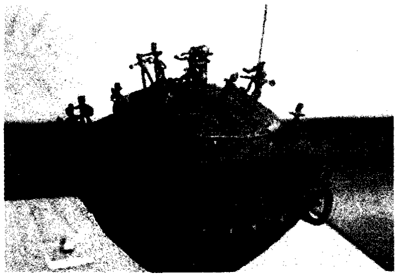
这里的“商王”之“商”是指这几位伊特鲁里亚人所从事的职业：商业。而三个伊特鲁里亚出身的王全部被称呼为“商王”，不仅说明了伊特鲁里亚与“商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实际上也说明了他们有以“商业”这个职业来命名“王朝”或“统治者”的习惯。中国的“商朝”完全有可能是由一系列的“商业统治者”（商王）组成的。因为以上的种种关系，地中海北岸的伊特鲁里亚人很自然地让我认为他们与腓尼基人有密切关系，也与中国商朝有关系。

当然，中国“商朝”或“商王”之“商”取意译。不过，有心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从古音“商”去推测与当时的哪个语系更接近，进而来推断哪些地区或民族曾经与中国当时发生了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商业”这个词汇发音近于中国“商”音者皆可得到怀疑。

▲伊特鲁里亚人青铜像。其实今天的意大利无论在文化传统还是在人种方面都显示出强烈的东西方混合特点。

人们公认，大约在公元前2000~1000年，全球发生过一次“人类大迁徙”，这个时期恰好基本涵盖了中国的“三代”时期。这说明全球文明传播的一个事件，不仅同时影响了东亚的文明发展，而且影响了全世界，包括意大利。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形成现在还不好判断，我推测应该有以下几个因素：商业发展到一个新的起点，因为青铜与铁的发明与发现，矿石运输与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可能带动了更多的人群进入商业领域冒险，但矿业的发现通常都是在很大的地理范围内开采。一个遥远的新矿区会带动许多群体的集体迁徙。类似的现象即便在近几百年也如此出现过，比如美国的“淘金热”，南非的“钻石热”，都使许多敢

于冒险的人们不远万里蜂拥前去。



▲从早期古罗马的一些青铜器方面看，他们倒是与龙山文化没有明显关联，但这个时期他们的人种与青铜工艺与中国云南的滇人有着可疑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喜欢做类似滇文化中大量出现的“贮贝器”，上面放许多小人儿。其相像程度之高数次让我以为我将它们弄混了。这个物品是意大利文物。

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发展也是这个“大迁徙”得以成立的重要原因。既然青铜与铁开始广泛使用，那么马车与船舶等都会在某些方面得到大力改善。生产力随着发展，加速度促使移民潮加剧。

同时加以考虑的还应该有丝绸品这个极其特殊的与中国有关的商品，当然也少不了腓尼基的染料使其锦上添花。

气候在这个时期可能在继续变冷，所以许多高纬度地区的人们在开始南移。

为什么移民潮停顿于公元前1000年前，因为国家与民族概念的突然强化而出现的“文明”弊端阻止了人们自由迁徙。

意大利半岛的文化，甚至伊特鲁里亚人以及罗马人的形成都受到了这个“民族大迁徙”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元前2000~1000年时期可能是伊特鲁里亚人的一个成长期；另外，他们恰好与中国的情况基本上获得了对应。但整体看，中国稍早于意大利半岛以及伊特鲁里亚人。我对此的解释是，东亚从战略上讲比欧洲更有发展的空间，所以最初从中东出来的人们首先选择发展东亚，然后才又回到地中海中部地区。

▲滇人“贮贝器”盖子。中国的滇人活动在云贵川一带，时间为中国的“西汉”，其五官明显有深目高鼻特点。此期距离中国的商朝已经有700年的时间，但与伊特鲁里亚人在意大利北部的崛起有大约500年的时间距离。

[illegible]

▲在棺盖上的伊特鲁里亚夫妻雕像，他们的面貌轮廓与今天的中国北方蒙古人接近。

伊特鲁里亚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来的是罗马，是意大利。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一些罗马的文化现象与中国文化现象的对比，来说明两地可能曾经出现的联系。

在罗马渐成规模的时候，罗马人从北方邻居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来了许多东西，包括建造“凯旋门”①，有门窗有房檐的房屋，对于“紫色”的喜欢，甚至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都来自对于伊特鲁里亚文字的学习，还有许多其他的技术。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其父是一个过继的养子。在基本同期的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也流行养子登基的风气，比如屋大维就是恺撒的养子。我觉得这个风气本身颇不寻常。

就我个人的感性认识而言，到意大利去的感触之一就是他们

---

①“凯旋门”也很可能就是中国“[illegible]”的另外一个称谓，详见《[illegible]》第[illegible]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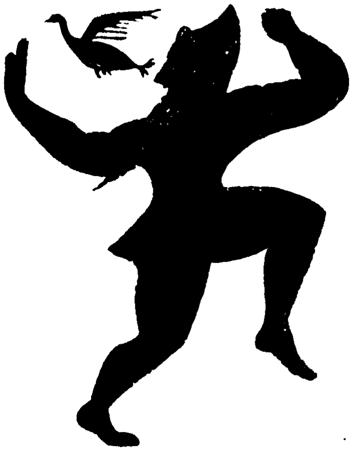
的许多建筑与中国很接近，我是说那种“人”字形屋顶的房子，只是比中国的都普遍大一号而已。并且中国人在心理上感觉意大利距离中国似乎比希腊还近。希腊对于中国是个很陌生遥远的地方，意大利对于中国人却是很亲切的。或许这与马可·波罗有关，但或许也有其他我们并不明白的奇特渊源。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会同意我这个结论，但为什么有如此奇特心理却一直没有人关注，实际上意大利在地理上比希腊距离中国更远。假如以我的这个体系看，希腊人作为意大利人长期的敌人，部分腓尼基人在意大利与中国之间游走，那么希腊人自然就距离中国很“遥远”了，而意大利却很“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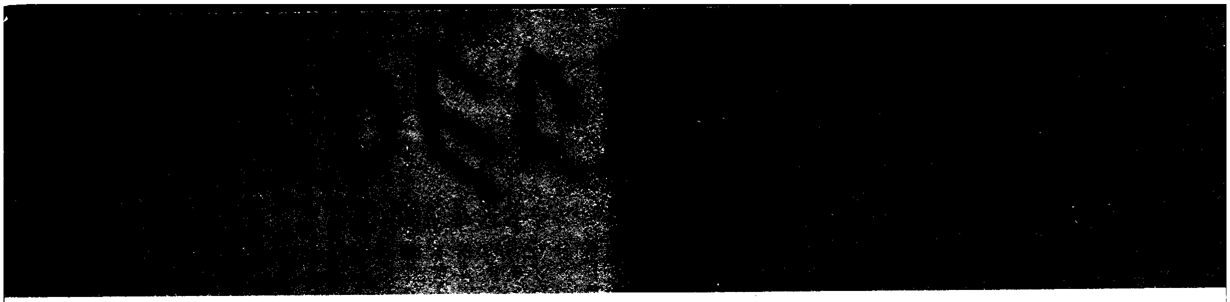
罗马最初的宗教，与中国极其接近，万物有灵，任何事物都有灵。有人看到此可能嗤笑，但是别忘记在这个时期并非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如此，一神教早已在许多地方出现。

除了极其尊崇战神马尔斯之外，门神、灶神、火神是罗马人特别关注的。另外，他们有浓烈的祖宗崇拜，由此还引申出他们对于老人的尊重等风俗。

在中国人的保护神中比较突出的恰好也是门神、灶神与火神，与罗马人不约而同。截至今天中国农村普遍保留着对这些神灵的崇拜。中国人对这几个神灵的祭祀时间集中在春节前的几天。在我生活的时代已经简化为在固定的日子里贴红帖子应付这些神灵。火神与灶神合一了，门神偶尔会让红对联取代。我记得童年时过年会在灶台附近贴一灶神小像，并在其嘴上抹点蜜，意为上天言好事。灶神其实像个传达人间与天上之间信息的天使，他的上级在天上，那就是“玉皇大帝”。罗马天神的上级是宙斯。

“灶神”也称“灶王”。西汉《淮南子·氾论》：“炎帝作火（“作火”原作“于火”），而死为灶。”《庄子·达生》：“灶有髻”。1700年前西晋学者司马彪注：“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中国古代的灶神被认为是女性，但是后来灶神在中国演变为男性——看来神的性别


▲这样身材短粗的伊特鲁里亚人在古代壁画中很常见



▲伊特鲁里亚没有系统的文献发现、但是有许多字母文字发现。

变来变去是正常的，这让人想到“山鬼”与“酒神”。而古罗马的灶神确实是位女性，在罗马她叫“维斯特”(Vesta)。在希腊她叫“赫斯提亚”(Hestia)。她是宙斯的姐姐，掌万民家事。此外，她还是位贞洁处女女神。我认为，中国的灶神很可能来自地中海的同一个崇拜，并且地中海的神话在前。

“巧合”的是，中国祭祀灶神的日子是腊月（阴历12月）23日或24日，而阳历12月24日是西方节日“平安夜”，圣诞节是第二天即25日。“平安夜”与“灶神节”在“同一

▲仅就身材与五官来看，或许这些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与伊特鲁里亚人很接近。假如伊特鲁里亚人确实包含有腓尼基人、而腓尼基人的祖先来自两河流域、那么这个联系就不奇怪了。不过应该说明的是，无论是苏美尔人还是伊特鲁里亚人中间都有大量的白种人，他们会明显区别于我提供的这些类型。我所强调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关注这些嫌疑，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推理，假如说我是牵强附会的话，那么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些疑点则可谓是“粗心大意”（有人误以为那是“严谨”）

天”，这两个节日有一个奇特的连接点：灶火。中国在这一天拜祭灶神，给灶王嘴上抹蜜。西方平安夜里忙碌的圣诞老人却是从“烟囱”这个直接与灶火相连的通道进入普通人家分发糖果或其他礼物。圣诞老人的形象是典型的红衣白髯，而中国的灶神也同样“着赤衣”。我认为他们之间有神秘的同源关系。

《太平御览》引《杂五行书》曰：“灶神名单，字子郭，披发，从灶中出”。这一记述透露了更加惊人的信息，中国的灶神名“dan（单）”、“从灶中出”，与“圣诞老人”的同源嫌疑进一步加强。“Santa Claus”确实与“单（dan）”表面上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不能否定在最初的原形里面有一个音节演化为中国的“单”与西方的“圣诞”，此点存疑。最为可疑的是，中国灶神“从灶中出”点出了与“圣诞老人”又一重要共同点。

有人可能提出中国阴历与阳历的日期不同，但很可能正是有一方彻底更换了历法之后，月份与日子的数目并没有改变，比如从商朝的阴阳历合用到周朝改为单用阴历，但却简单保留了同样的年底最后一月的同一天。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严谨”而“粗心大意”地将一个重大嫌疑放过去。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大约2500年前）中国已经有门神，孔子在《礼记 · 丧犬记》说过“君释菜、礼门神”。唐以后以秦叔宝、蔚迟敬德为门神。周时门神姓甚名谁不知道，但南朝的梁国人宗懔《荆楚岁时记》曾经有语：“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①古罗马的门神名叫“亚努斯”。

葬礼方面，意大利半岛也与中国有一些接近之处。伊特鲁里亚人以及部分古罗马人实行火葬，然后将骨灰放入陶罐，部分东亚人也有此风俗。尤其是中国陕西半坡出土了许多瓮罐是用来埋葬火葬后的死者的，之间可以比较。但更多时候伊特鲁里亚人启用了其他的方式，实际上因为他们的组成很混乱多元，所以葬俗也呈多样化。总体这方面与中国并无抵触。

---

① 参考袁珂编《中国神话大词典》第46页。

古罗马人非常讲究丧葬的排场，参加丧礼的人多被认为很有面子。假如参加的人少送葬队伍就抄近路，假如人多就走大路给更多的人看。这个习俗非常符合中国的情况，与中国传统社会几乎一模一样，截至今天大部分的传统中国地区也是如此行事，起码与我家乡分毫不差。

古罗马时期有许多俱乐部，其中之一是丧葬俱乐部。参加者需要交会费，只要有人死了，大家的钱就可以合起来给他办个体面的葬礼。我老家河南嵩县的“吊孝”就可以理解为同样习俗。嵩县那里一般死了人首先就要立一个“礼桌”，只要是来哀悼的人都一定会出一笔钱，出钱的多少主要看与死者关系的远近以及自己家境的富裕程度。吊孝人与吊孝额都会清清楚楚地写在“礼单”上。一旦有别家死人都会拿出自己家以前的“礼单”查看自己家死人时对方曾经出了多少钱，然后按照同样的额度去吊孝。这个活动起到的是一种类似俱乐部的功效，不过我们那里不叫“俱乐部”而已。但这个风俗会不会是一种“丧礼俱乐部”的遗留呢？据我所知并非所有中国地区有类似风俗，许多地方并不给钱，“吊孝”时给物，最流行的据说是给床单或被面，有面子的大户人家一旦死了人家里挂满了这些东西，是个排场。这些差异我想或许就是古代不同部分、不同方国传承下来的祖宗章规吧。嵩县与滦川是相临的两个县，但两地的丧葬风俗并不同，大概就属于类似情况，中国曾经的方国千万，风俗亦应丰富多彩。

▲据说中国商纣王勇猛可以“手格猛兽”。意大利半岛也风行人与人之间的角斗，而且也流行人与猛兽之间的格斗，即便是统治者中间也有此爱好。比如古罗马时期的尼禄皇帝就有此好。中国与意大利半岛这方面可以比美。据说伊特鲁里亚人是极其开朗健壮的一个群体，户外体育运动是他们的一个喜好。

就像中国人以及腓尼基人自称是“龙的传人”，罗马人自称是金星“马尔斯”（Mars）的后代。“马尔斯”就是希腊的战神爱里斯。我认为在商朝时期中国人很可能是有战神崇拜的，而且崇拜的正是意大

利的“马尔斯”，而不是希腊的“爱里斯”。这就更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与意大利人反而更亲切的原委。

关于战神，苏雪林在《屈赋之谜：中外文明互相发明例证数则》①中说：

“战神无头，策源甚古。印度锡克族奉一无头骑马神，云崇敬之则胜敌。此神在全印则为迦尼隆（Ganesa）大自在天子，谓在婴儿时受土星神一瞥而失其首，取象首续之而复生，长而为其父天军统帅性质类战神，常现无头婴孩（Headless Child）之相。其母婆婆谛亦为著名凶恶之女战神，与巨魔战，首亦被砍去，亦常现无头女人相。《山海经》与帝争位的刑天，其头被斩，被葬于常阳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盾及干而舞，也是一位战神。中国战神名为兵主，这兵主便是蚩尤，黄帝擒斩他以后，葬其首于东平寿乡县阚乡城中，肩髀（即身躯）则葬山阳郡钜野县重聚，所谓‘身首异处’而葬。我们知道寿乡即寿张，在今山东东平县治，钜野属今河北平乡县，相处数百里，这样身首远远地分开埋葬，是令人疑讶不解的。那么，蚩尤也是无头。何况蚩尤又号炎帝、赤帝，在天属荧惑之神，荧惑便是火星。火星之神，全世界皆称为战神之星。

“今日发掘出商代帝王陵墓，每有大批无头人，其头别葬，前者称‘无头葬’后者称‘人头葬’，考古学家皆莫知其所以然。笔者则谓无头葬者因战神无头，故将侍卫武士头亦斩去做成战神部下，则用以保护王陵，威力可增数倍之故。又古代武将棺之被发现者，棺中人往往无头。中国人项讲究‘全尸’，纵其头被敌人砍去亦必以木雕一人首续之，今之无头当亦是模仿战神形状，孟子所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①’，可见古代战士时时以失首为荣。失首何荣？也不过是模仿战神罢了。

“西亚有一浮雕今藏大英博物馆，刻亚述名王Ashur-Natsir pal率领军队攻击一敌垒，空中有无头人三，王举手向之，若祈祷状。外国神话学者及艺术家对此亦莫能解释，谓为战场尸体，为了古人不懂透视学，遂刻得远近不分，高下失置。但这三个无头人均飘浮于树顶，可知绝不是战场尸体。又有一石刻，刻此王凯旋国门之像，空中亦有无头人二，中间一带翅大神，居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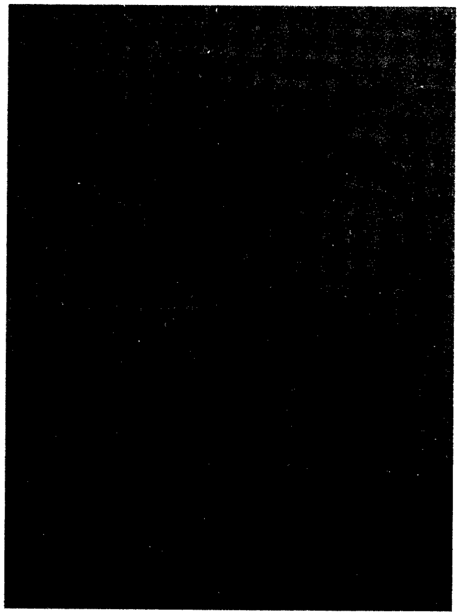
① 元：首也。

圈中，引满而射，这是亚述国家神亚素尔（Ahssur）。国门非战场，凯旋非战争之时，何以仍有无头人出现呢？这又是不能解说的事。

“屈原《九歌 · 国殇》旧以为祭为国战死者，是人鬼。但歌中有‘首虽离兮心不惩，魂魄毅兮为鬼雄’二句，我断定《国殇》歌主，是天神，是九重天里火星天之神。火星色红，象征血与火，故火星神又天然为战神。”

苏女士有关蚩尤无头而同时为火星的论证尤为我注意，因为这样的巧合实在是难以置信。

中国古代历史时期身为战将而成神者唯有关云长关公。此公红面，而且死后身首分离，符合战神的无首特征。历史事实到底如何，甚至是否有这样一个真实人物，我们并不知道，但小说里如此描述他。无论如何，身首异处是对人的一份尊敬，而非一份侮辱，这应该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古风。假如生活于几百年前的明朝作者罗贯中并不知道这一风俗，恐怕他只能在《三国演义》中为英雄错表哀痛。



▲《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厄洛斯 (Eros) 在《罗马神话》中叫丘比特　(Cupid)。他是战神和爱神阿佛洛狄忒所生的儿子。丘比特不会长大，总是像个小孩子，背上长有翅膀，飞来飞去向人们射箭，中箭的人会坠入情网。这是一个中国南方苗族的爱神，请注意这个中国爱神手里也拿着一支箭！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是，关公这个人物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他本来就是一个战神，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恰好有一个重要的将领有身首异处的光荣，然后就附会在一起成为今天全球各界华人崇敬的关公。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在传统社会中拜祭关公的人其实并不是军队，而是商人与商业机构，今天到许多华人商业网点都能轻易看到关公的塑像。我认为，战神（或曰关公）正是“三代”时期由商人带进中国的风俗！它与意大利半岛的战神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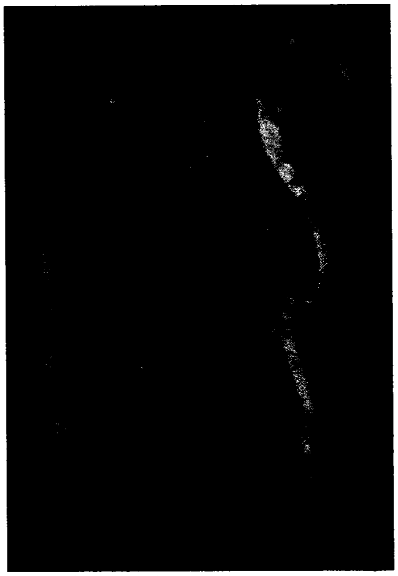
息息相关，他最初可能由于是商人崇拜，所以实际上改变为商业保护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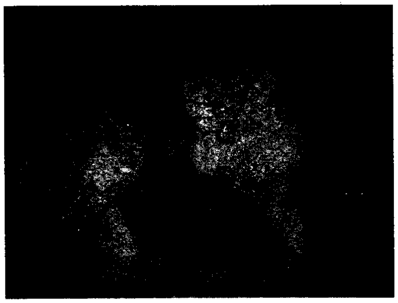
战神阿瑞斯 (Ares) 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Ares 是希腊人的称谓；他的罗马名字叫马尔斯 (Mars)，这个名字同时代表九大行星中的火星。他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他司职战争，形象英俊，性格强暴好斗，十分喜欢打仗。他同时是嗜杀、血腥、人类祸灾的化身。

在《商文明》(第 186 页) “ 军事力量 ” 一节中，张光直先生说：“ 让我们来看看商王朝的职业军人。首先在甲骨卜辞中，有许多不同的称号，可能指的是军官，陈梦家列举如下：马(可能为 “ 马师 ” ①)、亚(一种相当重要的军事称号)、箙(射箭者的首领？)、射(射箭者的首领？)、卫(士兵之长？)、犬(犬师？)、戍(前线指挥官？)。虽然他们的作用还不是太清楚，然而从这些头衔可以明显看出，商王朝的军队建制有相当大的规模，并且机构也相当复杂。”

商王朝的军队机构可能并不复杂，上面的许多名称出现在卜辞中是一种祈祷，而不是编制，因为他们是神灵，而不是真正的战士与将军。出现在军事武装之首的那位 “ 马 ” 或 “ 马师 ” 不是别人，正是古代意大利同样崇拜的、最重要的战神 “Mars” (马尔斯)！

假如说中国曾经与欧洲有过同样的风俗和神明，为什么后来中国人失去了所有与欧洲相通的商文化？我的解释是，后来的周是个一神教国家——犹太教，所有旧有的神明系统被抛弃了。周朝八百年，足够改变一切。但是，必须要注意到的是，这个改变可能只发生于统治阶层之中，至于百姓中的宗教信仰由于古代的行政组织处于原始散漫状态，许多民俗还是继续在民间遗留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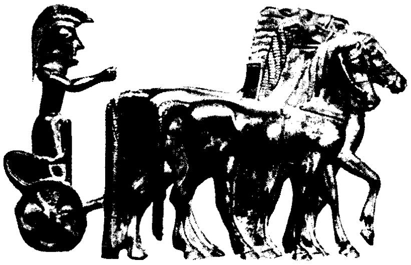

▲伊特鲁里亚怪兽造型


▲中国怪兽造型

▲伊斯兰世界中的怪兽

---

① [illegible]《商文明》[illegible]。



但人、意大利人和腓尼基人

假如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在远古有着神秘的文化联系，那么必须解释他们的分合途径，或者推理他们之间的关联是怎样产生的。

以色列十二个部族之一的但人的任何资料都是我关心的。在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联系方面也一样，但人可能在其中承担了一些神秘的穿插角色，在中国商、周之间他们可能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按照《圣经》的记载，但人家族曾经被分配在 Bashan 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实际上就处于腓尼基人聚集的黎巴嫩。

有想象力的研究者认为，但人曾经跨越整个地中海而到达了大不列颠岛，成为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这个事件必然会牵涉到腓尼基人，甚至牵涉到今天我们常说到的爱尔兰与苏格兰人的祖先：凯尔特人。实际上以上这些都让人怀疑，许多但人最终汇入腓尼基人当中。

在一篇名为“Tribe of Dan——Israel’s Biggest Nightmare?”中，作者猜测但人到达了地中海北岸，并且怀疑其目的地即为意大利半岛。假如我们考虑到时间是接近3000年前，而且接近伊特鲁里亚的发源时间，我们就不应该放弃这个可能性的探索。

尽管我已经在某些资料里看到一些只言片语说有西方人猜测失落的以色列部落到达过中国，但是还没有具体看到那些详细文字。可能他们从人种上武断地认为中国人的模样距离闪族人很远，所以最终放弃了探索。但有关人种这个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原因我已经在以往的书中讲过很多，人的外貌一代即可以改观，假如

是个群体的话，只要没有婚姻限制，过不了几百年多数人的族群即可完全掩盖或同化掉少数族群的特征。

“Israel’s Biggest Nightmare” 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说，“但人家族会不会取道黎巴嫩到达希腊，最后成为罗马人？” 不过，从地图上看，但人从那里去意大利半岛与进入中国西域在距离上差别不大。我想更有可能这个族群一分为二东西两别，一支去了中国，另外一支去了意大利半岛北部，但他们之间却一直保持了联系。这个可能是，在三千多年前这两个地区都是不发达地区，迁徙过去发展有着巨大的空间。这些人的一部分可能通过北方进入中国，另外有一部分进入红海，最后汇入中国后商，也有人进入陕西成为周人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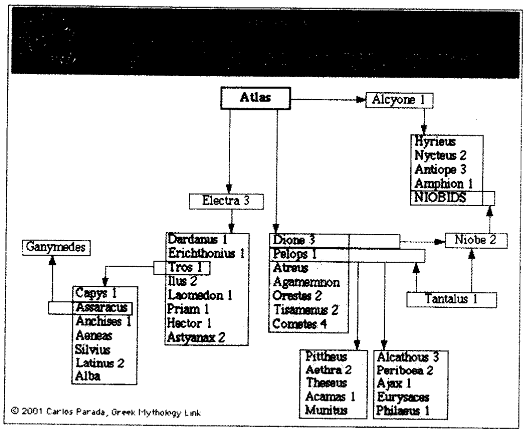
以下是那位作者的简单推论：

根据古希腊荷马史诗的传说，特洛伊城的建立者名字叫Dardanus。作者的意思是，这很接近Dan，应该是失落的但家族。Dardanus有个儿子叫Erichthonius，再下一代的名字叫Tros——这就是特洛伊人（Trojans）与特洛伊城（Troy）的由来。

Tros有三个儿子：Ilus，Ganymede和Assaracus。特洛伊的最后一个君主Priam是Ilus的后代。

在埃涅阿斯·维吉尔（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的史诗《埃涅伊特》中，埃涅伊特（Aeneas）这位特洛伊英雄，安喀塞斯和阿佛洛狄忒的儿子，逃脱了特洛伊战争的灾难并流浪了七年，最后在意大利定居，建立了罗马帝国。他是Assaracus的后裔。

Ganymede是Dardanus的孙子，根据荷马史诗，宙斯因其貌美把他掳去做众神的添酒人。作者认为这条线索可以引向圣杯（Holy Grail）①的传说。


Atlas
Alcyone 1
Hyrieus
Nycteus 2
Antiope 3
Amphion 1
NIOBIDS
Electra 3
Ganymedes
Dardanus 1
Erichthonius 1
Tros 1
Ilus 2
Laomedon 1
Priam 1
Hector 1
Astyanax 2
Dione 3
Pelops 1
Atreus
Agamemnon
Orestes 2
Tisamenus 2
Cometes 4
Niobe 2
Tantalus 1
Capys 1
Assaracus
Anchises 1
Aeneas
Silvius
Latinus 2
Alba
Pittheus
Aethra 2
Theseus
Acamas 1
Munitus
Alcathous 3
Periboea 2
Ajax 1
Eurysaces
Philaeus 1
© 2001 Carlos Parada, Greek Mythology Link

▲《希腊神话》家族树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没有说宙斯怎样起用美少年Ganymede，但是在一

幅古罗马的镶嵌工艺上面有他们俩共同存在的情景，其中这位特洛伊王子被替换为一只鹰。作者认为这就是“但”家族作为古老特洛伊家族的一个可能线索，并且这说明但家族可能已经接受了鹰的族徽。

宙斯有时候以鹰的面目出现，有时候也以食蜂蜜的大蛇(serpent)出现。这里还牵涉到另外一条线索。“但”家族在《圣经》中第一族徽就是一条蛇，尤其巧合的是，这条蛇需要上供的也是蜂蜜。这个蜂蜜有可能指向大力士参孙谜语中的蜜蜂。几个世纪之后，特洛伊早期的居民斯巴达人(Spartans)和特洛伊人迁移到南法国，并进入德国境内。《the Apocryphal book I Maccabees②》一书的作者说，南希腊的斯巴达人认为他们的祖先与犹太人有关，并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人。斯巴达的国王还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祭祀就此写过一封信以确认。

在《圣经》中但人家族曾经使用过四种徽章：蛇、鹰、狮子与蜜蜂。后面曾经出现过那个著名的蜜蜂的谜语。狮子的尸体上有蜜蜂，它预示着但人家族将要摧毁犹太人，犹太人的象征是狮子。后来法国的梅罗文加(the Merovingian)王朝曾经在几个世纪中都保留了蜜蜂的神秘③。

① 关于“圣杯”的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一只圣餐杯，曾经盛放基督的血液。后来[illegible]把圣杯带到了英国[illegible]，从那时起，圣杯的下落就成了一个谜。传说[illegible]用过的。故事流传了数个世纪，在中世纪达到了顶峰。在不同版本的传说里，圣杯[illegible]一个盛放基督血液的[illegible]、银盘、一个大锅炉、一块天堂的石头、一个盒子、一条鱼、一只鸽子、一把剑、一柄矛、一支标枪、一本秘密的书、天赐的[illegible]、一颗被砍人的头颅、一道[illegible]的白光、一张桌子，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最早的圣杯罗曼司，是在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间写作的，其中的大部分写于1190年到1240年。这些故事伴随着圣殿骑士团在中世纪的欧洲兴起。在1200年罗伯特·德·鲍伦的作品《阿里马西亚的约瑟夫》和《梅林》中，[illegible]一部分，而不是完全为了[illegible]时非常受欢迎的[illegible]关系。[illegible]了一个[illegible]的故事，一个关于[illegible]的故事，一个人[illegible]磨难，才可以得到圣杯，那只有上帝才可以[illegible]得到它。（改编自《[illegible]》）

② Maccabees：马加比家族，公元前一世纪[illegible]的[illegible]大祭祀家族。[illegible]bee，意思是“蜜蜂”。

③ [illegible]：公元前1600年，[illegible]的[illegible]人从[illegible]向[illegible]北意大利处。公元前625年，[illegible]人在今日的马赛地区建立了一处贸易殖民地（[illegible]中国“三代”），繁荣了几个世纪。公元前125年罗马人开始征服高卢，公元前54年[illegible]完成了征服[illegible]。此后500年间，高卢人在罗马统治下逐渐罗马化。

罗马衰败后日耳曼人入侵高卢。6世纪时，[illegible]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人成为高卢的霸主。[illegible]落入查理大帝所建的加洛林王朝之手。他死后，帝国开始分裂。公元843年以后，[illegible]地区被称为法兰西。公元[illegible]，[illegible]为法兰西国王，卡佩王朝延续到公元1328年。

1328年[illegible]入[illegible]之争，15世纪[illegible]已与今日[illegible]差无几。16世纪[illegible]，[illegible]战争，[illegible]王位，[illegible]力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其后经过主教大臣[illegible]、[illegible]J. 马扎然的[illegible]，到路易十四亲政时法国专制王权进入鼎盛时期。

结合摩西关于 12 个部族的预言，但人家族作为小狮子将从“巴珊”跃起。在《圣经》中但人确实从巴珊消失了，但是到了哪里却不见提起。作者问：他们难道去了欧洲？是德国、丹麦、多瑙河畔还是爱尔兰、希腊或罗马？他没有问到东亚或中国。

作者继续说，《士师记》中说但人建立了一种偶像崇拜，主要敬日月，他们背离了犹太教。

我想这里作者可能想强调，早期地中海里的人们以及腓尼基人实际上都是万物有灵者，他们都没有显示出信仰犹太教的痕迹。

从以上的分析看，作为但人族徽的蛇、鹰、狮子与蜜蜂，除了蜜蜂之外，中国分享了其中的四分之三，或许我孤陋寡闻没有注意到中国有蜜蜂崇拜。中国倒是一直有蝴蝶崇拜，不知道是否是蜜蜂到蝴蝶发生了转变。蛇、鹰、狮子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崇拜物。鹰的崇拜主要在北方草原民族那里，蛇与狮在陕西山西一带最盛，其实全国汉族地区皆有蛇与狮子的图腾痕迹。蛇就是龙。

但人到底去了哪里？我想我们在短期内不会有准确的答案。但是资料的搜集慢慢会帮助我们解开这些历史之谜，坚定不移的探索精神会距离文明起源的“圣杯”越来越近。

▲伊特鲁里亚的妇女地位一般比较高，希腊相对没有伊那么高，比如出席酒会之类的场所一般是夫妻同往，但这在希腊是不允许的。考古学和历史文献证明，伊特鲁里亚的妇女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在地中海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在一个家族的坟墓里，妇女安息的地方与他们的父亲、丈夫、兄弟或儿子一样显要。妇女的陪葬品上还通常刻着这些妇女的名字。就这些方面，罗马人以及希腊人对他们多有谴责，声讨他们不道德。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对于我们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周人谴责商人的生活也多半是不道德，尤其是对那个妲己的声讨已经上升到“红颜祸水”，骂声千年不绝。假如这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在取得政权之后，周人肯定要做出加倍的努力争取在道德上赢回他们的支持，会反商之道而行之，进行彻底的道德净化，对妇女的地位加以限制，而且据说连酒的使用也受到了限制，相对于商人而言，周人的生活是肃穆而沉闷的，我认为这可能也与宗教有关。

正统观点中的伊特鲁里亚人

伊特鲁里亚有12个民族，同时可能有12个自治区。这与犹太人的12部落恰好数目契合，尚不知道其起源和用意是否真的与犹太人有些什么关系，比如一种纪念，或者一种异地重建。较多人认为伊特鲁里亚最早的起源接近3000年前，但鼎盛期是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在这个时期世界上有几件大事同时发生，应该把它们联系起来。一个是以色列国与犹太国灭亡，他们受到驱逐，流落到中亚附近；同时中国西部与北部突然出现了一个以凶悍著称的游牧民族：匈奴；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浮出水面。

整个地中海东北地区，不仅使用谢克尔这个单位，而且也使用一个中国的单位“石(dan)”——他兰特，伊特鲁里人也使用这个衡量单位。而这两个计量单位我认为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使用的，请参见《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第289页。

伊特鲁里亚人的语言不属于印欧语系，实际上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语系。这让人想起来东亚的两个岛国：朝鲜半岛与日本，这两种语言同样找不到归属。当然，没有归属本身并不能成为他们是同源的证据，但也同样不能否认同源的可能。另外，后两者同样在东亚，而且恰在太平洋西区，距离商朝祖先所在的山东半岛很近，这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些有趣的联想。

伊特鲁里亚人到底来自哪里是人们一直关心的。“1885年，在爱琴海的莱姆岛上工作的法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石柱，后来证实这个石柱的年代在公元前6世纪。绕着柱子刻着33个词，

其文字非常像伊特鲁里亚语。大约过了半个世纪，在这个岛上工作的意大利人才再次发现了刻有同样文字的陶瓦片，这是已知的同伊特鲁里亚语唯一有关联的文字。学者认为，在公元前 6 世纪下半叶雅典人征服这个岛之前，岛上的居民可能就已在使用这种语言，但随后希腊语逐渐取代了它。但这种语言同西部 700 英里之外的伊特鲁里亚人所使用的语言到底有何种关联，却无从得知。①” 假如这个线索可靠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这些伊特鲁里亚人可能从土耳其方向而来，在希腊附近短暂停留然后继续向西，一部分人就落脚在意大利，而剩余的或许继续向西。

曾经传说伊特鲁里亚人是土耳其的吕底亚人的流行观点被否定，并且吕底亚语被证明属于印欧语言。现在人们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更多受叙利亚人、腓尼基人以及希腊人的影响，并且时间是公元前 1100 年左右，或许与赫梯文化有一定关系。看到这些正统观点我很高兴，这个结论起码可以说明，腓尼基人与赫梯人一直有着密切的友好联系，或许他们长期有盟友之谊。我更是认为中国商朝主要就是腓尼基人与赫梯人的联姻结盟政权。

“考古记录表明……情况在公元前 1300 年 ~ 公元前 1000 年的青铜器时代晚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学者们还不了解历史进程为什么会突然中断，但是有的居民点确实被遗弃了，更大、更加坚固的中心开始发展起来。从那时起，葬礼习俗也发生了变化，火葬成为一种标准。考古学家同时还发现这个时期有来自地中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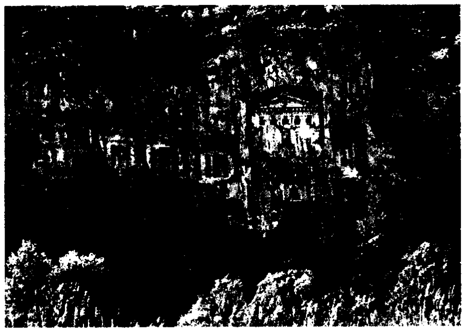
▲比较典型的伊特鲁里亚人墓室内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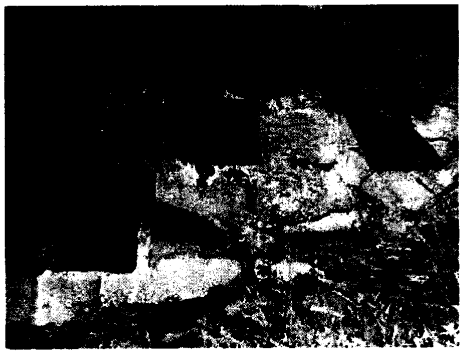
①《伊特鲁里亚人 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第 21 ~ 22 页。

东部地区的物品，这表明当时两地之间存在某种贸易联系。”①

伊特鲁里亚人有许多特性与生活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雷同，比如他们一样有在悬崖峭壁上打洞做墓的习惯。我之所以没有一下子说他们共同具有中国人所熟悉的“悬棺”是因为那确实与中国的有些不同，中国的悬棺只是一个简单的洞，有的甚至就是自然的山洞，而地中海东北地区的“悬棺”更适合叫“悬墓”，他们雕刻华丽的墓室于悬崖上，像建立一座小型神庙一般，然后再把棺材放进去。但是某些中国悬墓确实与他们有些接近的成分，比如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就有类似的悬墓。



▲土耳其境内发现的崖墓，或者说赫梯人使用的崖墓。



▲具有1800年历史的中国云南綦江人崖墓，该样式的墓葬方式一直延伸到与云南相邻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可能与一个名叫“僚人”的族群有关。崖墓开得越高，意味着“升天”越容易。墓室外篆刻的图案和文字已相当模糊，但墓穴内的水波纹、斜纹等仍清晰可辨。

中国悬棺出现的最早年代是大约3840年前，恰好是商朝祖先起源的大致年代，他们从福建登陆，这在中国的东南角。

悬棺文化实际上在整个东南亚都存在，并且明显沿海路前进到达中国，登陆点比较肯定是在中国福建。后来这条线沿长江逆流，在汉代一直到达陕西南部。最合理的解释是，腓尼基人或他们的前身迦南人带来了这个习惯。这个推测既符合殷商的以扫踪迹，从红海沿海路而来，时间上也恰好获得对应，也符合赫梯人简狄与他们会合的可能。但是从考古来看，中国南方才更盛行悬棺。这可能暗示了水路腓尼基人在南方的影响力。南方的地形大概也更有条件做出水边的悬棺，北方缺乏这样的条件可能渐渐放弃了

---

①《伊特鲁里亚人 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第28页。

这个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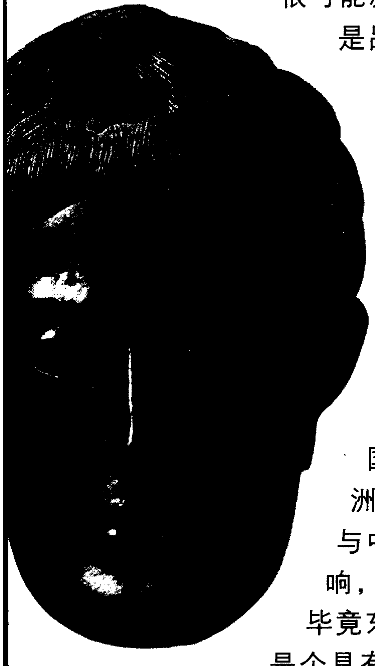
▲伊特鲁里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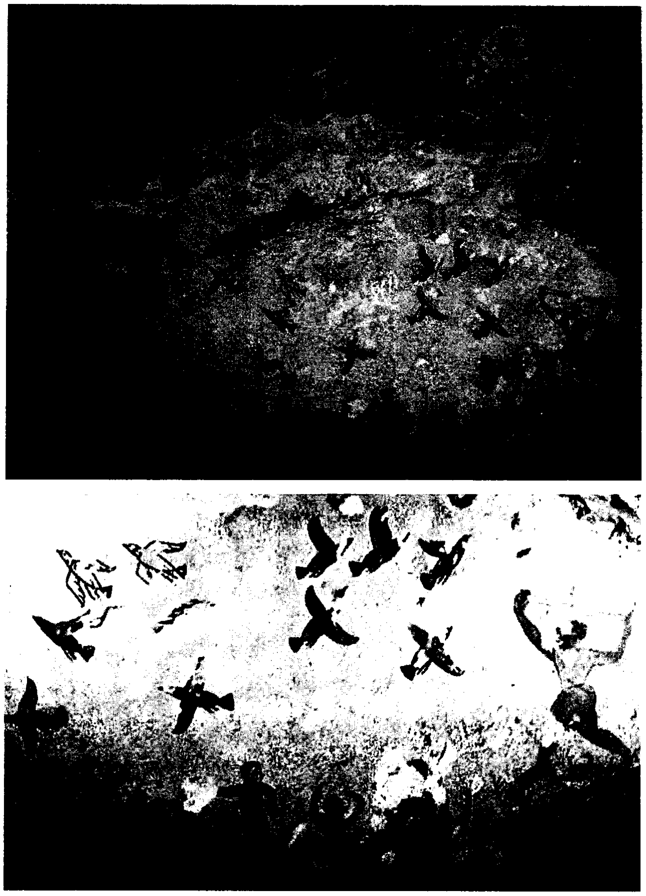
伊特鲁里亚人的埋葬方式各种各样，或许这是他们民族融合的结果，有火葬、土葬，有瓮棺，有石棺，也有石床，不一而足。

“有一点事实是无可争辩的，那就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确实遭受了厄运，当时有许多民族因此迁徙。不知从哪里来的攻击者占领了土耳其的希泰族王国，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也因此崩溃。就连有近2000年法老统治的埃及也遭到了严重威胁，……拉美西斯三世把这个敌人称为海上民族。历史学家对这些海上入侵者的身份仍存在争议，不过有人认为以色列人未来的敌人，巨人歌利亚的菲力士族人也在攻击者之列。” 菲力士人应该属于迦南人的一支。

“如果说伊特鲁里亚曾有过大量移民拥入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学者们认为，假如不是吕底亚人的话，那肯定是其他一些地中海东部居民或民族迁徙到了意大利，并带来了不同于他们欧洲近邻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他们的存在可以解释莱姆诺斯石柱所暗示的语言关联。不过，东西方之间进行接触的证据用贸易上的往来也可以解释得通。”

从以上的蛛丝马迹来分析，即便我们不能马上与中国后商到西周的动荡变革来推理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但既然中国的商人已经被一些人认定逃窜向遥远的美洲，部分人逃向南方，那么部分人跑回欧洲与中东附近又有什么奇怪？即便撇开直接的影响，多米诺骨牌式的波及效应还是应该有的，毕竟东亚的改朝换代是个大事情，中国地区已经是个具有文字与帝王传统的文明大国了，所以这里


▲伊特鲁里亚人



▲假如没有人告诉我真相，我会认为这些场景是中国古人的生活图景，而实际上这些出自伊特鲁里亚墓室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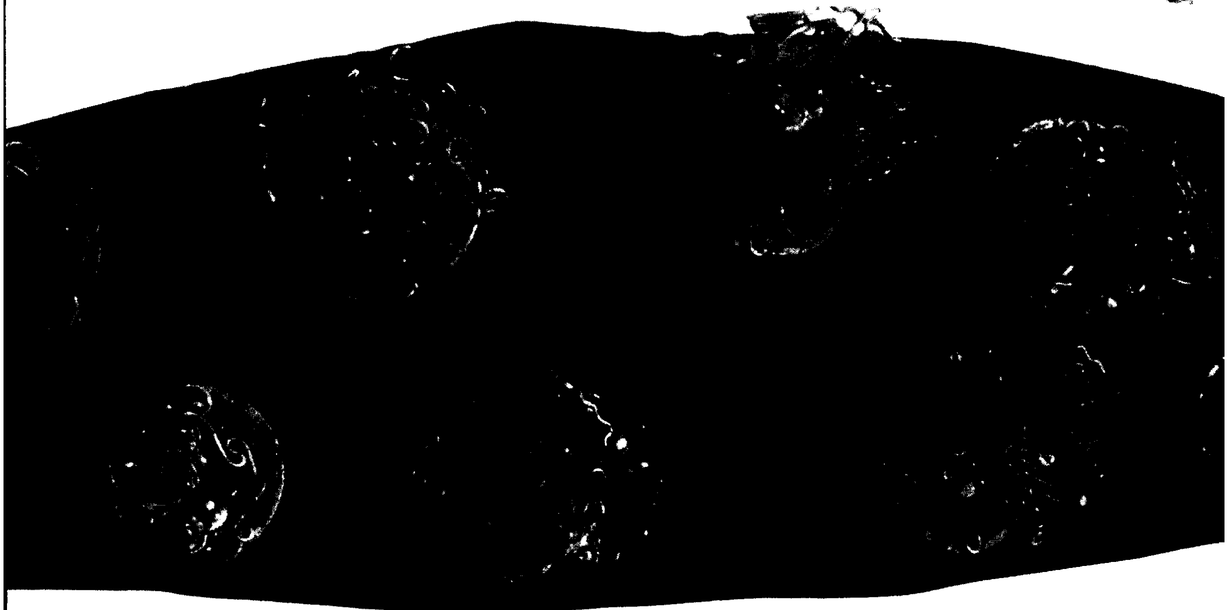
引起的动荡是可以想象的。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这个未明的海上民族，尽管也是腓尼基人的一部分，但他们与商朝建设者却并非同一分支，他们同样在东亚袭击骚扰商人，所以商人一再地被迫转移首都“八迁”到内地。

在中国中原地区，即便不能作出其他的明确推测，但经济与文化在后商得到了一次飞跃却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复杂的甲骨文在后商（大约公元前1300年前）突然出现，它应该是这次飞跃的一个标志和象征。这次飞跃是否会使其跃跃欲试在全球寻找机会是个疑问。但假如我们认定腓尼基人参与了商朝建设，他们就一定与这次全球事件有关。因为无论“海上民族”还是以色列南面的菲力士人，都与腓尼基人有关。我甚至想推测，或许在鼎盛时期的商人摊子过大，他们准备四面出击，而突然后备空虚，

或者加上穷兵黩武，所以才导致了周人的乘虚而入、取而代之！最后经过艰苦的奋战，腓尼基人两头失败，在中国他们四散于中原之外，在欧洲他们更多走向遥远的地中海，尤其是集中于伊特鲁里亚地区，在那里没有强敌方便静静疗伤，舔舐自己那鲁莽的伤痕。

在有据可查的明朝，远在东南亚和东亚的小国还向遥远的中国上贡，事实上整个印度洋两岸地区都会向一些遥远的大国上贡以求保护，这个现象同样会出现在更古的史前时期，所以埃及或者赫梯这样大国的生生灭灭是会产生许多联动反应的，东亚也一样会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将“三代”生灭与西方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再来观察伊特鲁里亚人的联动就不那么生涩了。

公元前7世纪的伊特鲁里亚人极其奢侈。“制造这些奢侈品所需的贵重金属在当地是无法获得的，还有鸵鸟蛋，精巧的彩色陶器，以及在其他古墓中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其他手工艺品，在当地也都是无法得到的。这些东西必须从遥远的地方进口，比如埃及、北叙利亚、亚述、塞浦路斯、小亚细亚以及腓尼基的港口



▲黄金的“微粒工艺”在中国也称作“金珠工艺”，主要在中国的东北方尤其是少数民族那里盛行。这个工艺据说最初出自美索不达米亚，后来在那里失传了。中国人与伊特鲁里亚人在古代却都擅长这个工艺。

和希腊这样的地方①。”“历史学家不能描述出每一种物品被运往伊特鲁里亚时所走的确切路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腓尼基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腓尼基商人融经商的机智敏锐和高超的航海技术于一身，他们在海上航行了几个世纪，从他们在地中海东岸的家园出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更远的地方去……”即便不能说伊特鲁里亚人就是腓尼基人，或者即便不能说伊特鲁里亚人中间含有腓尼基人，但是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的紧密联系却是不能否认或漠视的。

一般认为，欧洲的文明主要来源于希腊与伊特鲁里亚，并且更直接地来源于伊特鲁里亚，那么我们要问，伊特鲁里亚人何以有这样的底蕴去传播他们的文明？他们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低级幼稚的浅薄文明。遗憾的是他们的起源现在也没有理清。

从越来越多的资料看，《希腊神话》恐怕并不是希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独创的，它还融合了小亚细亚人以及伊特鲁里亚人的许多故事在里面，甚至可能囊括进了来自中国的一些故事，而所谓《罗马神话》是《希腊神话》的翻版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假如较真的话其实也值得斟酌。尤其是，除了已知的两个版本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更小的不出名的一些版本，只是它们还未被发现，或者研究得不够。比如希腊的赫拉在罗马叫朱诺，在伊特鲁里亚那里可能相当于“尤尼”这个女神，那么尤尼代表的就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较弱的体系。并且他们的一个男神叫“廷”或“廷尼亚”，主要司雷电，与中国的黄帝比较接近，当中国人说“雷霆万钧”的时候会有人想到这个“雷霆”与“廷尼亚”的联系吗？

伊特鲁里亚人到底有什么样政治体制？这段话是个参考：“古典作家的研究资料揭示出，伊特鲁里亚人在处理内部事务方面，与希腊的文明社会极为相似。他们暗示，伊特鲁里亚的城镇由一些叫做卢卡蒙的官员统治着，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几群村民首先聚集到城邦里，这些官员的权力可能得到发展。卢卡蒙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仍不清楚。一份罗马的资料提到卢卡蒙时将他作为一个祭司，而不是一位国王，这表明，这个官职的职责后来可能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的。历史学家猜测，每一个城邦的实际权力可能是掌握在一个政治寡头的手中，这个政治寡头由独具领

① 他们甚至与中非有着商业来往，比如多数驼鸟蛋就是从中非贩进的。

导地位的家庭组成，他们肯定控制着大部分的财富。”“然而，有一种更加个人化和神化的领导力量也存在着。”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商朝的体制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才能与伊特鲁里亚人的体制作出深入比较。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商王主要职责就是祭祀，类似占卜这样的事情都是由商王主持的，他们亲自参与占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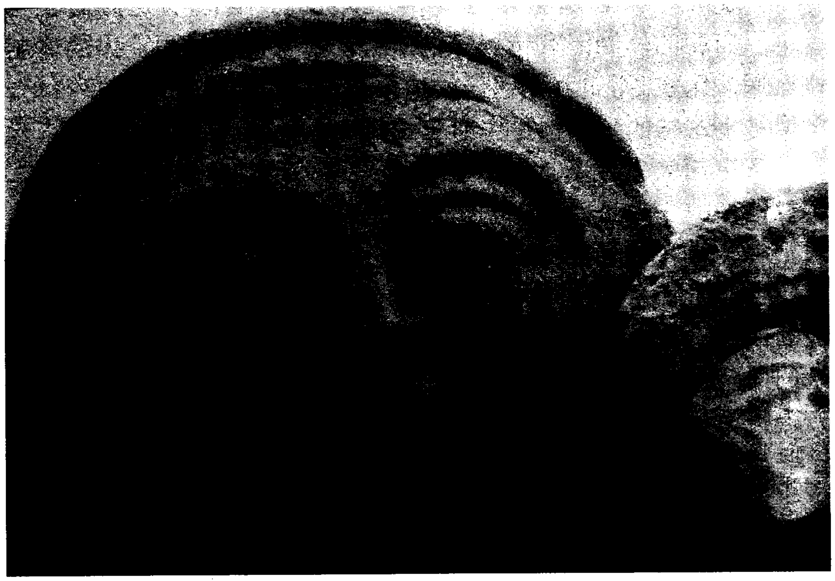
与中国大多数墓地都有镇墓兽一样，伊特鲁里亚人的也有，不过他们的一般是两头狮子，假如是在墓室外边的话。今天中国人把狮子作为镇宅兽使用，大门外一边一个。

当然了，意大利与中国的接近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的比萨饼被中国人称做馅儿放在了外面的包子，而中国人最爱吃的面条在意大利则是神奇的通心粉面。确实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流行面条，这就是东亚与意大利。当我们深入研究时将会发现这些与意大利接近的中国食物多分布在中国北方而不是南方，就更进一步加强了建都于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与伊特鲁里亚人的联系，无论山东、河南还是渤海湾或者商王朝所在地，都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北方。当然，这可能是由气候和物产决定的，比如南方生产稻米没有小麦，自然就不吃面。

在服装方面也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值得一说。在伊特鲁里亚有一个肩膀裸露的习惯，但是这个服装样式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也有，并且更加古老，比如游牧的贝都因人，他们如今生活在以色列与埃及附近。中国的藏区牧民保留了这个服装习惯。

一个有关鞋子的特别现象同时出现于中国与伊特鲁里亚，除了两地都有尖鞋子之外，两地共有一种特殊的厚鞋底，它们有现代曾经流行的松糕鞋一样的大厚底。在古代的伊特鲁里亚它叫“伊特鲁里亚凉鞋”，鞋底厚度可达几英寸。据说这种凉鞋普通人放弃实际使用，只有艺术女神在装扮时才穿着。伊特鲁里亚人喜欢体育与戏剧，尤其戏剧很发达，有大剧场，所以这些鞋子曾经流行。奇怪的是，中国古装戏剧里同样也有大量这样的鞋子，比如京剧里它们叫“朝靴”，不过主要是男人穿。中国的现实生活里一直有人穿类似的鞋子，其使用者为一个特殊的北方民族：满族。他们生活于渤海湾附近，距离山东半岛不

▲此图为满族妇女所穿的高底旗鞋。



▲伊特鲁里亚人的“滴水”，今天这样的物品是中国传统房屋建筑的必需品。

▲尽管伊特鲁里亚人并无信仰《圣经》的痕迹，但他们那里依然有带翅膀的天使，而且有明显的12崇拜与7崇拜。

罗马帝国在公元前6世纪取代伊特鲁里亚。在此之前，他们的宗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一种享乐与放纵改变为内敛有宗教感的有惩罚性的宗教。绿色妖魔卡伦或希腊人说的卡戎开始出现，带翅膀的魔鬼等也同时出现。魔鬼使用红色的船把人的灵魂给渡到合适的地方。这些都可以在中国风俗中找到对应。

远。这种怪鞋叫“旗鞋”，有的跟部中央高达五寸以上的厚度。

鞋的古代称谓很多，有屦、履、舄等。其中以“舄”最为显贵。据说“舄”始于周代，只在朝觐、祭祀等礼仪场合穿着。“舄”就是我们关注的厚底鞋。“舄”多用兽皮或丝绸做面，布底之下加一厚木为底，有的还在木上注蜡，以防潮湿。周代“舄”有等级之分，天子足登赤舄，依次为赤、白、黑；王后之舄亦为厚底及赤、青、元三色。夏用葛麻、丝绸，冬用兽皮制作而成。“舄”是不是“伊特鲁里亚凉鞋”呢?

满族妇女穿的木底丝鞋，形似花盆，也被称为“盆底鞋”。有的像马蹄，称“马蹄底鞋”。鞋跟都用白细布裱蒙，鞋面用刺绣、穿珠等工艺，作为满族人的慈禧太后穿的高底鞋，把鞋头做成一个凤头形，嘴衔珠穗，称为“凤头鞋”。

旗鞋中至今依然保留有尖头的，并且只有贵族妇女才使用高底鞋。之所以只有贵族妇女使用自然有劳动人民穿之不方便的道理，但我觉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可追究。比如“舄”为显贵所用的传统可能一直保留至今。

除了生活，伊特鲁里亚人也很擅长农业生产，尤其是水利工程。伊特鲁里亚生产小麦、大麦、黍、豌豆、扁豆等。

假牙的齿桥据说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发明，并且所有用金子做的齿桥都出现在当时的女人口中而不是男人口中。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有喜欢镶金牙的，并且男女同样喜好，表示金贵。

在所谓伊特鲁里亚的“科学”方面与中国的传统迷信极为接近。他们视死如生，相信来世。他们也认为天空是圆的，东方比西方吉利①。他们喜欢占卜，几乎一切都可以用来占卜，比如使用羊肝、雷电，甚至飞翔的小鸟，祭司被认为可以呼风唤雨。不过这样的占卜许多像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而来。中国与他们的相似也不例外。

对于神庙建筑，伊特鲁里亚人除了地基使用石头外其他部分使用木头。希腊人的庙宇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出，但伊特鲁里亚人的却只能从一个方向进出。与希腊神庙不同是，伊特鲁里亚庙宇被油彩涂得五颜六色、色彩丰富，并且由于是木头建筑还有装饰性屋瓦，此物可能就是中国的“滴水”。

他们常常在庙宇的三角墙上放一尊赤陶雕像，通常是带有宗

---

① [illegible]

教性质的神像。一些几乎如真人大小的神话人物雕像就放置在屋内的墙边①。所有这些特征几乎是对中国传统庙宇的特写。

实际上中国的庙宇与房屋很接近，多是三间正房。“滴水”瓦当这样的装饰使用，以及山脊的出现，我认为都与远在地中海东北地区的文化密切相连。或许我们不能说中国的这些传统来自地中海沿岸，但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两地有巨大的关联就足够了。或者东方引进到西方，又或者从西方引进到东方，这个方向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交流，看到了交流的两端集中在商周时期，并且与许多海上民族有关，这才是重要的。

如此多的相像确实指出的是同源的可能，但并没有排除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尤其是从伊特鲁里亚一直到中国的内陆线上一定会涉及的波斯区域，但因为这本书只准备关注海洋文化，并且只局限于商代前后，所以跳跃过波斯不谈。我相信在“三代”之前的陶瓷时代以及波斯帝国兴盛的时代曾经对中国也有过巨大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是中国的东部文化，尤其是延续到今天的东部文化，波斯的影响力则相对有限。如今潜在的“西来说”者之所以对波斯这块土地注意力过大，是忽视了或低估了海航能力的结果。一旦了解海洋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的影响，那么他们会马上注意到红海这个区域里的埃及文明在中国的影响力会是多么强大。实际上，航海能力的确认是“西来说”中心南移的必要条件，缺乏这个前提一切都将失败。

▲伊特鲁里亚人都喜欢头上戴桃叶编制的花环，他们为什么如此，还没有答案。但是在中国桃具有辟邪的功能，这很明显。而在犹太教的文化影响中，杏类更神圣一些。假如有办法证明伊特鲁里亚人的桃枝花环是一种宗教象征，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与中国桃具有同源关系。

▲伊特鲁里亚人墓室中描绘的生活图景

---

① 参考《伊特鲁里亚人 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第157页。

第四部分

必要的其他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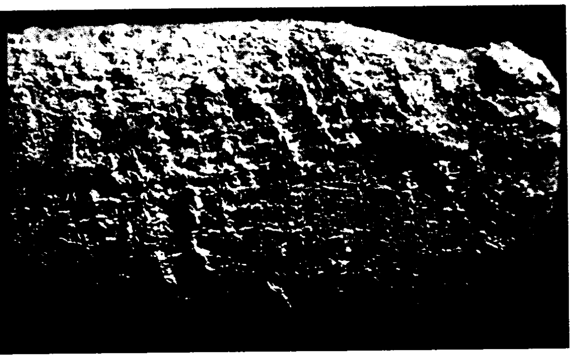
[illegible]赫梯人

腓尼基人的历史，在考古学上可以很容易将他们的早期蓬勃追溯到青铜器时代后期。那时，埃及是无可置疑的世界霸主，腓尼基人也就处于埃及人的势力范围以内。等到南方埃及势力稍减而北方赫梯王国崛起，腓尼基人又被赫梯人所掌握。所以，假如要了解腓尼基人，不仅了解埃及是必要的，了解赫梯更是必要的，更何况我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中还提出《圣经》中以扫与赫梯人妻子 Judie 可能是中国商朝统治者的祖先。

以扫的身份很清楚为希伯来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但他肯定不是以色列人。他的身份很符合前面我们提到的某些迦南人转化为腓尼基人的历史，既是希伯来人，但却又是阿拉伯人。

我不是唯一怀疑中国古代与赫梯有牵连的人。苏雪林在《屈

▲古代安纳托利亚人



▲ 9000 年前的安纳托利亚亚麻布

赋研究》中说：“近代俄人考古发掘古代西提亚① 国王陵墓，见其陵墓外观，广阔高峻，极像中国帝王之陵；内部衣服、弓矢、刀剑之形式装饰，多与中国蒙古相仿佛。西提亚古时与我国本有文化上交通，文化彼此沾染，不足为异。”

中国商人很可能从西部路径接受了赫梯人，严格地讲这里涉及的是“新赫梯人”，在他们之前还有更加古老的赫梯人。

“新赫梯人”居住在接近叙利亚与两河流域的北部，也就是安纳托利亚的东南地区，此处也接近黎巴嫩。这里与中国西部之间隔着一个伊朗高原。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亚拉姆语(Aramaic)，属迦南语系——这一点已经可以从语言上证明他们与腓尼基人是有渊源的。也有人说赫梯人受到过雅利安语的影响。

“新赫梯人”的帝国兴盛于大约3700年前，消失于3200年前，恰好与中国商朝大致同期。在当时他们是埃及的劲敌。假如我们知道夏甲是埃及背景，那么兴旺时期的赫梯人联合其他力量在东亚推翻夏朝就顺理成章了。赫梯人或许是“轮流坐庄”的王室一员。

除了我们曾经推测的商朝祖母简狄很可能就是一位来自赫梯的公主Judie，更多支持的因素有：恰在赫梯王国时期妇女地位极高，曾经有国王与王后共同执政的情况，对比中国商朝妇女地位也很高，这点与后来的意大利古人也很接近。另外，这里当时与以色列关系密切，曾经为盟友关系，他们曾经联合对付埃及以及夹在他们之间的叙利亚人，以扫与Judie联姻就是个证明。这一地区文明高度发达，在尚未产生陶器之时首先具有了冶炼技术，并且这里车的使用也早于中国地区。此地当时的宗教体系也与中国地区接近。更为重要的是，安纳托利亚时期狮子图腾兴盛，后来亚述等继承了这一特点，而中国狮子文化也很发达。除了崇拜狮子，他们还崇拜鸭子、鹿、牛，甚至乌龟。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考古中常见的图腾。赫梯人也热衷印章文化，很是盛行。

他们敬拜的神仙主要是天气神：雷神是最重要的一位，然后是大地母亲或丰饶女神。中国人喜欢说的“天打五雷轰”正合了安纳托利亚人② 喜欢的诅咒。

铁的冶炼是从安纳托利亚这里首起的。最初的铁由于坚硬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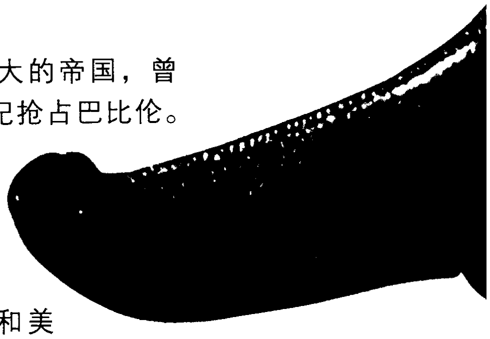
① 在今日土耳其境内。

② 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亚洲部分，[illegible]古代文化的总称。本书主要内容参考《安纳托利亚：文化重叠之地》一书。

为利刃，贵比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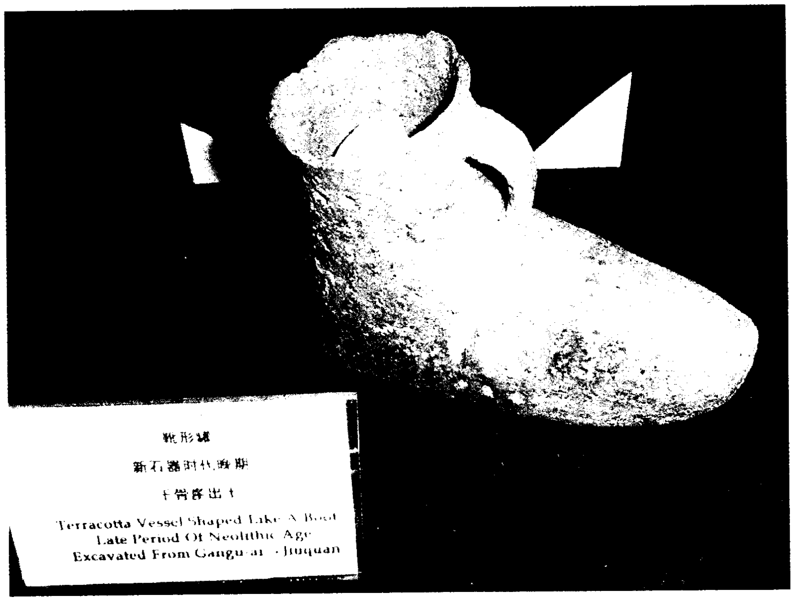
阅读安纳托利亚人的历史，有一些现象让人想到中国传统社会。比如说“还愿”——这是个频繁出现的安纳托利亚时期的行为，它牵涉到许多神像与物品的供奉。中国即便在今天的现实里也存在有这个习俗，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还愿”只是来自佛教的习惯，我想这是个误解。中国史前文化很少提及这一现象，尤其是“三代”期间的文化现象至今没有看到过有人论述这方面情况。比如中国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文化就没有人提出那里的祭祀坑是否属于“还愿”的可能。

赫梯是当时中东附近最为强大的帝国，曾经攻入两河流域，在公元前16世纪抢占巴比伦。与劲敌埃及相比，它确实具有更为便利的地理条件深入中国西北地区。



▲伊特鲁里亚出土的奇特的靴型陶器

在商业方面，“安纳托利亚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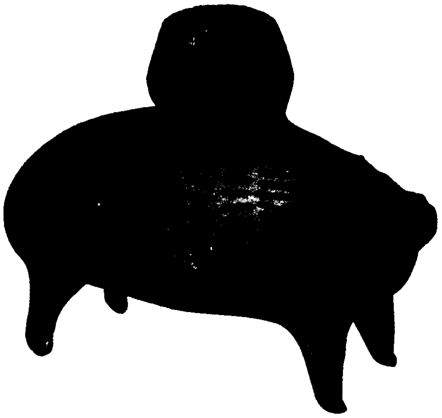

靴形罐
新石器时代晚期
干骨崖出土
Terracotta Vessel Shaped Like A Boot
Late Period Of Neolithic Age
Excavated From Ganguyai · Jiuquan

▲中国甘肃省酒泉出土新石器时期陶器，中国青海马家窑文化中也有类似物品发现。这些器物显示了赫梯文化与中国西北的紧密文化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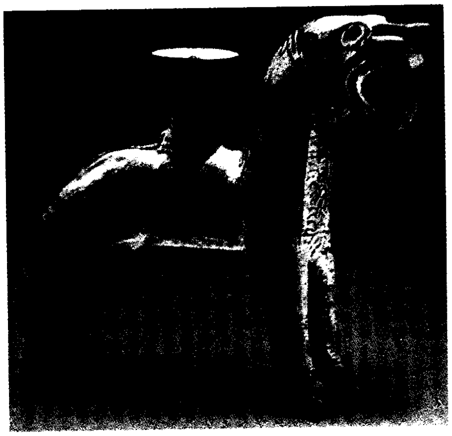
索不达米亚之间曾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赢利的商贸系统，历时200年。公元前1950年，亚述商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建了至少10个永久性的卡鲁姆（也就是商业聚居地）。骑驴的商队把金银和铜从这些卡鲁姆运往亚述阿苏尔城，从那里运回纺织品、服装、香料及对生产青铜必不可少的锡。工艺技术在这些卡鲁姆兴旺起来，生产的物品包括……仪式用动物造型的陶器器皿——用以为众神分发奠酒——及陶瓷靴子，它们那翘起的足尖部数世纪后成为赫梯服装的识别标志。亚述人给予安纳托利亚一件无价之宝——书写的知识。”

以上这段历史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商族的祖先根据推测恰好起源于这段历时200年的商贸繁忙期。所以他们在中国建

▲土耳其出土的安纳托利亚文化中的陶器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器皿



▲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文化器皿

▲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文化器皿

立了贸易殖民地是有极大可能的。

中国常常把一些远途据点称作“卡”或“卡子”，甚至“关卡”。“卡”这个词比较明显属于一个外来音译词，可能就起源于这些古代名叫“卡鲁姆”的商业聚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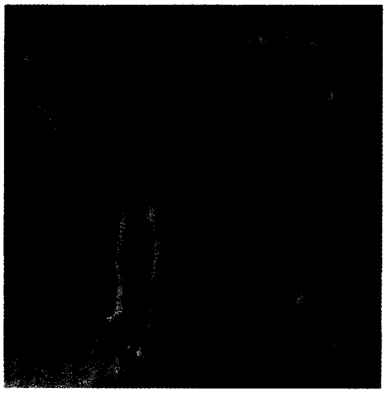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们强调了东西方曾经有过的长期交流，但那是为了打破“东西方无交流”的谬论，实际上东西方的交流一直都会是很困难的，这一点是应该得到认识的。但考虑到原始社会的淳朴，其实除了物质的保证条件比较差之外，可能其他的交流条件比我们想象的都好，很可能商路上的行人络绎不绝，张三初一出发，李四初二出发，王麻子初三出发，在这样的效应下，尽管一个新闻或时髦商品从中东到达中国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是却并不影响“源源不断”的状态。并且对于这样的交流也可以不考虑“一竿子插到底”的贯通，大

部分的商业与文明交流是通过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缓慢传递。

商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影响远离文明核心地区的因素，东亚可能尤其如此。所以商朝的建立，甚至“三代”的建立都可以集中向这个方向考虑，夏商尤其可以作如此考虑。

我没有忘记“西方”许多族群在人种上可能并不属于蒙古人种，当我说到人种的交流时更多是指上层少数“统治者”，但不得不承认许多所谓文明与他们之间关系更密切。实际上中国这个时期的考古恰好有一个现象与此相符：统治者与平民的人种并不统一，而平民多为蒙古人种，统治者多为其他人种。最终在中原地区其他人种的消失正是我曾经说过的多数原则起了作用①，文明保留了下来，但是人种却被占多数的蒙古人种给同化掉了。在中国的西部是相反的景象，蒙古人种多被非蒙古人种给同化掉了。

关于距离，并非谁离中国近谁就能在中国称王称霸，这里面完全是由其他一


▲山东胶县大汶口文化中的器皿

▲中国春秋器皿

▲中国汉朝器皿

① 参考《[illegible]》第55~56页。

些偶然因素造成的，比如一些商队在中国时间的长短，投入的大小，语言因素，文明程度高低。即便距离远，但只要发展快、文明层次高，完全可以在当时成千上百的方国中脱颖而出成为执牛耳者。

一些距离太近的国家，或许因为文明层次没有拉开，反而是远距离的、文明层次高的更有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大一些。比如在“三代”期间为什么不是印度对中国产生影响可能就是这个原理。因为印度的文明兴起相对中东为晚，是大约与中国同时兴起的，所以他们起码没有资格染指中国“三代”。反而是一些老牌的中东帝国在中国更有发言权。

赫梯历史上的某些片段值得中国人关心。

“公元前 1343 年国王苏比鲁利乌玛一世登上赫梯王位，开始其在短短的 20 年内使赫梯从王国跃升为帝国的不凡统治。就像古时《圣经》故事里所讲的，这一转变是伴随着一千辆马拉战车的轰鸣声实现的……苏比鲁利乌玛执政伊始面对的是正在迅速毁灭的王国。这一次麻烦并非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外敌的缓慢入侵。”

苏比鲁利乌玛一世在位期间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强大的帝国统治者，因为埃及人也向他求援。1906 年一位名叫温克勒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历史记载：在卡赫美士城（在今叙利亚）休息的苏比鲁利乌玛……接待了埃及信使……令这位国王感到惊讶的是，信使所带书信并非出自法老之手，而是一位女王写的。信中说，“我丈夫死了，也没有儿子。听说你有许多儿子。如果你派一个儿子到我这儿来，他将成为我的丈夫及埃及国王。”“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这位女王是图坦卡蒙的遗孀，然而现在有些学者提出她可能是爱赫那吞和内弗尔提提之女，斯蒙克卡尔之妻，爱赫那吞的直接继承人。”“苏比鲁利乌玛终于派去一位王子，然而为时已晚：埃及王朝已易主。”

假如不是赫梯声名显赫，埃及女王就不可能向其求援。

伟大的拓疆者苏比鲁利乌玛由于染上瘟疫于公元前 1322 年去世。中国的后商却是在几乎同时开始的。

尽管赫梯与埃及这两个帝国的核心相距遥远，但它们却可以说是两个“邻国”，因为叙利亚地区一直就向埃及帝国献贡，那么赫梯人的南下与腓尼基人的频繁往来实际上就是对于埃及帝国的一种威胁与蚕食。在许多年后两个超级大国在它们“边界”

的卡迭石①进行了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 1275 年。这次战争持续了 10 年，交战双方是苏比鲁利乌玛的孙子穆瓦塔利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结果不分胜负，但各自宣称自己是胜利者。据说赫梯人集结了 4 万人参加战斗，动员了“从海之尽头到赫梯国土的所有国家”。我很想知道这“海之尽头”是哪里，但无果，不过肯定很远很远。从上句话可以判断，赫梯人在当时的世界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在很远的地方都有殖民地。公元前 1259 年双方签订协议以后互不侵犯。

就在苏比鲁利乌玛统治时期，公元前 1300 年前后是后商发生裂变与突然获得文明跃升的一个时期。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商朝最后的国王桀纣的王后“妲己”恰好姓“苏”，是“苏比鲁利乌玛”的第一个音节，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我不觉得这个细节的提出是荒诞的，因为直接导致一个王国覆灭的王妃一再地被人们提及，她背后的“苏”姓家世是应该得到足够严肃关注的。我以往也提到过“苏”姓可能来自所罗门，还有更多的“可能”，到底是哪个，或者他们都是，或者他们都不是，都是可能的。

公元前 1246 年赫梯国王把长公主嫁给拉美西斯二世作为联姻，一切旧冤全部化解。法老把这位公主作为“两个国家的女主人”来迎接，而且在当时的埃及国土上——今天苏丹与埃塞俄比亚交界处，建立了宏伟的阿布 · 辛拜勒神庙，并且对这一和亲进行了各种方式的记载。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握手讲和，那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些相关地区的繁荣昌盛。中国的后商在这个期间突然获得了一次飞跃，甚至在中国出现了文字：甲骨文。他们之间的关联不能不得到关注。

仅只这两个国家的交往已经将地理上的中东之西北拉到了中东附近区域的东南角。这一地理跨度其实再一次提醒我们古代许多事实可能的“南辕北辙”与“天马行空”。这个距离已经足够从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画圆而圈进中国的版图。换句话说，假如赫梯人与今天地理上的苏丹埃塞俄比亚有密切联系，那么赫梯人与东亚的联系从逻辑上也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同距，甚至他们到中国来更为方便。

类似的大跨度地理与人群的调换并非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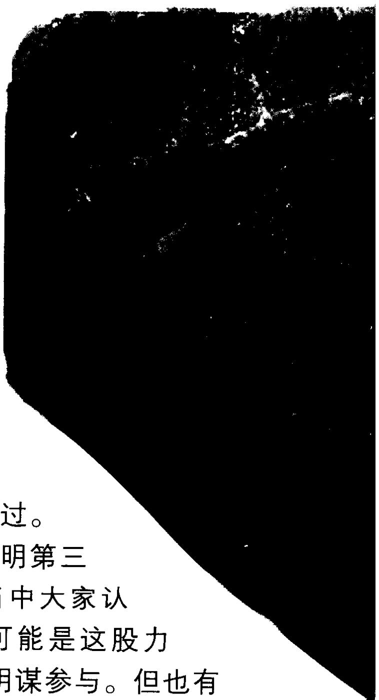
前6世纪早期，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卡里亚和爱奥尼亚的士兵曾经随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远征奴比亚①。这些事例说明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人群的移动不仅频繁，而且移动距离十分遥远，都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从红海南端的奴比亚再到东亚地区就不那么遥远了。这些历史事实为中国与红海以及地中海的联系作出了很好的注脚。

后来以地中海中部为核心的罗马帝国不仅统治了小亚细亚，而且统治了埃及，这个地理跨度就更显其大。罗马帝国最远的边境线之间等距于从东亚跨越到中东。

距离根本不是问题，观念才是问题的所在。

赫梯的君主继承制度并非一定为父子关系，也可兄弟或侄子继承，还有类似长老会的议会组织。公元前1465年，铁列平颁布继承法，只能父子继承。

从三千多年前开始，赫梯人开始称呼帝王为“太阳”，并且帝王开始具有“神性”。在此之前，他们的君王仅只是普通的统治者，神是神、人是人。就在相当于中国晚商时期，赫梯发生了以上的改变。我想东亚一定同时发生了改变，中国的纣王也称呼自己为“太阳神”了。这一传统在中国保留到现代社会，例如几十年前中国人还将领袖比喻为神圣的太阳。这方面，两地文化可谓高度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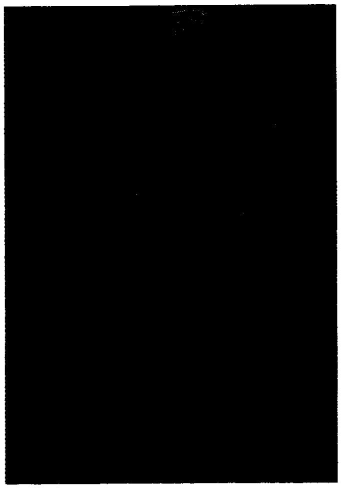
大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神秘灭亡。从目前发掘的博阿兹卡伊首都（在今天土耳其中部）看，这里遭受过一场巨大的灾难，到处都被大火焚烧过。奇怪的是埃及王国同时也受到了打击，说明第三种未知的力量袭击了他们。从一些文献当中大家认为包括腓尼基人在内的“海上民族”很可能是这股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还有本土人士的阴谋参与。但也有人认为是其后三个世纪的连续气候干旱导致了这些灾难。不过

---

① 戴尔·布朗主编《安纳托利亚 文化繁盛之地》第1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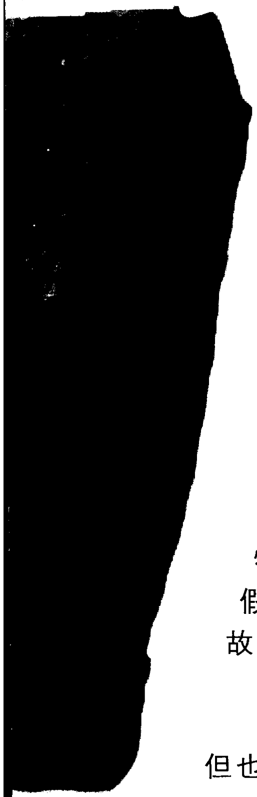
作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一定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就在赫梯人灭亡之后，中国商朝也瓦解了，“太阳王”商纣被周人的攻城大火烧死，另外一个王朝“周”在大约公元前 1047 年前后产生了。

尽管我们现在很难准确判定腓尼基人与赫梯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但初步可以认定两者都是中国商朝的重要参与者。不过，把商朝当作他们在中国的直接代言人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几百年的本土化肯定使一切发展得面目全非，过于直接的对应只能产生谬误。腓尼基人可以作为一个全球整体文化看待，但是具体到中国的“三代”却不能认为某一朝有他们的参与而后来的革命者中就没有他们的成分，这是错误的。因为腓尼基的内部肯定也有分支，基于他们分散如此广泛的特点肯定所依附也不同，所以“三代”期间可以假设三朝都有他们的参与，但无疑由于某种特殊的缘故商朝是腓尼基与赫梯文化色彩最重的一个王朝。



▲安纳托利亚文化中的母亲神“吉贝尔”。安纳托利亚地区曾经流行供奉大地女神、母亲女神或生殖神，名叫“吉贝尔”。巧合的是，这个发音在中国同样具有生殖含义，因为在俗语中男性生殖器就叫这个名称，普通话中一般表示为“鸡巴”，而豫西土话里可能保存了更为准确的“吉贝尔”，有明显的“r”化音。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有关，而且男性怎样从女性那里继承了这一称呼，我想可能与人类生殖知识的增长以及男性地位的增高有关。最初人们以为生殖是女性的特殊功能，所以崇拜她们的生殖功能，将她们称呼为“吉贝尔”，后来发现原来缺了男人也不能生育，所以精液与男根成为崇拜时尚，男人的“吉贝尔”的生殖含义就被突出，可见其本来与性别无关，与生殖有关。曾经有人研究说，中国的词汇“鸡巴”是从蒙古高原传播到中原的，这并不矛盾。都在大约北纬 40 度上，我想古代的迁徙最方便的其实是同纬度横迁，蒙古一带的人们更有可能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们交流，何况本来蒙汉皆为“炎黄子孙”。

▼ 3000 年前安纳托利亚的石刻雷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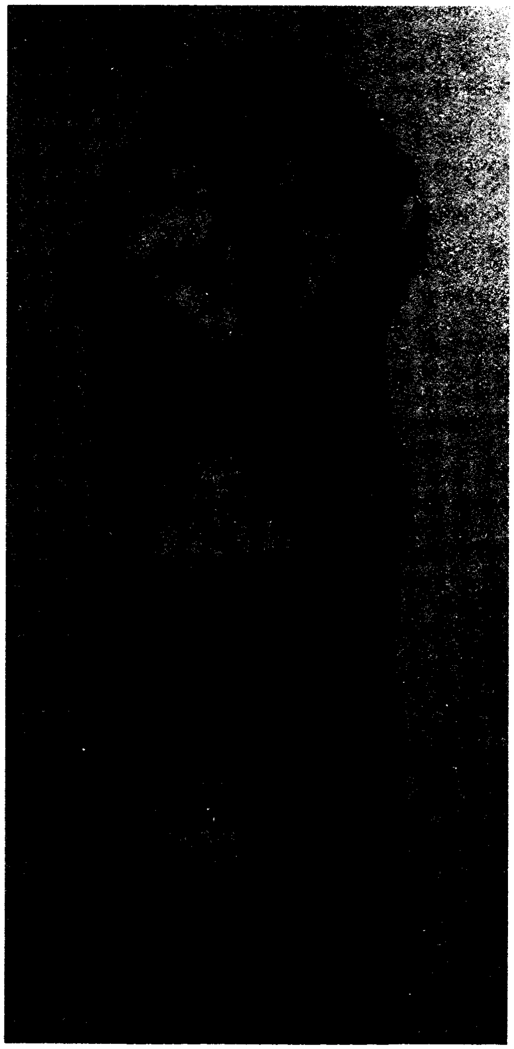


赫梯帝国时期使用许多不同的文字，有楔形文字，但也有象形文字，以及阿姆拉文字。但中国“三代”

前期主要发现的为类似腓尼基文字符号，尤其是后商时期甲骨文直接与腓尼基文字的一支“南阿”对接。赫梯人并不擅长文字。

小亚细亚这块欧洲与亚洲以及本土安纳托利亚文明的大熔炉，如今生活在那里的是逊尼派穆斯林人，他们讲土耳其语。

在安纳托利亚的历史漫游过程中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在大约北纬 40 度的欧洲与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沿渤海四周地区，以及土耳其，这些地区的古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古老爱好。


▲古代安纳托利亚女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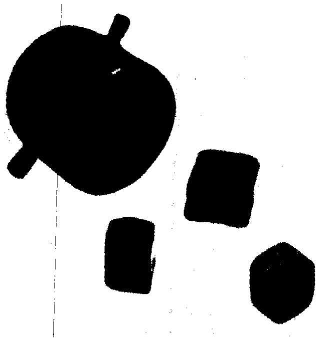
他们对于一种动物骨关节游戏格外青睐。有人说它是赌博用的骰子的前身。最初人们在宗教事物中广泛使用，后来成为地中海北部地区人们赌博使用的工具，可以表示“是”或“不是”。在中国今天看它们只是个玩具，尤其是流行在整个中国北方的所有牧区，以及与牧区接壤的南方农业地带。这就是“抓骨节”。甚至满清宫廷里妇女们也经常玩这个传统游戏。作为玩具的骨头牛羊猪的全有，但是牛骨太大，所以一般舍弃不用，羊骨最常用。据说最好的骨节是一种叫獾的骨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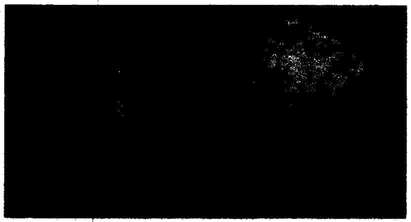
中国目前的玩法讲究六个面，赌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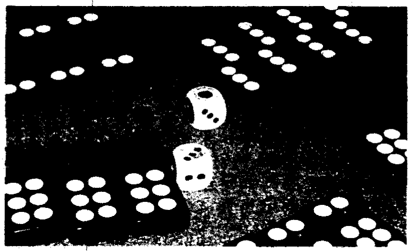
骰子也讲究六个面。中国现在抓骨节的游戏是抛类似一个沙包之类的玩具，在抛上空中的期间比赛谁翻的骨节面多来定输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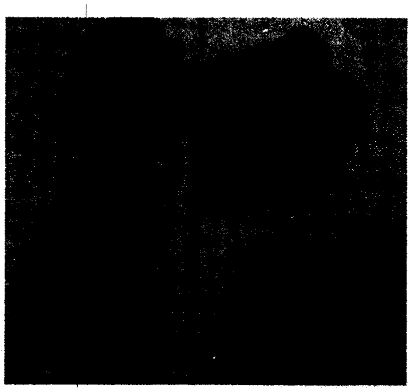
每个骨节有六个面，有不同的称呼，按照青海一带的说法它们是：较平的一面叫“胡尼”（羊），较凹的一面叫“牙玛”（山羊），横面凹者为“毛日马”（马），横面平面为“吾克尔”（牛），纵面凹者为“特买”（骆驼），纵面平者为“罗斯”（骡）①。

我相信以上这六个面的称呼都是外来语，比如“吾克尔”很明显就有“ox”（英语公牛）的痕迹，而它们整体来自哪个语系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或许从类似的语言分析中还能发现更多有趣的问题。初步看应该来自游牧民族，而且可能属于印欧语系，或许带有波斯一带的方言也说不准，因为从地中海北部到中国，必然要经过小亚细亚以及波斯等。


▲意大利罗马赌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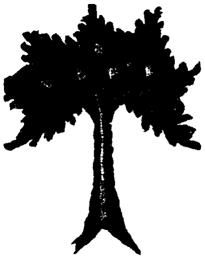

▲伊特鲁里亚人的赌具 比较传统的中国赌具正是与此相仿的刻画方式，并且为骨质。


▲中国古牌和骰子


▲罗马人最初的赌具，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玩具一模一样。

---

① [illegible]



[illegible]

本书的话题随着腓尼基人的历史越来越向北，而且向欧洲纵深处逐渐发展，所以就不能不简略提一下欧洲的史前情况。①

由于冰河作用截至 1.8 万年前冰雪覆盖了许多地区，这使水位下降，许多地方露出水面，改变了以往的许多道路交通情况，比如英国与欧洲大陆在当时就是一体的，但是一半的英国也被冰雪覆盖。大约 8500 年前，冰雪进一步融化，海平面开始上升和波动，大约 6000 年前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分离。

在新石器时代欧洲存在着大量让人难以想象的巨石建筑，建造它们不仅需要笨重的人力，而且需要高超的石匠，另外还有天文知识。“因此，20 世纪初的考古学家不能相信野蛮的欧洲人有能力建起这些纪念碑。他们认为这里面体现的技术水平只能通过伟大的东方文明②才能获得。

▲大约 3300 年前塞浦路斯附近的陶杯

“截至公元前 3000 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已经竖起了数以万计的巨石纪念碑，从伊比利亚半岛起经过法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英国、德国直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丹麦与瑞典，这些古代欧洲人的作品到处可见。”

“在注意到巨石建筑尤其集中在大西洋沿岸之后，考古学家 V· 戈顿 · 柴尔德在 20 世

---

① 本书主要参考《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秘密》一书，本节引言部分不注明即为出自此书。

② 相对于欧洲的“东方文明”，多指中东，此处明显并不指东亚地区。

▲发现于西班牙的大水杯

纪初提出了‘巨石传教士’这个概念。他认为来自东方的‘专家’沿着欧洲大陆边缘向北行进，将石头建筑的技术传给沿途对这种材料一无所知的野人”。

无论事实如何，这个现象向我们展示了在大约7000~5000年前有一批“文明人”借助航海工具行进在欧洲沿海一带，是他们向欧洲传播了文明。它再次提醒我们，假如没有航海工具，甚至是没有航海工具在这个时期的突然改进，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批文明。缺乏合适的航运工具，不仅这些文明人难以行走，而且运送那些石料所需的交通手段也不具备。

巨石文化在中国东部地区也有零星分布，但还没有引起考古界的足够注意。

我认为巨石文化伴随特点是比较明显的：新石器时期，有农业存在，多沿海。中国的一些巨石文化也符合这个特点。最后一个特点尤其使我注意，我甚至考虑这个特点是与水上运输工具有关，因为一些巨石假如使用船筏，势必要比人力方便一些。作为一个突出的代表，地中海上的马耳他群岛上也有巨石建筑存在，

这颇让人惊异，因为那实在是个弹丸小岛，什么人去崇拜，以及多少人建设了它们，让人迷惑。

欧洲的大麦与小麦都是从中东引进的，时间在大约7000年前。从这一方面也证实了欧洲从中东源源不断接受“东方文明”的事实。腓尼基人从“东方”出来后不断向北向西的转移，或许是这个文明之路的又一个例证，甚至就是这一文明进程的补充和延续。从中东出来向东向东南的进发也是可以设想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

在今天的萨拉热窝附近的万萨文化，“挖掘人员发现了一些可以证明存在一个十分精致的黑色磨光的陶器”。这个典型的巴尔干半岛文明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而更为奇怪的是，那里的出土物表明当地人的视野相当广阔，他们使用的某些物品显然来自两百多公里外的地中海。有人说，贸易在7000年前可能已经存在。万萨这里与中东一样具有人类最早的冶铜历史。在距离该遗址并不很远的保加利亚发现了存有两百多块黄金的一个墓地，时间在6000年前。此地是世界上最富黄金的地方。

东亚的车轮在何时出现还是个疑问，比较确定的是商朝有车，夏是否有还不确定，不过欧洲的轮子已经经考古证实至少出现于5200年前。

“大水杯人”以与英国的巨石阵有牵连而闻名。这个文化在广大的欧洲都有分布，设得兰群岛①、爱尔兰、西西里岛、撒丁岛、葡萄牙和波兰的古冢里也发现了大水杯人的工具。

大水杯人发现物的一致性和大水杯人向欧洲中部和西部迁徙的快速性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概念，即：大水杯人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流动工匠和商人，他们骑在骡子背上在欧洲大陆旅行，用贵重金属制品和啤酒来交换琥珀、翡翠黑煤玉。但这个猜想也遭到质疑。

不过中国新疆地区DNA检测发现有原始欧洲人的踪迹，所以欧洲的陶器制品与中国仰韶时期有所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同纬度迁徙的倾向应当予以适当考虑。

中国的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在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断裂。第一次，或者说我们可以推测到的一次断裂发生在第四纪冰川顶峰期，人类如退潮一般返回到赤道附近地区，几万年后的旧

---

① 位于英国北部。

石器时代晚期他们才重新遍布于中国大陆；第二次断裂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很可能远离中东地区的东亚在封闭的环境中并没有发展出足以与中东以及中东北部相抗衡的文明水平，所以他们很快被西方的文明再次所征服，造成了第二次的断裂；第三次发生在“三代”时期，又一次因为交通上的不便几千年过去就造成了东亚与西方世界的又一次深刻的距离，这一局面造成新的一代贸易殖民者在这里长驱直入。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国陷入了最新一轮的封闭，并且又一次形成既具有自己特色同时又是滞重的社会文化特点，它在20世纪前后的再一次飘摇断裂不仅是必然的，而且看来是必须的。

东亚文明需要与全世界交流，需要定期更新蜕变。东亚的地理封闭带来的保守与相应落后必须得到重视，中国的复兴与发达没有其他的妙方，开放再开放就是唯一的出路。每一次的敌方封锁都会将中国带入绝路。中国假如想走入世界前列，必须解放自己，对自己苍白的旧文化进行彻底大换血。从古到今看，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一切都是全世界交流融会而来，一切合适的都可以拿来。

中国人不断与外敌抗争的历史，看起来像是与敌人作战，实际上敌人就在他们自己心中。地理引起的闭塞导致目光短浅，永远是这个民族落后的唯一原因。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特殊，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井底之蛙”和“瓮中之鳖”。

▲英国大水杯墓中的陶器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并无特殊之处

了解凯尔特人

在《希腊神话》中欧罗巴是位腓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e）就是欧洲。当然还不能断言说欧洲文化就是腓尼基文化，但一个欧洲著名的古老民族凯尔特人总让人怀疑他们与腓尼基人有什么联系。原因很简单，凯尔特人与腓尼基人有许多共同点，比如喜欢海洋生活，以商业为主，勇敢善战，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腓尼基人一直在沿海向欧洲挺进。当然，也可以感知到他们之间确实是有差别的，正如腓尼基人与南岛人之间也是有差别的，但他们都善海并喜欢远足这一特点，很让人怀疑他们之间是否有关联。想象一张世界地图，从太平洋水域到红海、波斯湾以及欧洲的地中海，再出大西洋，从东到西分布着南岛人、腓尼基人和凯尔特人，他们三者或许不是来自同一个发源地，但这三个群体之间肯定在某些区域有着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融合。假如这个存续时间是几千年的话，这个可能性就增大了。但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始终并未真正“同一化”，在不同的区域人员构成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凯尔特人与腓尼基人正是这样的一种可疑关系。

“1958年人们在土耳其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沉船，上面装载着一位青铜器商人的所有家当，包括金属锭和各种工具斧子、凿子、冲床、熔炉、锤、砧板和坩埚等，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流动的铜匠铺子，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几乎有一吨重。”①

---

①《早期欧洲》第173页。

这是一个文明传播的例证在海底的发掘。他们是谁？是腓尼基人吗？是普通的艺人还是王室的御用工匠？他们是明目张胆的有组织迁徙还是偷偷摸摸夜行的沉船？假如这是一个腓尼基人正通过海船驶向欧洲某地，甚至是西欧与北欧，我并不惊讶。

凯尔特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①？有次听到有人这样问。就我个人的知识经验系统常把这一概念与英国联系起来，尤其是苏格兰人，他们是一群岛民。凯尔特人在拉丁文称Celtae或Galli，希腊文则为Keltoi。他们似乎有红发的特点。

通常的说法是，凯尔特人起源并发展于铁器时代，并且很可能不是一个统一的有着共同血缘关系的一个群体，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更大可能是文化习俗。这与腓尼基现象一样，也偏于文化现象而不是人种。凯尔特人出现于腓尼基人之后这一现象应该得到关注。

“从某种意义上说，凯尔特人可以被看作是今天的爱尔兰人、（英国）威尔士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瑞士人、奥地利人、北部意大利人以及其他西欧和中欧人的祖先。”

他们最常为人乐道的特征是野蛮凶悍，喜欢裸体而战，并且在宗教仪式与战争之前会把自己全身描绘为蓝色。我认为这批人与腓尼基人以及伊特鲁里亚人有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尽管从后来看他们之间也会开战。这些人实际上是以往历史时期脱离主流轨道的人群在铁器时代走到一起的一个集合体。

假如说腓尼基人经常被人描述为商人与航海家的话，那么凯尔特人就是商人与战士。他们活动的范围：“从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一直到咆哮的大西洋；向北穿过英伦各岛以及爱尔兰岛，向南越过了令人目眩的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北部富饶的山谷；最后他们还向东经过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了小亚细亚，并在今天的土耳其中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加拉提亚。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他们侵略性的扩张，不但席卷了整个欧洲，而且还影响到了其他古老历史的进程。许多凯尔特人的部落洗劫了罗马帝国，加速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灭亡，袭击了希腊的特尔菲。据记载，他们甚至还在埃及发动了一场战争。”这些描写都与同期的腓尼基人有重合的部分，我无意挑战传统的观念把两者混为一谈，但我确实想引起大

---

① 本节主要参考《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一书，有引言即出此书。

家对两者联系的关注，更何况现在对他们的研究尚无定论。

“直到公元 16 世纪和 17 世纪，学者们才意识到古老的凯尔特人的语言与一些现代语言形式，如爱尔兰语、马恩岛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不列塔尼语和盖尔语（即苏格兰人所说的凯尔特语）以及一些地方的方言，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北部等地的方言，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两位语言学家，威尔士人爱德华・鲁伊德与苏格兰人乔治・布坎南，就是用这些古老的证据证明了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是凯尔特人后裔。”现在一读到英国的历史，先讲到的肯定是凯尔特人。

最初凯尔特人的工艺常常会与伊特鲁里亚的风格弄混，这说明了他们之间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最终还是被专业的学者给分清了。

在德国一座大约 2500 年前的凯尔特人古墓中，看起来像是大酋长的主人身着可能是来自中国的丝绸服装。这一点证明了凯尔特人与中国之间确实发生过联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中国离凯尔特人可能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遥远。尤其是与中欧相同纬度地区的中国北方曾经长期生活着红发碧眼的族群，这个横向的交流是不能忽视的。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妖怪多为红眉毛绿眼或许与这样的欧洲人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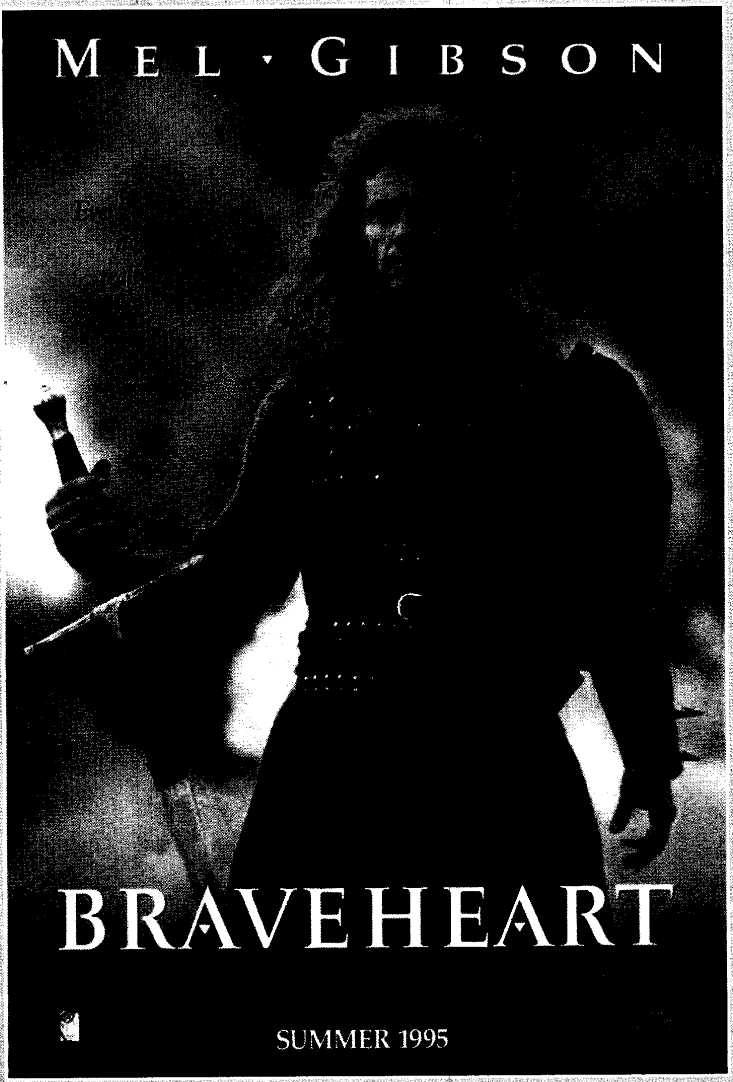
他们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妇女地位很高，在某些部落里女人直接就是酋长。他们也有用圆形大鼎用来陪葬的习俗，比如其中一个鼎重 450 英镑、高 5 英尺。不过那些鼎看起来与中国的鼎非常不同。他们的那些鼎据说多是用来混合酒用的。

凯尔特人的坟墓有一个特点，圆形或椭圆形为多。这点距离中国很远。

他们打仗时的一个习惯是把敌人的头颅割下来拴在马脖子上炫耀战果。类似的习俗似乎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也有。凯尔特人是非常好的战士，古罗马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地中海沿岸的雇佣军。勇敢而忠诚是他们的最好品德。他们有时候被称呼为阿尔卑斯山北边的高卢人。

具体到年代，古代凯尔特人是公元前 2000 年活动在中欧的一些有着共同文化和语言特质的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统称，也有人认为他们主要是铁器时代的欧洲人。今天凯尔特人主要指不列颠群岛、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语言和文化上与古代凯尔特人存在共同点的族群。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凯尔特人最早是从中亚草原向西迁徙过去的。在罗马帝国时代，他们占据西欧大部分地区，并同化和消灭了当地的伊比利亚人。罗马人进占高卢（现法国一带），并同化了高卢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进入不列颠岛，同化了不列颠的凯尔特人；目前只有布列塔尼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


MEL · GIBSON
BRAVEHEART
SUMMER 1995

▲《勇敢的心》电影画报

人仍然坚持使用凯尔特语，并以自己的凯尔特人血统而自豪。

也有人认为，凯尔特人是北部欧洲的原住居民，正是他们在5000年前建造了那座举世闻名的巨石阵。在古罗马帝国覆灭之际，凯尔特人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只剩下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的一部分和法国西北部的一小部分。进入中世纪之后，凯尔特人巩固了在苏格兰的主导地位，并数次企图进而控制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在中世纪来临之后，一些古凯尔特人部落逐渐融合在一起，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有了“爱尔兰”这个名字。公元1000年前后，布莱恩・博罗成为所有爱尔兰人的第一个国王。

中世纪早期，一个名叫“苏格兰”(Scotti)的爱尔兰人部落侵入现在苏格兰地区的南部，并用自己部落的名字来为这块新夺取的土地命名。公元1296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吞并了苏格兰。威廉・华莱士(电影《勇敢的心》主角)领导苏格兰人奋起反抗，在公元1297年进行的斯特灵战役获胜后几乎为

▼亚瑟石中拔剑

▲亚瑟王的圆桌会议

▼还剑给湖中仙女

苏格兰赢得了独立。第二年在法尔科克战败之后，威廉·华莱士率领部下和英格兰人展开了游击战，直到公元1305年被同伴出卖并被爱德华一世处死。随后，罗伯特·布鲁斯在公元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中把英格兰军队从苏格兰国土上驱逐了出去。公元1328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被迫承认了苏格兰的独立地位。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亚瑟王”就是凯尔特人，他的故事发生在大约公元500年。凯尔特人一般被当作英国的原住民看待，后来的“侵略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亚瑟王就是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

从欧洲开始的骑士之风很可能也是凯尔特人的一种贡献，起码有他们的参与。

狮子是凯尔特人常用的图腾标志。在宗教方面以及性爱的放荡方面都与伊特鲁里亚人一样接近。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想起一个以狮子为图腾的民族：但人。

与腓尼基人相仿，凯尔特人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于公元前391年洗劫罗马并成为意大利北方的定居者。公元前192年罗马又征服了那里的凯尔特人，并且一直把凯尔特人逼进大不列颠群岛，直到公元43年，凯尔特人都是不列颠岛的文化主导者。他们中的后裔代表有很多，在今天我们知道的有罗伯特彭斯、威廉·叶芝、乔治·肖伯纳、詹姆斯·乔伊斯等等。

凯尔特人不是游牧民族，他们生活主要靠渔猎和商业。这些特点似乎都与伊特鲁里亚接近，也与腓尼基人接近，更会与中国山东附近的“商人”们接近。我无意强调这些人真的是一个群体，但是注意对他们渊源联系的考察是应该的。

大约6000年前不列颠群岛成为大西洋上的孤岛。四面环水的特性使该地区充满了海洋文化的特点，开放曾经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特点。既然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恢复历史的原貌，还有以史为鉴的作用，有一点就不得不特别提出来，正是在这座岛屿上日后产生了世界上最先踏入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国家：英国。在中国人做梦都想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今天，了解英国的远古与今天的联系，深究一下其地理与历史变迁以及人种的变换，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东南亚史前一瞥

中国东部与南部的史前史与东南亚紧密相连。在大约4万年前一直到“三代”时期可能有大批人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境内。中国东部与南部的南岛文化很可能与东南亚史前也有紧密联系。

1976年的春天，由两艘巨型独木舟组成的双体船“大角星号”从东南亚出航，一切都依照生活在三千多年前的手段，他们的目的是想证实南岛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此次使用纯正的传统导航手段，精确到达了2000英里之外的目的地。这些手段是：星座、太阳、云彩、波浪、海流，水手的记忆力。①

专家们本来认为，要想精确地到达目的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嘲笑说在完全原始的条件下定点航行几百英里也不可能，别说是几千英里。但实验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

事实教育了专家，他们的思维可能过于“严密”了，他们把一些概率很小的“可能”挡在了门外。

过于（too）严密，其实就是“不严密”。看来专家太过注重“不可能”，恰恰形成了事实上的“不严谨”，任何微弱的“可能”在几率上偶尔也可以达到100%。

从表面上看那次著名的实验每一步都存在着不精确，这些不精确的积累最后会达到可怕的程度，做到精确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实际航行中，许多不精确最后相互抵消并且都被船员加以及时调整。总之，事实胜于任何雄辩。船只导航确实没有使用任

① 本节参考资料来自《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一书，第46～50页

何现代科学技术，甚至连地图、罗盘和六分仪都没使用，航行圆满地结束了。留给刻板的现代科学家们的是惊愕与难堪。

这个结果给了我两方面的信心，一个是专家们“too 严密”的事例处处存在，所以这给我这样一贯“不严密”的人一个发挥的机会。正是在了解到这一明显漏洞的情况之下我开始了这个探索之旅，有许多好心的二把刀想给我上“逻辑”课，我心想假如你真的了解逻辑就不会跟我提这个问题。懂点小逻辑的会去注重“严密”和“严谨”，懂大逻辑的人才会像我一样适时而恰当地“牵强附会”。这件事情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我在这本书最想说的话：古代人的航海能力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尤其是广大领域内的南岛文化之间一定在远古存在着联系。

原本人们认为东南亚的文明应该是“左右逢源”地被动接纳，东亚与中东甚至印度都会影响到这里。但上个世纪下半叶对于泰国等地的考古使人们大跌眼镜，远在 8000 年前那里就有很高级的文明存在，只是比较稀薄而已，所以有人很快得出了结论：东南亚是一种自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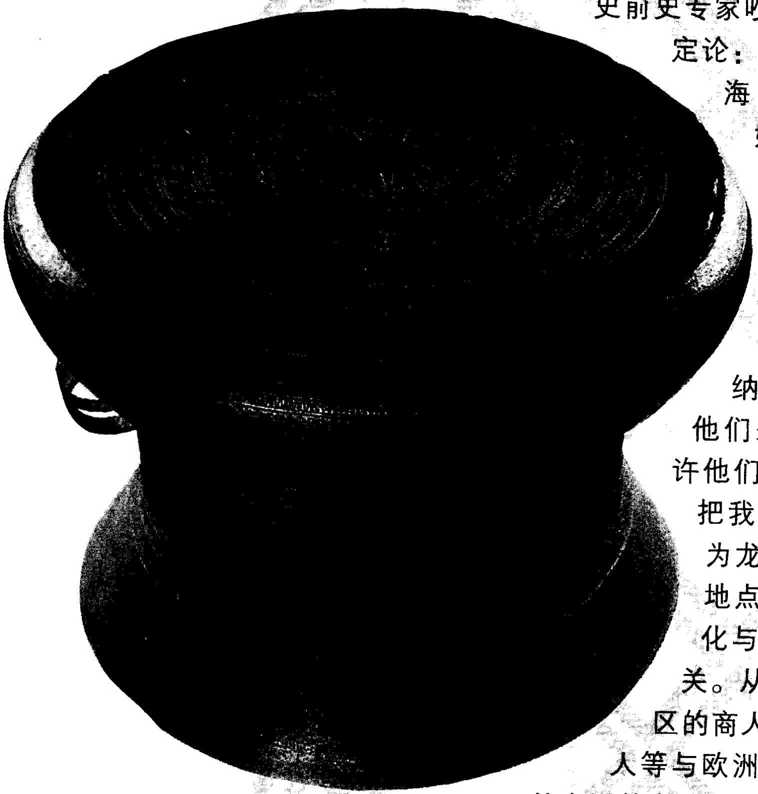
看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要号称“自生”独立文明了。不过已有的考古学证据还不能完全证实，所以大多数人对此保持了沉默。我对此的仓促判断是，太多的地方号称它们是自生独立文明，而它们的文明时间与地理又十分接近，那么只有一个结论：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是自生独立的，而是相互交流学习而来。问题应该放在谁以及怎样传播了这些文明。假如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它们之间不是相隔万年甚至十万年才各自发展了文明，为什么它们时间恰好接近，并且是几个地区都接近？这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同源的传播。并且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期晚期，每个大的文明板块之间传播速度为大约 1000 年时差。所谓“自生”独立起源多半是过度自恋。

现在看来，许多地区都有很早的文明，埃及、两河流域、伊朗、土耳其，东亚中国，现在又加上了东南亚，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是交流的结果。而这些交流之所以得以迅速实现，原因就是他们在远古就有了便利的交通工具，而且最便利快速的交通工具不是别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独木舟与船筏，甚至他们不使用船舶，只是沿海岸前进的“流浪”。东南亚的早期在考古上假如是一片空白的话，我可能还比较犹豫，现在那里同样发现了早到让人怀疑是独立起源的文明，那么无论是从中东而来的文明通道也好，是

第四纪冰川隔离之后的相对独立自生也罢，从这里传播部分文明到中国去，都是合乎逻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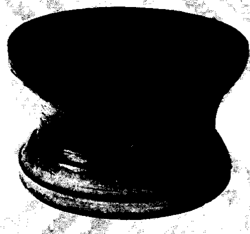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争论与中国有关。东山是越南河内附近的一个地方，这里两千多年前出产一种工艺要求极高的“东山铜鼓”，类似物品在中国地区也有发现，并且公认这个文化与中国云南的滇文化相关。

对于“东山铜鼓”所代表的文化，上个世纪有两位欧洲史前史专家吵得不可开交，至今亦无定论：来自奥地利的罗伯特·海因格尔登认为东山文化始于欧洲，时间是公元前800年。到底是欧洲的哪里没有看到资料，假如是伊特鲁里亚附近就太好了。但另外一位来自瑞典的学者伯纳德·卡尔格伦则认为：他们来自中国中部。其实或许他们俩说的是一回事，假如把我的猜想作前提的话。因为龙山文化可以使所有以上地点串联起来，中国的商文化与欧洲地中海北岸明显有关。从中国东部发展到中部地区的商人文化实际上通过腓尼基人等与欧洲地中海甚至北欧文化有着广泛的交流，所以得出来自中国中部是其起源的结论也是合乎逻辑的。



▲东南亚的东山铜鼓

通过考古方法人们认定在中国汉朝之前的1000年里，起码越南这个地区的东山人祖先一直存在。按照我的理论这个地区当然不能是空白，而且这批人很可能东接中国的商人，西接地中海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而这些人与传说中的腓尼基人有极大的联系，或者正是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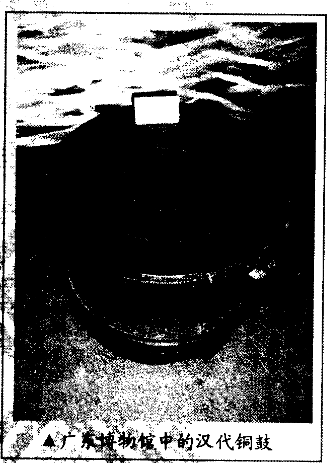
▲中国龙山文化中的陶鼓

腓尼基人实现的。中国滇文化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女人具有很高的权威，这一点也与中国商之前以及地中海东北地区的情况类似。

正统的观点认为，公元前1世纪这里才开始出现真正属于中国的物品，才开始交流，如中国的印章钱币等在当地有发现。不过考古也证明，这些东南亚地区，甚至越南国内都不止存在一种文化。在我眼里中南半岛这里在史前时期是个繁忙的中转站，文化形态自然应该是丰富多彩！

“对东南亚民族所使用的文字进行分析，起初是不知所云的，因为其所使用的语言达一千余种，各自不同，互不相通。通过对文字用法和结构的分析，语言学家发现，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可按相同语族加以分类。他们可能有相同的祖先。世界上有近50%的人口所操语言属印欧语系，其中包括印度。此种语言起源于俄罗斯中西部，由一种典型语言发展而成。印度对东南亚历史中的建筑、文学和宗教具有深刻影响，但除此之外，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却不属印欧语系。”①

“东南亚地区的语言主要可分为四个语族。一是汉藏语族，包括普通的缅语方言。二是泰语和老挝语族，主要见于泰国和老挝的昭披耶河流域以及湄公河盆地一带。东南亚大陆的第三个语族是南亚语族，包括越南语和高绵语，现多见于柬埔寨境内，在其邻国泰国和越南也有，但较少见。……第四个语族是南岛语族，这种语言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突出，它所包含的语支数量和传播范围都是最突出的。”②这第四个判断很让我喜欢。


▲广东博物馆中的汉代铜鼓

正统这样认为：“南岛语族传播的范围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岛之间的地区都属南岛语族范围，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国语以及这三个国家的方言和数百种少数民族语言，南太平洋岛屿居民的语言也属于南岛语族。南岛语族包括近1000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族包含的语言都多。所有语言都由一种语言发展而成，即第一南岛语言。语言学家相信，中国的台湾使用这种语言。公元前

---

①《东南亚 重新找回的历史》第60页。

② 同上第68—69页。

4000年之后，第一南岛语言开始向南传播，到达菲律宾和婆罗洲（加里曼丹岛），再向西传播，到达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最后向东传播，到达太平洋诸岛，向西传播到马达加斯加岛。”①我不怀疑这个联系，但是我怀疑传播的先后次序，并且我更怀疑南岛文化传播的范围比人们所熟知的要大得多，只是在发达地区它们被吸收掩盖，所以只能在相对落后隔绝的地方找到它们的踪影，这造成了一个误区，比如中国东部和南部，红海东部、阿拉伯半岛南部等。由于人员的流动，当然现在都找不到证据了，但是正如一句考古学名言所说，“没有证据不是不存在的证据”，或曰“不存在证据并不能作为不存在的证据”。

语言学的研究也证明，以往的宏观语系分法其实不是绝对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不同语系之间其实有相互渗透影响的因素存在，这将意味着不同文明板块的沟通与交流，具体到东亚，汉藏语系与南岛语系的交流与渗透研究成为关键的一环。今天的汉语一定是不同语言交流的结果，仅只从我的家乡话中我也可以判断。嵩县在河南，可谓中原核心，而且当地人为汉族，我们当地人与讲普通话的北方族群之间肯定就曾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许多用语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语言，比如普通话的“骂”（ma）在我们的话中表达为“jue”，“跌倒”（diedao）我们说“banne”，“（孩子）死了”（si）我们也说“ban”，“头”（tou）我们称呼“dinao”，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古代人的迁徙过分自由，所以看似有些规律可寻，实际上具体到微观就没有规律。偶然因素的发生都可以导致任何一个族群直插另外一个族群的核心，造成一些混乱。

结合人种研究，威廉·W·豪威尔提出过一些让我大喜过望的结论：“（商朝）安阳人种与海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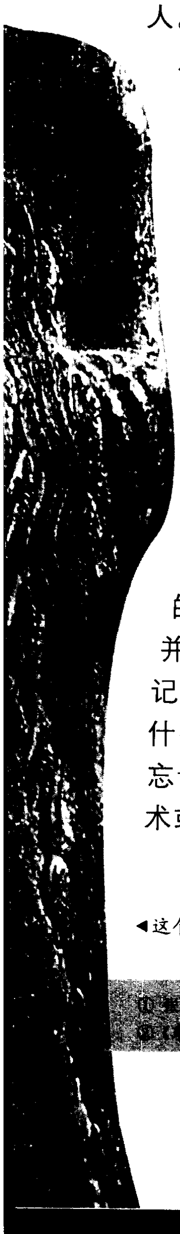
①《东南亚 重新找回的历史》第69页。

岛的现代中国人和北海道、琉球的日本人最接近，而不是欧洲人、美国印第安人或波利尼西亚人。①”这一结论是不是更加印证了殷商人来自海上民族，尤其是他们与南岛文化之间的关联，从而证明了腓尼基人中可能混入了部分南岛人?

本人2005年夏到海南进行考察，那里今天的主体民族为汉族，最大少数民族为黎族。另有少部分回民与苗人。岛上马来人种较为明显。黎族是个值得考察的特殊民族，据神话传说他们古代从福建迁徙而来，似乎有狗崇拜，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姓“符”，而这个姓氏竟然是从一个狗嘴里吐出的声音。假如豪威尔先生所指为黎族我就不吃惊了，因为他们实际上是福建人。而福建地区又是古代与中东地区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沿海之地。海南岛明显新石器时期并无发达文明，并且那里至今亦无大的海港出现。那些自称从福建而来的黎族人相貌与汉族有较大差异，其中部分人皮肤相当黑，另外一些人又很白，大多数人与蒙古人种差异不大。他们整体显示出由于闭塞杂交不充分的特点，我深信他们中间曾经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的语言也很有特点，一些卷舌音甚至让人联想到遥远的斯拉夫语或者阿拉伯语中的一些发音习惯。他们自称“shai”族，有人翻译为“塞”，但又不是标准的“塞”，此字发音舌位很特殊，是汉语与国际音标中都没有的一种类型，我觉得或许翻译为“畲”族或“闪”族也是可以接受的。

有一个文化遗失现象也是很有趣的。“语言学家在诸多证据背后，推断出看似寻常的一个道理，即所谓的文化遗失现象。……当第一南岛语言使用者向海上移居并在海岛定居时，经历数世纪后，其语言表明，人们又忘记了前几代人已经掌握的本领。也许因为这种本领不再有什么用处，一些群落丢失了水稻农业，没有了宽敞的房屋，忘记了纺织技术。一些群落最后连驯养的牲畜、冶金加工技术或陶器制作技术也消失了。”②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文明不交流的退化问题。这个思维其



◀这个苏美尔神造型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后来从印度传出的菩萨

---

①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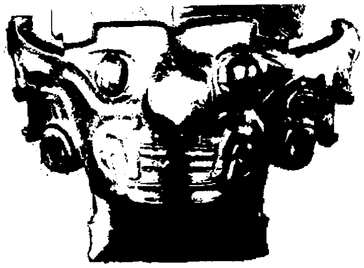
② [illegible]

实从一开始就在我的头脑中保存着警惕：一些所谓落后或先进不是静态的，是动态变化的，与地理位置以及相应时期的经济文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不可轻视那些今天看来落后的地区。“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东”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原本对于南岛文化中的太平洋上一些小岛的调查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先进的文化，人们以为这里不值得继续研究，但是通过语言学的调查发现，其实这些族群是曾经有过先进文化的。这些研究带来古代社会学、人类学的一系列思考。所以偶尔我想，以往老的史前文明过分倚重于考古学，是许多误解的开始，因为并非每一个考古学家都具有足够的社会学修养去思考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历史变化。还原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众多学科的加入，一个合格的史前研究者也需要比较全面的学术修养，仅仅考古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东南亚的研究者甚至把东南亚当成一个世界文明的中心，认为是他们向外传播了文明，我想这偏离了基本的常识。类似的“敝帚自珍”在中国人中也很常见，动不动就“五千年文明”、“中华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不怕外人笑掉大牙。不过东南亚研究者的这一强调确实向我们更加进一步证实了一个可能：作为东亚与中东核心区域之间“通道”的存在。这里曾经繁荣是顺理成章的。仅一个壮观无比的吴哥窟恐怕就能说明东南亚的一些历史辉煌，而这个文明的成果为什么处于柬埔寨这个濒临海边的国家和地区，似乎也向我们暗示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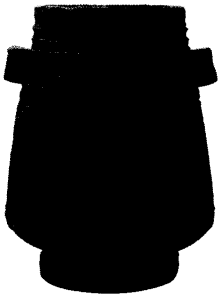
▲中国云南滇文化



读《青铜挥麈》笔记片段

《青铜挥麈》是一本张光直先生晚年病重期间出版社内做的文字汇编，是“学苑英华”中的一本，其中共有254个小短篇，或讲话或随笔或专题，时间则跨越1960年代到1980年代，在看似随意间都是张先生对于中国青铜文化思想的总结，读来收益颇多。这本书是我在本书定型之后偶然看到的，原本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新东西，因为张光直先生的著作与思想我已经了解到许多，结果出乎意料。阅读中感想很多，觉得已经不好再放进书里讨论，但部分还是跟上了《锁定红海》的修改，比如其中的一个章节“‘但’与‘周’的关系”就是排版中给加进去的，并且个别话题也汇入了本书的其他部分，其余决定单放一个章节夹叙夹议。因为商朝正处于青铜时代的核心，张先生又是商文明专家，所以很值得专门讨论一些他的观点。

> 早商（指二里头类型——苏三注）的遗址分布在河南的西部与山西的西南部。河南西部黄河以南以伊、洛、汝河流域为中心的区域，似是这类遗址最为集中的地区，已知的见于陕县、洛宁、伊阳、洛阳、嵩县、伊川、偃师、登封、临汝、巩县和郑州。（《青铜挥麈》第40～41页①）



▲江西大洋洲青铜器
陈溢智／摄影

我自己当然知道家乡嵩县属于几大文化交汇区，比如除了二里头类型还有仰韶文化，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所以当我在书中

---

① 本节后面几页码即为来自本书，节略“《青铜挥麈》”。

把嵩县当作一个特定古代文化典型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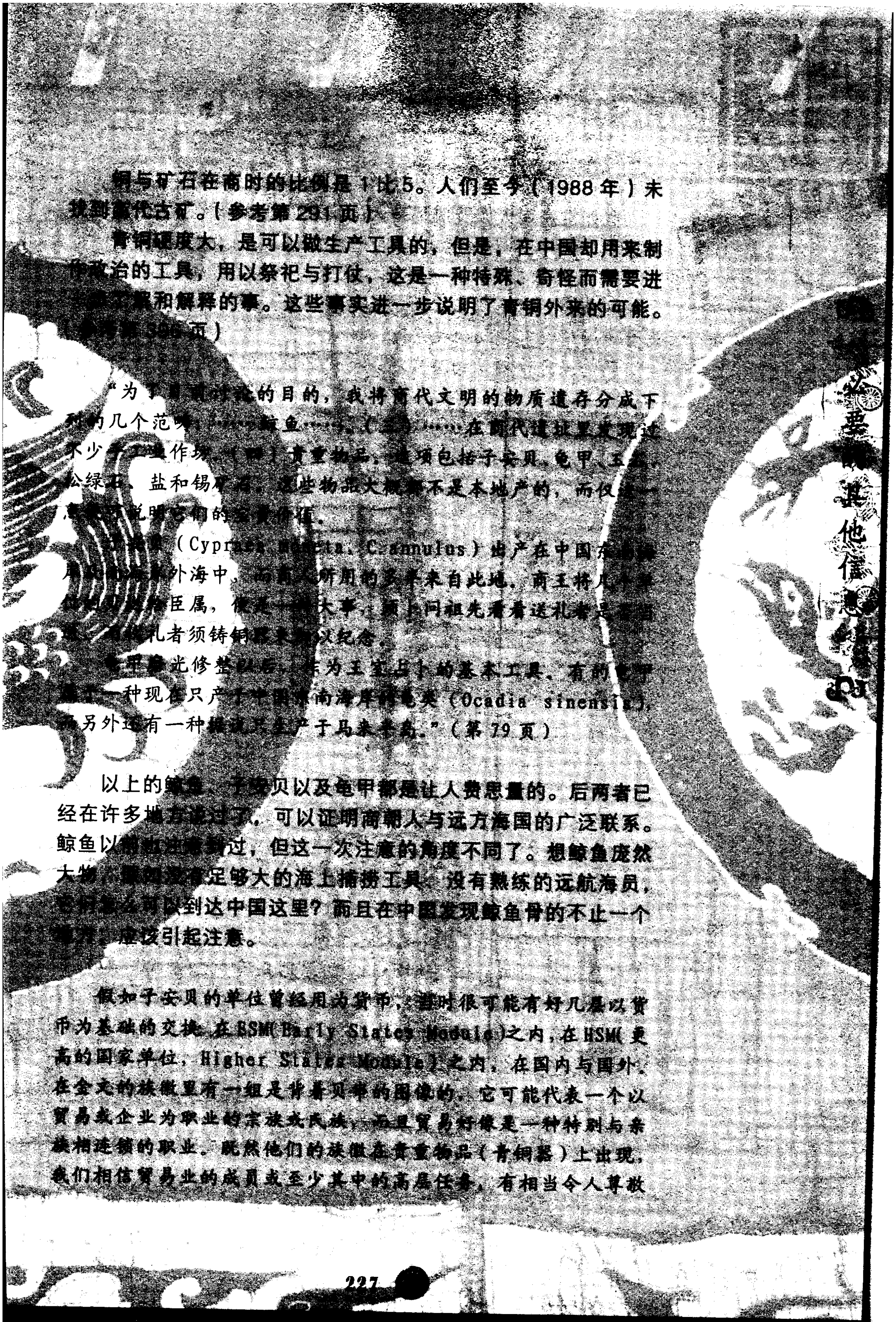
> 殷商文明的两种性质：一是一线的相承，二是逐步的演变。可为这种性质之代表的文化成分，以陶器、铜器、玉器、陶文和建筑等最为显著。陶器一直从龙山文化到殷墟都是一气下来的……其细处的变化自早到晚也一步步有清楚的足迹可循。陶文则早、中、晚商都有，而且不少文字都是相通的；再往上追溯，则陶文这个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前左右的仰韶时代，其分布地区也仅在豫西向西不远的关中地带。（第39～40页）

“其分布地区也仅在豫西向西不远的关中地带”，这句话引起了我的重视。张先生这句话可能还有商量，比较明显的西北集中于西安附近是比较可信的。但青海应该也有零星发现。这个分布区域的现象应该加以重视，并且必须作出解释，然后才能放心地说中国在新石器时期的东、西方特色。比如出现符号较多的半坡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突入西方的另类呢？并且这个方位上的接近东方，或许暗示了东方介入西方的某条通道，但其根源到底在哪里呢？甚至我猜想迦南来自东北方，联系到大约5000年前中国西北文化的兴盛以及向西流动的事实倾向，有没有可能这里作为一个台阶把文字传到了地中海东岸，随后1000年它们又倒流回来了呢？

> 岐山甲文 H11：3
>
> 衣王田，至于帛。王双田？
>
> 衣王，即殷王，周人称殷为衣……殷王所至之帛，不知何地。殷墟卜辞中亦有帛，亦地名。（第67页）

衣、殷，是不是一种假借关系？因为商人最擅长红色的布料或丝绸（衣），故而为之。更可喜的是“帛”的出现，加强了商朝人与这几项的特殊关系。衣、殷、帛，是商王朝兴盛的主业。

至今在中国没有发现商时的古矿，并且中国青铜只用于祀与戎，不像西方那样同时用于生产劳动如农业。是否可以假设殷人垄断中国的丝绸贸易，然后到西方购买需要的成品铜等矿料，然后在中国铸制青铜器？如此昂贵的代价得来，人们自然不舍得用以制造农具了。



铜与矿石在商时的比例是1比5。人们至今（1988年）未找到商代古矿。（参考第291页）

青铜硬度大，是可以做生产工具的，但是，在中国却用来制作政治的工具，用以祭祀与打仗，这是一种特殊、奇怪而需要进一步了解和解释的事。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了青铜外来的可能。（参考第396页）

> “为了目前讨论的目的，我将商代文明的物质遗存分成下列的几个范畴：……鲸鱼……。（三）……在商代遗址里发现过不少手工业作坊。（四）贵重物品，这项包括子安贝、龟甲、玉、松绿石、盐和锡矿石。这些物品大概都不是本地产的，而仅这一点就可说明它们的贵重价值。
>
> 子安贝（Cypraea moneta、C.annulus）出产在中国东南沿岸以及南海岸外海中，而商人所用的多半来自此地。商王将几串子安贝赐给臣属，便是一件大事，须卜问祖先看看送礼者是否应当，受礼者须铸铜器来加以纪念。
>
> 龟甲经光修整以后，作为王室占卜的基本工具。有的龟甲属于一种现在只产于中国东南海岸的龟类（Ocadia sinensis），而另外还有一种据说只生产于马来半岛。”（第79页）

以上的鲸鱼、子安贝以及龟甲都是让人费思量的。后两者已经在许多地方谈过了，可以证明商朝人与远方海国的广泛联系。鲸鱼以前也注意到过，但这一次注意的角度不同了。想鲸鱼庞然大物，假如没有足够大的海上捕捞工具、没有熟练的远航海员，它们怎么可以到达中国这里？而且在中国发现鲸鱼骨的不止一个地方，应该引起注意。

> 假如子安贝的单位曾经用为货币，当时很可能有好几层以货币为基础的交换：在ESM(Early States Module)之内，在HSM(更高的国家单位，Higher States Module)之内，在国内与国外。在金文的族徽里有一组是背着贝串的图像的，它可能代表一个以贸易或企业为职业的宗族或氏族，而且贸易好像是一种特别与亲族相连锁的职业。既然他们的族徽在贵重物品（青铜器）上出现，我们相信贸易业的成员或至少其中的高层任务，有相当令人尊敬

的社会地位。(第 83 页)

假如把迦南人以及腓尼基人的推理放到这个背景下就比较有意思了。

> 从庙号上所见商王室的亲属婚姻制度，与王位之继承法及政治势力的消沉有密切的关系。……
>
> 第一点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商代王位的继承是由父传子或由兄传弟的；换言之，是男系的继承法。卜辞里所见的亲属称谓，多在王室的祭祀中运用，所以亦以男性为自我(ego)；其亲属的分别，向上伸两世(父、母、祖、妣)，向旁及于一世(妻、妾、配、母、奭，及兄、弟)，向下及于一世(子、妇、生)。再向外则为这一个小圈子亲称的扩展，有时加以区别之；如祖以上皆称祖，其配偶皆称为妣；父母之堂表兄弟皆称父，父母之亲堂表姊妹皆称母；己之亲堂表兄弟皆称兄弟，己之子与兄弟姊妹之子皆称子。用 George P.Murdock 的术语来看，卜辞的亲称似乎既不重视 collaterality 又不重视 bifurcation；换言之，父与其兄弟之间，母与其姊妹之间，父之姊妹之间，与父之兄弟之间，似乎都没有分别的倾向。但 seniority 的原则则有时颇重要，如兄弟之分及小父小母之名；《六父戈》的大父、中父、父三称的分别，或亦与此有关。这些亲称材料在本题的研究上有两点意义：(一)王位的男系继承,可能伴以亲属制度上男系传嗣的制度；换言之，所谓“男系”，兼指 succession 与 descent。(二)卜辞中所称父不一定是生身之父，子不一定是亲生之子，兄弟不一定是同父之兄弟。次代之王之为前代之王的子或弟，固可能为其亲子或同父之弟，亦可能为其兄弟姊妹之子或其父的兄弟姊妹之子，而

▲中国商朝玉雕

> 且此所谓“兄弟姊妹”均不必是同胞所生，亦不必是一父所生。
>
> 第二点可以确立的事实是商王都是子姓的，共溯其来源于一个神话中的始祖。（第 85 页）

> 商王继承法　商王继承的法则，一向是一笔糊涂账。依《殷本纪》，商王之继统，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第 89 页）
>
> 陈梦家……的结论是：“由此可见商代传统法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传弟传子法，凡弟或子所以及瓦工难为必另有法规，可是我们无法推知。”（第 90 页）

商朝的继承制度以及亲属关系，都与我们熟悉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差别，起码没有我们那么小气、斤斤计较。由此联想到两点：1. 古罗马前后的继承关系以及亲属关系与殷商时期的颇有同风，比如盛行养子，养子甚至可以继位；中国截至秦以及秦始皇的以往家世似乎也是占了类似的便宜，但其后中国的情势就发生了改变。2. 赫梯历史上曾经有过继承方面的教训，是同样的“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传弟传子法”，最后在不断的战乱下终于指定出严格的继承制度，与中国同期联系起来研究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 对商王庙号的新解释：（一）商王室虽属子姓氏族，却分为两大支派与若干小支派；（二）两大支派轮流执政；（三）其具体的方式为王位传甥，亲子娶姊妹之女。上面的（一）（二）两点，从庙号的分析来看，似乎是无可怀疑的史实。（第 92 页）

这方面很容易从商王的五丁、五乙中得出结论。张先生的这个推论确实很有创意，我看到他在不止一个地方阐述这个意见，看来他很重视这个理论。我拿他的这个推论与我的推论（赫梯人与腓尼基的联合）一起看时就更加有意思，并且更加合理了。两大势力可能“轮流坐庄”。

> 殷代“旧臣”，殷代的所谓“旧臣”在政治上似乎有很大的力量。如伊尹权势之盛，可以放逐大甲，同时在宗族上亦有相当高的地位，为武丁时代王室嗣典所收。假如我们认为子姓王室之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交替，依照严密的法则，始终殷代数百年间不变，则其中必有极大的维持力量。……很可能也有政治上

的实力加以维持，而或即一种氏族长老的评议会（council of the elders）之类的机构。于是旧臣之具有实力，是亦有其原因。（第95页）

张先生把这个两系分组执政的开端定在伊尹这里，并且，他说：伊尹可能是“丁”组的英雄。假设一下，伊尹属于腓尼基阵营，商汤系属于更古老的赫梯人根系。当然这是个很武断的说法，甚至可以相反试错。并且张先生还指出有隐约的第三方的出现，以后再关注。

配合以上话题的是殷礼中的二分现象。“殷代的铜器花纹亦有二分的趋势：A、B，与中立的C”。由此，张先生认为可以深入到殷商社会去研究。

“殷代的王室分为两大支，这两支隔世轮流执政。古代的文明常常以王室为发展的前驱与持续的主力，因此我们不免要接着问的一个问题，便是殷代的文明内部的二分现象，是可以为上述假说的一种有力佐证。”（第105页）

在说到“殷王世系中的昭穆制”进一步对“轮流坐庄”的三代王制加以阐述：“从商王世系里我们可以看到下述的现象：（一）商的王位在王室中政治力量最大的两个宗支（乙丁及其‘朋党’之宗）之间交替；（二）王室的婚姻为父系内婚制与父方交表婚制；（三）王位的传递，在两代内由舅传甥，在三代内由祖父传孙。这样一种继嗣的制度，乍看起来，好像很是奇怪特殊，其实这三种现象在民族志上都不难找到。”

非常奇怪的是，这个民族学上的例证张先生在波利尼西亚找到了！张先生由于祖籍台湾，所以对“南岛文化”非常熟悉，而且他在许多地方表露过南岛与中国东部的广泛联系：“王位在四五个有领导地位的家族中轮替，王死后，继位的王在轮到的一个家族里选出。”这个岛上“曾经盛行过一种政府制度，包括一个王与一个次级领袖；王死后，次级领袖继任为王，而王子继任为次级领袖……”（第113页）

“与商制相似的王位继承制度之见于波利尼西亚，本身便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现象。波利尼西亚人公认是与中国大陆古代的

住民有密切的历史关系，而其政治宗教制度之与中国古制相似的又屡见不鲜。”（第114页）

由这个例证，张先生推测伊尹很可能就是一位“次级领袖”。

《礼记 · 王制》里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如下的分类：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第134页）

吃熟肉的与吃谷粒的被分为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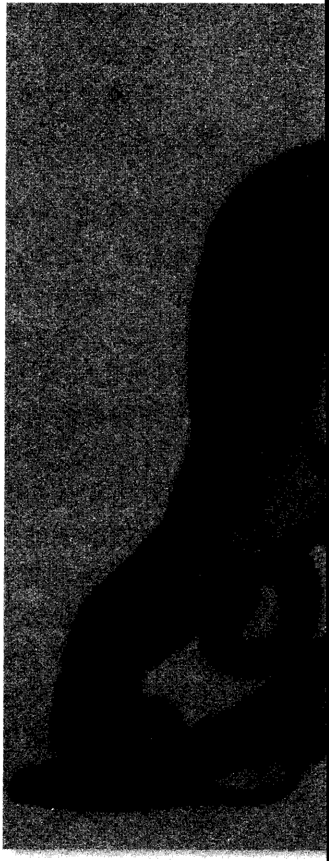
红山文化与其南方的沿海文化是有明显牵连的，而它们在新石器时期晚期的没落或消亡我认为他们很可能南下了一部分。就在他们没落同期南方兴盛起来，他们可能同样汇入“三代”建设，尤其是我认为夏文化实际上与红山文化也有可疑联系，但浮在表面上的更多联系是红山与山东和良渚一带的文化，比如玉，比如玉制品的某些纹样。

对于他们南下的原因，我的解释是，这个时期气候变冷迫使红山文化南迁。这时期的气候改变是个公认的事实，所以不用举例。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第168页）

我曾经说过黄帝为约瑟或雅各，现在又多了一个证据，看来我必须要倾向雅各（又名“以色列”）了。雅各在《圣经》里就有12子。用上面中国的事实去解，实际上黄帝有许多孩子，但可能因为出身等原因一般列出来的就只有“十二姓”；在《圣经》里，雅各的十二个孩子就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系的起源。但《圣经》却没有提到其他的孩子，很可能如中国的这个记录一样，把其他不重要的孩子给忽略不计了，比如私生子等。

以色列人那里实际上最初“得姓者”为十二人，后为“十三人”甚至“十四人”，也与以上相符。因为雅各的小儿子约



瑟这一支由于是法定的王族，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分化出两个支派，这就产生了第十三个支派。假如仓促指出第十四个支派的话，我认为是《圣经》里后来出现的“约书亚”，在中国神话系统里，“颛顼”应该属于与雅各隔了起码一代的人，这个关系在《圣经》里也成立，我认为中国的“颛顼”很可能是“约书亚”。由于“约瑟”与“颛顼”发音接近，所以我也怀疑中国神话中的“颛顼”实际上是“约瑟”。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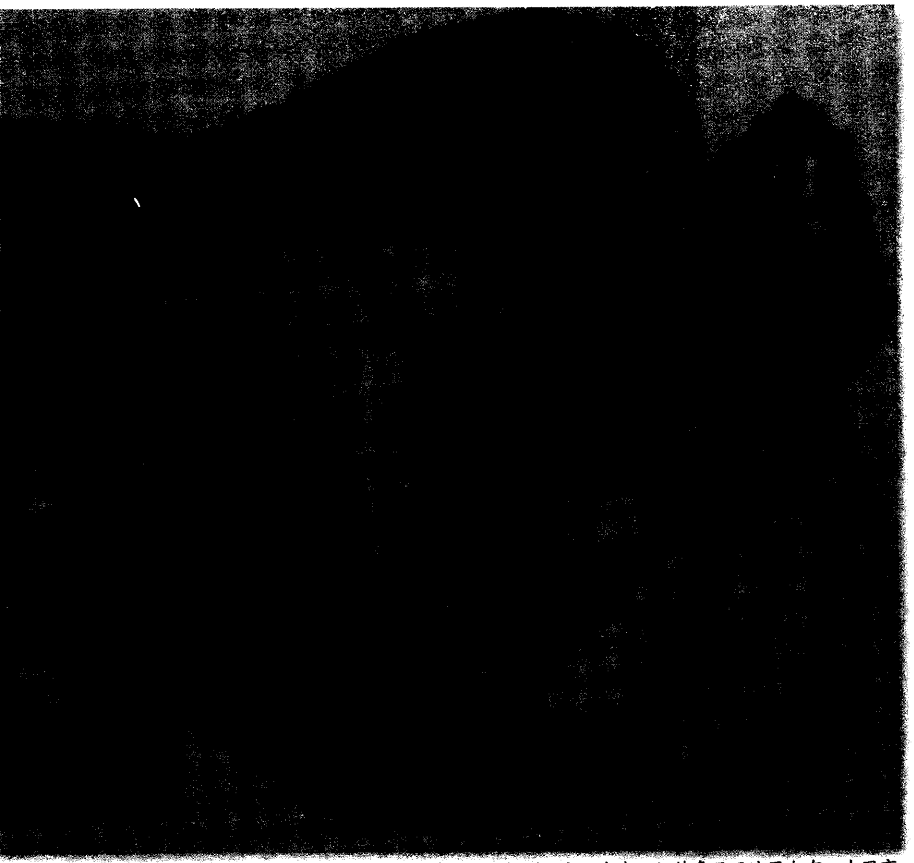
以上最为引起我关注并引我推理的是，黄帝有四妻，《圣经》中的雅各恰好从两河流域娶了四个妻子！而且，《圣经》中只记载了这四个妻子，盖因她们四个最重要吧。

周人女祖姜嫄按照神话谱系正是黄帝的后代，并且在张先生的列表中她很明确来自“有邰氏”（犹太氏）！这个条件进一步加大了对应的可能性。犹太氏族为 12 姓中的最大族群，他们在大约 3500 年前掌握了以色列人的命脉，大概从那时起，“以色列人”就可以被称呼为“犹太人”。

我还有一个推测是，可能在漫长的传说演化中中国人已经把约瑟和雅各弄混了，因为这两人实际上都是以色列人公认的祖先，并且他们俩是时代接近的父子关系，这就更容易混淆为一人。约瑟之所以也那么显要，是因为他继承了雅各的王权。他们俩组合成了中国的黄帝。

在商代祖先与神仙合一，在周代祖先与上帝分开（参考第 167 页）。这很符合我的推测体系。因为犹太人更尊重“上帝”，所以祖先就仅只是祖先；商代的情形符合萨满教原始时期，也与赫梯的情形接近，最高统治者人神合一。

由美术与神话中所能看出来的人对于动物的态度的转变，在商周考古与历史的许多其他方面也留了显著的痕迹。在这里我只举出骨卜的历史为例。……骨卜之俗在商代为最盛。……商亡之



▲狮子口里含人的艺术造型，不仅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文化中有，伊特鲁里亚地区也有，中国商朝也有。据说这个造型尤其为腓尼基人所崇尚喜欢。此物为腓尼基人物品。

后，骨卜之俗顿衰，到了东周时代，照考古证据说，虽然仍有施行的，但已不占什么重要的地位。（第 171 页）

我的推测是，商朝时期是万物有灵，但是到了西周就进入一神崇拜，其他动物当然就消失了，同时占卜也就不如商朝那么盛行了。

生还是死，关于“虎食人”的讨论（第 190 页）

从“乳虎食人卣”这个名词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对这一对卣所表现的人兽关系的一个看法，是张开大口的饕餮，正在把人头部吞吃掉。……（青铜器）人兽同现的器物，可以又分为四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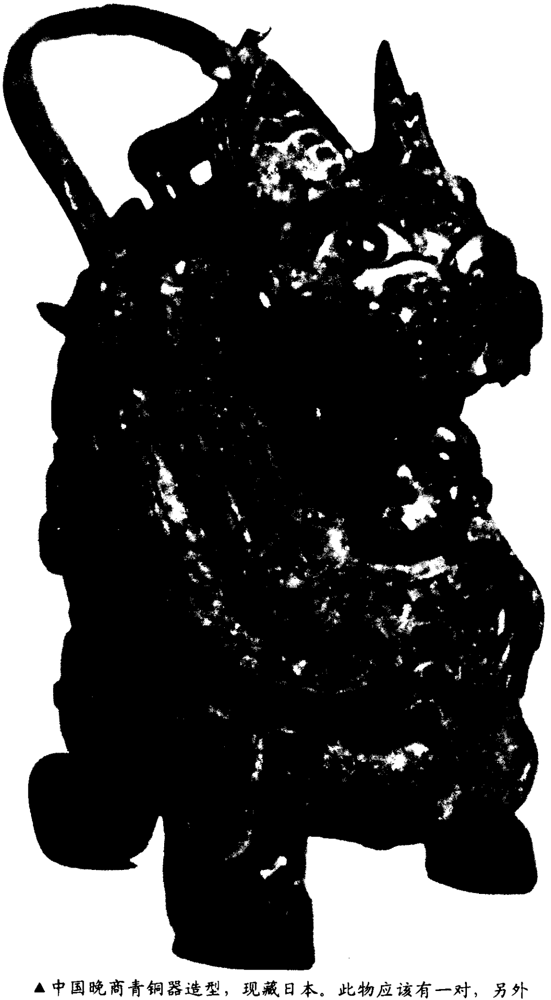
一、一个怪兽张开大口，人现头部和全身，人的头部在人兽

的上颌下，但人身与兽身双臂相抱——京都与巴黎的两件。

二、一个怪兽张开大口，人现头部和全身，人的头部在人兽的上颌下——弗烈尔美术馆的觚和刀。

三、一个怪兽的头面在中央，身体左右各向外展开，成为肥遗型，人现头部和身部，头在兽上颌下，人体与兽体垂直——阜南的一件。

四、左右各有怪兽一个，张口相对，把一个人夹在当中——安阳出土的两件。



▲中国晚商青铜器造型，现藏日本。此物应该有一对，另外一个现藏法国。耐人寻味的是，这对物品据说并不是黄河流域的出土文物，而是在典型的长江流域发现，大约出土地为湖南长沙附近的宁乡，该地曾经出土过大量青铜器。

这几种情形中，没有一件毫无疑义地在表现怪兽食人。唯一令人联想到“吃人”的动作是怪兽把口张开而人头放在口下。但这一个动作并不一定表示食人，即将人头人身咀嚼吞下。

那么这些张口怪兽与人形一起出现应该如何解释呢？有人指出张口的兽口在世界上许多古代文化中都作为把两个不同的世界（如生、死）分割开来的一种象征。这种说法与我们把怪兽纹样作为通天地（亦即通生死）的助理的看法是相符合的。而且这几件器物中所像的人很可能便是那作法通天中的巫师，他与他所熟用的动物在一起，动物张开大口，嘘气成风，帮助巫师形象或面具的说法相左，却与上文对动物纹样一般的解释是相符合的，而且还在《山海经》里找到不少支持。

商文化与环太平洋文化（第194页）

商周铜器的人兽关系与古代美洲的一种人兽关系有相像之处。以墨西哥的阿兹特棵人（Aztec）为例，他们每人生后便由巫师指定某

> 种动物为他一生的伴侣或所谓“同一个体的另一半”（alter ego），叫做这个人的“拿画利”（Nahualli）。在美术品上这个“拿画利”便常常张开大口把它的伴侣的头放在口中。这种“同一个体的另一半”在美术上类似的表现，事实上有广泛的分布，可以说是环太平洋的。看京都与巴黎两个乳虎食人卣上人兽关系的密切，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但是“亲密的伴侣”（familiar animal），而且也可以说是“同一个体的另一半”了！商代文化与环太平洋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又是一例。但是我们不一定主张商代文化与古代环太平洋或美洲文化之间一定非有什么亲缘关系不可。……在这上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这几件商代人兽同见的器物上的兽，很可能都是虎的变形。商王本身便是商代最高的巫师，所以这种关系可以代表王室成员与虎的特殊关系，就好像古代美洲的统治阶级在神话与美术上与美洲虎（jaguar）的特殊关系一样。

比较巧合的是，在世界史上这种人兽同在兽含人的造型一直被看作腓尼基人的典型传统。不仅中国殷商出现的类似物品很引人注意，而且中国南方长江中上游尤其是彝族人尚虎的传统又一次让人产生联想。此时我也再一次想到彝族人至今还保存着前面我们讲过的铜鼓。这些联系并非没有意义。

在嵩县那里，也是商文化的代表区域，有些案例或可纳入人类学视野。当地人为了保佑孩子顺利生长，一般会给孩子起很贱的名字，或者是与肉食动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表示没人吃他（她），或者没人敢吃他（她）。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名字就叫“狗闪”，从小到大一直这样叫，其实就是“狗剩”的意思。无论我们见到多少类似的人兽造型，看似凶险的画面中其实那些人都没有受到真正的残害，这才是重要的，他们最后时刻被“闪”了，这意味着一种神明的承诺与保佑。而把类似的形象给铸起来，怕是帝王或贵族的行为了，普通平民起个名字就可以了。或许在武丁这样的大名下有许多名叫“狗剩”“虎闪”的小名。

参考（第283页）“史前时代的文字遗存”符号的分布：

> 一、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3000年）：几乎全部集中于陕西……，但青海乐都也有发现。

二、大汶口文化（公元前500至公元前2500年）：山东。

三、龙口文化（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200年）：山东。

四、东南沿海文化（公元前2500至前500年）：上海、浙江、台湾、广东、香港。

特征：均单个出现，在陶器上面发现，占出土陶器很小的比例（估计不到0.5%）。仅有数量很少的不同符号，而同时见于一个以上遗址的就更少。据李考定统计，史前遗址中共出现八十八个符号，其中仅有十六个在一个以上的遗址中发现。

单个出现表示尚未到真正的文字使用阶段，还是“符号”。在一个以上的遗址中出现的比例很小表明远古沟通的不便。但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它们来自同一个起源的推论，原因是每个地方会有发展，会有自己的特色。只要观察其主要特征就可以了，比如笔画、整体符号的构成方式等。比如楔形文字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不属于同一个体系，以上两者与迦南文字以及中国区域内的文字也有差异，但很明显迦南与中国地区的文字接近。中国早期符号集中于中部和东部、南部，似乎向我们暗示了一个文明从南方或海上的登陆。

（仰韶）有的记号的确与商周的某些字相同，很可能是后者的雏形。（第297页）

我想不能仅以一些符号出现在哪个区域就认定属于何种文化，假如这些符号真的是行商的“合同”之类，那么只能说明这里有过一些商人的足迹，其他的什么都说明不了。随着我们对于远古社会越来越丰富的知识积累，就能看到一些划分不能简单机械了。

九鼎传说很像中国的青铜发明神话。如果能将它们与希腊神话中为阿喀琉斯（Achilies）铸青铜盾的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 ）的故事作一番比较，定会非常有趣。

九鼎神话直接而有力地宣称：占据这些神圣的青铜礼器，就是为了使帝王的统治合法化。青铜礼器是明确而强有力的象征物。（第2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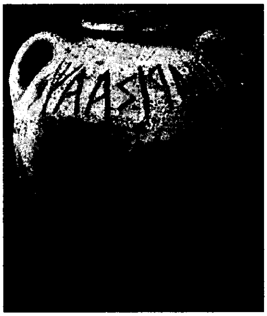
新时期的史前研究一定会将神话研究推向深入的，并且不仅仅是研究中国的神话，而且肯定要涉及到以往中国人并不注意的《希腊神话》。能够说出这样意见的考古学家是个美国学者而不是中国学者，可见还是西方人更开放一些，思维也更活跃一些。

> 古代传说中的神仙多在海中，因此求仙登天，必须经过沧海。(第 314 页)

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而说，中国的神话多是从商朝开始的呢?

> 最近 Pulleyblank 分析中国古代民族语言，主张夏是古汉语族，商与南亚孟吉蔑语系关系特别密切，而周之先世是藏缅语族。……现在的孟吉蔑语族有柬埔寨人，现代的藏缅语族有缅甸人。(第 382 页)

看到这个推论我很高兴。夏还难下结论，商朝按照我的推理确实由于起源在东部沿海，故而是应该有南岛文化特点的，只是被压在最底层难见真面目而已。而有关周人为藏缅人的结论更是揭示了他们从中东沿藏缅这条线经云南、四川到陕西的根源，事实上这条路线他们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后来他们的一部分受到秦朝压迫重新退回，这方面可以结合《锁定红海》中有关印度藏缅人以色列认亲的新闻就更有意思了。



▲伊特鲁里亚人 2700 年前的陶罐

百越民族及相关的信息

以下资料参考自一篇《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名称的由来》。从商文明、腓尼基文化以及黎巴嫩的历史对比的角度出发，建议对于下列百越民族进行深入有针对性考察：

傣族

族名：自称“傣”，意思是“自由”或“人”。按分布地区又有“傣那”、“傣雅”、“傣绷”等。

人口及分布：主要分布在云南德宏、西双版纳、耿马、孟连及新平、元江、金平等三十余个州、市、县。人口为 102.5 万人（1990 年）。

很早傣族先民就生息在滇、桂、黔地区，与壮族、水族、布依族、黎族等有密切的关系，同源于古代的“百越”。他们以“文身断发”为共同习俗。他们还步足老挝、泰国北部、缅甸和印度地区，为藏缅人。他们是最早栽培水稻和使用犁耕的民族。公元前 1 世纪，汉文史籍就有了关于傣族先民的记载。汉晋时，其先民被称为“滇越”、“掸”或“擅”，唐、宋朝时称“金齿”、“银齿”、“茫蛮”等；元、明朝时称“白衣”、“百夷”，清朝以后称“摆夷”或“摆衣”。解放前，内地和杂居区较早产生封建地主经济，西双版纳等边疆地区还保留较完整的封建领主经济。

畲族

族名：自称“山哈”或“山达”，意为居住在山里的客人。但文献记载中称畲族为“畲人”，意思指在山里搭棚而住的人。

人口分布：截至1990年为63万人。主要居住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八十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多与汉族杂居。

对畲族来源说法不一。有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武陵蛮说、“南蛮”后裔说和古越人后裔说。公元7世纪，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被称为“蛮”、“蛮僚”等。南宋末年，14世纪起，部分迁到闽东、浙南等山区。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在闽东、浙南等地山区。

语言文字：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现在只有广东十多个山村的一千多人会讲畲语。99%的人使用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但在语音和少数语词上与客家话有些差别，也不是当地汉语借词。本民族无文字，通用汉文。

佤族

族名：“佤”是民族自称，因居住地区不同，还有称“布饶”、“阿佤”、“阿佤”、“阿卧”等的，但都是“山居人”的意思。

人口截至1990年为35.2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西盟和沧源两个佤族自治县，此外，还散居在孟连、耿马、澜沧、双江、镇康、永德等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亦有一部分。

佤族先民在周秦时期为“百濮”的一支。唐朝时称“望蛮”，宋时称“蒲蛮”，元明清时称为“哈刺”、“哈杜”、“哈瓦”、“卡佤”等。“卡佤”原是傣族对佤族的称呼，在傣语中“卡”指奴隶。

语言属南亚语系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分为巴饶克、阿佤、佤三种方言。原无通用文字。

黎族

族名：自称“赛”，各地方言还有“歧”、“闰”、“美孚”等不同的称呼。公元 9 世纪末，在汉文书籍中出现了关于海南黎族的记载。黎是他们对“山岭”的发音转化。

人口截止到 1990 年为 111 万人。主要居住在海南省中南部黎族苗族自治州，其余散居在万宁、屯昌、琼海、澄迈、儋县、定安等县与汉族杂居。

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与壮、布依、侗、水、傣等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隋代称海南岛居民为“俚僚”，即黎族的先人。一般认为“黎”为“俚”的转化。黎族以海南岛土著自居。他们在海南岛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台湾岛也有黎族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居住在保亭、乐东、白沙三县交界五指山腹地的一万多黎族人还保留着原始家族公社残余的“合亩制”。

白族

族名：自称“白子”、“白尼”，“子”、“尼”都是“人”的意思。汉意为“白人”。旧称“民家”、“那马”、“勒墨”。据说因为他们崇尚白色，故称“白”。

截至 1990 年人口为 159 万人。主要居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碧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带等地，贵州、四川凉山州及湖南省桑植县等地亦有分布。

白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与古代的羌人有渊源关系。早在公元 1 世纪（汉代）以前就分布在洱海一带。公元 2 世纪，汉武帝就在这里设置了郡县，公元 3 世纪 ~4 世纪，由于战乱，不少汉族人曾避难来到白族地区，部分与其融合；公元 715 年由云南东部迁到洱海地区的大量各族人民融合于白族。14 世纪前后有不少屯军的汉族人在此地，后来也与当地白族人融合。后来部分彝族、阿昌族人也有融合到白族中去的。

白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南部、中部、北部三个方言。用汉字的音和义再加上一些新造的字来记录白语，被称为“白文”。使用大量汉语借词，是藏缅语族中吸收汉语最多的

语言。汉文也很早就成为白族人通用的文字。

布依族

一般认为布依族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族源上与壮族有密切的关系。布依族主要从事水稻种植，素有“水稻民族”之称，秦汉时期的布依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已相当发达。

现有人口约254.5万。主要聚居在贵州的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地区和贵阳市，其余分布在黔东南、铜仁、遵义、毕节、六盘水及云南的罗平等地。

布依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过去没有文字，一直使用汉文。

布依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信仰多神。

布依族人与“布匿”(Punic)之间是否有关可继续深入关注。

水族

族名：“水”是该民族自称的音译。“水”在水语中有“篦子”、“梳通顺理”的意思。历史上曾称“僚”、“夷”、“水苗”、“水家”等。

人口截至1990年为34万人。主要分布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部分居住在都匀、荔波及广西环江、南丹、河池等县境。还有一部分散居在广西。

水族与古代“骆越”族有历史渊源，是其中一支发展起来的。早在秦汉以前，岭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就居住着许多部落，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水族先民逐渐向西北往黔桂边境迁移；隋唐时统称“溪峒蛮”；宋代在该处设置“抚水州”，水族被通称“抚水蛮”，这一地名暗示以“水”为自称的人群已经形成。13世纪中期，有大规模的汉族人移到此处，13~17世纪又有大量的汉族士兵被调到此处戍守，设屯安家，他们的后代也逐渐融合于水族。

语言文字：水族讲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兼通布依、苗、汉语和汉文。有文字，称为“水书”。是一种古

老文字，但通用的单字只有三百多个，仅限于宗教活动中使用。这些文字全靠誊写抄录，没有刻版印刷，但各地的水书基本一致。大部分水族人不认识水书。他们日常生活中通用汉文。

以上各民族中最可集中研究的是水族与黎族。尤其是水族的水书已经被证实与甲骨文同源。尽管上面提到水族之“水”是音译，但实际上历史中他们有自称为“水家”的情况，所以完全可以假设他们曾经是来自海上的一个民族，由于他们是水上民族，所以连他们的文字也被称呼为水书。腓尼基人是否就是水书的创始人呢？这需要更多的论证，不过从逻辑上没有矛盾。“甲骨文”是今人对其之命名，很可能商朝当时就叫水书呢？

水书在民族内部的传播方式，比如用于宗教巫术活动，以及只在祭司中间流传等，都符合以往文字初期发展的规律。水书以及水族的研究有深远的价值。

2005 年 3 月 10 日晚 CCTV-10 频道《走近科学》栏目，主题是水书。一个江苏的陶瓷爱好者给荔波县整理档案的人写来一封信，说他在一个唐宋时期的陶瓷上面发现一些字，看着有些像水书，也像甲骨文，不能确定，就把那些字描下来给他们看。结果，几个“水书先生”看了，并且是好几个“水书先生”分别去解这些字，他们的解释是一样的，说这些字是“干支”。同时大家也发现，这些水书也是甲骨文，这就揭示了一个重大秘密，实际上这些深藏在中国西南方少数人手中的水书就是古老的甲骨文，或者说它们是同宗的。

据说在当地水书为传家之宝，是一种并不普及的知识，单代相传。可以推想在 3000 年前这个知识也是作为秘不示人的神秘宝贝。这或许部分能够解释文化同源的三星堆人为什么没有文字，而中原商朝却有文字。文字是核心机密不是谁都可以看的。借助这些社会学信息可以推测古代文字的出现与传播是有益的。

“水书先生”可能也叫“鬼师”，他们掌握水书知识。假如上推商朝，他们可能就是“贞人”。

水书从右向左书写，这一点与甲骨文同，不过甲骨文也从上向下写。同时西方的大多数文字都是如此方向写的。

水书被描述为是受压迫民族使用的，实际上可能是作为商族

▲此照中全部为海南黎族同胞 苏三 / 拍摄

后裔的压抑一直存在的结果，似乎水书一直在躲避中使用。其主要用途为占卜。

水族人自述来自北方，从江西，而广西，最后到达今天的居住地贵州。他们使用的吉祥图案有北方人喜欢的鹿，这不是当地的动物；另外结亲时必须使用南方人根本不可能使用的羊皮大衣，这些都可证明他们来自北方。另外，他们还喜欢赛马，过隆重的“端节”。女人喜欢穿蓝衣裹白头巾，男人则喜穿黑衣。

附资料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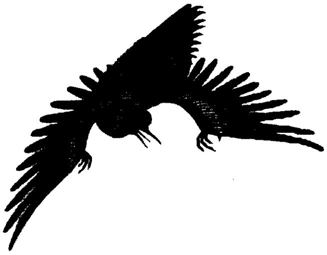
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介绍了他和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对台湾发现的大坌坑文化遗址、圆山文化遗址等进行研究的情况。两位史学家通过与代表“古越人”生活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等进行较全面的比较，他们认为在距今六千年到四千五百年间，台湾先住民中的泰雅、布农等族的祖先就开始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陆续进入台湾，后来又有三次较大的迁入活动。这也与台湾著名考古学家阮昌锐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

台湾先住民的风俗习惯保留着古越遗风，如断发文身、龙蛇

崇拜、缺齿与墨齿、腰机纺织、饭稻羹鱼、干栏式建筑、悬棺葬、屈肢葬等等，都是台湾先住民源自古越人的有力证据。

据台湾考古学家阮昌锐先生介绍，从出土的陶片、石器以及若干古文物考察可证明台湾原住民为西来说，即属大陆系的成分较大。考古分析，自四千五百年前有两种文化自中国大陆传入台湾岛，其一为台湾龙山形成文化，类似大陆龙山文化，有各种形式的彩陶、黑陶等，而今居于山区的泰雅族、布农族就是早期龙山文化的移入者。其二为圆山文化，以台北盆地为中心，有各形式陶器及磨制石斧等。至于居住在平地的诸族如阿美族、卑南族、噶玛搁族等，迁入较晚，其文化接近南岛系。阮昌锐先生介绍说，南岛系民族，经考古学家与民族学家研究其祖居地亦在中国华南地区。

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李辉和宋秀峰博士用中华民族基因组的DNA研究成果对海南黎族和台湾阿美、泰雅、布农、排湾族人男性Y染色体类型做了分析。据李辉介绍，国际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金力教授和中科院遗传所的杜若甫院士于1998年前分赴台湾和海南采集了两岛六个少数民族的血样，经DNA研究结果表明，六个民族中，其中有五个民族的主要Y染色体类型完全一致。海南黎族人主要有三种类型的Y染色体，台湾阿美族人只有其中一种类型的Y染色体，泰雅、布农、排湾族人有其中两种类型的Y染色体。他们这种相对较纯的Y染色体类型与发源于浙江河姆渡的古代百越人简单的Y染色体类型相一致，证明他们有相同的古代百越人祖先。



在查阅“三代”时期的遗址或都城，会发现许多名字接近“an”的地理名称，似乎是一种语言习惯，但后来分化为“奄”(yan)和“安”(an)。尤其以东部沿海和商、周比较频繁，可以留意观察其他语言中的类似情况。从侗水语中“an”(水语)表示“干栏式房屋”来推断，由于当时的人们或者惯于航海或者多居山洞，一旦使用房子就有“高级文明”或城市聚居区的意味，或许从这方面称呼为“奄”和“安”甚至是“庵”，或以“干栏式”代表一种统一的“民族”，指具有“干栏式”房子的民族聚居区?

来自山东的朋友告诉我，今天的山东人其实多半都是山西人，所谓“大槐树”下的传人；另外一个朋友肯定了他的说法，补充说：但不止于此，原本的山东人据说被赶到了江浙一带。这个信息具有两方面的价值：1. 本身提供了族群的流向；2. 说明了山东与江浙的方便联系，另外它们地理条件接近：都临海。这可以印证新石器时期沿海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存在的。

中国北纬大约40度的地区流行一种近似的戏曲形式，可以看作一种文化的传播。这个传播现象具有人类学借鉴意义。其地域有青海、甘肃、蒙古、陕西、山西、辽宁；这个戏曲在不同地区的名字为：二人台、满翰调、信天游 、陕北民歌、二人转。

张光直《商文化》第155页讲到：甲骨文是一种新造的不成熟的文字。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推论，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确实是在后商“突然”出现的。

说到“红色”，还有一条信息是非常有趣的。文明源的研究者王立说：两河流域有一个时期由阿卡德人统治，“阿卡德”的意思就是“红色”。而今天的日语中发音为“aka”的单词恰好就表示“红色”。

或许这可以说明从两河到阿拉伯海到太平洋西岸的文化是相通的，或者是“腓尼基人”把这个语言带到了东亚的日本。日本整体上还是应该看作海洋国家。

一个地区的人们发音习惯肯定与他们的固有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两个遥远的地区有着某种方向相似的特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比如中国中原地区的河南人与新疆地区的人们在讲汉语的时候有着明显的共同腔调或发音倾向，以至于许多新疆人的汉语听起来像河南话。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曾经让我十分纳闷，这牵涉到太多的因素。我怀疑，两地是否有某些渊源联系，指向两地人有共同的发声倾向。或许有人说，那是因为新疆的河南人太多了的缘故。存疑。

著名的希腊史诗作家荷马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科学家泰勒斯等，实际上都并非是希腊半岛上的人，他们出生并生活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希腊城邦。

考察距离我们很近的郑和下西洋，就可以推断当初一个高级文明向低级文明传播的规律与情形。实际上中国丝绸之路就是亘古就有的一条道路。

今天的所谓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区域，多就是当年腓尼基人的活动区域，假如还不能说它们两者是同一概念的话。我们为什么最大规模地出使派遣的是一个回民马三保，也是需要考虑的。他与要访问的地区有着更方便的交流与沟通，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无论是陆地还是海路，对于这个群体，从精神构成到民族血统，从古到今，他们一直是以商业为主的一个民族和群体。中国江浙人，尤其是今天的温州人，还有福建人，为什么可以到世界各地

去闯荡，在汉族里面显得十分“外向”？可能是他们血脉中流通的古老血液，无论多长时间，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家园在路上，他们的战场在商业。

西方与中国的联系是肯定存在的，问题只是这个联系或传播是多米诺骨牌式的一牌传一牌，还是一牌从开头直接跑到了末尾——像马可·波罗一样。这确实是个问题。想想全球旧石器时期的统一性，甚至他们分期的统一性，然后是新石器时期的开始与结束，青铜器时期的开始与结束，还有铁器时期的开始，几乎像有一个报信人，同期传达了信息。是风儿把消息传递，还是天使报信？是我们至今无法想象的古代极大的自由性将这些消息迅速传递，是一批又一批精明经营的商人，更有那些不安分的探险家们。

假如有人说龙目是宋朝三保从阿拉伯带回来的，那么很快就可以证实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唐朝的船上就已经有了龙目。中国历史记载中一直就有阿拉伯商船来往于中国与中东之间，所以也可以看出来，古代腓尼基人和后来的阿拉伯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中国第一个有瓷器的王朝是商朝。中国瓷器比较发达的地区似乎都在中原及其以南地区，而陶器最辉煌者似乎在北方，西北、东北都是。寻找世界上瓷器的起源也是一个可以深入下去的兴趣点。

从中国郑和出使摆平斯里兰卡把国王都给换了的情况看，一个大国完全是可以通海的，并且也只有大国才方便。

中国从春秋战国已有南方为上的习惯，而具

▲从出土的雕像来看苏美尔人中有许多人毫无疑问是欧罗巴人种，但有一些人却是蒙古人种。

▲苏美尔人向来被怀疑与中国文明起源有关

▲苏美尔人

有这个习惯的恰好是阿拉伯人。说明中国古代接受的恰是一种阿拉伯文明，也就是近腓尼基文明。

分子生物学家金力在电视上说：我们试图从中国寻找出东亚起源的证据，但是做了1.2万人的DNA测试，发现所有人都是非洲起源。距今10万~4万年之间没有人类化石。

位于黎巴嫩滨海地区古代腓尼基的海港比布鲁斯为《圣经》中的盖巴勒。

古希腊单位：斯塔德 180 米。中国古代有许多以此为倍数的度量单位，比如 1.8 米的寻。

中国甲骨文的“孟”字是一个婴儿在盆子里沐洗的场景，我怀疑这个“孟”字的本义就是犹太教里的“施洗”。而这个“孟”姓起源或许可以参考来自红海的“孟那里克”王朝。

在中国表达“人”的时候，发音“ren”，东北人发音为“yin”，实际上这很可能是全球统一的“n”的一种异化，英语中表示“民族”或“人”的后缀不是“-ean”就是“-nite”，总之与“n”这个发音有关。而“n”这个音很可能发“zen”，渐渐转化为“ren”，实际上中国南方部分省区至今依旧将“ren”读为“zen”，可以看作一种残留。

上海的“阿拉”表示第一人称“我“，很有可能与北方河南、山东、河北一带的“俺”同源。“Ala”，表面上看与“an”相差很远，实际上一分析就不远了：a-a，la-n。中国南方与北方本来就有“n”、“l”互换的倾向，并且其基本规律恰好是南方人就把“n”常常发音为“l”。西语中相差不会很远，比如同源视野下的英语就是“I”（ai），与“俺”非常近。今天的客家话据说保留了商、周时期的古音，而他们的第一人 tqi 与英语就更相似了，接近读“ai”，写为“伲”。而日语中则是接近 anat，根据以上可以置换为 alat，就可以清楚日语与一海之隔的上海方言的接近。现代汉语中的普通话“我”应该说与以上也不远，因为它发音“wo”，实际上与以上所有的第一人称一样是个元音：“o”。经过几千年的演变，最终没有变出围绕元音这一范畴，它们总体上的根源是可以归结为有联系的。实际上黄海两岸地区的中国人（尤其是某些江苏地区）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某些族群的语调非常接近，由于不熟悉这些地区的方言连我有时候也分辨不出说话的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或日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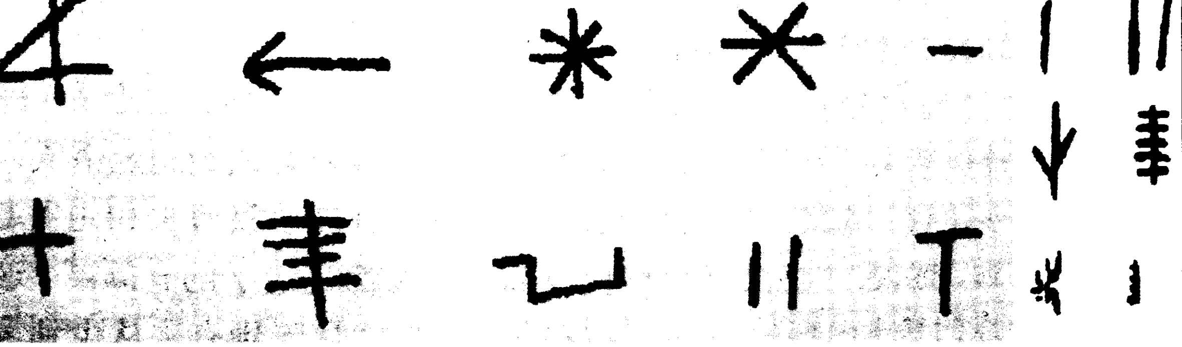
阿提密斯是希腊的狩猎女神，阿拉伯人称她Lat，埃及人称她依西斯(Isis)，而罗马人则称她为黛安娜(Diana)，在古代的希腊阿提密丝女神深受敬仰，因此兴建了七大奇观之一阿提密丝神殿。可见一个神在不同的地区是会发生变化的。名称的改变是很正常的。

四象中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可与龙、虎、鸟的形象相联系，也就是说东夷崇拜龙，西羌崇拜虎，南蛮崇拜鸟，其天象与动物形象可以明确对应。唯有北方玄武与龟蛇相应有点莫名其妙，玄武是什么含义？它是一个音译的词汇？

广义上的阿拉伯世界要广大得多。有22个国家和地区明确属于“阿拉伯世界”，包括：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特尔、巴林、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埃及、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吉利亚、摩洛哥和毛利塔尼亚及位于莫桑比克海峡的科摩罗群岛。我很愿意首先把这些地区想象为腓尼基人曾经广拓商路的地区。今天的所谓阿拉伯地区比当初“腓尼基地区”要小，原因是这里的阿拉伯划分多是从宗教归类的，其实还有许多地区不在同一个信仰之下的也是同样的底层文化。

第五部分

走马观花史前语言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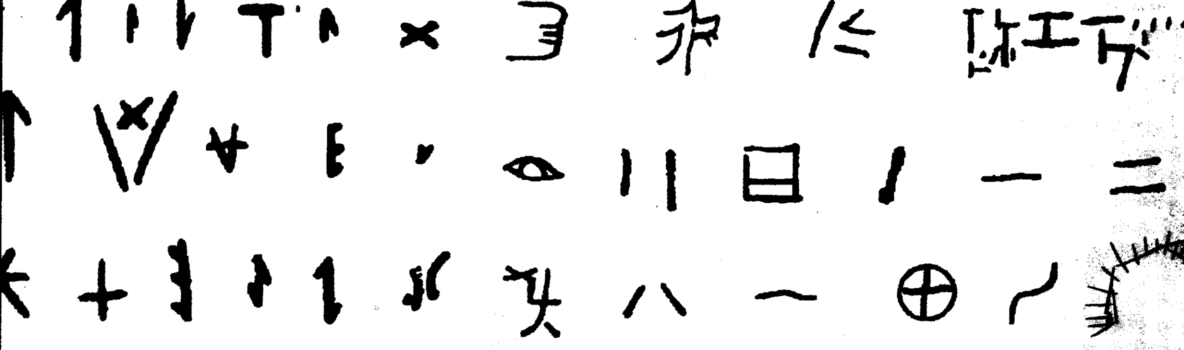
▲半坡符号，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中国地区的语言文字，无论从大约七千多年前的贾湖符号，还是从仰韶时期的半坡与晚夏时期的符号来看，它们与后来的殷商甲骨文都有继承关系。这无疑给了中国文明独立说以强有力的支持，似乎文字问题是在中国之内独立解决的。但问题不止于此，假如只看到这一面就下结论，必然是个片面的结论，还可能是个谬论。我们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与中国发现的这个序列是否有关，并且要研究它们之间是否发生过交流与沟通。

更多的事实证明，越到后来中国与中东文明发源地产生了越多的联系，本土化与外来文化交错发展才是中国文明的主要特征。

就文字方面，与中国这些古老符号相像的体系还有大约四五千年前的迦南文字以及由迦南文字发展出来的腓尼基文字，还有它们发展出来的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使用的“南阿”文字。同时我们还要给没有发现的古代文字留下一个想象的出口，因为总体中东文明在新石器时期早于中国地区，我们真的没有理由自信于中国文明自生，这不合乎逻辑。非要在这个问题上争先，是一种民族不自信的表现。从源头来说我们都是从非洲出来的，假如比光荣还是看今天的社会成就最直接，古人怎么样与我们今人何干?

为什么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古人们的文字神秘地保持着联系，因为在很久以前有一群善于航海的人们，或许出于避难、出于扩疆、出于探险、出于商业，他们到处游走，多沿海而行，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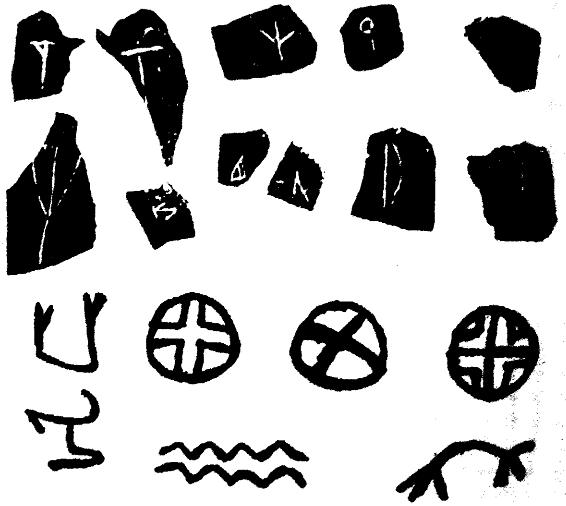


▲两河符号，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贾湖符号，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且围绕着一些文明发达地区发展，最终致使许多相似的文化带或文化信息连续地出现于一些地区，比如太平洋西岸、东南亚岛屿之间、阿拉伯海沿岸、红海两岸、地中海两岸，甚至穿过西班牙半岛至西欧和北欧，而中国只是这个文明传播中特殊又平凡的一环。至于哪里才是这个文字系统的源头，我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但中国的贾湖可以作为其中之一来考虑，因为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早的一批文字符号，但是作为系统的属于常规文字范畴的源头却可能是地中海东南处的迦南。

我已经不想继续一点一滴地积累地中海或者其他地区与中国之间的民俗联系了，我发现拿文字对比可能是最简单的办法。不过，假如真正按照语言学家的传统学术方法去做，估计我这一生也做不出来，因为我不仅要搜集详尽的文字符号图表，而且还要去学习那些语言。我决定用比较野蛮草率的办法先指出一个可



◀埃及符号。我认为这里展示的几种符号之间还是有关联的，同时它们既不属于楔形文字也不属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系统，或许它们属于另外一个隐藏的古老系统。这就是商人文字：迦南符号。

能的草图，意近猜想，指出一个大致的方向，至于最终的精确答案如何，让语言学者去仔细研究吧。我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看外形特点。我相信外形书写及构造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具体是否有价值以及是否正确，专家可以深入批判指正。

西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恶劣考古资料不全，所以西藏地区没有考虑在内，暂时是个空白。这里观察的核心是大约4000年~3000年前除西藏之外的东亚与中东以及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区域的文字交流或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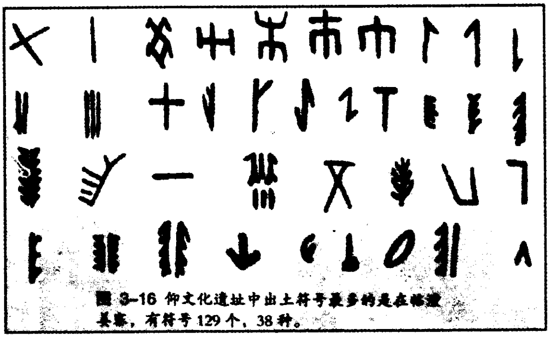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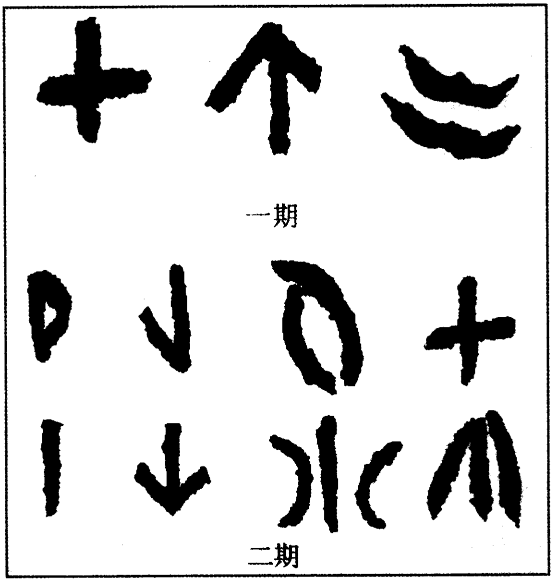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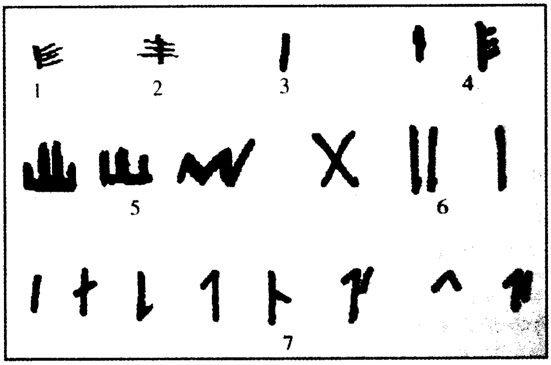


图 3-16 仰文化遗址中出土符号最多的是在临潼姜寨，有符号129个，38种。

▲中国陕西临潼发现的仰韶时期的符号、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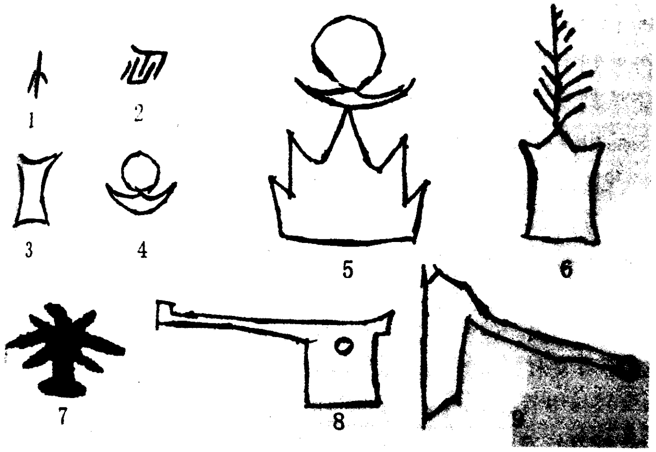
▲甘肃大地湾文字符号、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甘肃与陕西等地出土的文字符号、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借助参考的中国语言主要是两方面：仰韶晚期与夏时期文字符号，商朝文字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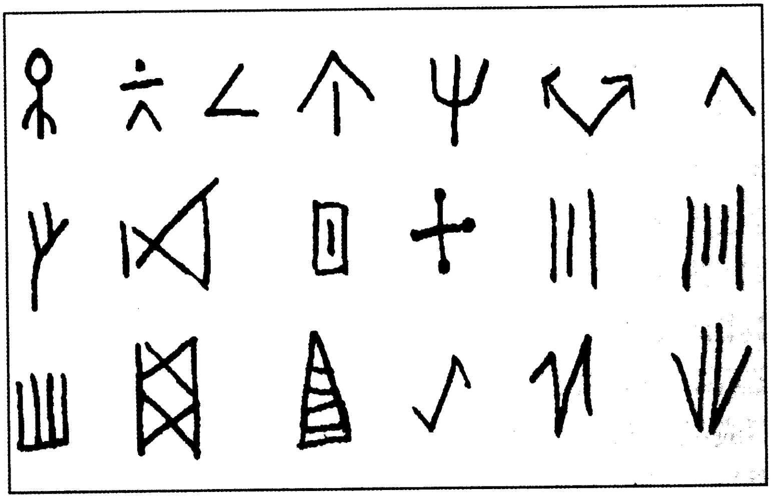
从山东我们可以看到接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大汶口文字符号，那可以看作是埃及文明试图在中国直接登陆的一个痕迹；然后与其衔接的是接近“南阿”的商甲骨文。一直被我看成腓尼基文字的仰韶晚期文字与夏早期文字，实际上可能介于迦南文字与腓尼基文字之间，这个区分需要更细的研究，因为它们是同系列的，时间也恰好对应，在大约4000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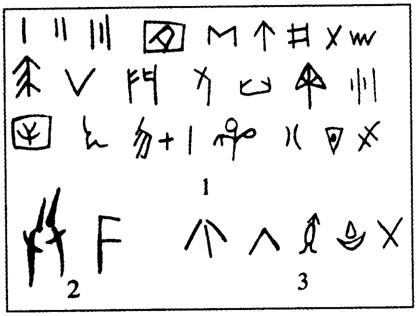
▲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符号　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当我仔细翻阅尽可能多的古代文字时，发现世界上有那么的文字与中国地区的文字符号接近！这就给我一个启示，假如我们说所有文字接近的区域有继承关系的话，那么这些文字接近的区域肯定被同一群人联系在一起，假设他们为来回穿梭流动的商人可能最好理解。而迦南文字体系不仅出现于这些地区，而且迦南人就是商人。并且，人类文字的出现最初是因为商业的出现，几者全部符合现有的文字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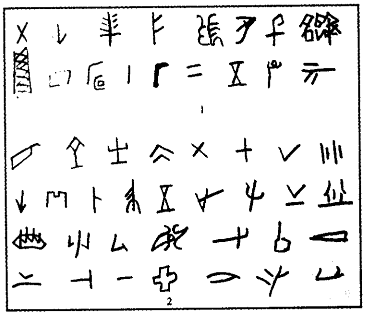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假如说最初的文字都是商业文字的话，那么首先就要考虑那些最初的符号是商人留下的，并且那些符号确实接近或者属于迦南文字。这个推理链条很坚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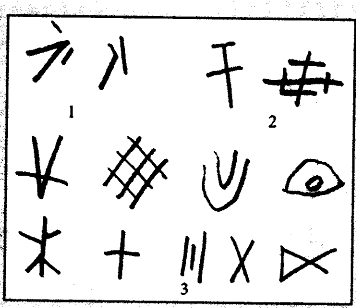
▲假如不事先说明，大多数人会误以为这些是中国早期的符号，实际上它们是印度的史前文字符号，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印度“通道”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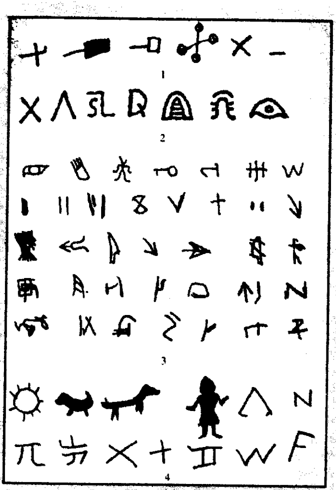
▲中国河南、陕西省的二里头、王城岗、紫荆等地出土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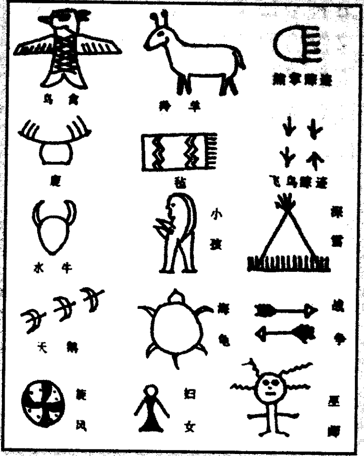
▲江西吴城符号　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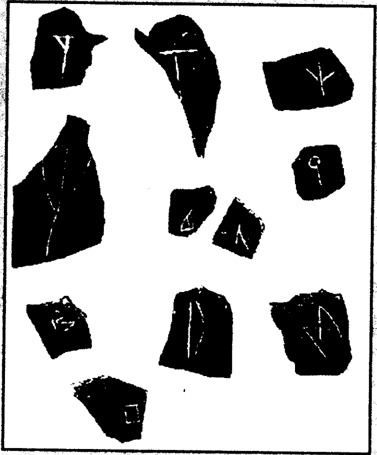
▲中国山东榧台、河北下七垣、河南郑州南关外等地出土符号。下面两行是河南出土的，整体看它们与三星堆符号接近，不过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些符号实际上是可以调换角度与方向的。



▶中国出土符号。从上到下的顺序为大洋洲、四川三星堆、台西村、甘肃。引自《图说文字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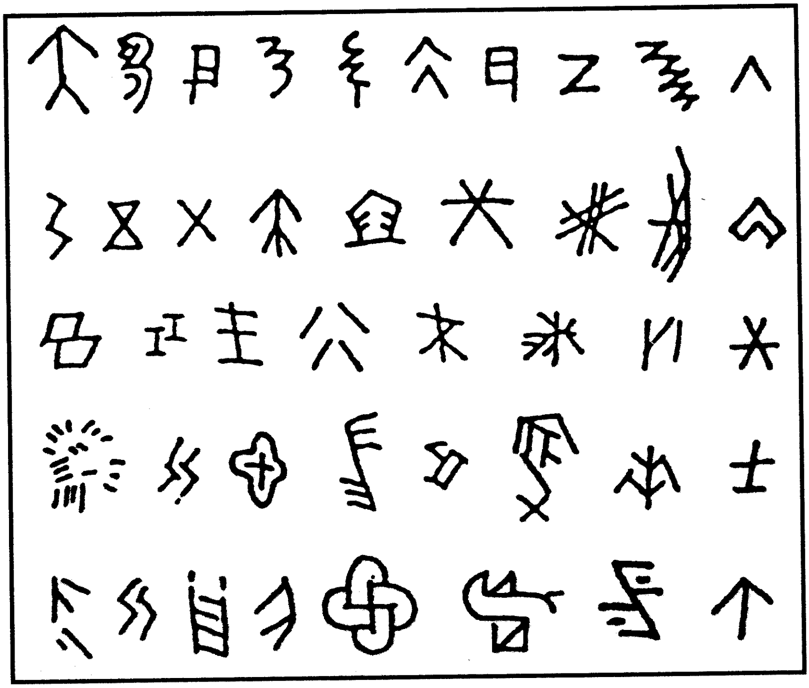


▲美洲印第安部落符号，尽管与旧大陆有所区别，但是仔细辨认其实还是有关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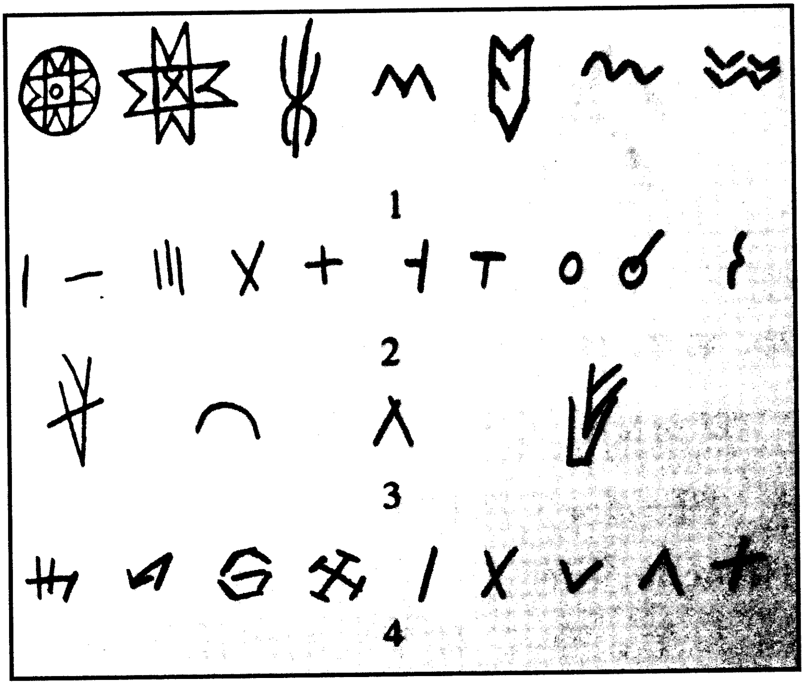


▲埃及史前符号其实与中国地区的符号很接近，真的可以怀疑早期迦南人，甚至是迦南人的前身进行了这一沟通，因为所有这些文字都最终指向迦南文字或腓尼基文字，我们必须承认是接近的群体在传播这些接近的符号或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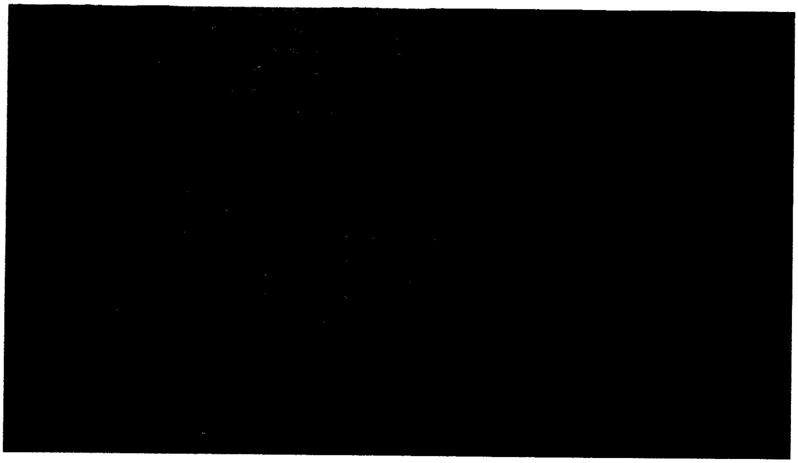
在我查询的接近的语言线路上，非常清晰地指出了中国地区与中东及其附近地区的海上联系，红海与地中海是主要的区域——那正是腓尼基人（也就是迦南人、商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实际上，从这一个点出发更容易看出，无论“南阿”还是甲骨文都更像是象形文字与地中海东岸地区“原始迦南文字”——“腓尼基文字”的结合发展，同时古希腊以及古代意大利半岛与中国之间的可能联系也被逐渐揭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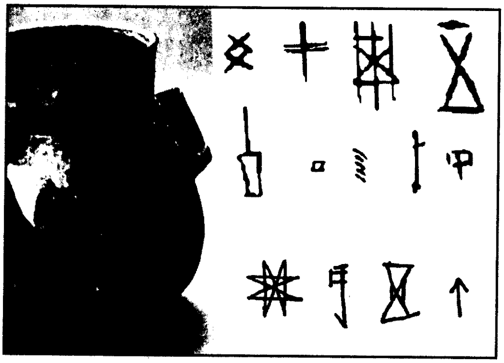
▶中国湖北省大溪文化符号



▶中国地区史前符号，从上到下顺序为:（长江口）太湖地区、马厂、清水滩、（长江口）良渚地区。



▲陕西西安出土的符号（本页图来自《图说文字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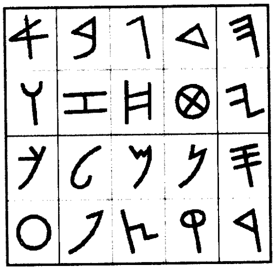


▶太湖地区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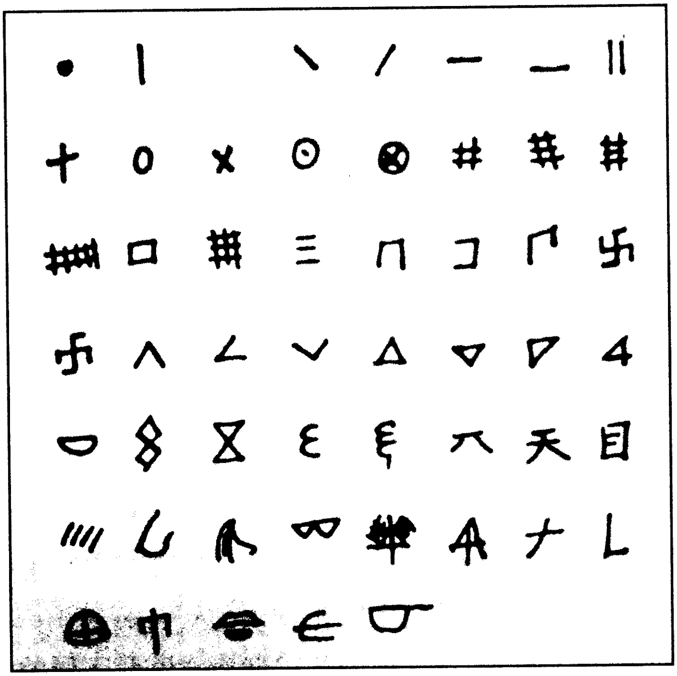
在考虑中国与中东以及附近地区的联系时不可再单一地认为彼此是点到点的联系，要考虑中国接受的文明是一个多种文明的混合体。其实，这也正是中国的文明一直找不到源头的原因之一。“点对点”的对比方法有机械僵化的嫌疑，每次人们使用这个方法就会无功而返。设想一下“三代”时期中国的方国成千上万，这些小方国很可能都代表着一股不同的中东文化势力，到了秦汉前后，它们全部在中国融合交汇为一体，所以我们想寻找一个单一纯洁的中东文明源几乎比登天还难！但是只要我们找到几条主要的交通通道，并且寻找到语言的大致流向，就可以解决一些主要的问题。

南亚以及附近地区

假如选取与中国地区最大的两个对应区域，我挑选地中海东岸与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前者为使用腓尼基文字的区域，后者为“南阿”文字的区域 。



▲腓尼基文字



▲中国西北青海一带的文字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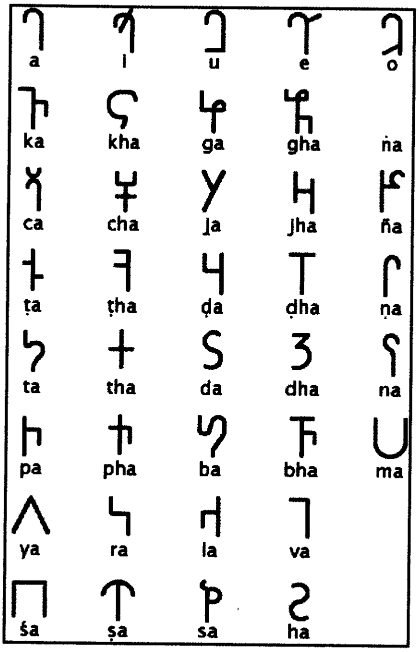
然后我们看其他比较接近，或者明显有嫌疑或者关联的地点。不过，我首先还是要补充上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地区，它们与中国之间一定有文明的交流，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因时间问题而没有后来的腓尼基文字与“南阿”那么明显。

与中国最接近的东南亚地区是个不可缺少的过渡或衔接地区。古代高棉人使用的 Khmer 语言属于印度板块的文字，接近梵语。Khmer 最初出现于公元前 7 世纪左右。泰国人使用的暹罗语 Siamese 也属于梵语，并且出现的时间相当晚。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比对，暂时只能保留一个空白。但其他方面的信息可以印证这个结论，东南亚是个过渡地区，比如悬棺等都可以看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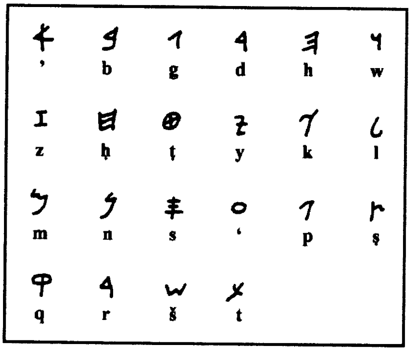
一些印度史前文字与夏商文字有明显关联。但是后来印度地区的文字却与中国之间拉开了距离，说明它们被另外一种文明冲断。我深信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西南以及西藏地区在中国“三代”甚至更早之前有着广泛深入的文明交流。

藏语与汉语属于同一个语系，所以可以证明藏汉实际上是一家人。但藏人后来借用了梵文来表达他们的语言，所以，表面上看藏语与汉语不同，事实上从语法等角度看藏汉非常接近。

由于印度是个人种库，


a
i
u
e
o
ka
kha
ga
gha
ṅa
ca
cha
ja
jha
ña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ta
tha
da
dha
na
pa
pha
ba
bha
ma
ya
ra
la
va
śa
ṣa
sa
ha

▲ Kharosthi 文字，据说其根源是 Aramaic。（亚拉姆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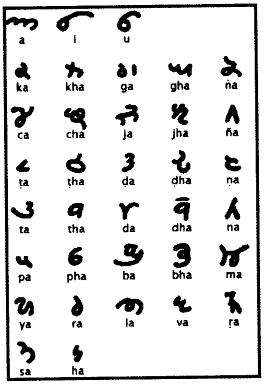

'
b
g
d
h
w
z
ḥ
ṭ
y
k
l
m
n
s
'
p
ṣ
q
r
š
t

▲亚拉姆语，这是一种大约 3000 年前广泛使用的国际性商业语言文字，其使用范围从地中海沿岸到印度半岛都有分布发现。它来自腓尼基文字，这些文字的继承关系已经指明了传播的途径。

所以印度各地有着差别很大的各种语言在使用。印度南方有两个邦的文字与中国的甲骨文有明显联系，这两个邦是 Karnataka 与 Andhra。不过这种文字又融合进一种叫做 Old Kannada 的文字，外形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文字又以 Kannada-Telugu 著称。它指出了中国与中东之间南部印度是一个可能的停靠站。

Kharosthi 文字一般认为出现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巴基斯坦与东部阿富汗一带，甚至进入印度。有人认为这个文字发源于印度的一种方言，并且属于梵语，我认为该文字明显与中国文字有关联。推测是，有一股文明曾经从阿拉伯海登陆印度，他们沿印度河进入中国西域，所经过的区域正是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地区。中国与之连接的是西藏的阿里地区，在古代这里曾经有像雄文明与古格王朝的出现，其另外一个衔接地区是新疆的昆仑山与帕米尔高原。这批人可以穿越青藏高原到甘、青一带发展，也可以在新疆生活并穿越河西走廊汇入中原。另外，这个地区与今天的尼泊尔地区文化接近。就这一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生活在中国甘肃的一个特殊的民族：裕固族，据说他们的语言与尼泊尔有相似之处。

与上面并列的另外一种可能有关的文字是 Landa，主要使用地区是印度西北部的 Punj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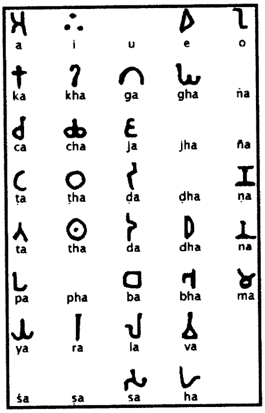

a
i
u
ka
kha
ga
gha
ṅa
ca
cha
ja
jha
ña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ta
tha
da
dha
na
pa
pha
ba
bha
ma
ya
ra
la
va
ṛa
sa
ha

▲ Landa 文字

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仰韶文化、“三代”文化可能有着神秘的联系，这是一条长期的文明信道。在这个信道上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大约 4000 年前突然消失的印度哈拉巴文明，其源头大约距今 7000 年。

印度西南部的 Grantha 文字也与中国文字有着微弱的联系。

Orissa 是印度一种古老的文字，它在古代被称为 Kalinga，其使用地区为今天的奥里萨地区，与中国古代文字符号（或者说与腓尼基文字）有比较明显的关联，它面临孟加拉湾。或许它说明了中东船队来到东亚必须在这里有停留中转。这里比较大的港口城市是斯里卡库兰。


a
i
u
e
o
ka
kha
ga
gha
ṅa
ca
cha
ja
jha
ña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ta
tha
da
dha
na
pa
pha
ba
bha
ma
ya
ra
la
va
śa
ṣa
sa
ha

▲ kalinga 文字

印度北部的 Cupta 文字也与中国文字有联系，这种语言的使用主要在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 322 年 ~ 公元前 185 年）。

我对于印度半岛的总体看法是，这里一些地区与中国有着明显的联系，而另外一些地区似乎又没有联系。部分原因可以考虑为历史上种族战争冲突和流动的结果。

来到西亚

中国的文明毫无疑问与西亚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亚地区一般指今天的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以色列、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等国家和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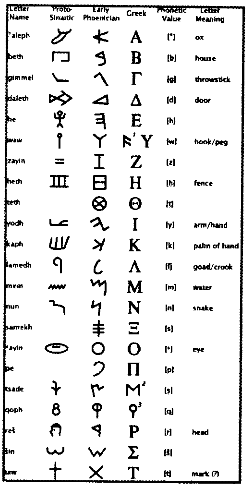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字直接或间接与两河流域有关，这一关系体现在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红陶文化上面。我认为红陶中的许多三角形或者鱼形符号实际上都是楔形文字的演变。这一交流很可能是通过伊朗和中亚而完成的。假如我们说文字是商人带过去的，那么其他形式的文明则可能是另外一批人带过去的，他们不必是同一批人。

阿拉伯文字是比较后期的一种文字，所以我们避开不谈。换句话说，中国的文字或文明根基是在阿拉伯文字出现之前奠定的。

古代希伯来文字基本是同样的道理，不过古代希伯来语出现的时间却比阿拉伯文字早些，大约在3000年前。中国文字与古代希伯来文字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但这并不表明两者之间没有“语言”的关联，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阿拉伯文字和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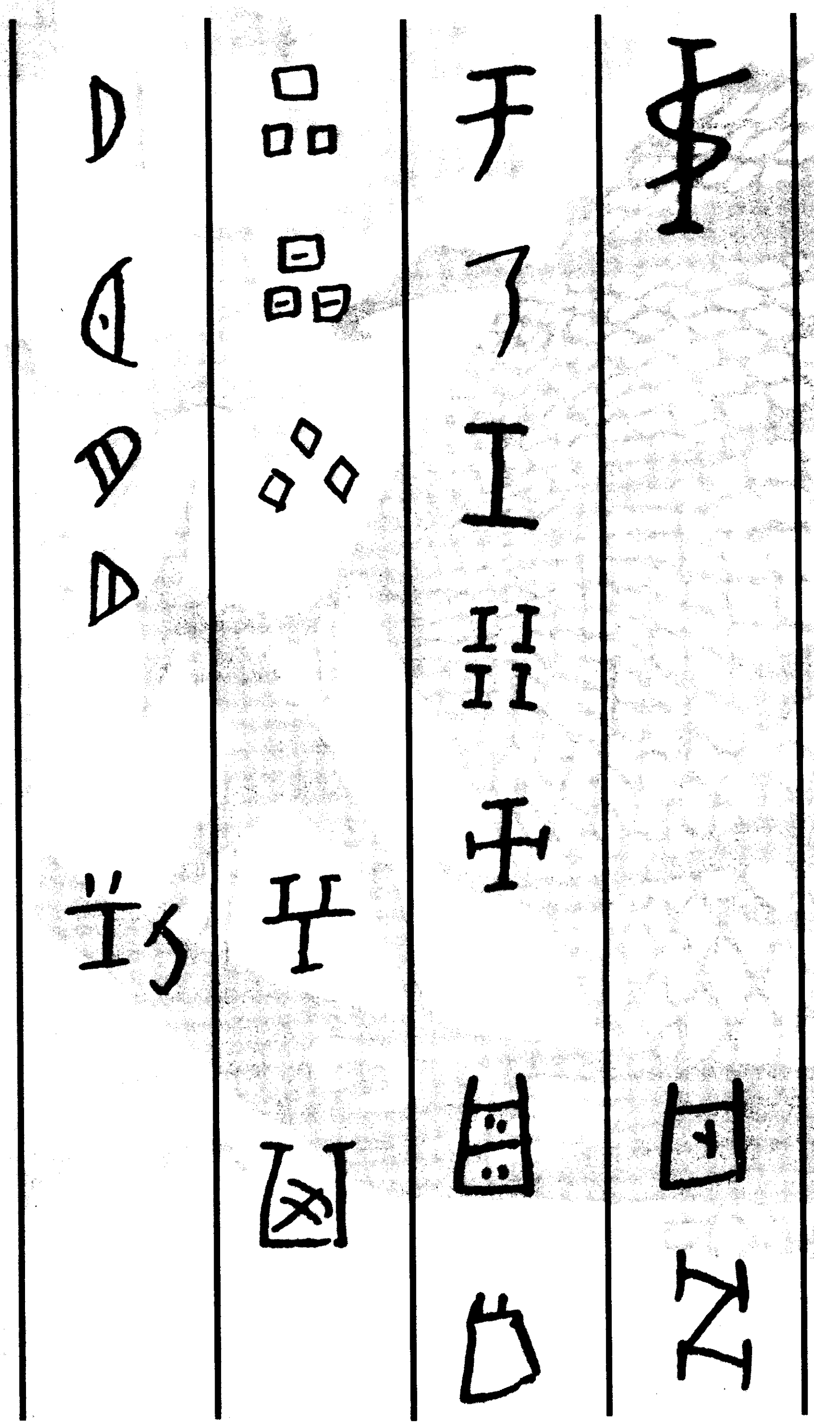
它们两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腓尼基文字，之间的一个过渡有可能是亚拉姆语（Aramaic）。这个文字与中国的夏时期符号有着惊人的一致。部分赫梯人使用这个文字系统。

Aramaic被翻译为阿拉米语或亚拉姆语，是古闪族语言，在阿拉伯文字出现之前被西亚地区的闪族或非闪族人广泛使用。它是一种国际性商业文字，使用的最早时间一般认为在三千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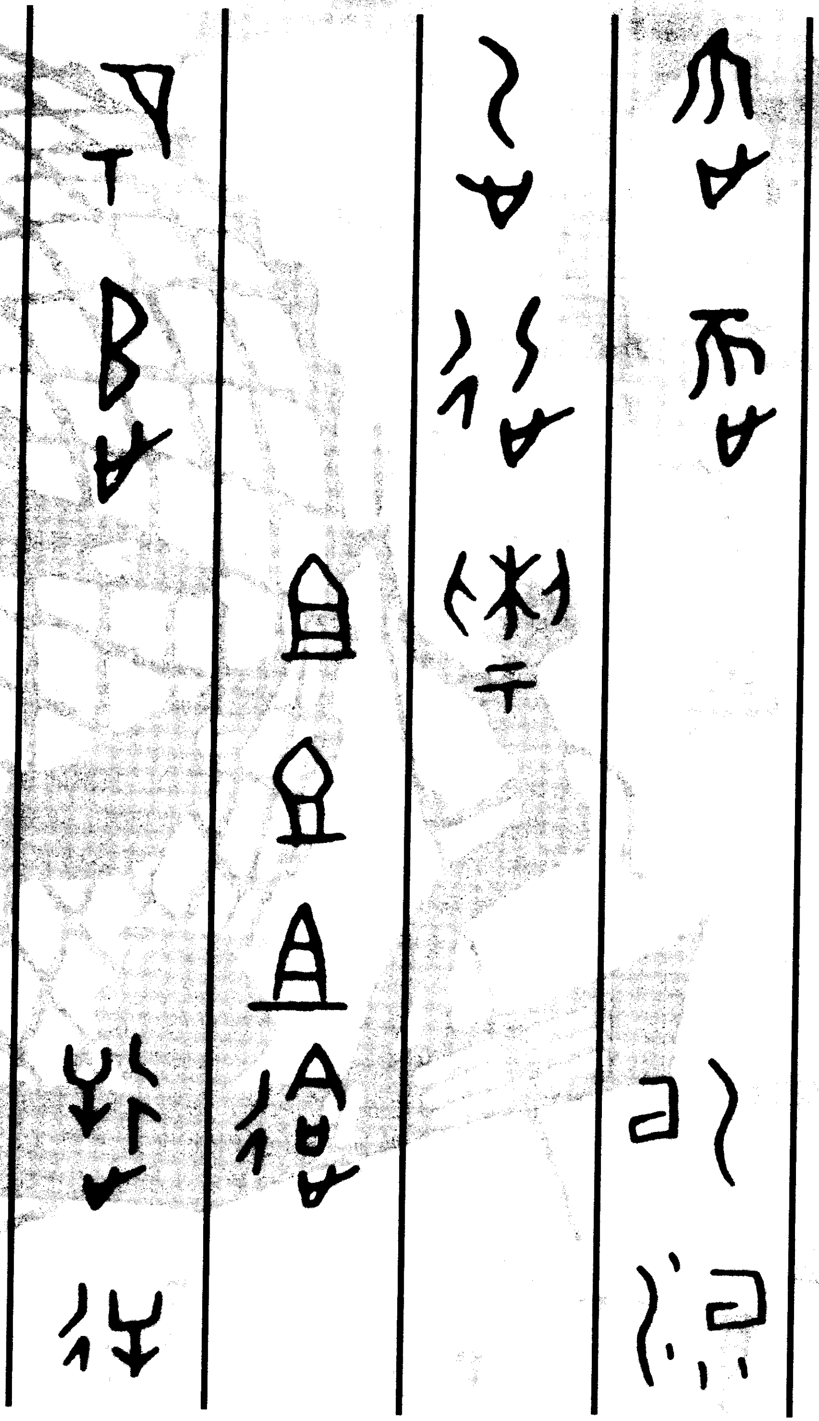


Letter Name	Greek	Phonetic Value	Letter Meaning
ʾaleph	Α	[ʾ]	ox
beth	Β	[b]	house
gimmel	Γ	[g]	throwstick
daleth	Δ	[d]	door
he	Ε	[h]	
waw	Ϝ^1 Υ	[w]	hook/peg
zayin	Ζ	[z]	
heth	Η	[ḥ]	fence
teth	Θ	[ṭ]	
yodh	Ι	[y]	arm/hand
kaph	Κ	[k]	palm of hand
lamedh	Λ	[l]	goad/crook
mem	Μ	[m]	water
nun	Ν	[n]	snake
samekh	Ξ	[s]	
ʿayin	Ο	[ʿ]	eye
pe	Π	[p]	
tsade	Μ^2	[ṣ]	
qoph	Ϙ^3	[q]	
reš	Ρ	[r]	head
šin	Σ	[š]	
taw	Τ	[t]	mark (?)

▲原始迦南文字（proto-sinaitic）、腓尼基文字以及希腊文字。



一些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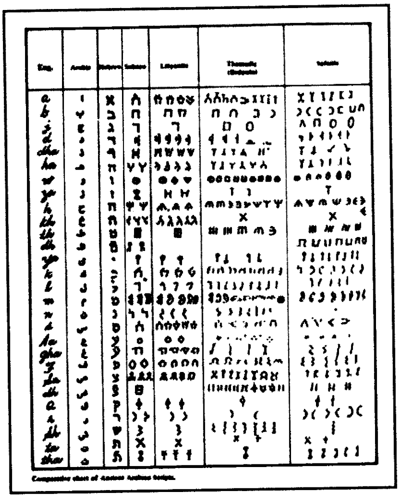


前。其根源在腓尼基文字这一事实，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很难区分。阿拉米语的具体使用范围从地中海到印度洋沿岸，说明有一支族群长期往来于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最有可能他们的职业是商人——我们干脆就认为他们是包含腓尼基人在内的迦南人。有个理论认为，希伯来人是迦南人的一个分支。

我还无法研究出中国晚夏时期的文字到底更接近于腓尼基文字还是阿拉米语，甚至是腓尼基之前的原始迦南语。或者，这几者之间都与中国文字有关。整个西亚地区由于使用以上的几种语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文明与西亚地区的紧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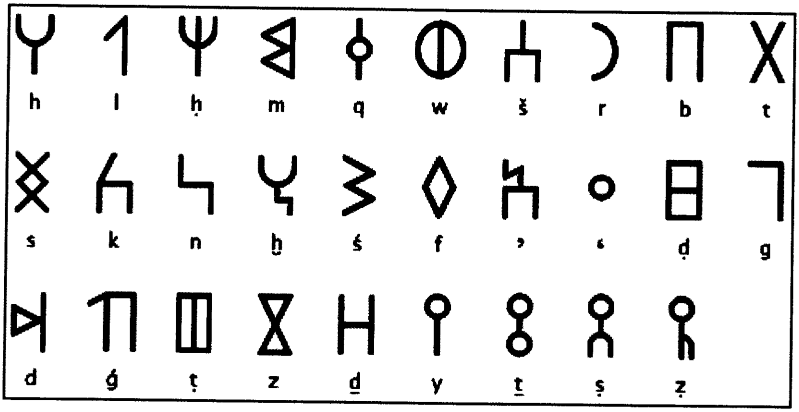
中国西部地区出现了阿拉米文字或者腓尼基文字甚至是原始迦南文字，然后是从东部随商朝人进来了“南阿”文字，这似乎说明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大约3000年前并未直接进入中国。但这个事实也应该被提出，以色列人曾经使用过阿拉米语或者腓尼基文字，甚至原始迦南文字。这里我并非在强调以色列与中国之间必须有关系，我只是提醒一个相对复杂的事实存在。事实如何不可轻易否定。可以假设，在希伯来文字产生之前中国东部被“南阿”势力强劲打入，或许来到中国的是已经腓尼基化的但人。

中国的商朝，尤其是从盘庚迁殷之后的后商开始，东部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在明显增长，他们甚至更换了一种新的语言：甲骨文，或称“南阿”。后商迁殷是一种战略转移，这也可能显示了以“商”为代表的东部政治势力“西迁”中重要的一环。


▲巴比伦文字与“南阿”文字。

现在看看与甲骨文最为接近的“南阿”文字的根系。尽管大多数有关“南阿”文字资料都显示它是从腓尼基文字而来，但是也有人指出“南阿”可能与两河南段的巴比伦文字有关，而且与今天约旦境内的港口城市Aqaba（也叫Elath）有着神秘联系。从这张表格中确实可以看到“巴比伦语”与“南阿”极其接近。这些地区都接近伊朗板块。

在查询这几个语言关系的同时我还得到了比较多的这一意见：萨巴王国与麦因王国使用同一



▲大约 2500 年前时期的“南阿”文字，这与原始“南阿”文字已经大为不同了。

种语言。“南阿”文字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萨巴（Sabean）文字”。也就是说，夏甲建立的夏王朝与以扫后裔建立的商王朝都使用了同一种文字：Sabean 文字或“南阿”文字，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发展的关系。仔细观察甲骨文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尽管腓尼基文字有明显的字母文字特点，“南阿”属于象形文字，但甲骨文确实是结合了腓尼基字母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将两者结合了起来，并且还结合了其他的文字特点。在与巴比伦文字对比中可以看到，Sabean 文字与中国文字的关系更近。

Sabean 文字来自约旦境内的港口城市 Aqaba，这个说法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今天的约旦地区也是古代腓尼基人的核心区域。那么也就是说，在腓尼基人生活的地区之中（Aqaba 港口附近）有一群人首创了“南阿”的雏形，然后这个语言在大约 3500 年前从地中海随着一些商旅进入南部阿拉伯地区。本来腓尼基人就是一个跨国商业团体，所以无论是地中海还是红海、阿拉伯海，甚至是整个印度洋与太平洋，都是他们的活动天地，他们也因而把他们使用的文字——腓尼基文字或者后来的 Sabean 文字或“南阿”文字带向了他们商业活动的地区。这条线路把一支腓尼基人的活动范围给标示出来，而且把中国商朝的部分文明来源给破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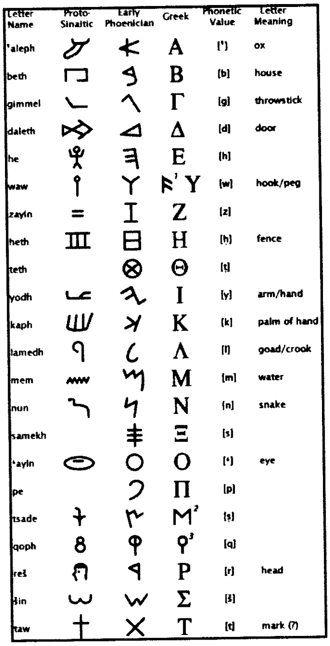
今天的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地区都是腓尼基文化的核心地区。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通过中亚进入中国地区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个族群与地中海、红海甚至印度次大陆的许多国家保持着独特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可以按照今天的情况去机械地定性中国的“三代”时期准确地对应了哪一个国家或民族。

最大的可能是，不同时期，这个以商业为核心或目的的群体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地区）服务，久而久之一些商业中转站或据点成为贸易殖民地。

腓尼基核心地区连接了世界上最早的两个文明区域：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地区，同时它自己就是古代文明最早发育的“新月地带”的一部分。它离非洲的埃及地区与欧洲的距离一样近，北部穿过高原就是欧洲的高加索地区，西北部避开小亚细亚半岛就是希腊，更有可能它通过海洋直接从距离它只有上百公里远的塞浦路斯到达克里特岛就可以登陆希腊半岛以及意大利半岛。它有地理上的绝对优势。只要航海技术足够好，他们没有理由不到东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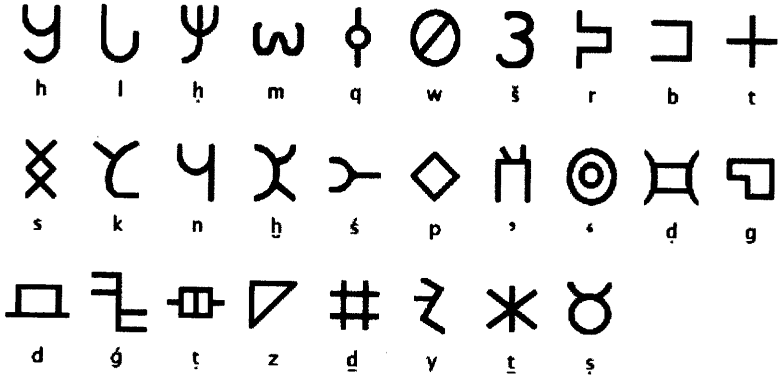
腓尼基文字一般认为出现于3800年前左右。腓尼基文字是个主干文字，现代人使用的文字基本上都来源于腓尼基文字，比如阿拉伯文字、希伯来文字、希腊文字、拉丁文字，甚至还会有我们的甲骨文字。这个现象本身又说明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所有这些文字的使用国家或地区部分就是腓尼基文化影响地区。

腓尼基文字是直接从原始迦南文字（Proto-Sinaitic）演变而来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腓尼基文字逐步抽象化、字母化、线条化；而原始迦南文字则具有明显的象形特点。


Letter Name
Proto-Sinaitic
Early Phoenician
Greek
Phonetic Value
Letter Meaning
'aleph A [ʾ] ox
beth B [b] house
gimmel Γ [g] throwstick
daleth Δ [d] door
he E [h]
waw Y [w] hook/peg
zayin Z [z]
heth H [ḥ] fence
teth Θ [ṭ]
yodh I [y] arm/hand
kaph K [k] palm of hand
lamedh Λ [l] goad/crook
mem M [m] water
nun N [n] snake
samekh Ξ [s]
'ayin O [ʿ] eye
pe Π [p]
tsade M [ṣ]
qoph Ϙ [q]
reš P [r] head
šin Σ [š]
taw T [t] mark (?)

▲原始迦南文字、腓尼基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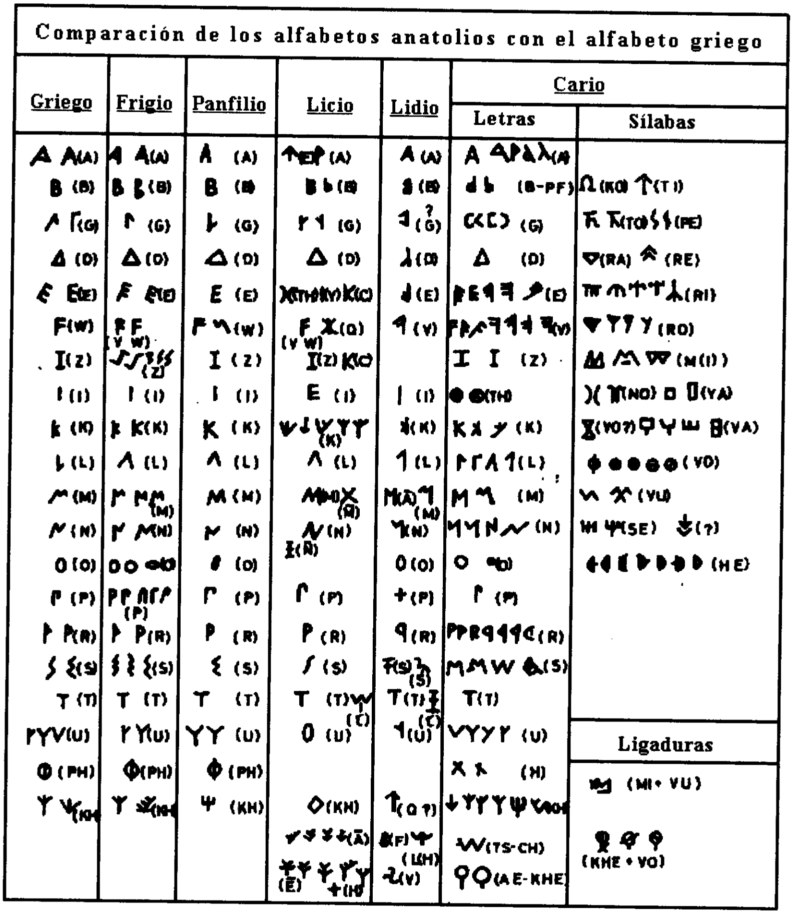
Proto-Sinaitic（原始迦南文字）又作Proto-Cnaanite。一般把今天巴勒斯坦一带看作迦南的核心地带。这附近的另外一种文字Thamudic与中国文字符号也应该有一定的关联。据说大约在3900年前古埃及人征服了西奈（Sinai）半岛，所以将那里的人使用的这个语言文字称呼为Proto-Sinaitic。又据说这个文字的最早起源并不在那里，而是在红海中南部地区，比如上埃及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苏丹或者埃塞俄比亚地区，但这些文字的使用者不是非洲的含族人，而是闪族人——他们应该从阿拉伯半岛过去的吧。这一关系又一次加深了腓尼基文化与红海之间的闪族渊源，从这里再


h
l
ḥ
m
q
w
š
r
b
t
s
k
n
ḫ
ś
p
ʾ
ʿ
ḍ
g
d
ǵ
ṭ
z
ḏ
y
ṯ
ṣ

▲ Thamudic 文字

一次理解萨巴王国与麦因王国使用“南阿”文字就容易得多了：海洋民族、闪族人、活动于地中海与红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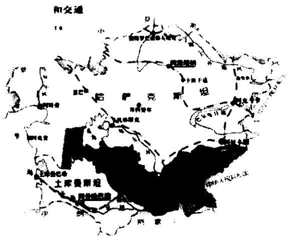
假如迦南文字真的来自红海南端，我甚至想假设，它的起源会不会与东亚的贾湖也有些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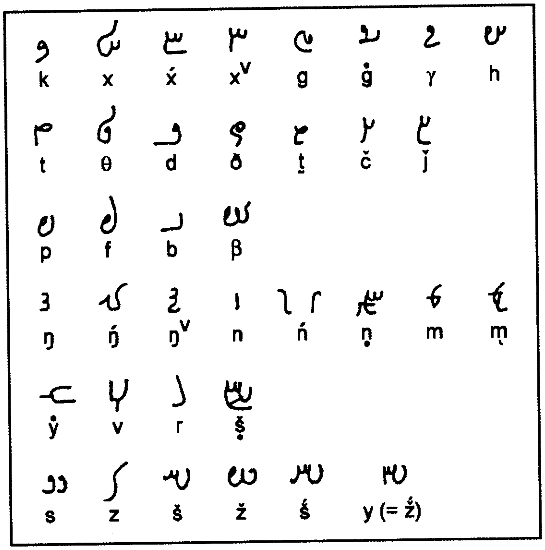
Comparación de los alfabetos anatolios con el alfabeto griego

Griego | Frigio | Panfilio | Licio | Lidio | Cario (Letras, Sílabas, Ligaduras)

▲安纳托利亚人使用的几种语言文字



中亚


k x x́ xᵛ g ġ γ h
t θ d δ ṯ č ǰ
p f b β
ŋ ŋ́ ŋᵛ n ń ṇ m m̨
ẏ v r š̩
s z š ž ś y (= ž́)

▲阿维斯陀语

伊朗的阿维斯陀语(Avestan)是一种大约3500年前就存在的古老语言，但是有文字书写却是比较晚的事情了。通过一些比对我认为这个二千多年前出现的书写字母依然与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字有一定的文化联系。

向北是爱美尼亚与格鲁吉亚地区的“古代文字”，表面看起来它们都与中国文字无关，不过原因可能由于它们是十分晚近的文字，我们经常看到的最早的源头也不超过2300年前，近的甚至只有一千多年历史。也就是说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他们古代与我们“三代”同期的文字，所以等于证据空缺。“不存在证据不能成为不存在的证据”。

这一地区是欧亚大陆的交汇点，历来为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的来往穿梭地带，所以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这里与中国的西域应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DNA 的测试似乎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 DNA 研究》第 123 页：“对于（中国新疆）罗布泊的古代群体，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全由欧洲谱系组成的序列组，从核酸多样性、平均配对差异和遗传距离上看，这个古代群体均与欧洲群体接近，这一点与韩康信先生对罗布泊遗址上的颅骨的人类学研究结论一致。”第 113 页：“罗布泊古代人骨取自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北岸墓地，属于青铜时代墓葬……，估计这批墓葬的年代大概距今约 3800 年（王炳华，1983）。从颅骨形态学数据上看（韩康信，1986），罗布泊古代人群属于人类种族中的欧洲人种（即高加索人种）。测量特征的比较说明，这些颅骨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草原和咸海沿岸地带分布的青铜时代居民的颅骨同属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于最靠东的古欧洲人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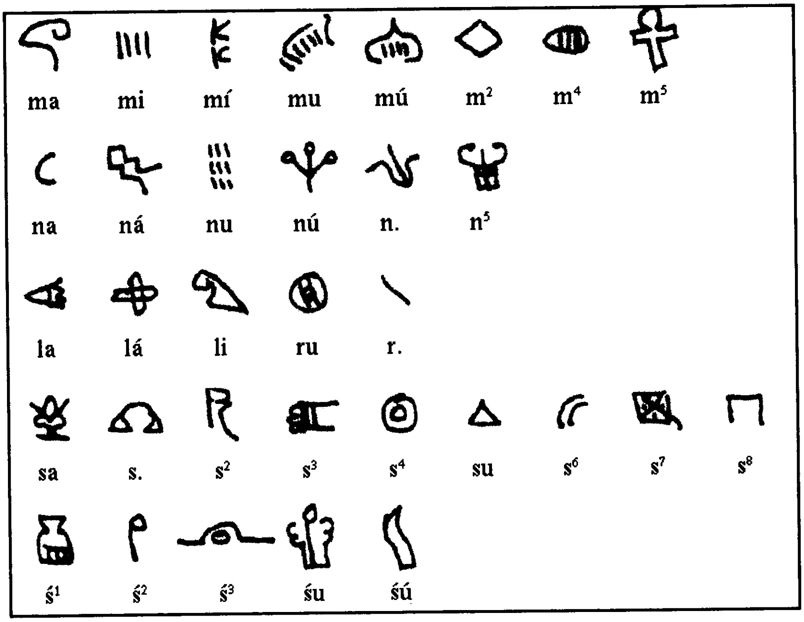
固然欧洲人还有其他通道进入中国西域，但实际上由于气候等原故，考虑到人们不会群体选择寒冷的北方旅行，所以欧洲人从高加索地区通过中亚进入中国就是一个必经的通道区域。爱美尼亚与格鲁吉亚属于亚洲地区，但它们处于“必经通道”的南段，当然从欧洲过来的人实际上也一样要经过这里。《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 DNA 研究》（第 122 页）对罗布泊北部的吐鲁番盆地的古代人群 DNA 分析显示了“在青铜及铁器时代”的“欧亚混合”的人种现象为：“吐鲁番古代人群比现代新疆土著群体在遗传距离上更接近于欧洲群体。”这说明，时间越早中国（西部）受到欧洲人的影响越大。

《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 DNA 研究》（第 120 页）：“由于吐鲁番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长时间的居民居住历史，使之成为一个亚欧人种混杂、融会的地区。形态学分析表明，青铜至铁器时代的吐鲁番盆地居民是一个有大量的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地中海类型、中亚两河类型以及他们的混合类型和少量的蒙古人种共同构成的混杂民族。”

东北两面与欧洲接近的小亚细亚地区使用的一种现已消亡的语言文字“Luwian”文字，本来被误认为是赫梯文字，后来被

分析出来为一单独的体系文字。这种文字显示出与中国文字也有一定的关联，但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象形文字在南部安纳托利亚地区以及北部叙利亚使用过，时间是大约3000年前。

不过叙利亚西部地区使用一个著名的文字体系 Ugaritic，很明显它属于楔形文字，部分古波斯地区也使用楔形文字，其起源当然是在大约5000年前的两河地区。Ugaritic 文字最后被迦南－腓尼基文字排挤消亡，这是否可以看作一种两河文明被古埃及而来的南部文明取代的宏观趋势？中国的红陶文化也显示了与两河地区的交往。但是后来腓尼基文字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出现，说明了楔形文字所代表的力量的消退。腓尼基人是否会选择绕开波斯人的途径，而从海路绕行到印度河从那里新辟一条道路呢？他们的另外一个登陆点可以是福建与山东。可以参考大汶口文化，在那里埃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共同组织了他们的登陆，或者说埃及人借助了腓尼基人的航海能力；还有一条线路是从印度半岛进入中南半岛再到中国西南。


ma
mi
mí
mu
mú
m^2
m^4
m^5
na
ná
nu
nú
n.
n^5
la
lá
li
ru
r.
sa
s.
s^2
s^3
s^4
su
s^6
s^7
s^8
ś^1
ś^2
ś^3
śu
śú

▲ Luwian 之一种

能够看到古代古什（Cush）人使用的语言文字与中国之间有着联系，但较微弱，或许是因为时间比较晚近，远古已经脱离了我们关注的时代，它明显是从古埃及体系过去的①。或许这个现象说明了腓尼基文明只在大国文明鞭长莫及的地方。

接下来看到的一种非洲文字是著名的柏柏尔人（Berber）使用的。我非常意外地发现这个遥远地区的文字竟然与中国文字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曾经广泛使用于北部非洲。当了解到这个文字的现代名称为“Tifinagh”，而它的词义为“Phoenician/Punic letter”之后我的迷惑就解除了，因为它属于腓尼基人的“作品”。

▲柏柏尔族老太太

“Punic”是我们熟悉的“迦太基”的意思，而“迦太基”就是腓尼基人在古代建立的港口商业城市，这种柏柏尔文字的古老起源不言自明。西班牙与突尼斯的联系之紧密从一个地方可见一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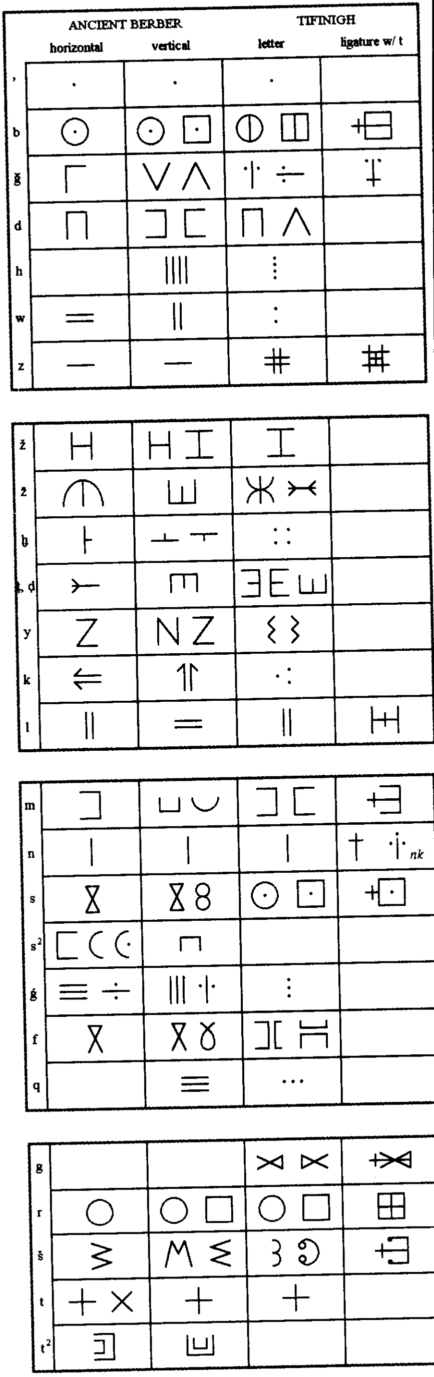
①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中国文字之间的联系可以参考《历史也疯狂》中最后一篇短文。

古代突尼斯的首府就叫“迦太基”，而西班牙面向地中海的一个大城市也命名为同样的名字，为避免重复，实际为：“新迦太基”。

本来人们以为这种文字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消失了，但现在发现它竟然存在于西撒哈拉沙漠与中撒哈拉族群中的Tuareg社区（这个部落的名称让我想起中国北方地区更经常被其他地区称呼的名字：Taugast——突厥语的“桃花石”）。假如谁觉得把它们联系起来很困难，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将它们牵强联系起来：腓尼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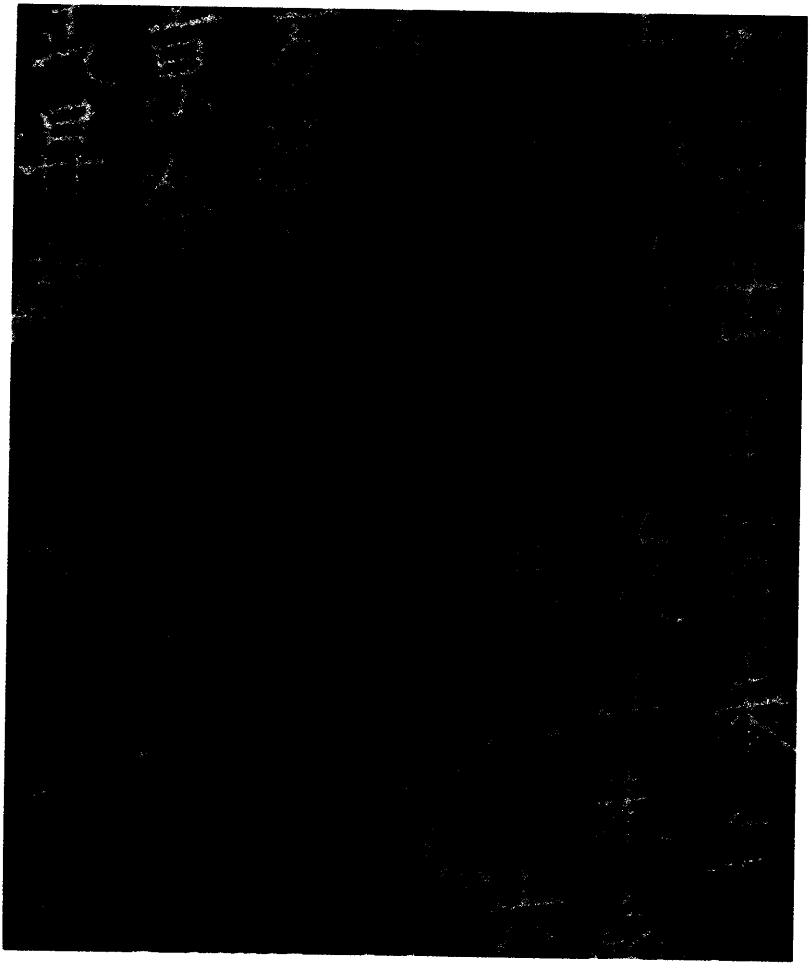
奇特的是“Tifinagh”是一种“女书”，只有女人使用。在中国也有“女书”。据说中国女书是由于秦朝时期为了统一文字，女书的部落就把他们的文字保留在女性中间，男性使用了秦统一后的文字。不过我相信这只是一个传说，真实的情况也可能是别样的。文字在古代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和今天情况大为不同。某个古老时期人们或许认为文字可以通灵，只保留在少数人手中。在妇女地位特别高的部族当然就只能在妇女中间使用，假如一直恪守这个传统那么最后就是女书了。中国的水书在过去也只在家族内部流传，不能向外人透露。

罗马文字与阿拉伯文字是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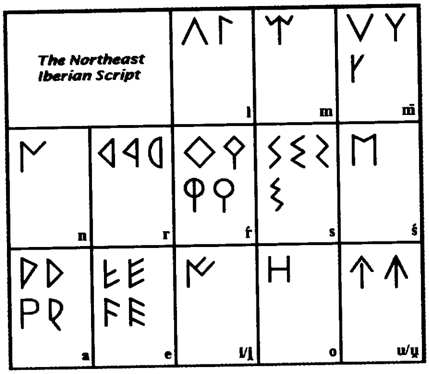

ANCIENT BERBER
TIFINAGH
horizontal
vertical
letter
ligature w/ t
ʼ
b
ǧ
d
h
w
z
ž
ẓ
ḫ
ḍ
y
k
l
m
n
nk
s
s²
ġ
f
q
g
r
š
t
t²

▲北非人使用的“Tifinagh”或“Ber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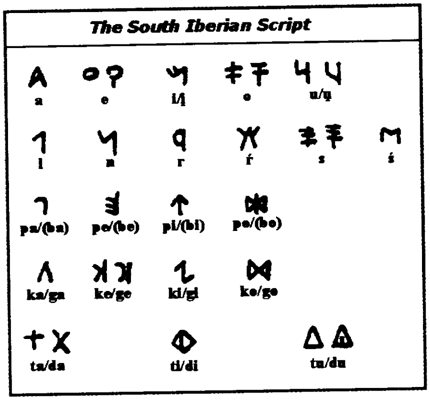
后出现而对这个撒哈拉女书造成冲击的文字体系。其实，从这个简单的事例中我们已经逐渐可以推测到腓尼基人的式微是从大约2600年前左右开始的。全球的战乱与不稳定开始，所谓“上天变乱”是也。一个曾经保持了大约2000年的稳定秩序被打破，腓尼基人自由浪迹天涯的时代结束了。也所以，这个语言对比的文字实际上底线也必须是在这个时限之前才合适，否则就很冒险，或者不能说明问题。



▲我知道肯定会有许多人反对我使用如此简单粗暴的外观方法来对比文字，但我认为这是很实用的一种方式。粗耕细作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只要因地适宜就是正确的。比如这样从外观上与汉语有密切联系的文字，当然可以认为与中国汉文化有极大关系，甚至它的某些字与中国汉字都是重合的，但整体却又是不同的。这就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的一种语言：契丹文。“粗耕”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中国早期的文字符号与中东的联系正是同样的逻辑。


The Northeast Iberian Script
l
m
m̄
n
r
f
s
ś
a
e
i/i̯
o
u/u̯

▲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东北地区（西班牙）史前文字


The South Iberian Script
a
e
i/i̯
o
u/u̯
l
n
r
f
s
ś
pa/(ba)
pe/(be)
pi/(bi)
po/(bo)
ka/ga
ke/ge
ki/gi
ko/go
ta/da
ti/di
tu/du

▲南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史前文字

假如事先不知道腓尼基人的文化扩张能力以及他们对欧洲的影响我是会对于文字方面的发现大大友邦惊诧一番的，因为远在大西洋东岸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使用的文字竟然与中国史前文字有明显的关系，并且兼具夏符号与甲骨文字特色。

假如说位于地中海最西部的伊比利亚的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字之间有联系的痕迹还不能让我惊讶的话，那么北欧的发现则大大震惊了我，因为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之外。

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古代几乎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而这种文字与中国文字的相似程度甚至超过了伊比利亚！我以为尽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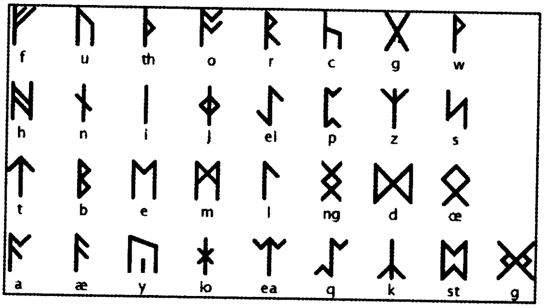
全球文明同源，但是欧洲的文字肯定与中国的文字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次我错了，它们之间存在着神秘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从腓尼基人推测到伊特鲁里亚，然后又扯上凯尔特人的原因所在。语言发展痕迹给了我这个信心。

但是，今天人们所见的欧洲文字都不是我所指的这种名字叫做“Futhark”或者“Runes”的文字的后代，它们都最终被拉丁文或希腊文字所取代，它们又被称呼为“原始日耳曼文字”(Proto-German)。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这个文字体系就是字母体系，而不是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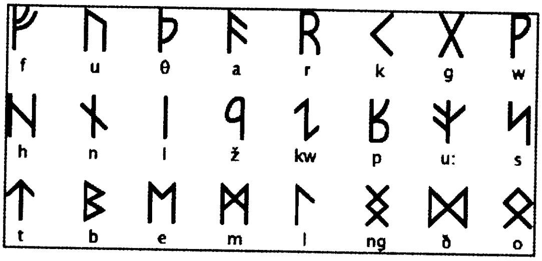
据说这个文字使用的时间是在两千多年前，而消失的时间分国家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这要看它们被罗马人征服的时间。这种文字据说来自地中海！有人认为它们与伊特鲁里亚人或者古希腊人有关。这就解释了它可能的腓尼基根源，同时它解释了腓尼基文化的影响力。我认为有了这些旁证，中国人接受甲骨文曾经受到过腓尼基文字影响这一思路就容易多了。

至于其传播路径，可以沿海走利比里亚半岛北上，也可以从希腊或者意大利直接北上陆地。也有人说这些文字是哥特人创造的，我觉得在找到腓尼基根源之后似乎就不必再操心这个结论了。

据说这种文字总是让欧洲人想起“野蛮人”与“异教徒”，所以这个文字符号作为普通语言消失之后依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具有怪异的神秘意味。这个现象只说明了一个问题，腓尼基人是善于占卜的一个迷信族群。这也正是中国商人的特点，甚至他们最初的文字今天只发现于占卜的甲骨上。


f
u
th
o
r
c
g
w
h
n
i
j
el
p
z
s
t
b
e
m
l
ng
d
œ
a
æ
y
io
ea
q
k
st
g

▲ futhark_anglosaxon 这种英国史前文字与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应该说是有关联的，这个关联可能是通过商人建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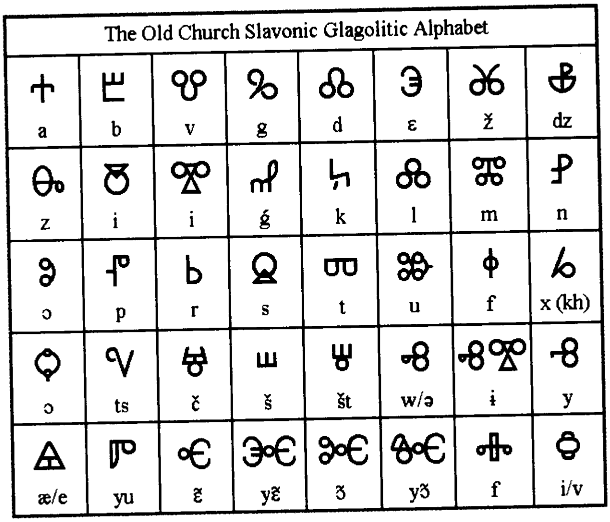

f
u
θ
a
r
k
g
w
h
n
i
ž
kw
p
u:
s
t
b
e
m
l
ng
ð
o

▲ gothic_runes 文字

在这个欧洲文字体系中，它的“Y”与“J”所对应的字母是可以置换的，这也顺便解释了为什么在汉语中总是发生“Y”“J”互换的根源。说明这个特殊的发音习惯非常久远，当它延伸进中国的汉语中时已是一种约定

俗成。比如《希腊神话》中的“Jason”在中国通常被翻译为“伊阿宋”（Yi A Song）。

Futhark与日耳曼语有渊源关系，甚至某些德国字里依然有这些文字的痕迹。它在欧洲消失的时间有的是在2世纪，有的在4世纪，还有的在9世纪。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消失的时间最晚，为16世纪。这与地理的偏远有关，我们很容易地看到了越偏远越保守的人类学规律。在东亚，可以说它一直保留到今天。


The Old Church Slavonic Glagolitic Alphabet
a
b
v
g
d
ɛ
ž
dz
z
i
i
ģ
k
l
m
n
o
p
r
s
t
u
f
x (kh)
ɔ
ts
č
š
št
w/ə
ɨ
y
æ/e
yu
ɛ̃
yɛ̃
ɔ̃
yɔ̃
f
i/v

▲斯拉夫文字

今天俄语所在的斯拉夫语或文字，应该是后期从希腊文字演化而来，所以也可以说它们具有地中海的气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斯拉夫人（以及使用这种语言的部分中亚人）与地中海北岸确实有密切的文化联系，但究其根系当然依旧是腓尼基文字。这是毫无疑问的。

斯拉夫语文字之前的一种古老文字可能是一种称呼为Glagolitic的文字，不过它们与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字有显著的差别，但并非一点联系都没有。我现在意识到，无论甲骨文还是夏晚期或者半坡的文字符号都是偏于中原的，而中国西域文字我们实际上知之甚少，所以不能判断西域与这些文字之间的关系。很可能西域的文字研究出来之后会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新概念，指出总体文明西来的某些特殊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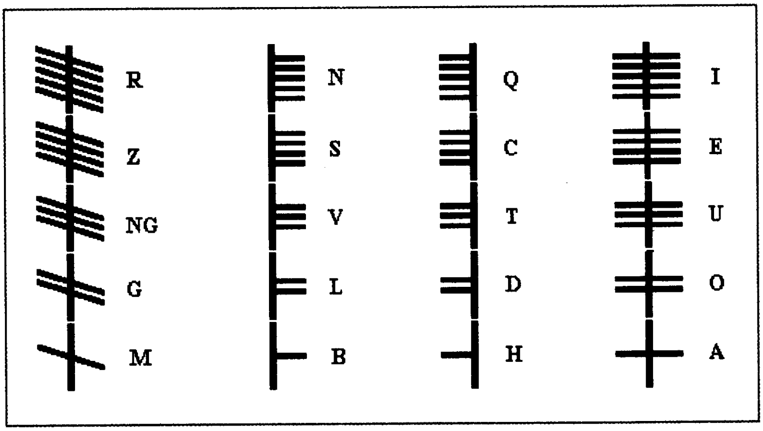
古代不列颠群岛上的文字Oghams非常有趣，全部由线条组成。有人说它是从Runes而来，我觉得假如从结绳记事的外观而来可能更实际。

《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第8页：“（罗布泊）古墓沟组的颅骨具有较宽而低的面，眉弓和眉间突度强烈，鼻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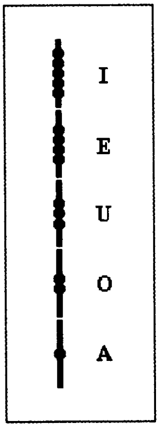
起明显；长－中颅型，颅高较高，额较倾斜，低眶，研究者认为，该组头骨的体质特征与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比较接近。他们是目前已知的在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居民。”看来这些分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书第5页：“（吐鲁番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出土人骨大致可分为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以及这两大人种的混合类型三类。其中属于欧罗巴人种的个体又可以分为三个亚组：……在体质特征上较接近原始欧洲人种类型。……在体质特征上较接近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人类学特征接近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

不过这些分析的人群有的属于“三代”时期，有的可能晚近至西汉时期。实际上我们熟悉的楼兰人时间就很晚近，并且他们也是欧罗巴人种。

基于以上欧洲与中国西域的联系，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推测：中国西域或中国北方与欧洲之间长期存在着联系，在某一时段里欧洲人向东，在另外一个时段里中国北方人又向西发展，但这批人的活动规律可能是一直在大约北纬40度上做横向拉锯战，其范围可能一直到中国的渤海湾，甚至俄罗斯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其最西可能达到英国。但具体哪些时候向西哪些时候向东，却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



▲ Ogh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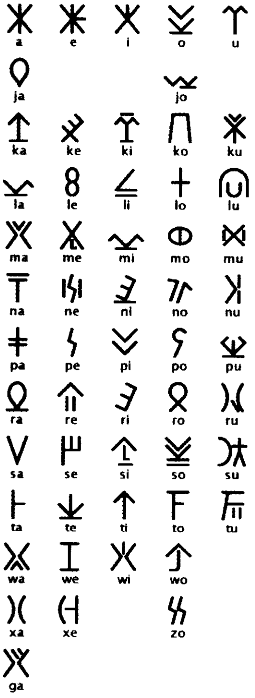
▲ 这个“Oghams”让我想起中国的珠算。

地中海路线

地中海是欧洲与非洲甚至与部分亚洲的分界线。

分界线，实际上也是过渡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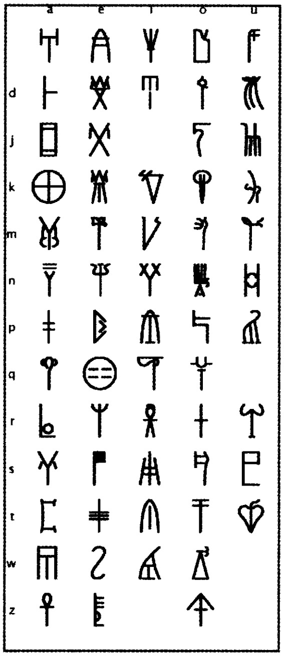
地中海与红海的不同在于地中海比红海更宽大，所以地中海里有许多岛屿，这些岛屿毫无例外都属于善水民族。塞浦路斯是最靠近地中海东岸的一个较大岛屿，它们之间的距离与台湾海峡宽度大致相等，不会超过300公里。这里理应是腓尼基人的乐园，从文字上也验证了这一点。


a
e
i
o
u
ja
jo
ka
ke
ki
ko
ku
la
le
li
lo
lu
ma
me
mi
mo
mu
na
ne
ni
no
nu
pa
pe
pi
po
pu
ra
re
ri
ro
ru
sa
se
si
so
su
ta
te
ti
to
tu
wa
we
wi
wo
xa
xe
zo
ga
▲塞浦路斯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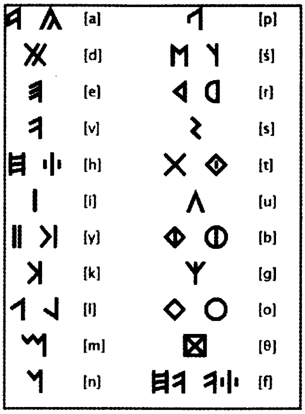
塞岛至少在3500年前已有了文字，但是据说它的文字与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A型最为接近（Liner A），与迈锡尼（Mycenaean）的Liner B当然也很接近。无论如何，克里特岛以及希腊最南端的文字A、B型都可以看出来与中国（中原）文字之间有一定联系，不过确实也有差异。

克里特岛一带的考古曾经发现有金面具，中国三星堆也有类似物品出土。我曾经思考过这个联系，但是三星堆浓郁的阿拉伯文化色彩曾经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腓尼基人的活跃再次把地中海与中国中原的交流提了出来，我要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河南商地也发现过人面陶范，想必也是可以制作金面具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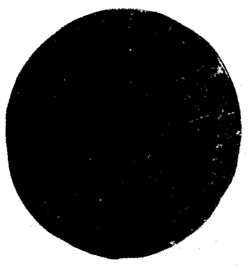
希腊化、罗马化发生之前是LinerA、LinerB型文字的使用期，都在大约3500年前。这个时间需要仔细鉴别才有意义。维尼提亚语（Venetics）使用于大约3000年前的希腊半岛与意大利半岛之间的亚得里亚海北岸偏意大利地区，水上城市威尼斯


a
e
i
o
u
d
j
k
m
n
p
q
r
s
t
w
z

▲迈锡尼文字 Liner B


[a]
[p]
[d]
[ś]
[e]
[r]
[v]
[s]
[h]
[t]
[i]
[u]
[y]
[b]
[k]
[g]
[l]
[o]
[m]
[θ]
[n]
[f]

▲维尼提亚文字，其中的一半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其对应文字或字母。



▲克里特岛 Phaistos Disc 是一个单独的文字体系，使用于大约3700年前，与中国地区的文字符号有明显联系。此文字可以看作 Liner A 的一个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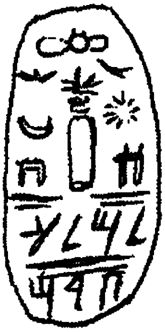
就在这个区域。该文字体系现在已经灭绝，最后被希腊文字替代，当初可能受到过伊特鲁里亚文字的影响，有人怀疑北欧的“Runes”就来自Venetics。

意大利半岛在罗马人占领之前充满着令人迷惑的民族与文化，许多谜团至今无法解开。我想假如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或许真相就会向我们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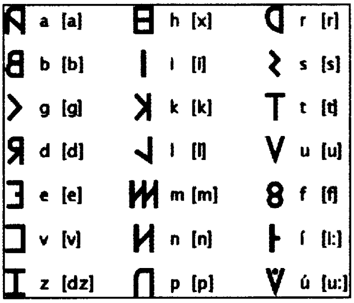
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意大利半岛最主要的文化影响力来自伊特鲁里亚，罗马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同样来自伊特鲁里亚文字。其后是罗马化时期。罗马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把拉丁文字普及到哪里，至今的西欧完全是拉丁文影响的天下。近100年内，不断有开放的中国人希望改革中国的文字，其中一派就是希望将汉语拉丁化。我并不了解这个文化号召的具体原则，但是我想这也没什么。假如我的猜想是正确的，甲骨文本来就是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拉丁文是其另外的一个支系而已，分分合合，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拉丁文如此看与汉字本来就是同源的。其他民族改换语言的例子很多，中国真的要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不过我个人就感情上确实也是不怎么接受的，但感情这个东西完全可以不理会——我指我个人的感情可以不理会，只要整体社会进步需要，什么都可以舍得。

罗马坐落于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河流 Tiber（台伯）河上，我看到这个词汇的第一反应是，Tiber 与 Tibet（西藏）之间会不会有什么独特关系？这当然是个随意的联想。但或许有些意义。有人说古代藏人称呼为“bet”，到了欧洲就演变为“Tibet”，或许吧。

希腊人是欧洲第一批使用字母文字的人群，不过最初希腊文字有许多分支。这些分支与中国的中原文字符号有着明显的联系。表中所列的这几种都与中国文字关系密切，但是最密切的一种我认为是 Corinth 文字。它不仅有类似“3”这个符号，而且还有一个类似于“己”的符号，在山东或者商朝的陶杯上有一模一样的描绘，或许这是一种“3 崇拜”的痕迹。希腊文字来自腓尼基文字，假如我们说它们与伊特鲁里亚文字有密切关联或许更有道理，因为它们地理距离更近。


▶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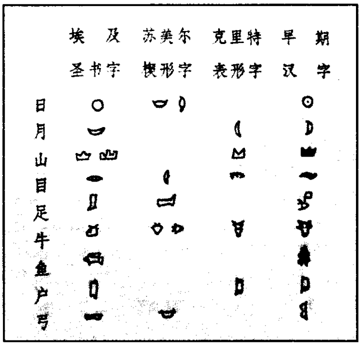
伊特鲁里亚文字与中国文字极其接近，可以肯定 80% 的文字都出现于中国“三代”时期文字符号里。伊特鲁里亚文字的使用时间为大约 2800 年前到 2400 年前，后来随着被罗马征服整个伊特鲁里亚文化在大约 2000 年前消失。


a	[a]	h	[x]	r	[r]
b	[b]	i	[i]	s	[s]
g	[g]	k	[k]	t	[t]
d	[d]	l	[l]	u	[u]
e	[e]	m	[m]	f	[f]
v	[v]	n	[n]	ſ	[l:]
z	[dz]	p	[p]	ú	[u:]

▶意大利南部文字

在神秘的不知源头的“伊特鲁里亚”族群面前，我有一个更牵强附会的推测，它是否从西域而入中国，与“吐鲁番”是否会有联系？有人以前推测过中国西北甘肃出现的神秘“土火罗”文字可能与“吐鲁番”有关，我想在这里再加上一个“Etruria”的嫌疑，假如粗心的话“tru”这第一重读音节是可以发音为“土罗”的。

有个驻北京的俄罗斯记者在采访我时，我提到伊特鲁里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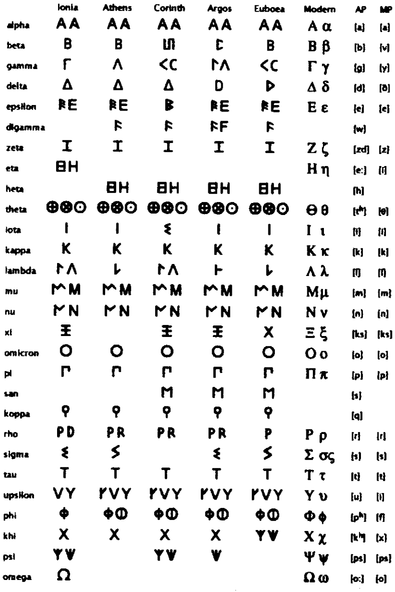

埃及圣书字
苏美尔楔形字
克里特表形字
早期汉字
日
月
山
目
足
牛
鱼
户
弓
▶早期几种文字的比较，此表引自董琨著《中国汉字源流》。不过董先生并不认为这些文字有同源关系，我的意见则相反，尤其是地中海上的克里特文字也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化，他告诉我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历史大致三个来源：一个是芬兰一带的北欧人，一个是蒙古人，还有一个是俄罗斯西南地区的欧洲来源。他说有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这个词汇就来源于“伊特鲁里亚”的一部分：Russia——Etruria，摘取了其中的第二、第三音节：“ruria”。其实我更愿意使用Etruscan（伊特鲁里亚人）与Russian作对比。

今天意大利的托斯卡尼（Tuscany①）来自Etruscan应该是没问题了。

本来我觉得俄国人这个说法是否太离奇了，不符合语言常规，因为一般是选取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音节的，怎么这里是选取中间部分？但研究后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且也符合语音规律。因为“ruria”是重读音节，前面的“et”由于发音不响亮，时间长了是可以“磨损”殆尽的。

文字方面的分析就基本到此结束了。这是个挂一漏万的旅行，连走马观花都算不上，但这个“野蛮”行径在以后才能看到它存在的意义。



	Ionia	Athens	Corinth	Argos	Euboea	Modern	AP	MP
alpha	AA	AA	AA	AA	AA	Α α	[a]	[a]
beta	B	B	ᗰ	Ꮯ	B	Β β	[b]	[v]
gamma	Γ	Λ	<C	ᛚΛ	<C	Γ γ	[g]	[γ]
delta	Δ	Δ	Δ	D	ᐅ	Δ δ	[d]	[ð]
epsilon	ꟻE	ꟻE	ꟻ	ꟻE	ꟻE	Ε ε	[e]	[e]
digamma		Ϝ	Ϝ	ϜF	Ϝ		[w]	
zeta	I	I	I	I	I	Ζ ζ	[zd]	[z]
eta	⊟H					Η η	[eː]	[i]
heta		⊟H	⊟H	⊟H	⊟H		[h]	
theta	⊕⊗⊙	⊕⊗⊙	⊕⊗⊙	⊕⊗⊙	⊕⊗⊙	Θ θ	[tʰ]	[θ]
iota	I	I	Ƹ	I	I	Ι ι	[i]	[i]
kappa	K	K	K	K	K	Κ κ	[k]	[k]
lambda	ᛚΛ	ᒪ	ᛚΛ	⊦	ᒪ	Λ λ	[l]	[l]
mu	ϺM	ϺM	ϺM	ϺM	ϺM	Μ μ	[m]	[m]
nu	ИN	ИN	ИN	ИN	ИN	Ν ν	[n]	[n]
xi	Ξ		Ξ	Ξ	X	Ξ ξ	[ks]	[ks]
omicron	O	O	O	O	O	Ο ο	[o]	[o]
pi	Γ	Γ	Γ	Γ	Γ	Π π	[p]	[p]
san			Ϻ	Ϻ	Ϻ		[s]	
koppa	Ϙ	Ϙ	Ϙ	Ϙ	Ϙ		[q]	
rho	PD	PR	PR	PR	P	Ρ ρ	[r]	[r]
sigma	Ƹ	S		Ƹ	S	Σ σς	[s]	[s]
tau	T	T	T	T	T	Τ τ	[t]	[t]
upsilon	VY	ϒVY	ϒVY	ϒVY	ϒVY	Υ υ	[u]	[i]
phi	Φ	ΦΦ	ΦΦ	ΦΦ	ΦΦ	Φ φ	[pʰ]	[f]
khi	X	X	X	X	ΨΨ	Χ χ	[kʰ]	[x]
psi	ΨΨ		ΨΨ	Ψ		Ψ ψ	[ps]	[ps]
omega	Ω					Ω ω	[oː]	[o]

▲希腊各个地区不同的史前文字，包括Corinth文字。

参考书目及网站：

张光直著，《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 月版

张光直著，《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 月版

张光直著，《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张光直著，《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 1 月

张光直著，《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 年版

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年版

中国地图出版社编，《世界分国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 年版

崔银秋著，《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 DNA 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9 月版

戴尔 · 布朗主编，《凯尔特人 铁器时代的欧洲人》，华夏出版社 /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

戴尔 · 布朗主编，《美索不达米亚 强有力的国王》，华夏出版社 /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

戴尔 · 布朗主编，《东南亚 重新找回的世界》，华夏出版社 /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

戴尔 · 布朗主编，《安纳托利亚 文化繁盛之地》，华夏出版社 /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

戴尔 · 布朗主编，《伊特鲁利亚人》，华夏出版社 /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版

戴尔 · 布朗主编，《早期欧洲 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华夏出版社 / 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 月

启文著，《古罗马 英雄时代的神与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3 月版

袁珂编，《中国神话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 年 1 月版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国古代民族志》，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 土耳其卷》，商务出版社，2002 年 8 月

马书天著，《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1997 年 1 月版

王树声 张亚南著，《地理参考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年版

彭树智 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 阿富汗卷》，商务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王新刚著，《中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出版社，2003 年 8 月

徐善伟 顾銮斋著，《蓝色诱惑 爱琴文明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4 月版

李万福 杨海明著，《图说文字起源》，重庆出版社，2002 年 1 月版

汤惠生著，《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三秦出版社，2003 年 5 月版

宋兆麟著，《会说话的巫图》，学苑出版社，2004 年 8 月版

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 月版

段清波主编，《中国古陶器》，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 年 1 月版

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 1 月

（美）劳费尔著，《中国伊朗编》，商务出版社，2001 年 3 月版

刘超之、艾英译，《希腊神话故事》，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东汉）许慎原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2002年版

陈初生编纂，《金文常用字典》，2004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缩印本），1999年版

黄秀莲、沈文轩编，《最新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张芝联、刘学荣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

陈德中译，《希腊神话故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郭宝华著，《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黄振著，《列国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杨孝柏著，《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阿拉伯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鲍会园著，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更新传道会，1997年简体初版

托马斯·斯瓦尼/帕里斯·巴尼斯著《海洋世界》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年9月版

湖南省博物馆著，《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拉尔夫·伊利斯著，《所罗门 示巴女王之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雷钰、苏瑞林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版

周烈、蒋传瑛著，《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王铁铮、林松业著，《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版

马歇尔·萨林斯著，张宏明译，《“土著”如何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马歇尔·萨林斯著，张宏明、黄向春、刘永华译，《历史之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修订本《辞源》，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李先登著，《商周青铜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江森、文逊著，《圣经家谱1纸通》，天智出版社

李汉平译，《祖先的声音－非洲神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石玉新、徐俊元、张占军著，《华夏姓氏考》，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刘婷 任刚著，《朝圣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文物出版社编，《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2004年2月版

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商务出版社，1996年版

何新著，《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版

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游记》，远方出版社，2004年1月

上杉千年著，《郑和下西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月

《尤斯伯恩彩图世界史 史前世界》，成都地图出版社，2001年9月

《尤斯伯恩彩图世界史 古代世界》，成都地图出版社，2001年9月

http://www.ancientscripts.com/lorentz/

http://www.cuttingedge.org/All_Seeing_Eye_Egyptian_Boat.jpg

http://www.theinterestingshop.com/pages/ancient%20weapons.htm

http://www.gznywmuseum.com/index_2_4.htm

http://www.zb-lzonline.com/2003tbh/zbtc2002/beijing/LISHI/wenwu/001.htm

http://www.ycxljy.com/ztwz/myweb/index.html

http://www.white-collar.net/02-lib/01-zg/03-guoxue/

http://www.nms.ac.uk/etruscans/www/asp/main.asp?id=4&sub=1

http://www.ou.edu/class/ahi4163/files/stone06.html

http://lexicorient.com/cgi-bin/eo-direct-frame.pl?http://i-cias.com/e.o/can_phoe_rel.htm

http://www.songsouponsea.com/Promenade/GnosisK.html

http://24.24.31.212/literature/POL-HS-Origin-Writing.htm

http://www.xanthos.com.au/

http://turkeyinmaps.com/Sayfa1.html

http://www.sephardicstudies.org/maps.html

http://www.phrygians.com/maps.html

http://www.ancientanatolia.com/

http://www.keyway.ca/htm2002/20020518.htm

http://www.helmink.com/Antique_Map_Blaeu_Anatolia/

http://www.livius.org/anatolia.html

http://www.usc.edu/dept/LAS/religion/arcproj/war/EssayFive.html

http://www.faradventurestravel.com/Iran.htm

http://web.sst.org.cn/hot/k1/01/6-01-00.htm

http://homepage.mac.com/cparada/GML/ThreeAncestors.html

http://www.timelessmyths.com/classical/asia.html#AsiaMinor

http://www.bestofsicily.com/mag/art115.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oenicia#Origins

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vrml/tomb5/advance5.htm

附页

2001 年 2 月 7 日《生活日报》：山东人、欧洲人基因相似？

最近，有消息称，我国分子考古学研究最新发现，2500 年前的山东临淄人与现代欧洲人的基因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消息称，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专家与日本的有关研究机构合作，以山东临淄区古墓群中古人类 DNA 为标本，提取并纯化了该地区 2500 年前、2000 年前的古人骨 DNA 和现代人的 DNA，并分别与从国际基因数据库中筛选的 1300 多个标本进行了 DNA 特征的比较，结果发现，2500 年前的临淄人与现代欧洲人的基因非常近似，2000 年前的临淄人又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阿尔泰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而当代的临淄人与现代的东亚人基因特征非常接近。

对此，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生物中心的韩金祥主任认为，随着基因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好多原来的观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得出上述结论也是可能的。另外有关专家还发现，中国人的基因和加拿大人的基因也有着相似之处，这些都对传统的进化论观点形成一定的冲击。

据了解，这一研究的原理是，线粒体 DNA 具有母系遗传的特征，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种类人群的线粒体 DNA 多态性最高的区域样本进行比较，从而可得出上述的结论。①

简短说明

本书参考大量来自网络资料，由于网络特点，许多出处未能详备。有异议者请尽快与作者联系，并特别对于提供信息的一切途径与个人表示感谢。

苏三 于北京王府井
susanxuxu@126.com
“苏三客厅”论坛：http://blog.sina.com.cn/m/susanxu

本书 2005-1-20 初稿
本书 2005-6-20 修改
本书 2005-7-15 再改

[redacted]

苏三其人：

★中国当代最具争议的学者

☆新浪“2004 年度中国文化人物”评选第九名

★香港媒体称之为“21 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

苏三其书：

★迦南（Cana）就是中国（China）？

☆商朝为腓尼基人与赫梯人合建？

★商朝的“轮流坐庄”可能与腓尼基人与赫梯人合建有关？

☆商朝为“商人之朝”？

★中国传统渔船上的“龙目”竟然“腓尼基之眼”？

☆腓尼基人与中国人谁是真正的“龙的传人”？